

《世界通史》选编

英法德俄历史

1830—1917

上 册

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在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配合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们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部分内容选编出版，提供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供学习时参考。

选编以英、法、德、俄四国历史为主，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期开始，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为止。选自第六卷和第七卷，共二十六章（有些章的个别小节删除），按原书先后顺序重新进行编排。各章标题、文字基本未动。地图择要选用，其他插图一律不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主要代表人物的有关材料选录附后。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六、七两卷，是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之后编辑出版的。选编的部分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如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扩张，甚至公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这幅地图上将我国领土划进俄国版图等，希读者批判地阅读。

1972年2月

目 次

第一章 十九世纪 30—40 年代西欧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高涨 1

1. 法国的 1830 年革命和资产阶级君主制 1

七月革命(1) 1830—1847 年的经济发展(4) 征服阿尔及利亚(6) 工人和农民的状况(7) 1831 年和 1834 年的里昂起义(8) 秘密的革命组织。罢工运动(9)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12) 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3) 埃蒂耶纳·卡贝(14) 40 年代革命的共产主义。德萨米(15) 七月王朝危机的成熟(16)

2. 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宪章运动 18

资本主义的发展(18)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19) 工人运动(21) 1832 年的议会改革(21) 宪章运动的产生。宪章运动中的派别斗争(23) 1842—1847 年的宪章运动(26) 自由贸易的胜利。工厂法(28) 殖民政策(29) 加拿大的 1837—1838 年起义(31) 澳大利亚(33) 南非洲(33)

3. 德意志 34

工业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状况(34) 革命运动和反对派运动。关税同盟(35) 思想领域中对反动势力的斗争(37) 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魏特林。“真正的社会主义”(38)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39)

第二章 30—40 年代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增长 41

1. 农奴制经济的解体 41

农业危机(41) 工厂生产的开始(43)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45)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高加索、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的特点(47)

2.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51

封建社会的阶级分化(51) 人民的反封建运动(52) 高加索各族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殖民压迫的斗争(54) 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56)

3. 社会思想.....59

30 年代的社会运动(59) 40 年代的社会思想的活跃局面。斯拉夫派和西欧派(61) 革命民主主义派。维·格·别林斯基。依得拉舍夫斯基派(64) 俄国各民族的先进社会思想(67)

第三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卡尔·马克思

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70

1. 资本主义在西欧和美国的胜利。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开始.....7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70)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早的独立的斗争(71)

2.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73

卡尔·马克思革命活动的开始(73) 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7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的开始(7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会见。他们共同活动的开始(78)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科学上的革命变革(79)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奋斗.....82

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新的革命学说原理(82) 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84)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84)

4.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共产党宣言》.....86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86) 《共产党宣言》——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的纲领性文献(88)

第四章 1848—1849 年欧洲的革命和革命运动.....93

1. 革命形势的产生.....93

人民骚动(93) 政治形势的尖锐化(94)

2. 法国的革命.....95

巴黎二月事件(95) 成立临时政府(96) 争取红旗和争取

“劳动权”的斗争(97)	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98)	临时政府的对内政策(99)	国际上对法国革命的反应(100)	制宪会议的选举(101)	反动的加强。5月15日的示威游行(102)	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03)	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它的历史意义(104)	反动势力的嚣张。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105)	1849年春天民主运动的高涨(106)	1849年6月13日巴黎的示威游行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107)	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第二帝国的建立(108)
3. 德意志的革命	110										
1848年三月革命(110)	农民运动(111)	普鲁士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巴登起义(112)	波兹南的波兰人起义(113)	普鲁士反动派转入进攻(11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114)	争取统一德国的斗争。法兰克福议会(117)	1848年秋德国的革命战斗(118)	反革命在普鲁士的胜利(119)	民主阵营划分界限(120)	1849年的帝国宪法(121)	1849年五月起义(122)
4. 1848—1849年的英国	124										
宪章运动的新高涨(124)	1848年4月10日的示威游行(125)	宪章运动的历史意义(126)	1848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27)								
5. 1848—1849年革命的总结和意义	128										
第五章 十九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工业霸权	132										
英国在工业上的优势(132)	贫富悬殊的加剧。劳动大众的状况(134)	“工联主义”。工人贵族的产生(135)	合作社(137)	英国的政治生活(137)	对外政策和殖民政策(140)	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1867年起义(141)	50—60年代的工人运动(142)	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143)			
第六章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1859—1861年的											
革命形势和农奴制的崩溃	146										
1. 俄国革命形势的成熟	147										
政府的初步改革方案(147)	1858—1860年农民运动的高涨(148)	贵族废除农奴制的方案(149)	赫尔岑在十九世纪								

50年代的革命宣传(150)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争取农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151)	俄国革命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开端(153)
2. 废除农奴制的法令		155
	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阶段(155)	临时义务农民的份地和义务(156)
	赎买宅旁园地和赎买份地的条件(157)	
3. 60年代革命运动的发展。1863—1874年		
	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改革	158
	1861年的农民运动(158)	革命民主主义者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159)
	十九世纪60年代初革命运动的高涨(161)	俄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163)
	60年代下半期的革命运动(165)	地方自治改革、市政改革、司法改革及其他改革(166)
	俄国60年代资产阶级改革的总结(169)	
4. 1864—1873年中亚细亚的征服		170
	中亚细亚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170)	19世纪中叶中亚细亚诸民族(171)
	1864—1873年的军事行动(172)	中亚细亚并入俄国的后果(173)
第七章 德国的统一		174
	工业的高涨(174)	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普鲁士式的道路”(175)
	德国统一的道路(176)	政治生活的活跃(176)
	普鲁士的“宪法冲突”(177)	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的宣传活动(178)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180)	普鲁士的对外政策。普鲁士—丹麦战争。普鲁士—奥地利战争(181)
	北德意志邦联(183)	
第八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		185
	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185)	产业革命的完成(187)
	50年代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190)	法国的殖民地扩张(191)
	向“自由帝国”过渡(192)	工人运动(193)
	60年代外交上的失利(194)	帝国内部危机的加剧(195)
第九章 十九世纪60年代的工人运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198
1.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19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0 年代的活动(198) 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同盟的解散(203)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204)

2. 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870年以前)..... 208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208) “国际”各个支部的发展。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斗争(210)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211)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212) 1867—1869年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国际”的巩固(212)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214) 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中的破坏活动(216)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反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218) “国际”俄国支部的成立(219) 1870年上半年的“国际”(221)

第十章 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倾覆..... 222

宣战(222) “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223) 法国初战的失利(224) 1870年8月7—9日和14日的巴黎事变(226) 法军在色当的溃败(227) 第二帝国的倾覆。共和国的成立(229) “国际”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230) 巴黎被围(233) 1870年10月31日的起义(234) 1871年1月22日的起义(236) 巴黎投降(237)

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 240

第二帝国崩溃后法国的阶级斗争(240) 3月18日起义。公社宣告成立(242) 公社的组成。它的活动家(244) 公社中政治派别的斗争(247) 公社时期的群众性革命组织(248) 公社——新型的国家(248) 公社的社会—经济政策(250) 公社的国际地位(252) 国际无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支持(254) 公社社员和凡尔赛分子之间的武装斗争的进程(257) “五月流血周”。公社的覆亡(259)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历史意义(261) 公社以后的第一国际(262)

第十二章 7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265

技术的进步(265)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268) 垄断组织的产生(271) 十九世纪末的经济危机(273)

第十三章 英国的工业垄断权的丧失..... 274

在经济地位中的变化(274) 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生(276)
各政党的斗争。殖民帝国的发展(278) 爱尔兰问题(280)
自由党的分裂。保守党人的胜利(282) 工联主义和费边社
员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283) 社会民主联盟的成立。工人
俱乐部(285) 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新工联主义(287) 独立工
党的成立(288) 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288)

第十四章 德意志帝国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

反动势力。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 290

迅速的经济发展(290) 垄断组织的产生(292) 国家制
度(293) 德意志军国主义(295) 波兰西部地区的殖民地
化(296) 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296) “文
化战斗”(297) 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政党(299) 70年代末
反动势力的加强。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301) 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英雄时期”(303) 沙文主义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
“政党联盟”。俾斯麦的退职(305) “新路线”和随后90年代
反动势力的加强(307) 9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308) 统治
阶级“团结政策”的开端(309)

第十五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 313

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313) 银行的作用和资本输出(314)
保卫共和国的斗争(316) 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急进派为
反对派(318) 殖民扩张(320) 工人党的建立(322) 布朗
热主义(324) 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法国外交政策(326)
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327) 德雷福斯案件。十九世纪末的
政治危机(329)

第十六章 改革以后的俄国 333

1. 农奴制度崩溃以后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333

农奴制度的残余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333) 大机器工
业的生长。新的工业地区(336) 90年代的工业高涨。19世
纪末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结(338) 俄罗斯帝国各民族地
区的经济发展(341) 俄国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地主和资产
阶级(345) 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347)

2. 70 年代的社会运动。革命的民粹运动。80 年代 的贵族反动势力.....	349
70 年代革命—民主运动的一般特征(349) “到民间去”。民 粹派的组织(352) 最初的工会(354) 70 年代末的革命 形势(356) 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的摧毁。80 年代的 反动势力(359)	

3. 80—90 年代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 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	362
80 年代的罢工斗争。“劳动解放社”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 组(362)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产生(365) 90 年代——革命 运动的转折点(366) 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368) “工人阶 级解放斗争协会”。90 年代后半期的罢工运动(371) 革命马 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作斗争。列宁创办《火星报》(373)	

第十七章 国际工人运动。第二国际.....	376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无产阶级国际联系(376) 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 70—80 年代(377) 为建立“第二国际”而奋斗(380) 第二国际成立和最初几次代表大会(382) 同无政府主义作 斗争(383) 第二国际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384) 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中的抬头(385) 修正主义派的出现。马克思主 义者对修正主义的斗争(388) 列宁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391)	

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 列强重新瓜分世界斗争的开始	393
---	-----

1. 垄断资本主义.....	393
1900—190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垄断组织的发展(393) 银 行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产生(396) 资本输出。国际垄断 组织和它们对世界的分割(397) 腐化的趋势。寄生性的增 长(398) 帝国主义和政治反动(399)	
2. 帝国主义时代最初的几场战争。重新瓜分 世界斗争的开始.....	400
1898 年美西战争(400) 英布战争(402) 1904—1905 年日 俄战争(404)	

第十九章 第一次俄国革命 411

1. 革命危机的成熟 411

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411)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413) 革命运动的新阶段(415) 日俄战争。革命的前夜(418)

2. 从“流血星期日”到十二月武装起义 420

1月9日——革命的开端(42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421) 1905年夏天革命斗争的高涨。“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424) 1905年10月的总政治罢工(426)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05年10月至11月间的波兰和芬兰(429) 新型革命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农民运动(432)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434)

3. 1906—1907年的革命运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 438

工人和农民运动(438) 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439) 革命的总结(443)

第二十章 帝国主义的发展和欧洲各国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446

1. 英国 446

二十世纪初叶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446) 工党的建立(448) 张伯伦鼓吹保护关税政策(449) 对俄国革命的反响(450) 自由党人重新执政。劳合-乔治的政策(450) 宪法冲突(452) 1910—1914年工人运动的高涨(453) 1913—1914年的政治危机(456)

2. 德国 457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增长(457) 工人运动的高涨。俄国革命的影响(460) 二十世纪初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462) 统治阶级“团结政策”的新阶段。“霍屯督联盟”(464) 德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466) 政治危机的成熟(467)

3. 法国 471

经济的发展(471) 法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劳动人民的状况(473) 左翼集团执政。反教权主义的法律(474)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75) 统一后的社会党(479) 准备战争(481)

第二十一章 俄国的六三帝制。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483

1. 反动派的猖獗。布尔什维克领导群众…………… 483

斯托雷平制度(483) 地主—资产阶级同盟。第三届杜马(486) 新的土地政策(487) 反动时期的工人运动。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490)

2. 俄国帝国主义的发展。新的革命的成熟…………… 494

经济中的变化。金融资本的增长(494) 对西方帝国主义依附性的加强(496) 新革命的前提(497) 革命运动的活跃(499) 连那惨案。1912—1913年的罢工斗争(500)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502) 第四届国家杜马(504) 布尔什维克为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团结而斗争(505) 革命危机的成熟(507)

第二十二章 国际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和

改良主义派的斗争…………… 512

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现象(512)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514) 1905年革命和第二国际(515) 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性和第二国际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516) 在第二国际中的殖民问题(518) 革命倾向的增长。布尔什维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520) 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524) 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526)

第二十三章 帝国主义矛盾的增长和重新

分割世界的战争的外交准备…………… 528

1904年的英法协定。1905年俄德两国的华沙条约(529) 1905—1906年的摩洛哥危机(530) 1907年的英俄协定。三国协约的成立(531) 波斯尼亚危机(532) 英德两国的海上竞争(534)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年)(535) 的黎波里战争(536) 巴尔干同盟的形成(538)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开端(540) 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形成(541) 1913年伦敦条约(542)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543) 军备竞赛。列强的战略计划(544) 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547) 奥国的最后通牒和奥塞战争的开端(548)

第二十四章 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作战过程

- (1914年8月至1917年11月)..... 551
1. 战争的开端。第二国际的破产..... 551
战争的开端。它转为世界大战(551) 第二国际的叛变。布
尔什维克的革命立场(553)
 2. 1914年的军事行动..... 557
交战国军队的展开(557) 海军力量(558) 西欧战场上的作
战(559) 东欧战场(560) 奥地利—塞尔维亚战线(563)
高加索战线。在伊朗境内的军事行动(563) 海战(564)
1914年战局总结(565)
 3. 1915年的军事行动..... 565
东欧战场(565) 西欧战场(567) 达达尼尔战役(568) 意
大利参战。伊松佐河战役(569) 保加利亚参战。巴尔干战
线(570) 高加索战线(571) 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非洲的军
事行动(571) 海战(572) 1915年战局总结。1916年初双
方作战计划(572)
 4. 1916年至1917年的军事行动..... 573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573) 俄军的进攻(574) 罗马尼
亚参战。罗马尼亚战线的作战(576) 意大利战场和巴尔干
战场(577) 欧洲以外的战线(577) 日德兰战役(578) 1916
年战局总结和双方1917年作战计划(578) 1917年的军事
行动(579)

第二十五章 交战国家内部矛盾的尖锐化..... 585

1.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状况..... 586
德国(586) 奥匈帝国(592) 英国(595) 法国(600) 俄
国(602) 意大利(611) 美国(612)
2. 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策略”..... 617
“向和平转变”的原因(617) 中欧强国和美国的“和平”建
议(618)
3.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 布尔什维克为团结左派分子而斗争..... 620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620) 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
国际主义者代表会议(622)

第二十六章 推翻沙皇君主制度。各交战国革命运动的 高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 主义革命.....	626
1. 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626
彼得格勒起义(626) 革命的胜利(630) 建立工兵代表苏维 埃(633) 成立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635)	
2. 二月革命对各交战国反战运动发展的影响.....	639
德国革命的成熟(640) 奥匈的革命运动(643) 英国的罢工 斗争。里子反战会议(644) 法国工人和士兵的反战斗 争(645) 都灵事件(648)	
3.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俄国.....	648
二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四月提纲》(649) 临 时政府危机的开端(655) 联合政府当政(657) 群众革命运 动的高涨(659)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示威游 行(661) 七月危机。两种政权并存局面的结束(665) 布尔 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668) 平 定科尔尼洛夫叛乱(671) 全国性危机的成熟(674)	
附录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主要代表人物	681
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681) 费尔巴哈(683) 政治经济 学(683) 李嘉图(683) 空想社会主义(684) 圣西门(685) 圣西门学派(686) 沙利·傅立叶(687) 罗伯特·欧文(689)	
地图: ① 1848—1849 年欧洲的革命和革命运动	112—113
② 巴黎公社(1871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28 日)	252—253
③ 第一次俄国革命	424—425

第一章

十九世纪30—40年代西欧各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工人运动的高涨

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英国在这20年间完成了产业革命。继英国之后，工厂工业在法国顺利地发展起来，而在比利时、普鲁士和其他许多国家情况也是这样，不过稍慢一些。同时，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强，它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取得政权。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个新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30—40年代，无产阶级展开了最早几次大规模的独立斗争，这些斗争表明西欧阶级斗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1. 法国的1830年革命和资产阶级君主制

七月革命 复辟时期的法国政府主要是保护大地主贵族和天主教高级僧侣的利益和特权，它的反动政策使法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不良的影响。耶稣会教士在宫廷、行政机关和学校中的专横跋扈，归国的亡命贵族用恢复封建制度威胁农民的挑衅行为，使国内不满情绪日益强烈。

1826年的工业危机，接着而来的1829—1830年的萧条和歉

收，使劳动者本来就够困苦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大批城市居民无法谋生，乡村里则是一片贫穷饥饿的景象。因此，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增长了。

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政府行动加强了。他们要求扩大选民范围，实行大臣对议会负责的制度，实行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他们反对教权派的胡作非为，要求取消出版限制。如果这些要求实现了，法国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

1827年的选举使君主立宪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众议院中取得多数，于是国王查理十世就不得不让极端保皇党人维勒尔伯爵的内阁辞职。新内阁是由以马丁雅克伯爵为首的君主立宪派组成的，它试图随机应变，周旋于大资产阶级和门阀贵族之间。1829年8月，国王不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让步，就撤免了马丁雅克的职务，把政权又交给极端保皇党人。国王的宠臣波林雅克公爵成了内阁阁揆，他过去是一个积极活动的亡命贵族。其他阁员也由极端保皇党人担任。

波林雅克的组阁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自由派报纸激烈地攻击新阁员。自由派左翼在1830年初创办《国民报》，主张由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有密切联系的奥尔良王朝代替波旁王朝。一些处于秘密状态的共和派团体和烧炭党人支部(venta)都活跃起来。1830年3月中旬，众议院表示不信任波林雅克内阁，要求内阁辞职。为了回答这一行动，国王禁止众议院开会，5月中旬干脆把它解散了。但是，6月和7月间进行的选举，结果是自由派和君主立宪派击败了政府的拥护者。政治局势日益紧张起来。

查理十世听信近臣谗言，说人民对于政治是漠不关心的，重视宪章的只是一小撮律师和新闻记者，因此就决定镇压反对派。7月25日，他接受大臣的建议，签署了名为《波林雅克敕令》的几项敕令。这些敕令规定：解散新选举的众议院，减少议员人数一半，

取消所有工商业企业主的选举人资格,限定只有大地主、即主要是贵族出身的人才才有选举权,对报纸杂志的出版实行事先审定制度。这是举行反动政变的一种尝试。

波林雅克敕令的颁布使巴黎人民忿怒万分。各个反对派报纸的撰稿人在《国民报》编辑部举行集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抵制政府。7月26日晚间,在巴黎街头人民同警察发生冲突。第二天,街头示威发展成为武装起义,起义者的口号是保卫宪章和撤换波林雅克内阁。7月28日,起义已经具有群众性质。巴黎布满街垒,圣安东郊区和其他工人区构筑的街垒特别多。

七月革命就这样开始了。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极其广大的巴黎劳动者对于贵族教权派反动政府,对于欧洲反革命联盟军队两次强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波旁王朝,都怀有满腔仇恨。其他阶层,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也站在劳动者方面。同抱有反政府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和军官有密切联系的理工学院学生领导了许多支革命战士队伍。烧炭党人、“爱国协会”活动家和其他秘密革命团体成员在领导武装斗争中起了显著作用。至于自由派议员,他们却懦怯地呆在家里,或者开开会,讨论如何赶快终止武装斗争问题来消磨时间。

1830年7月29日,起义人民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在它的上空立刻就升起三色旗——1789—1794年革命的旗帜。国王军队伤亡惨重,退到圣克路郊区。

人民群众对王宫所在地兰布利耶展开进攻,查理十世在人民的压力下,逊位给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自己则逃往英国。

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对派人物就不再躲藏起来了,这时,他们赶忙出来阻止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把政权夺在自己手里。工人阶级的缺乏组织,共和派的软弱无能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得以实现自己的计划。7月31日,以奥尔良派占优势的众议

院议员，在银行家拉菲特家中开会，决定把王冠授给奥尔良家族的路易一菲利浦公爵。共和派曾经提出抗议，并且组织了人民示威游行，可是没有达到目的。路易一菲利浦终于被拥立为国王。

七月革命所获得的政治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次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人民群众尽管十分积极，可是并没有争得民主自由和共和制度。

1830年8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保留了旧宪法的许多原则。不过，国王的权力略有削减，众议院的权限稍有扩大；选民人数从10万人增加到24万人（因为财产资格略微降低了）；禁止天主教僧侣置不动产；清洗了国家机关和陆海军中的贵族反动分子；取消了对定期出版物的限制。可是，广大居民阶层在政治上依然毫无权利。警察官僚机关依旧保持着拿破仑帝国时期形成的那付样子，只不过转到另一批人手中罢了；既没有废止取缔工人罢工和不准组织工会的法律，也没有取消引起城乡贫民强烈不满的沉重的间接税。

七月革命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推翻了门阀贵族的政治统治，粉碎了恢复各种形式封建专制制度的企图。现在，政权已经从贵族阶级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手里，不过并不是转到整个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转到其中一个集团——金融贵族（即工商业和银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手里。资产阶级君主制在法国确立起来了。

七月革命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复辟政府的被推翻，沉重地打击了神圣同盟体系，促进了欧洲许多国家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各地的先进人士看到法国反动派的倒台都非常高兴。海涅把报道巴黎七月革命事件的报纸叫做“包在纸里的阳光”。后来，莱蒙托夫也写了歌颂这一革命事件的诗，在诗中严厉谴责查理十世，欢迎巴黎人民高高举起的“自由旗帜”。

1830—1847年的经济发展 在路易一菲利浦王朝（七月王朝）

年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法国产业革命也像在英国一样，首先在轻工业中展开。棉花用量从1831年的2,800万公斤增加到1845年的6,400万公斤；工商企业的投资额在30—40年代增加了50%（从300亿法郎增加到450亿法郎）。工业中使用的蒸汽机到1847年达到4,853台。在30年代，法国开始敷设铁路；到1846年底为止，已经通车的铁路线达1,535公里，正在修筑的铁路线达529公里。

法国工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大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和亚麻纺织业）在法国北部（里尔）、西北部（卢昂）和东部（阿尔萨斯和洛林）成长起来。冶金工业在罗亚尔河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巴黎主要是生产服装、装饰用品、奢侈品和名贵家具这样一些工业部门。巴黎的工业多半是每家只有工人2—10人的中小企业。在1847年，巴黎只有10%的企业主雇用工人10人以上，有半数企业是个体手工业者或者雇用一个小业主的极小的作坊；这种小作坊都是替包买主或者手工工场企业主进行生产的。

按人口说，里昂是法国第二大都市，并且是丝织工业中心，但在里昂的工业中，仍然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占居优势。大型手工工场主通常只设有定货分配事务所，这种事务所把原料分配给拥有一至六台工作机和相应数目帮工、助手和学徒的小作坊主，向他们定货。有许多小作坊主是不雇工人的单干工匠。

在许多省份中，手工工场主都愿意把定货分配到农村中去，因为农村劳动力比城市便宜。

政府的政策只保护一小撮大金融家、商人和上层工厂主的利益，损害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因而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对煤、铁、棉花征收高额进口税，使得“煤炭贵族”和其他工业巨头大发其财，可是对大多数企业主却极为不利，因为增加了生产成本，

从而削弱了法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银行家和高利贷者依靠高额的信贷利息发了大财。

征服阿尔及利亚 为了上层金融家的利益，路易一菲利浦王朝继续出征阿尔及利亚。这一征服行动早在波旁王朝执政时期就开始了。波林雅克政府曾于1830年6月中旬派遣远征军团到阿尔及利亚去，7月5日，阿尔及利亚德伊(дей，即统治者)未作重大抵抗，就把首都阿尔及尔城交给了法国人。阿尔及利亚名义上的宗主国之君土耳其苏丹，也只是提提书面抗议而已。人民群众——阿拉伯诸部落和柏伯尔诸部落奋起保卫祖国。七月王朝政府碰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差不多延续了20年之久。

从1832年起，意志坚定、才能出众的军事长官阿布德—艾尔—卡德尔领导了这场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他把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许多部落都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建立了独立的艾米利国，并且多次大败法军。法国当局被迫于1834年和1837年两度同他订立条约，承认他对阿尔及利亚^{2/3}领土的统治权。过了些时候，殖民者派增援部队去阿尔及利亚，再动干戈，但又遭失败。法国侵略者在遭受了严重损失、消耗了巨额战费、在阿尔及利亚集中了十多万军队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并且大规模地屠杀了阿尔及利亚人，消灭了整个整个的部落之后，才于1847年年底击溃了阿布德—艾尔—卡德尔的军队，俘虏了阿布德—艾尔—卡德尔本人。但是，在此以后，阿尔及利亚仍然继续进行反殖民者的斗争。

困难重重而不得人心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圣阿尔诺、彼里西埃、尚加尔涅等等“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将领”，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用血腥手段残酷镇压人民运动的经验，后来，他们把这套经验搬到法国本国使用。

工人和农民的状况 由于工业发展，法国工人阶级人数显著增加了。1846年，巴黎100万人口中，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差不多占 $\frac{1}{3}$ 。大量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集中在里昂、马赛、卢昂、波尔多。当时正是以巴黎为首的这些城市常常发生革命斗争。

在产业革命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强，劳动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坏。工作日平均是12—13小时，而在煤矿和其他某些生产部门中竟长达15—16小时，甚至更多。妇女和儿童受到特别残酷的剥削。大部分工人和小手工业者都栖息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和闷热而黑暗的阁楼里。科学院院士阿道夫·布朗基写道，他曾在里尔看见几个女工，她们一周的全部食品只有两公斤面包；这些妇女瘦弱不堪，几乎都站不住了。塞纳—瓦斯省的一位政府官员在1842年谈到缟带制造业中童工的情况时写道：“这样贫穷实在令人惨不忍睹。说句良心话，就是我们最坏的德坦监狱中囚犯的生活，在各方面都要比他们强20倍。”1841年颁布一项法律，规定8—12岁儿童的工作日为8小时，13—16岁少年的工作日为12小时。但是实际上，这一法律几乎没有人遵守；况且，就是这个法律本身也准许有许多例外情况，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准许让8岁儿童做夜工。

农民占法国人口 $\frac{2}{3}$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处境都是很悲惨的。小块的农民土地不断地碎裂的过程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使绝大多数农民日益贫困。分成制的小佃农，生活特别困苦。大地主利用农民缺少土地的机会抬高地租。

直接税和间接税（盐税、酒税、农民在城市出卖食物的捐税）摧毁了农民。低利贷款缺乏也阻滞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富人向农民放高利贷来掠夺他们。另一种掠夺贫农的方式是取消村社仅剩的土地和剥夺农民久有的权利（在公共牧场牧放牲畜，捡集禾穗、剩葡萄、枯枝和谷草的权利）。

无怪乎也像 1789 年革命前夜那样，在十九世纪 40 年代法国农村中到处有人行乞；只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已经不是封建剥削而是资本主义剥削罢了。

1831 年和 1834 年的里昂起义 里昂是丝织工业的最大中心；这里丝织工人受着残酷的剥削。由于工厂工业的发展，帮工、学徒、甚至小作坊主的生活状况都恶化了，小作坊主已经完全仰赖手工工场企业主的鼻息。

1831 年 11 月 21 日，里昂举行罢工，抗议企业主拒不承认已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批准的较高的新的计件工资定额。许多手工工场主都关闭了向织工分配定货的事务所。为了回击这种做法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挑衅行为，里昂的劳动者都执戈而起。罢工演成起义。起义工人的口号是：“不是劳动而生，就是战斗而死”。这个口号绣在高悬在里昂工人郊区的黑旗上。经过将近三天的武装斗争，把政府军队逐出里昂，城市转入工人之手。但是，由于没有独立的政治组织，里昂起义者未能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也没有掌握政权。起义织工只成立了一个临时司令部，而在其中掌权的是小资产阶级（作坊主）。许多工人当时还相信国王路易—菲力浦，以为他会保护劳动人民，制止企业主的贪婪。

12 月 3 日，大批军队开入里昂，把起义镇压下去。在巷战中，起义者数百人阵亡。1 万多人被驱逐出里昂市区和郊区。

里昂织工起义对当代人发生深刻的影响。这次起义表明：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里昂起义作了这样的评价，认为它是法国阶级斗争发展中的转折点，是工人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开端。

1832 年 6 月，巴黎为在民主集团中享有名望的拉马克将军举行葬仪时，发生了推翻君主制的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在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工人。在工人区

街垒上悬挂着红旗。经过两天英勇战斗，共和派的抵抗被击破了。

1834年4月，在工业萧条的情况下发生了第二次里昂起义。推动起义的是下述两件事：当局通过了旨在反对民主组织的严苛的结社法；司法机关迫害不久前发生的罢工的工人。第二次里昂起义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工人根据亲身的经验了解到，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劳动者的社会解放。所以，1834年的里昂起义者举着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旗帜。在里昂街道上，起义人民同国王军队进行了6天的激烈战斗。起义主要策源地克鲁亚—鲁斯郊区，防御工事构筑得很好，四面环壕。街垒上红旗招展。起义者的战斗口号是“不共和毋宁死！”起义的领导人中有英勇而坚定的共和党人拉格朗日、博恩、科西迪耶尔、卡利埃，有职工会和互助会的活动家。政府对起义者施加残酷的镇压，炮兵也参加镇压起义。官兵肆意破坏房屋，不仅枪杀起义者，而且还杀害和平居民。

第二次里昂起义得到巴黎、圣亚田、格累诺布尔、克勒蒙菲朗和国内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响应。起义也扩及某些农村地区，特别是产酒地区。在阿尔布阿，农民拿着红旗，结成队伍前来支援起义的共和党人。起义者曾经一度占领该市，推翻了市长。

在巴黎，武装斗争持续了将近两天（4月13日和14日）。镇压起义的暴行令人发指。特兰斯诺宁大街上，官军的行为特别残酷。他们杀戮无辜人民，连老弱妇孺都不能幸免。

在镇压了1834年起义之后，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司法迫害，审判差不多持续了整整一年。许多被告被判处苦役流放。

30年代初期共和运动的失败，使政府有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一点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反动情绪增长促成的，因为他们已被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吓坏了。

秘密的革命组织。罢工运动 秘密的革命团体在工人阶级中

的影响很大。早在复辟时期就产生的秘密革命团体，起初大抵是由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宣传雅各宾派思想和传统。但是这种组织就成分来说，逐渐地变成了工人的团体。在它们的活动中，社会问题被提到首要地位。例如，“人权社”的社员在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中就曾积极地展开活动，这个秘密团体许多社员在 1834 年审判中被判了罪。

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 年）在秘密革命团体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位热烈的革命家，把自己漫长的一生都献给了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布朗基的观点是在巴贝夫主义的革命传统影响下，首先是在邦纳罗蒂所著《平等派的密谋》一书的影响下形成的。布朗基确信，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并严厉批评那些断言只要争得政治自由，群众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布朗基认为不仅要进行革命，而且要建立革命专政。但是，布朗基对革命理论的意义估价不足。他不明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也没有把工人同一般无产居民阶层群众区分开来。因此，布朗基主义者就提出了错误的策略，认为起义是在任何时候都可由一小群职业革命家来完成，无需广大群众参加。

1835 年夏天，布朗基同其他革命家一起建立了秘密的“家社”。这个社的准备武装起义的战斗小组叫做“家”。密谋被警察破获了，许多参加者，包括布朗基本人在内，都被投入监狱。布朗基在 1837 年获释以后，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四季社”，这个组织的活动比“家社”更加秘密。1839 年 5 月 12 日，“四季社”在巴黎发动起义，参加起义的是“四季社”的几百个社员。这次起义又暴露了布朗基主义者的密谋策略的毫无根据。起义失败了，因为群众不知道起义的目的，没有支持起义。布朗基和另外一些起义者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徒刑，“四季社”也被完全摧毁。

从 30 年代末期到 40 年代初期和中期，标志着法国群众运动的广泛发展。群众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罢工运动、粮食风潮、抗税发动等等。1836—1838 年间的罢工运动，大都是反对降低工资和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1840 年 3 月，巴黎爆发了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行各业的工人近 6 万人。罢工继续了数月之久，证明巴黎的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的组织性。9 月 7 日事件特别激烈。这一天工人们在圣安东郊区和巴黎其他一些街区，举行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还修筑了一些街垒。

这时期一次最大的罢工，是 1844 年 4—5 月里弗—德—日埃的罗亚尔煤区矿工的罢工。这次罢工的特点是：罢工者同其他工业城市的工人保有联系，并得到小店主和农民的支援。这次罢工具有战斗性行动的性质，不仅反对“煤炭贵族”，而且反对同他们密切勾结的资产阶级君主政府。1846—1847 年，里弗—德—日埃的矿工又举行多次罢工。

城乡劳动者进行了激烈的抗税斗争。1840 年 1 月开征新市场税后，富瓦城人民同军队发生激烈的冲突。1841 年 7 月，在土鲁斯由于调查户口和登记课税对象而爆发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省长和检察官都被迫逃出城去。在克勒蒙菲朗，有近万人参加了武装斗争。在里尔，老百姓构筑了街垒，高呼“打倒大臣！”“打倒路易—菲利浦！”的口号。

粮食风潮在这个时期也频频发生。歉收、投机倒把和增加粮食出口引起谷物、马铃薯和其他食品价格上涨，因而粮潮蜂起。国内许多地方都有人试图把运送出口的粮食截留下来。工人和农民纷纷构筑街垒堵住道路，他们还同军队开仗，袭击粮店和粮商住宅，痛殴税吏。市场上不时发生群众骚动。

许多次粮食风潮具有政治目的。1847 年 5 月 12 日，里尔的一支由 400 个工人组成的示威游行队伍沿街高喊：“要工作！要面

包!”“打倒路易—菲力浦! 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壮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促进了新的社会学说的产生。七月革命以后,圣西门主义者立刻积极活跃起来。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地球报》,出版了大量宣传小册子,并在巴黎和外省举行公众集会。

但是,圣西门主义的兴盛时期是很短暂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学派”内部发生了演变。圣西门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宗教,变成了一种以安凡丹和巴札尔两个“总祭司”为首的“教会”,变成了“新基督教”。为了避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圣西门学派越来越埋头研究“道德”问题,而不过问社会政治问题。

这一切使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纷纷离开了圣西门主义。早从1831年底起,特别是在巴札尔同安凡丹破裂之后,圣西门学派发生了危机。圣西门主义的组织接二连三地解体了。

在30年代,傅立叶学派力量稍有增强,这是因为在1832—1833年,原先的圣西门主义的拥护者加入了傅立叶学派的基本核心。傅立叶主义者创刊了《法伦斯泰尔》杂志。他们还广泛地进行口头宣传工作。傅立叶主义的信徒,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人物和知识分子。但是,傅立叶主义思想也部分地渗入工人之中,特别是在像里昂那样的工业城市。

傅立叶学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傅立叶主义者把新的、和谐社会理想越来越推迟到无限遥远的将来。组织各种生产消费协作社,在傅立叶门徒看来,已经不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傅立叶主义者特别重视各种“过渡性”的组织,重视“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就连傅立叶最杰出的学生维克多·孔西得朗在这个时期也只主张“较为迅速的演进”,从而逐步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尽管他曾在《社会命运》一书中激烈抨击过资本主义社

会,并且动人地描述了无产阶级的痛苦。

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宣扬阶级调和,散播小资产阶级的关于社会逐步演进和和平演进的幻想。他们在 30 年代,特别是在 40 年代,在客观上起了有害的作用,阻碍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

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40 年代,路易·勃朗(1811—1882 年)的思想在工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路易·勃朗所著《十年史》一书记述了法国从 1830 年到 1840 年的历史,由于用犀利的笔调指摘了政府,使他在民主集团中获得声名。1839 年,路易·勃朗出版了《论劳动组织》一书,大张挞伐资本主义制度,颇受读者欢迎,在短时期内数次再版。路易·勃朗在这本书中所阐述的社会方案是一种完全不懂阶级斗争本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他无视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这一事实,武断地说只要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然后再借助于政府的补助金,便可以和平地组织起“公共工厂”(工人生产协作社),逐步地排挤掉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路易·勃朗断言,他提出的社会改革措施是不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 年)。他表达了小资产阶级要求抵抗大资本冲击、保护自己的小私有制的愿望。他说“私有制就是盗窃”,实际上只是谴责大私有制。蒲鲁东提出了组织不用货币的交换和没有利息的信贷的方案。根据他的意见,这种方案可使小生产者免受大资本的剥削和免于在大资本压迫下遭到破产的威胁,能够解决一切社会矛盾。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硬说共产主义是压制个性自由的暴力。他对罢工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其他方式都采取激烈否定的态度,甚至妄图证明罢工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列宁对于蒲

鲁东的思想作了如下的说明：“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東西，这就是蒲鲁东的思想。”^①

蒲鲁东摒弃政治斗争，对国家采取否定的态度。他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之一。他在 1846 年发表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以极端仇视的态度攻击共产主义。

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在工人中间也发生影响，因为在手工业工人和离开农村不久而念念不忘于重新去做独立业主的一部分工厂工人中，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和幻想，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蒲鲁东主义助长了工人中的这种幻想，起了反动的作用。

埃蒂耶纳·卡贝 杰出的政论家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 年）在 1840 年发表了哲学社会长篇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说，要解除人间疾苦，必须消灭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卡贝证明，唯有共产主义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卡贝在自己的理想国中描述了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伊加利亚，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全体公民人人劳动。每个人都尽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劳动。每天工作时间，夏天 7 小时，冬天 6 小时。伊加利亚人广泛地使用机器和新的技术发明。消费是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安排的。但是，卡贝的理想具有粗浅的平均主义的特点。

卡贝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实现共产主义。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困苦处境，描写了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同时力求证明现代社会制度对资产阶级也是极有害的。因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载《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 页。

此卡贝认为，人人都应该关心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对革命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他写道：“如果革命掌握在我手中，我绝对不让它爆发，即使我将在流放中死去。”

卡贝对共产主义思想作了天才而生动的宣传，他因此而在工人中间获得了声誉，但是，他学说中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调和富人和穷人的思想，不必革命就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却阻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

40年代革命的共产主义。德萨米 40年代，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840年7月1日，在巴黎工人郊区贝尔维尔，在一个由革命的共产主义拥护者组织的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集会上，一位演说家说：“共产主义是为人类祛除万恶的唯一良药……。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要一千年，甚至不要一百年，而是就在今天，就在当前。”

“四季社”被摧毁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秘密的共产主义团体——“平均主义工人社”。这个团体的纲领是按照巴贝夫思想写成的，它宣布真正的平等，共同的幸福和普遍的劳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实行人民专政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不久，“平均主义工人社”结束了，另一个秘密组织“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代之而起。

40年代的共产主义报刊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其中一些报刊同秘密革命团体保有思想上、甚至组织上的联系。《平等派》、《人道主义者》等杂志都宣扬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平等派》杂志论证了真正的民主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原理，并且预言“无产者阶级”最近就将得到解放。这个杂志赞同巴贝夫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革命专政的思想。《人道主义者》杂志捍卫平等思想，指出平等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共享幸福。它主张彻底消灭一切人对人的统治。

《平等派》杂志的出版人是40年代的革命共产主义杰出的理论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德奥多·德萨米(1803—1850年)。他是《公有法典》一书的著者。他写道：“公有制！公有制！凡是一切好的优美的东西，都在这一个词中扼要地叙述出来了。”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想像为既从事农业、也经营工业的公社的综合体。德萨米反对粗浅的平均主义，他肯定了机器对于减轻劳动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他论证了必须进行社会教育，提出了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德萨米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实行社会革命和建立革命专政，以消灭私有制和镇压富裕阶级的反抗。他在同卡贝论战时说，用和平手段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目的的。

与德萨米接近的，有巴贝夫派的另一个革命共产主义者让—雅克·皮佑，他当过教士，写有许多宣传小册子，后来他是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

40年代的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包括德萨米在内，仍然都是空想家。像十八世纪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一样，他们是纯理性的，即援引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来为共产主义提出论证。虽然德萨米和他的同志们也谈到无产阶级及其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但是他们通常把无产阶级理解为一切没有财产的人，并没有把工人同一般劳动者区分开来。他们所想像的革命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狭隘的革命组织所实行的专政。

七月王朝危机的成熟 在40年代，七月王朝的统治进入受到内外困难夹击的时期。镇压工人也罢，禁止工人结社也罢，都没有摧毁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工人开始更明确地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学说在工人中间的影响日益增强。

与此同时，其他社会阶层的反政府情绪和革命情绪也不断高

涨起来。农民苦于捐税压迫，怨声载道。一部分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也对政府表示不满。这个“银行家王国”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集团的立法措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给予铁路公司特权等等，可是仍旧束缚着法国生产力的发展，延缓并阻碍产业革命的进程。国债从 1830 年到 1846 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25 亿法郎，使资产阶级忧心忡忡。巨额的国债利息都落入了金融寡头的腰包。

资产阶级集团也不满意政府对外政策，特别是殖民政策的失败，即不满意法国在 1840 年同四强（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联盟争夺在东方势力的斗争中所遇到的“外交上的滑铁卢”，以及同年对英国殖民扩张的让步，因为英国在这一次扩张中夺去了法国已派去远征军的新西兰和大洋洲诸岛。

对七月王朝内外政策的不满情绪，到 1847 年底达到异常激烈的程度。在人民群众中革命情绪日益激烈。资产阶级反对派要求实行选举改革，以便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势力，遏止革命的爆发。但是，基佐政府再三拒绝了反对派的要求。基佐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他在 1830 年革命后从温和的自由派变成了凶恶的反动派，从 1840 年起成为政府首脑。基佐对提议降低选民财产资格和扩大选民范围的人厚颜无耻地回答说：“诸位先生，你们发了财，就会成为选民。”恩格斯在 1847 年写道：“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利浦都非常清楚：让小资产阶级也成为选民不意味着别的，正意味着‘LA RÉPUBLIQUE’（‘共和国’）。”①

七月王朝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狭窄了。

① 恩格斯：《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06 页。

2. 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宪章运动

十九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是英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英国比其他国家先走一步,产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这就使得英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阶级斗争急剧尖锐起来,这一点在宪章运动中得到非常鲜明的反映。

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 30 年代,特别是在 40 年代,工厂生产在英国主要工业部门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在 1830 年,甚至在最发达的生产部门——棉纺织工业中,手工织布机的数目还比机器织布机的数目多两倍。在以后 20 年间,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绝迹了。在其他生产部门中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这种情况是由于接连出现的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造成的。走锭精纺机(自动机械)在纺织工业中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保证了纺纱过程的机械化。蒸汽机的使用扩大了。在纺织工业中,蒸汽机的功率从 1834 年到 1850 年增加了两倍半。生产集中快速地进行着。工厂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

这些年英国工业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迅速地成长了。在从 1830 年到 1847 年的 17 年中,英国金属的产量增长了两倍多。从 1828 年起,使用热鼓风熔炼矿石,使 1 吨金属的燃料消耗量减少 $\frac{2}{3}$,更重要的是在生产时可以使用劣质煤炭。在英国,劣质煤炭储量丰富,过去只用作取暖。以前,英国的金属仰赖进口,现在已经大量输出了。在从 1826 年到 1846 年的 20 年间,英国的熟铁和生铁的输出额增加 6 倍半。1839 年,英国的煤产量比法国、比利时、普鲁士的总和多 3 倍。

机器制造业和机床制造业的迅速成长,也是这个时期英国工业发展的特点。由于制成了高效率的精密刨床、旋床、铣床和冲压

床,劳动减轻了,产品质量改善了。英国的机床和机器就质量优良和价格低廉来说,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英国成了世界各国的机器的供应者。

运输的发展,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对于英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从1830年以后,英国开始迅速修筑铁路。到1850年,它的铁路长度差不多达到1万公里。铁路使英国经济迅速地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便于国内各地区参加国际贸易。

产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坐上了世界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头把交椅。从1830年到1849年,英国的输出增加3倍多。出口货差不多完全是工厂产品。相反地,进口货基本上是工厂的原料和居民的食品。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由于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1851年,英国有 $\frac{1}{3}$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各大城市,可是当时的法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5%。

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也是工业化过程的反映。与此同时,工业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又刺激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加速了对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由于圈地,到十九世纪30年代,所有村社的耕地都变成了大地主的私产;在以后数十年间,村社的荒地又被圈占,也变成大地主的私产。地产的集中的程度非常惊人,在30年代中期,35,000个大地主掌握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

土地所有主(landlord)通常不亲自经营农业,而是把自己的土地,主要是大片大片地租出去。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投资这种事业。租佃农场主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他们雇佣工人,并且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1851年,英国农业工人总数为1,442,000人,平均每个农场约有工人10名。在农业中广泛地采用先进的农艺方法:实行多区轮作制,使用排水设备、肥料和农业机器。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随着产业革命的接近完成,它的社会后

果也就日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从 1800 年开始的经常性的户口调查表明，人口迅速增加了：1801 年人口总数（不包括爱尔兰）为 1,090 万人，1831 年为 1,650 万人，过了 20 年，即 1851 年，已经增加到约 2,100 万人。1841 年，在工厂、手工工场、矿场和建筑业中工作的约有 380 万人，占自立人口 34% 强；1851 年，工人数目达到 480 万人，即占自立人口 37.6%。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在城乡人口中已占很大比重。所以，正是英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极其清楚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机器迅速的采用，手工业完全被排挤掉了。但是，工业并不能立刻就吸收全部闲散劳动力。结果，就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后备军，这支劳动后备军由于经常重复出现的危机和严重萧条而日益扩大。大量失业者的存在，使资本家能够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减低他们的工资。在 30 年代，工业中每天工作时间通常为 12—14 小时（有时为 16 小时）。工资只能勉强糊口。根据工厂城市埃斯顿—安得一莱因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在 1838—1839 年查明，一个四口之家用一个工人的每周平均工资仅能购买面包 12 公斤，再也不能买到别的东西了；可是房租和其他费用却要占工人工资的一半以上。

雇主残酷地压迫工人，玩弄花招，来克扣本来就非常微薄的工资。为这种目的服务的诡计很多，特别是罚金制度。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家工厂规定，要是工人打开工厂的窗子，上班迟到一分钟，没有把油壶放在指定地方，天已亮还开着瓦斯灯工作等等，都要处罚金。为了掠夺工人，还规定了必须在工厂商店购货的制度，厂主发放工资时，只付一部分现金，而其余部分工人必须按照合同购买陈旧的、有时是劣质的货品，而价格却非常昂贵。

女工和童工受到特别残酷的剥削，他们的工资比成年男工少得多。

民主派政论家威廉·科贝特为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受压迫情况，在当时写道：“人们常常谈论过去的奴仆，农奴；谈论过去的奴隶制度！但是，在‘文明’的北方，在闷热的气温中每天工作 14 小时，偶而抬头瞧瞧窗外就要挨罚，试问在封建主义时代有这样受屈辱，这样受尽奴役的不幸的人吗？”

工人运动 到 30 年代，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积累了阶级斗争的重要经验。以往，工人把代替手工劳动的机器看作是自己不幸的主要原因，并且作了反对使用机器的尝试，甚至毁坏机器，这样的时期已成为过去了。工人已经懂得，问题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资本家采用机器。

不过许多工人还沉湎于幻想之中，以为不必经过政治斗争，就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状况。由于受到罗伯特·欧文宣传的影响，开始设立生产合作社和不使用货币交易的“交换商场”。这样的企业一一破产使工人懂得：要是走这条道路，他们的状况永远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英国工人的斗争渐渐具备了有组织的性质。新的职工联合会建立起来了。1829 年，作了组织全国性的统一的纺纱工会的尝试；1830 年，“联合王国纺纱工总工会”创建人纺纱工人杜赫蒂组织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工会组织。

工人阶级组织性的增强使英国当局惊慌万分，于是就对工会和工会会员施加残酷的压迫。由于警察的迫害，“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关门了。工人得到了教训，他们开始觉悟到，要求得到解放，必须改变本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争取工人组织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1832 年的议会改革 工业资产阶级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也促使工人阶级卷入政治生活。

在 1830 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的议会改革拥护者积极行动起来。1830 年 11 月,威灵顿公爵的反动政府被迫辞职。以格雷为首的新内阁依靠辉格党和托利党左派的支持,提出了一项改革方案,方案规定改变议会议席的地区分配,取消“腐败选邑”,以有利于资产阶级。所谓“腐败选邑”,就是农村中没有人烟,而在事实上由大地主指派议员的选区。原来在议会中拥有优势的土地贵族坚决反对这种改革。资产阶级为了击破大地主的抵抗,便向人民群众求援。结果,在人民群众压力下,大地主让步了。

资产阶级先后在伯明翰和其他大城市成立的政治联合会,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并向劳动人民许下诺言说,选举改革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状况。政治联合会所组织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规模非常巨大。伯明翰的“全国政治联合会”特别活跃。这个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特别是伯明翰的银行家阿特乌德和伦敦的裁缝工场主弗兰西斯·普里斯,以拒纳捐税和“袭击银行”(即大量提取存款)来威胁反改革派。内政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和其他辉格党阁员都积极支持议会改革派。普里斯从秘密基金项下取得了宣传经费。

1830 年秋天,英国许多郡的雇农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要求提高工资。苦于高额地租和教会什一税压迫的小农场主都支持雇农。载有雇农要求的给大地主的匿名信,署有假名“斯文”(Swing;这个词的本义是秋千,转义是绞架)。“斯文运动”主要发生在英国南部地区,扩及 16 个郡,使得大地主惊惶失措。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残酷地镇压运动的参加者。

一年之后,即到了 1831 年秋天,由于上议院拒绝批准经下议院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英国各地又发生了严重事件。一些反对这个法案的人的住宅和城堡受到了攻击;在布里斯托尔和格拉斯哥发生民变。这些运动被镇压下去了,而产生了这样的后果:统治

阶级的两个阵营，即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由于害怕群众的积极行动，打算妥协了。所以，一当政府要提出以改革派新议员来补充上议院问题的时候，贵族们就让步了。经过两年的紧张斗争，终于在1832年6月批准了改革法案。

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撤消了不少“腐败选邑”，设立了许多新的选举区，主要是在从前在议会中没有议席的新兴工业城市。但是，劳动人民并没有得到选举权，只有缴纳高额所得税的有产阶级才得到选举权。

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土地贵族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妥协。由于这种妥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也被认为是政治方面的统治阶级”^①。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在改革以后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土地贵族依然可以左右国家的一般行政管理和立法机关。

大工业资产阶级得到了侧身国家政权的机会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统治，就采取了许多奴役工人的措施。1834年，议会通过了新济贫法，剥夺了失业者和贫民得到社会救济的权利。从此以后，要想得到社会救济必须进“习艺所”。而在“习艺所”里，力不胜任的劳动，非生产性的劳动，监狱般的纪律，弄得进所的人疲困不堪，而且还要挨饿。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迫使失业者贱价就雇。

30年代初期的立法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积极参加议会改革斗争的工人阶级弄清了资产阶级欺骗了他们，并且独吞了对土地贵族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果实。

宪章运动的产生。宪章运动中的派别斗争 英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产生了名为宪章运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1836年，一批先进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了“伦敦工人协

^① 马克思：《不列颠宪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页。

会”，协会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叫作《人民宪章》，要求英国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化。宪章提出六项要求：确定普选权（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选举议员用无记名投票法，把全国划分成平等的选举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废除财产资格，发给议员薪俸。广大劳动人民都热烈拥护宪章，希望通过宪章的实现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像一位宪章运动的演说家所说的，“宪章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

从 1838 年起，全国各地到处都举行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宪章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到 1839 年春天，在向议会提出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有 120 多万人。

1839 年 2 月 4 日，宪章运动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在大会的代表中间，很快就暴露出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些代表认为只要把请愿书递交议会，大家就散伙，让议会去解决问题。宪章运动中的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不久就离开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中的多数派表达了无产阶级和拥护无产阶级的各阶层人民的愿望，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坚决为实现宪章而奋斗。宪章的拥护者在人数上对一小撮统治寡头占巨大优势，因此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产生这样的希望：代表大会通过和平途径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进一步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产阶级仍然拒绝满足人民的要求，那怎么办呢？一些代表要求作坚决的斗争，直到举行武装起义。另一些代表则认为只须从事和平宣传给社会舆论以影响就够了。

竭力主张采取坚决行动的是朱里安·哈尼，他在 1838 年创立了“伦敦民主协会”，把首都的革命工人联合起来。哈尼严厉批评那些以为无须进行革命斗争就可以实现民主改革的人。他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并提出了宪章运动者的武装队伍向伦敦进军的计划，以迫使议会通过宪章。

采取另一种立场的是威廉·洛维特，他是个细木匠，伦敦手工业者的代表。洛维特认为宪章运动者的任务只限于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

在宪章运动中起显著作用的是爱尔兰律师和政论家奥康瑞尔，他是影响很大的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的出版人，又是团结广大工厂工人的“北方大同盟”的组织者。奥康瑞尔发表了许多演说，号召采取坚决行动。但是，他又认为事情到不了人民起义的地步，只要有发生起义的威胁就可以迫使议会实行宪章。所以，奥康瑞尔的革命的演说中常常掺杂着号召群众镇静的要求。

宪章运动最有影响的活动家是政论家詹姆斯·布朗特·奥勃莱恩，他是好几个宪章运动派报纸的编辑。他的文章在宪章运动者队伍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奥勃莱恩是欧文思想的信徒，但是他跟他的老师不同，认为实现欧文的理想，必须由劳动人民把政权夺到手。奥勃莱恩已经接近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但是就他的观点来说，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像奥康瑞尔一样，在策略问题上东摇西摆，有时主张起义，有时主张和平宣传。

宪章运动代表大会在策略上严重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宪章运动的社会成分在运动的最初阶段是很复杂的，并且也反映出工人群众在思想上还不成熟。这种意见分歧阻碍了代表大会对群众斗争发挥领导作用。

这时政府被宪章运动者的宣传活动弄得惊恐不安，因此决定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公开的群众大会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都遭到禁止；在工业区，军警云集，资产阶级开始建立志愿部队支援政府。

1839年5月7日，宪章运动者的请愿书递给了议会。不出所料，议会否决了请愿书。宪章运动代表大会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而削弱已不起作用，可是工人群众为政府的警察镇压所激怒而斗志

高昂。1839年7月15日，为了回击当局禁止宪章运动者举行群众大会的挑衅行为，伯明翰的工人举行起义，他们占领城市达两天之久。同年11月3日，纽波特的一群工人试图劫狱，营救宪章派活动家文森特，但在同军队的冲突中遭到了失败。

政府加强了镇压行动，开始大肆逮捕宪章运动积极分子。法庭的严厉判决，监狱囚禁，苦役流放，使宪章运动陷于群龙无首状态。到1839年底，运动被摧毁了。

1842—1847年的宪章运动 但是，宪章运动的沉寂只是暂时的。到1841年秋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来了，而且非常猛烈，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急剧地贫困了。

到这个时候，宪章运动阵营发生了重大的变动：资产阶级激进派退出去了，跟着，这个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也离开了。在这两种人看来，议会改革本身就是目的，而工人阶级则认为这种改革是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根本改革的方法，是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手段。随着宪章运动者中的无产阶级成员越来越多，运动便具有新的更有组织的形式。还在1840年就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型，协会订有会章，设有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规定会员须缴纳会费。协会的会员很快就达到4万人。曼彻斯特成了协会和整个宪章运动的中心。

宪章运动者第二次请愿书有330万人签名，于1842年4月递交议会，这次请愿书的措辞比第一次更加激烈。它提到许多社会问题，较彻底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请愿书说到女王维多利亚时写道：“陛下每天获得收入165英镑，而千千万万工人家庭每天每人只能获得3³/₄便士”。请愿书的执笔者揭穿了英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公平，指出了工人的力不胜任的劳动，工资的微薄，捐税的沉重，以及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集中于上层阶级手中。他们要求废止济贫法，取消英国与爱尔兰的合并。

议会拒绝了请愿书。统治集团的行为使工人阶级增强了必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的信念。举行“神圣月”，即举行政治总罢工的主张，特别受到工人的欢迎。1842年8月10日，工业城市斯坦利桥（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宪章。这个工业区其他城市的工人纷纷响应，后来，罢工还扩及国内别的地区。8月中旬，许多工联会都响应罢工。罢工运动席卷了英国北部各工业区。但是，罢工仍然没有发展成为总罢工，因为中部和南部各郡的工人没有参加罢工。

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一次也是不称职的。1842年8月17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运动代表会议没有通过能够保证斗争取得胜利结果的决定。由于没有总的领导，罢工逐渐地衰落了。政府又出动警察进行镇压，而且规模比过去更大。

1842年罢工失败后，宪章运动就开始失去它的群众性。造成这种情况也由于危机的减轻和1843年开始的工业复苏从而使经济情况有了某些好转。

但是从现在起，宪章运动成了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从1844年到1848年，宪章运动的先进活动家——哈尼、诗人和政论家厄内斯特·琼斯等人都积极地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这个协会同英国国内外的许多革命团体和民主团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协会对于宣传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已经同宪章运动有了联系。这些年住在英国的恩格斯，从1843年起同宪章运动中的革命分子保持着私人往来，从1845年起积极地给宪章派报刊写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建立“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工作。他们给予宪章运动左翼先进活动家以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同他们过从甚密。

同时在宪章运动者中间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势力。奥康瑞尔提

出了一个计划，要工人回到农业劳动中去。为此，他于1845年建立了宪章派土地合作社，合作社的每一个社员以缴纳现金为条件可以取得土地、住房、劳动工具、役畜。这是一个完全不能实现的计划。75,000个合作社社员凑集起来的钱，到1848年为止只能保证230家得到土地。奥康瑞尔的计划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它使工人离开了反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使他们产生了回到农业中去做小私有者的虚幻的妄想。奥康瑞尔方案之还能受到宪章运动者的欢迎，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不久，宪章派土地合作社也就破产垮台了。

自由贸易的胜利。工厂法 工业资产阶级坚决地要使工人放弃独立的政治斗争。早在1838年，他们就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力争取消谷物进口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希望用这种方法争得降低粮食价格，从而使工业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畅销国内外市场。

“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人是富有的工厂主理查·科布顿，同盟展开了关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大规模鼓动。科布顿一伙人——自由贸易主义者对劳动者许下诺言说，谷物价格一降低，实际工资就会提高。宪章运动者很快就识破并揭穿了“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家们的阴谋。但是科布顿终究把工人的某些阶层诱入反谷物税运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群众性的宪章运动的衰落。

从1846年起，托利党皮尔内阁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开始实施自由贸易纲领。进口税率，首先是粮食和原料的进口税率，大大降低了。造成来自殖民地的货品输入困难、价格昂贵的航海条例也取消了。这两项措施降低了英国工厂产品的价格，刺激了英国的输出。归根到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英国资本的活动范围，便利了英国商品夺取他国市场和使英国变成世界贸易中心。如马克思所写那样，英国资产阶级当时想使英国成为“一个大

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①这是一个要使全世界服从英国工业资本利益的计划。

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原料和粮食的价格下降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他们还想借口食品价格的下降而降低工人工资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润，但是因为害怕宪章运动，而不敢这样做。由此可见，英国工人阶级毕竟也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

在宪章运动的影响下，英国资产阶级也对工人作了另外一些让步。1844年，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规定把未满13岁儿童的工作日缩短到6个半小时，以便他们有时间学习。1842年，禁止未满10岁的儿童和禁止妇女在地下矿井中劳动。1847年通过了规定妇女和未成年人工作日为10小时的法律。马克思强调指出这项法律的重大的原则性的意义，说明它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②正是在这个时期对工厂法的实施情况加强了检查：增加了工厂检查员的人数，还稍稍扩大了他们的职权。英国工人阶级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宪章运动和工人运动高涨的直接结果。

殖民政策 在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英国在全球所有海洋和大陆上积极实行侵略政策。推行这种政策一位最卖力的人物是帕麦斯顿勋爵，他从1830年到1841年和从1846年到1851年两度担任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肆无忌惮地欺凌弱小国家。

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无法无天，作威作福，它拥有自己的海军和陆军，设有法庭和其他镇压机关。1833年

①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5页。

② 参阅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0页。

修改东印度公司章程时,公司的特权稍有削减,其中包括准许英国较广泛的工商界人物从事对华贸易。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仍然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经济机构和政治组织。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印度的统治,英国殖民者在 1843 年夺取了信德,1846 年占领了克什米尔。英国用“保卫”到印度去的通路这个骗人的借口,于 1839 年占领了亚丁港,并继续在马六甲半岛扩展自己的领地。同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但是因为碰到阿富汗人民的坚决抵抗,只好在 1842 年同阿富汗艾米尔签订了条约,暂不侵占这个国家。对中国,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 年),英国占领了香港,并迫使清廷为外国主要是为英国(特别是为输入鸦片)开放了一系列的通商口岸。英国还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继续扩张领地:1840 年侵占了新西兰,1842 年侵占了婆罗洲北部(沙撈越公国),1843 年侵占了南非的土地(纳塔尔)。

英国的侵略政策使得它同其他强国的关系日益尖锐。在近东,英俄关系不断恶化。英法矛盾也有增无已;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埃及和新西兰等几次几乎动武。

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劲敌是想称霸西半球的美国。英国同美国为划定加拿大与缅因州之间的边界,为争夺奥里根等地的领土,为争夺中美洲的霸权,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两国都计划在中美洲开凿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而于 1849 年相互保证暂不开凿。因此,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往来于两大洋之间的船舶不得不绕过南美洲作长期而危险的航行。

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拥有殖民地领土为 20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 亿。英国的这个辽阔的殖民帝国是英国统治阶级神话般地大发横财的源泉。用抢劫手段从殖民地各族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加速了宗主国资本主

义的发展。

1833年，英国资产阶级被迫废除了英国各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因为奴隶们坚持要求自由，屡次举行起义。在整个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在西印度的种植场上，奴隶起义此伏彼起。况且，奴隶劳动从经济上看也越来越不上算了。英国政府从奴隶主手中把奴隶赎出，支付给奴隶主2,000万英镑的巨款。蓄奴的种植场主试图用“学徒”形式继续保存奴隶制度，然而再三发生的奴隶起义迫使他们于1838年放弃这种制度。但是，过去的奴隶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他们没有土地，被迫在种植场做工，挣微薄的工资。在40年代，种植场主需要劳动力，开始从印度和中国把大批苦力输入西印度群岛和其他英属殖民地。苦力的状况同奴隶几乎毫无区别。

随着英国工业生产的发展，英属殖民地也越来越成为廉价的殖民地原料的重要产地和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这就是英国实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同时，在英国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移民出境也有重大的意义。在30年代，迁往殖民地的移民约为50万人，而在40年代已经超过120万人。

美洲和澳洲英属领地的广大地区都是移民劳动开发的。移民用双手清除了处女林，垦殖了北美高草原，修筑了铁路。从英国迁出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经历了千辛万苦。在路上，许多移民饿死病死，许多移民被船主和中介人勒索一空；他们到殖民地后，又成了种植场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的牺牲品。

加拿大的1837—1838年起义 英属北美洲（现在的加拿大）是英国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之一，它包括下述几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圣罗梭士河支流渥太华河为界）以及滨海各地区。农业、林业、渔业在英属北美洲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工业只有农产品加工业。木材、大麻、鱼类和粮食是主要出口货。在滨海

地区，造船业发展得很快。

资本家、主要是英国资本家的土地投机活动阻滞了移民向加拿大西部地区迁徙。资本家侵占了大片土地，由于移民源源不绝地涌入而使地价飞涨，他们就把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发了大批横财。英国土地投机者在英国当局的支持下胡作非为，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新兴的加拿大资产阶级大吃英国在加拿大实行的关税政策和租税政策的苦头。下加拿大(圣罗梭士河下游一带)的情况由于民族矛盾而变得复杂了，这里从法国统治时期起，就有大量的法国移民，他们顽强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特别是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

加拿大各个地方议事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成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心。资产阶级在地方议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力争对英国当局财政政策的监督权。下加拿大这个最大的和经济最发达的殖民地的议事会里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

法国的1830年革命和英国的1832年议会改革，使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运动加强了。在下加拿大，反对派的首领是法兰西人律师帕皮诺。下加拿大的资产阶级要求成立“责任政府”，当地议事会拒绝批准总督提出的预算。但是，英国议会拒不接受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要求，下加拿大议事会被总督解散了。

英国当局的挑衅行为激起了殖民地居民的公愤。1837年，下加拿大和上加拿大先后爆发了自发性的起义，起义农民提出的主要口号是要求土地买卖自由。不久，资产阶级由于惧怕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而退出起义。帕皮诺逃往美国。

英国军队把起义镇压下去了。但是英国政府担心美国利用移民的不满情绪，就对加拿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当时美国曾经几次对英国的北美领地提出要求，而且在起义期间以武器和装备接济起义者。1840年，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合并，从而

加强了英国当局的地位。不久，加拿大获得自己规定商品进口税的权利，后来又成立了责任内阁，以限制总督的专权。英国政府的让步，巩固了加拿大资产阶级与英国资产阶级的联盟。

澳大利亚 在十九世纪第二个 25 年，英国移民潮涌而至，并开垦了澳大利亚大陆。在此以前，英国当局只是把澳大利亚作为判处苦役刑罪犯的流放地，用苦役犯的劳动在那里修筑道路，建造港口等等。政府把流刑犯交给富有的农场主和资本家使用。大企业主和资本主义公司便利用这种不花钱的劳动力大发展畜牧业。自从发现蜿蜒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山岭的诸隘口以后，这条山岭迤西辽阔的膏腴地区便得到了垦殖。畜牧资本家闯入这片地区，把土著居民撵到大陆中部荒漠地区，使他们陷于绝境，并且经常发动战争消灭他们。同时，澳大利亚其他沿海地区也开始住上移民：1829 年建立了西澳大利亚殖民地，1836 年建立了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在此以前，即 1825 年，已经有移民垦殖的塔斯马尼亚岛，被宣布为独立的殖民地。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由于人口增加，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流刑犯的劳动力了。因而，在澳大利亚展开了反对再向那里大批放逐苦役犯的宣传运动。工人和农民都热烈地参加这一宣传运动。1840 年，英国政府在移民的压力下，停止向澳大利亚某些殖民地放逐苦役犯，到 1868 年完全禁止这种放逐。这时，英国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总数已达 50 万人。1851 年澳大利亚发现富饶的金矿后，移民人数增长得特别迅速。

南非洲 英属南非诸殖民地有自己的发展特点。还在十九世纪初叶对法国作战时期，英国人就占领了那里原属荷兰的领地。那时候，这片殖民地叫作好望角，居住着荷兰的移民，他们自称布尔人（荷兰语是农民的意思）。布尔人夺取了土著黑人的土地，使黑人沦为奴隶，强迫他们在牧场上干活。布尔人主要经营畜牧业，牧

场占地极广。布尔人为了夺取新的牧场，经常同土著居民发生冲突，一步一步地、越来越远地把他们撵向北方和东北方。

布尔人对于自己转而受英国统治，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因为英国当局能够保证他们在同土著居民斗争中占居上风。但是，英国殖民者要控制他们的地产，并要实行英国的法律，却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1836年，布尔人开始大批地往北向奥伦治河北岸迁移，在那里建立了奥伦治共和国，后来进一步向瓦尔河北岸迁移，在那里又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布尔人用武力把土著黑人赶出这些地区。1836年12月16日，拥有火器的布尔人同捍卫自己土地的朱卢部落进行了一场大血战（“血河激战”）。

英国殖民者趁布尔人北迁的机会占据了新的领地。1843年，英国人吞并了布尔人在印度洋沿岸地区所建立的纳塔尔共和国。但是，奥伦治共和国的布尔人则作了比较坚决的抵抗。1852年，英国只好承认奥伦治共和国独立。

3. 德意志

工业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状况 德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从30年代后半期起显著加快了。在莱茵河上，兴起了一批工业大中心：科隆、克雷费尔特、爱北斐特、巴门和索林根等等。到40年代初，博胡姆和埃森都已经由小村镇变成了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巨大中心。莱茵—威斯特法里亚地区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统治时期废除了封建制度，以及那里蕴藏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都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在萨克森，纺织工业发展很快，纺织工业的中心是开姆尼斯城。从40年代起，柏林也开始变成重要的工业中心。1846年柏林的40万人口中，有7万是雇佣工人，一部分雇佣工人在大工厂中，例如在波尔齐机器制造厂中就业。普鲁士的机器制造业和布匹印花业，有近 $\frac{1}{3}$ 集中在柏林。到1847年，全普鲁士总

共有 1,000 台蒸汽发动机，总功率为 21,000 匹马力。1824 年，莱茵河上开始行驶轮船；1835 年，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开始通车。

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主要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仍然占有优势。产业革命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时期，德国工人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够。城市中充斥着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和迫于贫穷和饥饿而离开乡村的农民。工业发展得太慢，吸收不了这么多闲散劳动力。失业和贫穷迫得德国劳动人民到国外去找工作。1846 年到 1847 年，出国人口每年超过 10 万人。

工厂工业的发展导致小型手工业企业的衰落，并使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企业主不断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日，残酷地剥削女工和童工。在柏林及其效区的织布工业中，幼童为了极微薄的报酬，从早晨 5 点钟工作到夜晚 9 点钟。

革命运动和反对派运动。关税同盟 1830 年的法国革命也引起了德国社会运动的高涨。30 年代初，在萨克森、不伦瑞克、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巴伐利亚都发生了革命斗争，结果实行了某些改革，不过这些改革范围相当小。1830 年，在黑森爆发了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起义，但是起义被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莱茵地区某些城市的工厂工人中发生过多次骚动。

1832 年 5 月，在汉巴赫城堡（在巴伐利亚的奈什塔特附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它的口号是为争取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参加这次得名为“汉巴赫庆节”的集会的，有将近 3 万人之多。出席集会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从德国各地来的，一部分则是从法国和其他国家来的（其中包括波兰的流亡者）。到会的演说家们发表了热烈的爱国演说，号召为争取国家的民主改革和民族统一而斗争。

1833 年 4 月，在美因河法兰克福，有一群大学生和职员试图

举行政变，宣布成立共和国。尝试失败了。第二年，黑森的警察破获了秘密的“人权社”，“人权社”的领袖是两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大学生乔治·毕希纳和牧师魏迪克。毕希纳发表过有名的告农民书，揭穿了德意志诸侯和封建主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强调指出劳动人民在同反动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为了躲开警察的迫害，毕希纳逃往瑞士，不久就死在那里。魏迪克被逮捕，后来在监狱中被折磨死了。

德意志邦联的统治集团对先进的报刊和大学生团体施加残酷的压制。到 30 年代中期，德意志的反动势力重新加强了。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中心，由于德意志分成许多独立国家的割据局面，所以革命力量也是涣散的，这种情况以及大多数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怯懦，方便了当局镇压革命运动。

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赞成统一德国的口号，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他们希望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在这个时期，德国统一的倡导者是杜宾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工厂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 年）一书中，悲痛地叹息政治割据局面和国内关卡林立妨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李斯特要求对从国外进口的制成品课征高额关税，他不仅鼓吹要由统一的德国来夺取世界市场，而且主张要用战争取得德国在欧洲的霸权。由此可见，在李斯特的思想体系中，既有进步的愿望，也有侵略性的和沙文主义的企图。1834 年，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等 18 个德意志邦建立了关税同盟，这是摧毁德意志邦联内部的关税壁垒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关税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普鲁士。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全德性国内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德国资产阶级民族觉悟的提高。同时，关税同盟的建立也保证了普鲁士能在未来统一德国事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从 40 年代初期、特别是从 40 年代中期起，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地区，反对派运动重新发展起来。1840 年登基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策充满着神圣同盟精神，这种反动倾向使资产阶级自由派非常失望。1844 年发生了谋刺国王事件。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人士坚决要求立宪。1845 年，普鲁士全国各州等级议会（只有两州除外）都向国王递送请愿书要求立宪。资产阶级自由派还力争扩大关税同盟和废除贵族的等级特权。大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仍旧希望用和平手段，即通过同君主政权和贵族达成协议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纲领。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上的温和性，根源于德国经济上的落后性、德国的分散性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小邦里）对统治集团的依附性。

思想领域中对反动势力的斗争 当时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政论家都积极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领导这个斗争的，是文学—政治团体“青年德意志”，在初期，它的领袖是作家和政论家路德维希·白尔尼。白尔尼在 30 年代初所写的《巴黎通信》中激烈地抨击德国的反动制度。亨利希·海涅的作品，对于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发生强烈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辉煌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对普鲁士的政治制度，对德意志掌权的诸侯，对整个德意志的贵族、官僚和小市民都给予致命的讽刺。诗人格奥尔格·海涅的《仇恨之歌》也引起热烈的反响，他宣布革命斗争是唯一能够消灭反动势力的手段。

哲学家大卫·施特劳斯挺身反对教权派反动势力的专横跋扈。他在《耶稣传》（1835 年）一书中激烈地批判了有关基督教产生的种种传说。他说，摆脱宗教偏见是政治进步的条件。教权派对施特劳斯的这部书看作眼中钉。

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即黑格尔门徒中的左翼）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也批判宗教和“旧制度”的其他思想基

础。青年黑格尔派政治上的急进主义是非常浅薄的。他们藐视人民群众,说什么历史是“有批判头脑的人物”创造的。

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也在思想领域中同反动派作过斗争。他在1830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论死与不死》被当局没收了,他本人被解除了埃尔兰根大学的教授职务。费尔巴哈并不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他的哲学著作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影响很大。他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还是一个黑格尔学派的代表。但是后来就离开了黑格尔,开始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1839年,费尔巴哈出版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费尔巴哈在他的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里抨击宗教的世界观,证明上帝只不过是人类幻想的产物而已。后来恩格斯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经受过它的人才可理解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都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费尔巴哈派了。”^①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弱点,在于他是脱离社会条件,脱离阶级斗争来研究人。费尔巴哈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在社会观点方面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揭露了费尔巴哈学说的这种局限性。

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魏特林。“真正的社会主义”最早的一批德国工人团体,是30年代初由流亡在法国和英国的德国侨民建立起来的。1833年,在巴黎成立了“流亡者联盟”,加入联盟的,除了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外,还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流亡者联盟”内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1836年,联盟发生分裂,社会主义派从“流亡者联盟”中分出,组成“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的纲领是空想的纲领,而它的策略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5页。

则近乎是密谋者的策略。1840年,跟“正义者同盟”有密切联系的法国秘密团体“四季社”被破坏后,同盟迁到伦敦活动,在那里同宪章运动组织建立了联系。

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是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他的职业是裁缝,曾经迁居法国,后来侨居瑞士和美国。魏特林的主要著作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其中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批评,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计划。这部著作战斗性的言论对当代人发生强烈的影响。但是,魏特林由于所表达的是手工业者(他本人就是手工业者)的情绪和愿望,所以不能正确地理解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的途径和方法。他对革命理论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德国可以从封建的君主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和国,他不明白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主导作用,而把革命本身想像为备受压迫群众,首先是流氓无产者阶层的自发暴动。魏特林在自己著作中所阐述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是带有空想性质的。例如,他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必须从废除货币流通入手。后来,魏特林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德国土壤上产生的小资产阶级学说,这一派在40年代拥有一定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卡尔·格律恩和奥托·吕宁等人断言,只要扶助独立的手工业,而不鼓励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苦难的大工业,德国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理论家既否定资本主义,同时又否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他们把自己的发展社会的空想方案叫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翻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学说。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德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独立发动。

西里西亚工人主要从事亚麻布生产，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遭受着双重剥削，既要遭受雇他们做工的手工工场主的剥削，又要遭受地主的剥削，因为他们要取得从事工业劳动的权利，必须向地主缴纳一种特别捐。机器的出现，使得企业主可以把工人的生活降低到乞丐般的地步，无论是织布工或者纺纱工，虽然全家从早干到晚，甚至也不能保证一家人吃饱。

在布烈斯拉夫附近两个村庄里的织工，因为大企业主茨凡奇格尔无理开除工人代表，掀起了反对企业主的自发的斗争，起义就这样开始了。起义的织工捣毁了茨凡奇格尔和另外几个手工工场主的住宅、仓库和企业。运动扩展到全区，波及西里西亚很大一部分地方。工人同军警进行武装搏斗。在起义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有组织的因素；但是工人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当局把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判处死刑，有的被判处长期徒刑。

西里西亚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德国国内和国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海涅曾经写了卓越的诗响应这次起义，痛斥普鲁士国王军队镇压起义工人的残酷行为。

第二章

30—40 年代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增长

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到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以致当时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成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俄国在 30—40 年代被卷入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因而加速了这个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欧洲各国对俄国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刺激了俄国商品性农业和商品性畜牧业的发展。外国廉价工厂制品的竞争，促使俄国的手工工场主不得不采取工厂方式的生产。

在农奴制的俄国普遍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关系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在社会制度方面都是在“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尖锐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1. 农奴制经济的解体

农业危机 在十九世纪 30—40 年代，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它的经济发展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居优势而停滞不前。地主贵族和专制农奴制国家几乎成了土地的独占所有者。在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欧洲部分 103,000—105,000 个地主拥有 10,500 万俄亩可耕地，其中只有 3,570 万俄亩归领地农民使用，使用这些土地的农民总共 1,070 万人。同一时期，在国家领地的 7,900 万俄亩可耕地中，900 万国家农民总共才有份地 3,700 万俄亩。

由此可见，领地农民每个男丁的平均份地还不到 3.5 俄亩，国家农民也不过略多于 4 俄亩。与此同时，每个地主的庄园，除去份地不算，单是可耕地平均就有近 700 俄亩，其中大部分没有加以经营利用。因此，到十九世纪 50 年代初，俄国欧洲部分种植各种农作物的面积还没有超过土地总面积的 20%。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俄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

农奴制的地主经济已经过时了。这种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外界隔绝的自然经济的优势地位，农民的份地制度，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守旧的耕作技术）在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期间，逐渐地消失了。

自然经济性的农业生产在当时的俄国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地主的庄园日益卷入市场关系：商品粮食的生产增加了，马铃薯、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扩大了，牧草播种和多区轮作制推广了，畜牧业发展了，农业原料初步加工企业建立起来了，等等。商品货币关系也扩及农民经济，特别是在那些代役租盛行、小型农村工业和农民出去打短工现象早就得到发展的非黑土省份。

把土地分拨给农民并把农民固着在份地上，这种做法对地主来说，渐渐变得无利可图了。地主首先用夺取农民份地的办法来扩大庄园的耕地，并且常常把自己农奴的土地全部剥夺掉，把土地折成“月粮”（месячина——按月发给的实物给养）。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贵族领地中的主人耕地，比重陡增：在非黑土地带由 14% 增加到 25%，在黑土地带由 18% 增加到 49%。在这数十年间，剥夺农民土地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本来是使用农奴的无偿劳动力的条件，现在对地主来说，已失去了经济意义。在地主庄园里，越来越经常使用雇佣劳动了。在黑土地带，居住农奴人数较少的土地，往往价格较高。报章杂志上也开始公开讨论雇佣劳动力的优越性的问题。

在十九世纪 30—40 年代,俄国国内对于农艺方面的各种成就和新式农具已经表示出高度关心。在这个时期,成立了近 20 个各种各样的农业团体,出版了十多种研究农业个别部门的报纸和杂志。在农业展览会上,开始出现了许多种改良农具的样品,这些农具通常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就在这个时期,俄国建立了第一批农业机器制造厂。

但是,农奴的强制劳动,生产率很低,在这种条件下,要在地主庄园中实行生产合理化是不可能的。况且,为实行生产合理化所必需的投资,对大多数贵族也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贵族欠下了以庄园作抵押的巨额债务,总数差不多有 5 亿卢布。

大多数地主仍旧采取加重劳役或者提高代役租的办法力求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不仅强制农民在地主的耕地上干活,而且还在领邑工业的企业中和庄园的其他工作中广泛利用农民的劳动。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货币税也增加了。到十九世纪 50 年代,每一课税单位土地所缴的代役租往往达到 20—30 卢布。

农奴制剥削的加强阻碍着俄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促使许多农户破产,引起农奴制乡村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工厂生产的开始 由于农民经济的被卷入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在农奴制的俄国,不仅开始有了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必要条件,而且开始有了发展工厂生产的必要条件。

除了旧式的农民工业生产——麻布、毛织品、皮革和木器等等生产部门以外,农民还开始发展棉布、服饰用品、家具、玩具等等生产。这些小企业主大多数都陷入对包买主的奴役性的依附地位。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因此而纷纷破产,并被迫为从他们中间分化出来的大企业主做工。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剥削农民劳动并为市场制造产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俄国手工工场的数目，在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增加了50%，达到2,800家，从业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半，达到86万人，其中雇佣工人将近53万人。手工工场的规模日益扩大，大部分手工工场都使用雇佣劳动力，并同市场保持联系。

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促使手工工场主采取机械化生产。早在十八世纪末叶，俄国的个别企业就试图采用机器技术。可是直到十九世纪30—50年代，俄国许多工业部门才开始系统地运用机器技术。

机械化生产在新兴的棉纺织工业中取得了最有成就的发展，俄国的棉纺织工业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才兴起的，但很快就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十九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的多座大型纺纱厂，完全采用机械化生产。从十九世纪40年代起，俄国的棉纺织工业就基本上使用国产棉纱进行生产了。

在俄国旧式的纺织部门——呢绒和亚麻布生产部门中，工厂技术的发展要慢一些，因为在这些部门中大半是官营手工工场、地主的手工工场和领有制手工工场，这些手工工场都使用农民的强制劳动，而且通常都是制造国家定货。可是，从十九世纪40年代起，商人和富裕农民开设的新企业也开始有效地采用机器生产，这些企业织造毛织品和麻织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一部分向国外输出。

采矿工业也开始采用新的技术。十九世纪20年代，俄国的许多铁工厂都开始使用压延机。从30年代中期起，乌拉尔的炼铁炉进行了热鼓风的试验，并且成功地采用了搅炼法。

但是在农奴制度下，重工业生产的机械化是不可能得到广泛发展的。列宁在说明乌拉尔的工厂的落后性时，着重指出它们是国家的和大地主的财产，国家和大地主“不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资本与竞争上，而是建立在垄断和自己的所有权上”^①。在十九世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1—442页。

纪整个上半叶，俄国的生铁产量增加不到一倍，而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的英国差不多增加了 11 倍。俄国在世界生铁生产方面失去了领导地位，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降到世界第四位（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后）。

农奴制俄国经济上的落后，在工业生产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工厂工业只有在较多的雇佣工人生产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但是，农民的向非农业性职业的发展，由于农奴主的专横，仍旧受到限制，而官营手工工场和地主的手工工场仍在有增无已地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这些手工工场里做工的已超过 30 万人。工业的机械化对机器设备的需求日益增长，可是俄国的机器制造业直到 50 年代才开始有所发展，因此俄国工厂所需要的发动机和其他机器大部分是从国外输入的。在十九世纪 30—50 年代，俄国工业中所使用的机器价值 10,800 万卢布，其中进口的设备价值 6,400 万卢布。而且，工厂生产还由于对工业品的需求不足和这种需求的增长非常缓慢，而停滞不前。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 由于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发展，国内各个经济区的经济专业化加强了。

商品性农业在中部地区、黑海沿岸地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各个黑土省份优先获得发展，不过俄国的谷仓仍旧在中央黑土地区（库尔斯克省、奥廖尔省、唐波夫省、沃龙涅什省和奔萨省出产的投入市场的粮食占商品粮总量 40%）。商品性畜牧业的基地在南部和东南部的草原边区。在北部和西部各省广泛播种经济作物，特别是亚麻。甜菜的主要产地是乌克兰。

俄国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非黑土省份，那里出现了整片整片的商品性的农村手工业地区，兴起了许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工业城市。冶金业的主要基地仍旧是乌拉尔。“莫斯科附近地区”的老工厂和北部的一些企业只有次要意义。

这样,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欧洲部分终于分为两个各具特点的经济地区,这两个地区大体上以奥卡河为分界线,投入市场的食物和工业原料大部分是这条分界线以南地区生产的。小型商品性工业和大型加工工业在这条分界线以北地区获得很大发展。农业省份和工业省份之间商品交流的加强,是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农奴制俄国的国内贸易中,集市起着极大的作用,集市的数目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 3,000 个增加到 4,300 个,集市的总贸易额年达 23,000 万卢布。工业品的主要贸易中心是马卡里耶夫集市,它于 1817 年迁移到下诺夫哥罗德,这个集市的年贸易额在十九世纪中叶估计为 4,500—5,000 万卢布。在农产品和畜产品贸易方面,乌克兰占居主导地位,那里有集市近 1,750 个,总贸易额达 7,000 万卢布。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贸易的意义也显著增大了。仅仅莫斯科一地 1840 年的经常贸易额就超过 5,000 万卢布。

国内市场的发展仍旧落后于工农业商品生产的增长。在市场上,商品的主要消费者——农奴的群众性需求增加得不多。俄国的交通梗塞也严重地阻碍着国内交换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货运仍旧主要依靠旧式的水上运输和兽力运输。这些运输方法速度缓慢,而且不可靠。伏尔加河流域各黑土省份登场的粮食,最快也得到第二年航期开始后才能运到彼得堡。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最早的一条公路是直到十九世纪 30 年代才开辟的;到 1850 年,全国修成的公路还不超过 5,000 俄里。

在俄国,轮船的建造和铁路的修筑,早在蒸汽运输史上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1815 年,第一艘轮船在涅瓦河上试航,20 年代初,卡马河和伏尔加河都开始航行轮船。30 年代末,在彼得堡和它的

郊区巴甫洛夫斯克之间建成了一条“实验”铁路。但是，其他铁路建设计划却因为遭到农奴主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实现。

直到十九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有商轮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并兴建建筑三大铁路：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华沙——奥地利边境（通往维也纳）铁路，彼得堡——华沙铁路。在十九世纪中叶，只完成了前两条铁路，那时俄国铁路的总长度不超过 1,000 俄里。在蒸汽运输方面，农奴制的俄国远远落后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国内市场发展（虽然是缓慢的），对外贸易也扩大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商品输出额由 7,500 万卢布增加到 13,300 万卢布，输入额由 5,300 万卢布增加到 13,000 万卢布。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业原料，首先是亚麻、大麻、亚麻籽、羊毛、油脂和皮革。粮食的输出，只是从 40 年代后五年，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和西欧各国歉收，才有显著增加（达到俄国出口总值的 30—35%）。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的输出量是很有限的（占出口总值 3—4%），并且几乎全是输往中国、中亚细亚、伊朗和土耳其的。在俄国进口额中，工业原料和制成品达到 50%。

在国际贸易中，农奴制的俄国对欧洲各个工业国首先是英国来说，是食品和原料的主要供应国之一，英国吸收了俄国全部输出商品的 40% 以上。

虽然如此，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首要意义的毕竟还是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容量，在十九世纪第一个 25 年期间，估计差不多达到 10 亿卢布，这个数字比俄国的对外贸易额大好几倍。并且，俄国的国内需求是比较稳定和经常的，而对外贸易额因为受到军事政治局势和各国关税政策等等的影响，经常发生剧烈的波动。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高加索、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的特点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资本主义经济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这是由于那里靠近国外市场和处于有利的滨海地位促成的。畜牧业发展了，酿酒业繁荣了，亚麻（很大一部分供输出之用）的播种面积扩大了。当地的地主（барон）继续实行他们早在十八世纪就采取的扩大主人耕地的措施。由于他们力争，政府于1816—1819年颁布了解放农奴但不给农奴土地的法律，可是地主对农奴的权力有很大一部分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地主夺得了几乎全部的土地，并且使农民沦为受奴役的佃农和雇农。这种改革给地主更加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创造了条件，随之就确立起对农民来说是特别残酷而沉重的剥削制度。此外，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还要受德意志地主贵族的民族压迫。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场手工业很不发达：在城市里是手工业占优势，在农村里是地主的领邑企业占优势。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大工厂企业，如那尔瓦的克林哥尔摩纺织厂，里加的造船厂及其他工厂等等。

在乌克兰，商品性农业生产在南部草原省份取得特别急剧的发展，因为在那里，贵族土地所有制不大盛行。俄国小麦出口的增加，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使得黑海沿岸各省使用季节性雇农的雇佣劳动力的耕地日渐扩大。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地主庄园的商品率也增加了。贵族大规模地剥夺农民的份地来扩大自己的耕地：在哈尔科夫省，“月粮农奴”达到农奴总数的11.5%，在基辅省，领地农民34%被剥夺了土地。从十九世纪30年代起，乌克兰的甜菜种植场获得急剧的扩展；到十九世纪中叶，乌克兰的甜菜种植总面积有一半以上是在基辅省和波多利斯克省。甜菜制糖工厂、酿酒工厂和呢绒手工工场都控制在贵族地主手中。到40年代，商人经营的呢绒企业跃居首要地位；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工厂。商人所拥有的炼制脂油、制造蜡烛、制造肥皂的企业，规

模都是不大的。当时在乌克兰，重工业只有一家古老的路甘斯克工厂。顿巴斯和克里沃罗日耶的丰富的地下资源都勘探得不够，未加开采。

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劳役经济的危机，从30年代起就明显表露出来了，这是和地主试图使自己的庄园适应于恶化了的粮食市场的条件有关的。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养羊业有了发展，而在南部地区，甜菜制糖业有了发展。白俄罗斯渐渐成了酿酒业的中心，地主又利用酒精来发展畜牧业。地主庄园生产的扩大，使农民越来越多地失去土地，经济日益破产。歉收和饥荒年复一年地重演着。由于当地的工业不发达，农民到俄国内地各省去谋生的越来越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作为工业原料和雇佣劳动力的供应者而进入全俄市场。

高加索同全俄市场的联系比其他边区都差。列宁写道：“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多……。”^①可是，高加索并入俄国所产生客观上的进步后果，到十九世纪中叶就有利地影响着高加索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尽管沙皇政府采取殖民主义政策和支持封建地主，可是在高加索仍然不断地创造着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在30年代，高加索进入了帝国统一的关税体系，这就加强了它同俄国内地各省的正常的经济联系。穿过中央高加索山脉的公路的修建，也促进了这种联系的发展。50年代，通往高加索的黑海沿岸地区的班轮开航了。南高加索同俄国内地各省之间的贸易额扩大了，这就推动了南高加索的商品性的烟草种植业、葡萄酒酿造业、园艺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工业原料（颜料、生丝、羊毛等）生产的增长。高加索的丰富的自然资源那时几乎还一无所知。石油矿被租让出去，使用简陋的手工技术开采，1850年的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3页。

石油年产量还不超过 5,000 吨。

那时,北高加索草原地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肥沃土地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开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 4 倍多,人口的增加首先是由于农民的移民。从俄国内地各省和乌克兰各省迁移到那里的国家农民,开垦了荒地,发展了商品性农业和商品性畜牧业。移民们学会了当地居民阿第盖人、卡巴尔达人、奥谢提亚人等的经营经验,也把好的耕作方法传授给当地居民。

哈萨克斯坦也卷进了俄国国内市场。哈萨克斯坦输出牲畜、羊毛和手工毛制品等;哈萨克斯坦从俄国内地各省输入的,主要是棉织品、粮食、鞣制皮革和铁。此外,假道运往中亚细亚各国的俄国货,也部分地留在哈萨克的乡镇和山村。商业的发展促使在哈萨克人中分化出一种新的势力——巴依(бай 即财主)。哈萨克斯坦本来就发达的封建关系,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影响的增长而复杂化了。

西伯利亚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尽管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比重在那里是微不足道的。由于西伯利亚许多民族保有宗法氏族关系的浓厚残余,自然资源的经济开发工作受到了阻碍。从俄国欧洲部分迁来的农民移民,人数不多。西伯利亚的垦殖之所以进展迟缓,也是因交通梗阻造成的,那里没有一条公路,西伯利亚的河川到十九世纪 40 年代才开始行驶轮船,而且轮船数量极少。在工业方面,稍微像样的企业只是阿尔泰的几个金矿,但是由于滥肆开采,丰富的矿床很快就枯竭了。尽管如此,商品货币关系毕竟也在西伯利亚发展起来了:集市的贸易额上升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俄国内地各省的工业品的输入量扩大了;并且从西伯利亚向俄国内地各省输出毛皮、粮食和畜产品。西伯利亚商人在下哥罗德集市中,在对华贸易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 30—40 年代俄国经济的发展是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在俄国不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动摇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可是农奴制度的统治却阻碍着俄国向当时比较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

2.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封建社会的阶级分化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俄国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根据第 9 次人口调查,1851 年俄国人口达 6,800 万人。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制度反映出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处于封建依附地位的各类农民占总人口 80% 以上,而贵族地主还不到总人口的 1%。

30—40 年代的特点是:农民大批破产了,富裕农民阶层分化出来了。

由于劳役和代役租加重,农民的份地日益缩小。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农奴的份地平均缩小了 $\frac{1}{2}$ 到 $\frac{2}{3}$:在非黑土省份每人份地由 13.5 俄亩减少到 4.3 俄亩,在黑土省份由 7 俄亩减少到 3.2 俄亩。领地农民,从 1836 年的 22,306,000 人减少到 1851 年的 21,846,000 人,即减少了 50 万人,这说明受农奴主贵族任意宰割的农奴的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同时,一些富裕农民分子,即“农奴资产阶级”却积累了数万以至数十万卢布的财产。后来著名的工厂主莫罗佐夫家族的始祖萨瓦就是在十九世纪 20 年代以 17,000 卢布赎得自由的。在 20—40 年代,伊凡诺沃城有 50 户发了财的农奴手工工场主获得了解放,他们付给自己的地主舍列米杰夫的赎金总数为 100 万卢布。

封建社会的另一个阶级,即贵族地主的状况也发生了大变化。农奴制经济的危机使得大批地主,特别是地产少的地主,陷于破产。仅仅从 1835 年到 1851 年的 15 年间,拥有农民 20 人以下的

贵族庄园,就减少了9,000多个。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无地产的贵族已经有好几万人了。

随着封建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阶级产生了。俄国工场手工业的较快的发展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加速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到十九世纪中叶,仅仅在大工业中就业的,就差不多有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工。这些雇佣工还不是无产者。他们在农村里有家业,他们的家庭平常也住在乡间,他们本人从秋天到第二年春耕前在工业企业做工,仍完全依附于地主。这部分从事工业劳动的农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国前无产阶级的固定成员。他们在手工工场和工厂中年复一年地、往往是一代继一代地做工,获得了有用的技能,因而一有机会就离开农村。

资产阶级在迅速地形成。在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资产阶级队伍主要是由富裕农民出身的商人和工业企业主补充的。普罗霍罗夫家族、古契科夫家族、加勒林家族、康诺瓦洛夫家族和其他许多俄国工厂主,都是发了财的“农奴资产阶级”出身的。

官宦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数颇多的阶层。专制制度的庞大官僚机构需要大量的官吏。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对专业人材的需求日益殷切。拥有数以千计学生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数目增加了。出版事业、特别是定期出版物发展起来,这就保证文学作品得到正规的报酬,从而为平民知识分子,即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从事这种工作的门路。在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俄国文化界著名代表人物中,有成批的学者、作家、新闻记者、演员和画家都是平民知识分子。

人民的反封建运动 农奴制俄国国内危机尖锐化的明显表现就是农民反封建运动的发展。从1801年到1825年,领地农民发生了281次骚动,从1826年到1850年,增加到576次。在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这些骚动带有明显的反农奴制性质。领地农民拒服

力不胜任的劳役，拒纳加重了的代役租；他们同农奴主的专横暴戾作斗争，力争彻底摆脱农奴制的压迫。

在某些领地上，农民的骚动采取了持久的形式，继续达数年之久。为了镇压骚动，当局往往派出特别队伍和正规部队，农民时常进行公开的抵抗。每逢歉收之年，以及瘟疫流行、兵荒马乱、农奴生活特别困苦的时候，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1830—1831年，霍乱流行，塞瓦斯托波尔、彼得堡、诺夫哥罗德、许多军区和中部各省纷纷发生大规模的反对当局专横的斗争。1839年普遍歉收，以后几年又连续减产，许多省的农民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同时，在1841—1845年，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的国家农民，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苛捐杂税和官吏压迫的运动。在40年代末，由于歉收、霍乱再度流行和额外征兵，在某些城市和乡村地区，特别是西部边境各省，不断发生骚动。

工业企业中的骚动，也带有反农奴制的倾向。这种骚动首先发生在使用农奴的强制劳动的官营手工工场、领邑手工工场和领有制手工工场里。参加骚动的人自发地起来反对农奴制剥削，常常要求给予他们以雇佣工人同样的劳动条件。

那时，雇佣工人也开始了积极争取改善生活状况的斗争。他们力争提高工资、定期发放工资、限制厂方的专横行为等等。这些早期的工人斗争还是自发性的、无组织的和分散的，有时还破坏机器。可是，这些斗争表明，在农奴制的俄国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典型的阶级矛盾。

例如在1834年，波果罗德斯科的一家丝绸手工工场的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并停止工作。企业主向官厅控告说：“工人违抗命令，故意毁坏货物和机器……经常成群结队地活动，抢夺钱财，并且跑出工厂去找代理人写状子，不断诬告我们。”1842年，莫斯科附近的彼罗夫毛织工场的200名雇佣工人停止工作，要求缩短节

日前夕的工作时间。1849年,莫斯科附近的拉宾涅克染色工厂的130名工人罢工,反对厂方克扣工资。不过,在农奴制的条件下,这种雇佣工人的斗争事件毕竟是寥寥可数的。

高加索各族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殖民压迫的斗争 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高加索的群众运动的规模非常广大。运动的目的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在30年代,北奥谢提亚、南奥谢提亚和阿尔明尼亚(谢梵湖地区)都发生了农民大骚动;在40年代,古利雅爆发了大起义,很快就席卷了几乎整个西格鲁吉亚。所有这些农民斗争都是自发地发生的,彼此各不相谋,并且遭到沙皇军队的严厉镇压。

北高加索山民的长期斗争在当时高加索的人民运动中占着特殊的地位。运动带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性质。在高加索山地东北部难于到达的地区,除了个别的封建领地以外,还有数十个“自由村社”,这种“自由村社”外表上是宗法式公社传统和氏族残余,而内部潜藏着未成熟的封建关系,村社的大部分居民是还未农奴化的农民,叫做乌兹金(уздени 即自由农民)。这种农民就是2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山民反对沙皇政府殖民政策的斗争的主力。山民反抗当地封建主的行动在这个斗争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因为当地封建主不仅霸占了“自由村社”的土地,并力求使乌兹金听从自己的支配。在切奇尼雅和达格斯坦山区发生的起义,规模最大。

沙皇政府兴师动众大举进攻起义山民。大量的正规军蹂躏山村,并把居民赶往不毛之地,并派遣哥萨克在高加索山前地带进行军事殖民。但是,人民运动仍在增长。这个运动的领导权操在伊斯兰教僧侣手里,他们使这个运动变成“反对异教徒的圣战”(ia-завам),不肯妥协。1834年,沙米尔领导了山民运动,他用宗教领袖——伊玛目(имам)的权力,使达格斯坦山区和切奇尼雅的居民

听从自己领导，并把这两地的居民统一在他所建立的神权国家——伊玛目国之中。沙米尔依靠自由农民群众，借助于受他支配的地方上的统治者——那伊勃(наиб, 村长)和狂信派——穆里德派(мюриды)军队，在同政府的正规军作战中取得大胜。沙皇将领曾多次大举征讨，连连惨败。

宗教思想体系(穆里德主义)对山民运动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这种思想增强了反动僧侣在运动领导中的势力，并加速了伊玛目国内矛盾的尖锐化。起义者的宗教狂热病使得自己脱离了周围各族人民，特别是高加索的基督教居民，并陷于孤立无援地位，以致不能同高加索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制度。最后，由于运动具有宗教性质，运动的领导人物便向土耳其苏丹求援，而这种做法正是高加索各族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从40年代末期起，沙米尔的伊玛目国日就雕敝。他所创立的山民的军事神权国家联合体是不巩固的。在同强敌进行多年持久的斗争中，沙米尔的军事力量日渐衰微，以后，他便采取强制和恐怖手段继续斗争。另一方面，在伊玛目国建立后的第二个十年末期，国内的封建化过程加强了。在这个时期，沙米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那伊勃、某些发了财的乌兹金和上层僧侣组成的有势力的大所有主集团，他们靠着向农民征收租赋生活。在伊玛目国内部，自由农民群众同过剥削生活的封建上层分子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增长，因而运动的领导人物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整片整片地区脱离了伊玛目国。

沙米尔兵力锐减。沙皇政府派到高加索的大兵团于1859年在古尼布村包围了沙米尔和还跟随他的400名穆里德派教徒，迫使他屈膝投降。

高加索西部的山民起义，由于得到英国和土耳其的援助，还持续了一个时期，到60年代中期也被镇压下去了。

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 专制农奴制度的基础越发动摇，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的反动也就越发露骨。尼古拉一世在他秉政 30 年间(1825—1855年)，一直在拼命地维护贵族在国内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他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而十分顽固的农奴主，“自负的平凡人，眼光同连长一样，把残忍当作毅力，把刚愎自用当作意志的力量……”^①

沙皇政权的最重要的惩罚机关是 1826 年设立的内廷第三厅。它主持政治侦查和监视工作，指挥特种宪兵团。第三厅直属沙皇尼古拉一世。

在沙皇俄国，有一星半点的反抗专制政权的行动，都要受到军警统治的摧残。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严厉打击出版和教育事业。教育大臣亚·谢·施什科夫上书沙皇说：“法国之所以能酿成和发生革命，是由于政府对书籍出版自由监视不严。”1826 年春天就实行了苛刻的(“生铁般的”)书报检查条例。随后又颁布了学校章程，这个章程使教育具有等级的性质，限制平民知识分子进入中学和大学。

在 30 年代初，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发表了农奴制度思想体系原理，所谓“官方民族性”理论。他断言，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专制制度，东正教，民族性”。乌瓦罗夫宣称专制制度是“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条件”，认为俄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宗教信仰并且始终服从专制农奴制度的。

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是在 1830—1831 年俄国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西欧革命运动高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它的任务是要给过了时的专制制度找论据作辩护。政府的教育系统的目的就是要广泛传播这种理论。以《北方蜜蜂报》为首的官方报刊和半官方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下册，俄文版，第 24 页。

报刊也都宣传这种理论。《北方蜜蜂报》是同第三厅有勾结的反动记者法·布尔加林编辑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彼·包果丁和斯·彼·雪维辽夫是鼓吹官方思想体系的头面人物。

在30—40年代,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根据俄国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尖锐程度,有时加强镇压,有时则从贵族地主的利益出发试图采取立法手段略微改进一下极其残酷的农奴制度。可是,沙皇政策的本质仍然不变。尼古拉一世为了研究政府改革方案,设立了所谓秘密委员会(总共设了十来个秘密委员会),力求保存和巩固专制农奴制度。秘密委员会的经常参加者科尔夫男爵泄露了沙皇政府的真正意图,他直言不讳地说,对专制农奴制度“丝毫都不要触动”才好,并且恬不知耻地接着说,“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活下去”。

沙皇政府始终在巩固农奴主贵族的物质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从1826年到1836年,沙皇把30多万俄亩的国家土地赐给贵族。国库慷慨地发放给他们数亿卢布以庄园作抵押的贷款。1845年实行长子继承法,禁止在继承时把大块贵族领地割成小块。

尼古拉一世同样关心保护贵族的等级和阶级特权。1836年重申确认他们拥有农奴的垄断权。为了限制其他阶层人物取得特权贵族身份,而创立了一种“荣誉公民”的特殊称号,用以授给有名望的手工业工场主、大商人、某些学者和艺术家,在这以前,这些人有时是可以取得贵族身份的。官吏的取得贵族身份也不容易了:按照当时的官等表,原定官员从八品起就可以取得贵族身份,这时改为只有累资到五品的人才能成为贵族。

沙皇政府对农民的政策,也是从贵族地主的利益出发制定的。由于农民骚动频繁,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几乎所有的秘密委员会都经常讨论农民问题。可是讨论的结果归纳起来只不过是防止一下农奴主的那些最难以容忍的坏行为而已。例如,禁止在出卖农民时拆散农民家庭,限制无领地的贵族购买农奴,只允许他们连土地

一起购买农奴。在 40 年代末，在住有很多波兰地主的西南各省，开始实行“财产清册”制度，即把农民的封建义务一一登入清册。

关于农民的立法，有时甚至比十九世纪初叶都开了倒车。1842 年的《义务农民法》确认地主有权同农民订立赎买契约解放农奴，但是必须把份地留下来，归地主所有。跟“自由农人”（1803 年《自由农人法》规定的）不同，“义务农民”没有取得自己旧份地的所有权，只取得临时使用权。

1837—1841 年，政府对国家农民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设立了国家财产部管理国家农民，国家财产部在中央和地方设有大批官吏。国家财产部大臣巴·德·基塞略夫伯爵拟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工作纲领，规定改善农民的土地使用方法，调整农民代役租的征收方法，采用最新的农业技术，设立医院、学校等等。这是典型的、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实行的农奴制改革。这种改革使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使国家农民服从官吏吹毛求疵、束缚重重的监督。从 1841 年到 1845 年，在许多省份的国家农民的村落里纷纷发生反对酷吏的大骚动。

农奴主改革家们的计谋失败了。可是改革却为国家农民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国家土地交给了特设的部管理后，限制了地主强占国家土地，取消了出租领地上对农民的劳役剥削。富裕农民的个体农户土地使用制巩固下来了，他们可以取得国库的贷款和农艺上的帮助。

官方人士所设想的未来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因为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害怕工厂工业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尽管这样，政府仍然不得不时常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政府举办了多次工业品展览会，在首都创办了工学院，设立了由手工工场主和商人代表组成的工场手工业协议会和商业协议会。1839—1843 年政府发行银币，从而加强了货币的流通。

工厂主请求在工业中更广泛地使用雇佣劳动，这种要求也取得法律的认可。1835年，政府并规定在手工工场和工厂中当雇工的，纳代役租的农奴，在雇佣契约期满前，不准地主把他们召回。1840年，领有制企业主争得了解放在自己的企业内做工的农奴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更广泛地使用雇佣工人劳动了。

为了防止工潮发展，政府于1835年建议工厂主按期与工人结算工资，至于解雇，至迟应在两星期前通知工人。由于俄国的纺纱工厂广泛使用童工，因而在1845年规定禁止不满12岁的儿童做夜工。同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对罢工者采取了严厉惩罚措施（直到处以苦役流放）。刑法典写明，这种反罢工措施“采用外国立法”。农奴制拥护者曾经郑重地说：“俄国没有无产阶级的祸害”，现在这个论断被沙皇制度本身的立法实践给否定了。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是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在这时期，尼古拉一世政府的政策带有某些矛盾的色彩。但是整个说来，它的政策是反动的，旨在巩固专制农奴制度。同时，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到俄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并在立法措施中局部地反映出这种关系，不过这些立法措施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贵族农奴主的统治地位。

3. 社会思想

30年代的社会运动 十九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俄国的解放思想，是在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进步的青年学生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莫斯科大学学生、天才诗人亚·波列日耶夫1826年在《萨什卡》一诗中对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发出忿怒的抗议。尼古拉一世下令把他送去当兵，受“最严格的监视”。

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政府债悉莫斯科有克里茨基兄弟

和松古罗夫两个革命小组，小组的参加者制订了举行人民起义推翻专制制度的计划。这两个革命小组被警察破获了。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年)在大学生中间展开革命活动，他是莫斯科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赫尔岑从青年时代起就坚决反对专制农奴制度。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后，赫尔岑就同他的朋友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年)一起创立了大学生革命小组。革命小组的参加者特别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他们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赫尔岑和奥加辽夫试图展开革命鼓动工作，但因于1834年被捕而中辍。他们被监禁了9个月以后，分别被流放到边远省份(赫尔岑先被流放到彼尔姆，后转到维亚特卡；奥加辽夫被流放到奔萨省)。

十九世纪30年代，革命家和民主主义者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年)开始了文学活动。别林斯基是外省一个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海军医生家庭中长大的，1829年作为官费生考进莫斯科大学。不久，以他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学生小组。别林斯基和他的同志对于哲学特别是美学问题兴趣很浓，并且坚决谴责封建农奴制度。别林斯基的民主主义信念在他青年时代的早期作品——1830年写成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中就反映出来了。大学当局不久就把他开除。

从十九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别林斯基就专心致志于文学工作，为许多杂志撰稿。1834年，他的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对青年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别林斯基揭露了反动的出版业，指出了先进的俄国文学的世界意义。

可是，别林斯基的革命世界观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他在30年代末，曾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保守论点：“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站在为专制农奴制度作辩护的立场。但是

到1840年，别林斯基就明白自己的错误，他在一次与人通信中痛苦地写道：“我诅咒我的苟安于卑鄙现实的卑鄙愿望！……想起来真可怕，我好像患了一场热病或者是精神病，现在仿佛是大病初愈。”别林斯基于1839年底迁居彼得堡，不久成了进步的《祖国纪事》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836年，莫斯科的《望远镜》杂志发表了彼·雅·恰达也夫的《哲学书信》，在社会上和文坛上这是一桩重大事件。恰达也夫同普希金和许多十二月党人很友好，曾经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的早期组织。恰达也夫说，农奴制的俄国生活在“死一般的萧条之中，没有可谈的过去，也没有将来”。恰达也夫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发表的这番言论，正如赫尔岑后来回忆往事时所说的，好像“响彻黑夜的枪声”。不过，恰达也夫的悲观结论并未得到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情。尼古拉一世下令查封了《望远镜》杂志，放逐了杂志的编辑，宣布恰达也夫是疯子。

尼·弗·斯坦凯维奇小组在十九世纪30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小组的参加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的许多著名社会活动家，如维·格·别林斯基、米·亚·巴枯宁、吉·尼·格朗诺夫斯基、康·谢·阿克萨科夫等人，当时都是这个小组的常客。斯坦凯维奇小组虽然对农奴制度深恶痛绝，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在俄国社会思想的各种流派划分界限的时候，这个小组的成员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就发生了分歧。

40年代的社会思想的活跃局面。斯拉夫派和西欧派 各个文学派别之间的斗争对于40年代的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其他任何公开的社会活动都遭到政府当局无情地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差不多成了唯一的社会论坛，而杂志编辑部则成了社会思想的主要中心。

在 40 年代，俄国的思想斗争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相当活跃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分出了社会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流派。在这十年间，产生和形成了贵族地主思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斯拉夫主义。

斯拉夫派小组是 30 年代和 40 年代之交在莫斯科形成的。它联系着一群贵族政论家和作家。它的骨干是阿·斯·霍米亚科夫、伊凡·基列也夫斯基和彼得·基列也夫斯基兄弟、尤·费·萨马林、亚·伊·柯舍列夫、作家谢·季·阿克萨科夫的两个儿子：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和伊凡·阿克萨科夫。当时有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在农奴制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得出结论说：地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也要求对社会政治制度作某些变革，斯拉夫派表达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

斯拉夫派否认当时各国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并且把“独特的”俄国同西欧各国截然对立起来。他们断言，资产阶级国家正处于衰落之中，认为这种衰落就意味着那里的居民普遍地无产阶级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和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斯拉夫派谴责西欧各国社会政治制度，也不承认西欧各国文化的成就，并且认为从彼得一世时代以来，俄国的吸收西欧文化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他们说，俄国的历史仿佛是沿着自己的、独特的、跟西欧其他各国历史不同的道路发展的，并且宣称俄国的村社就是防止无产阶级和革命动乱的堡垒。他们缄口不谈农奴制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而把地主同农奴的关系描写成为富有田园诗意的宗法关系。

斯拉夫派的思想体系是自相矛盾而且是不一贯的。他们曾经再三谴责农奴制度，但是这种谴责是不痛不痒、徒具形式性的，所指望的是在相当遥远的将来单纯由政府实行改革的办法来解放农奴。斯拉夫派没有看到俄国已经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并且极其模糊地想像着俄国的未来，把俄国的未来描写成是恢复“彼得一世

以前罗斯”的理想制度。

斯拉夫派的社会政治观点，就是在贵族地主中间也传播得不广。在40年代，斯拉夫派还没有自己的出版机关。他们经常利用米·彼·包果丁的反动杂志《莫斯科人》发表言论，这家杂志的订户，就在当时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总共不超过300人。

主张走西欧发展道路的“西欧派”坚决反对斯拉夫派。属于西欧派的有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和一些平民知识分子：吉·尼·格朗诺夫斯基、康·季·卡维林、彼·尼·库德里亚策夫、瓦·彼·波特金、巴·瓦·安年柯夫、叶·费·科尔什等人。

西欧派坚信俄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应当向资产阶级制度过渡。他们坚决主张废除农奴制，限制专制政权，广泛吸收西欧文化的成就。他们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欢迎俄国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并认为对劳动采取资本主义式的剥削是不可避免的。

西欧派利用定期报刊、文学作品、大学讲坛和文艺沙龙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们时常发表科学论文和政论文章，指出斯拉夫派把俄国同西欧各国对立起来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并且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外国最新的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吉·尼·格朗诺夫斯基在40年代中期的公开讲演极受欢迎。赫尔岑说：“他的讲演十分严肃，非常认真，充满力量、勇气和诗意，有力地打动了听众……”

西欧派的世界观在客观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这就是西欧派对当时的广大人士发生很大影响的原因。安·克拉也夫斯基的《祖国纪事》杂志拥有近4,000的订户，在40年代很受欢迎。

虽然如此，西欧派的社会政治观点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特有的阶级局限性的。他们只承认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

的改良主义道路，同主张革命斗争的人是截然异趣的。在他们中间，有人经常批评和谴责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奉为理想也是他们的特点。

革命民主主义派。维·格·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 俄国社会思想中特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 40 年代崭露头角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农奴化了的农民的利益。他们大部分出身于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并把当代贵族革命家中的个别代表人物争取到自己方面来。40 年代俄国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是维·格·别林斯基和亚·伊·赫尔岑。

革命民主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同农奴制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进行了非常坚决的论战。正是他们，领导了对斯拉夫派和对专制农奴制度公开维护者的斗争。1847 年，别林斯基愤怒地斥责了当时出版的果戈理的赞扬地主统治农民的《给友人书信选》一书。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通过辗转传抄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后来，列宁称这封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①。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当时就看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所具有的。他们指出了西欧各国劳动人民对于资本权力的依附关系，西欧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追逐暴利，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自由的徒具形式。别林斯基在评论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章中写道：“法国无产者在法律面前是同最富裕的私有主和资本家平等的……，可是不幸的是，无产者的负担没有因为这种平等而稍稍轻松一些。永远替私有主和资本家做工的无产者，完全操在他们的手中，完全是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给予无产者工作，可以任意规定工作的报酬。”

① 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载《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1 页。

别林斯基在一封信中说：“资本家手中的国家，不幸就在于人们没有爱国精神，没有任何高尚情操。对于资本家来说，战争或者和平只是意味着股票的上漲或者下跌而已，除此以外，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革命民主主义者确信，像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也必定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醉心于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且不倦地在俄国宣传这种学说。当时刚刚开始写作的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从法国的圣西门、卡贝、傅立叶、路易·勃朗和特别是乔治·桑那里……向我们倾注了对人类的信心，我们因此而产生了光辉的信念：‘黄金时代’并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我们的将来。”

别林斯基经常给撰稿的进步杂志（先是《祖国纪事》，1847年起是《同时代人》），建议读者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新著作，有时还对这些著作的内容作极详细的叙述。青年学者弗·阿·米柳亭在《祖国纪事》1847年头四期中发表了内容丰富的著作《英法两国的无产者和赤贫现象》，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系统的综合介绍。科学家兼文学家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在1845—1846年出版的两卷本《俄语辞汇中的外来语袖珍辞典》中，巧妙地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唯物主义学说和革命的社会发展理论。

40年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他们都是坚决的革命家。自由主义的西欧派指望用和平手段，实行逐步改革来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别林斯基同他们展开了论战，他在一封信中说：“但是，以为不用暴力革命，不用流血，到时候，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想法是可笑之至的……。几千人的流血比起数百万人的受苦受难，算得了什么呢。”他在另

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千年天国不是靠着空想温情的吉伦特派
的甜蜜热烈的辞藻，而是靠着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
他们的言行双锋利剑在大地上建立起来的。”

在十九世纪40年代后半期，由于俄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和西欧
发生许多暴风雨般的政治事件，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拥护者的革
命情绪高涨起来了。在彼得堡、莫斯科、罗斯托夫、喀山、沃龙涅什
等城市里纷纷出现了青年学生小组和公职知识分子（教员、小官
吏、军官）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得堡的米·瓦·布塔舍维奇—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激烈地抨击专制农奴制度，
并讨论举行人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的问题。他们中的最坚决
的分子，草拟了革命宣言，试图出版秘密报刊，并且制定了成立秘
密革命团体的计划。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同志们（彼得拉舍夫斯基
派）在1849年春天被捕，革命活动遂陷停顿。

十九世纪30—40年代俄国先进社会思想的发展，属于俄国革
命运动第一时期，即贵族革命时期。可是，在这20年间，俄国革命
运动出现了与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不同的新特点。首先，是革
命斗争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先进的地主贵族以
外，平民知识分子以及出身于和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相近的无
领地官宦贵族的人物也日益积极地参加斗争。其次，30—40年代
的革命家不同于十二月党人的地方是：他们理解到没有人民群众
积极参加，就不能推倒专制制度。最后，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革
命民主主义思想原则的确立，俄国的革命思想已经大大地前进了。

列宁在总结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俄国革命传统的发展
时指出，第一代贵族革命家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亚·伊·赫尔岑
在1847年出国以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①。

① 列宁：《纪念赫尔岑》，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列宁在另一著作中评论维·格·别林斯基的作用时写道：“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①

俄国各民族的先进社会思想 民主主义和革命解放思想在十九世纪 30—40 年代也传播到沙皇俄国的各个边远地区。封建农奴制度的内部矛盾在这些地区由于对当地居民的民族压迫而日益尖锐化。和俄罗斯人一样，俄国其他各族人民也都挺身而出反对当地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和沙皇当局的暴虐。各民族的先进代表人物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无权地位，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农奴制度。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发展，大都受到俄国解放运动，特别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其同志们的彻底革命思想的直接影响。

十九世纪 40 年代是乌克兰杰出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塔·格·舍夫琴科(1814—1861 年)创作的全盛时期。他出身农奴，亲身尝过地主的专横暴虐，从小就看到人民的不堪忍受的痛苦生活，并且强烈地仇恨尼古拉一世的专制制度，直到 24 岁那年，才在画家卡·巴·勃留洛夫和诗人瓦·安·茹科夫斯基的帮助下获得自由。

舍夫琴科接受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这对于他的革命世界观的成长有重大的意义。他把十二月党人叫做“为自由殉身的圣徒”。这位社会活动家、诗人和画家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他在自己作品中鲜明地描写了农奴走投无路的处境，颂扬乌克兰民族和俄国其他各民族许多世纪以来争取自由的斗争，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地主和专制制度。

^① 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载《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0 页。

1846年，舍夫琴科参加了在基辅成立的秘密团体“吉利—美福季兄弟会”。这个团体的参加者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幻想成立一个由自由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组成的自由联邦。舍夫琴科领导兄弟会中的彻底的革命派，他坚持用革命方法进行斗争，主张建立共和制度。在1847年兄弟会被沙皇政府破获后，舍夫琴科被送去充军10年，放逐到边远的奥尔斯克要塞。

高加索各族的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坚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的启蒙运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俄罗斯各大学受教育，他们对俄罗斯进步文化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卓有成效地传播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

格鲁吉亚的著名教育家和学者索·多达施维里（1805—1836年），曾于20年代上半期在彼得堡大学求学，他赞成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他回故乡后，发表了很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对于唯物主义哲学在格鲁吉亚的传播以及格鲁吉亚民族文化的发展，发生显著的影响。1832年，多达施维里因从事反政府活动而被捕，监禁一个时期以后被放逐到维亚特卡。

杰出的格鲁吉亚诗人尼科洛兹·巴拉塔施维里（1817—1845年）是多达施维里的学生。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不得已而去当官吏，因而十分了解高加索人民群众在沙皇俄国所处的屈辱地位。巴拉塔施维里的诗歌创作，反映了格鲁吉亚人民要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愿望。他认为振兴教育和吸收先进的俄罗斯文化是格鲁吉亚民族复兴的道路。

阿尔明尼亚作家、启蒙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哈查杜尔·阿波维扬（1805—1848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热烈赞成阿尔明尼亚和俄罗斯合并，坚决拥护阿尔明尼亚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友好亲善。他对俄罗斯先进社会思想的成就给予很高评价。30年代，他在捷尔普特大学（塔尔图大学）读书，回故乡后，从

事教育工作和文学活动。写有大量的文学、历史、语言学、民族学著作和学校教科书。阿波维扬为阿尔明尼亚人民的教育事业和争取他们的美好未来的斗争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阿塞拜疆卓越的启蒙运动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米尔札·法塔里·阿洪多夫(1812—1878年)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了创作生活。他从小就学会俄语,精通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同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亚·别斯屠热夫和亚·奥多也夫斯基有很深的友谊,他在《东方长诗——悼亚·谢·普希金》中对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不幸而死深抱不平,这首诗由亚·别斯屠热夫译成俄文。阿洪多夫建议用拉丁字母或者俄文字母来代替阿塞拜疆文字中的阿拉伯字母。在60年代,他写了许多无神论的哲学政论文章,反对伊斯兰教和僧侣,因而驰名于世。

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俄国其他民族中也有许多先进的社会活动家。白俄罗斯农奴作家帕夫柳克·巴赫里马和《塔拉斯在巴那斯》这一著作的无名作者,爱沙尼亚的两位民主主义启蒙运动者弗·罗·费尔曼(1798—1850年)和弗·米·克莱茨瓦尔德(1803—1882年)等人的创作都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内容。

在俄国许多民族的杰出文化活动中家的创作中激越着解放思想。他们都主张接受俄罗斯的进步文化和号召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先进社会思想。

第三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十九世纪 40 年代发生了具有极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先进的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这个先进的革命学说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的表述，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历史这样的阶段产生的，那时，大工厂工业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鲜明地表露出来，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并且壮大起来了。

1. 资本主义在西欧和美国的胜利。

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开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到十九世纪 40 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成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先于其他国家取得胜利。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产业革命就完成了。在英国工业中，采用机器技术的大企业占了优势。

十九世纪 30—40 年代，资本主义在法国也取得颇大的发展。但是，法国的产业革命开始得比英国晚，进展也慢得多。这种情况也深刻地影响到法国工人阶级的面貌，在当时，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半无产者。

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显然扩大了，巩固了，特别是莱茵—威斯特法里亚地区的采煤和冶金工业，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纺织工业。在德国的许多工业中心已经出现了大工厂企业。但就整个说来，德国的产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德国国内保留着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的割据局面，都阻碍着它的生产力的发展。

在奥地利帝国这样的比较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帝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克伦地亚和某些其他地区，以及奥地利人所占领的伦巴底，都出现了大工厂企业。在奥地利，资本主义的成长不仅加深了阶级矛盾，而且加深了民族矛盾，同时也增强了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乌克兰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在美国，它的东北地区具有对产业革命有利的条件，西部地区有着大片自由土地，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是，在美国南部还继续存在着以残酷剥削黑奴为基础的耕作粗放的种植场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大批工人的集中到大企业中来，随之发生的是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城市的迅速成长。资产阶级和贵族居住的市区，建有豪华的邸宅，同工人郊区，同穷人栖息的贫民窟形成强烈的对照。

随着城市的成长，城乡的对立急剧地尖锐起来。资本主义城市统治着乡村，广大的农民阶层注定要过赤贫的生活，往往甚至完全破产。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早的独立的斗争 由于生产力空前提高，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工业生产便有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性。但是工人的劳动产品却被一小撮生产资料所有者即企业主攫为己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产品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日益加剧的生产无政

府状态方面，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抗不断加深方面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后果就是周期地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失业、工资下降），使生产力受到大破坏。

机器技术的采用本来是人类智慧战胜自然力的标志，可是这却并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而只是被资本家用来增加利润。企业主经常延长工作日，降低工资，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机器使工人的劳动成为单调乏味、疲于奔命的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变本加厉。资本家竭力要把工人变成机器的简单的附属品。

最初，工人对付资本家加强剥削的办法是进行自发的抗议，如破坏机器和机床，烧毁工厂建筑物。但是，随着阶级成熟性和团结性的增强，工人逐渐开始懂得，使他们陷于灾难之中的，并不是机器的过错，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他们越来越频繁地举行罢工，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改善劳动条件。罢工渐渐成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最普遍的斗争形式。

工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特有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任务。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最初几次独立的斗争之中，如里昂的两次起义，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特别是宪章运动。

总的说来，当时的工人运动还是自发的；无产阶级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种革命理论能够表达他们的利益和需要，给他们指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道路。

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即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的时候产生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后来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空想性的学说，这些学说并且没有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列宁在说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的这个时期的性质时写道：“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极为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正在探寻自己的道路，正在探寻自己本身。……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这个时期是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准备和诞生的时期。”^①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为新的革命世界观——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为用这种学说来武装工人阶级，创造了客观的前提。

2.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革命活动的开始 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立是天才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的不朽功勋。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列尔城。他父亲是律师，犹太人，新教徒，一位很有学问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马克思在特列尔中学受中等教育。还在1835年，这位未来的伟大革命家在他的中学毕业考试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已经表现出他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于人的崇高志向和人类活动的高尚任务的思想。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青年马克思的科学兴趣范围极广，他研究法律学、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和文学。到柏林大学毕业时(1841年3月)，马克思写

^①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0页。

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因而取得哲学博士证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他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

青年的马克思，当他还不到 24 岁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天赋异人、学问渊博、多才多艺和知识深湛而使同侪感到惊讶。哲学家和政论家蒙塞·赫斯很熟悉马克思，他在 1841 年 9 月给他的朋友奥艾尔巴赫的信中写道：“你将有机会认识一位最伟大的，也许是当代唯一的真正哲学家，他发表了他的公开讲演（以作家和教授的身分）以后，不久将会引起整个德国的注目……他既十分冷静严肃，又非常敏锐机智；请你想像一下，假使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为一个人，我着重说一下，是结合，而不是混杂在一堆，那么，你面前就会出现马克思博士。”

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起初，马克思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工作。但是，当时统治着普鲁士的反动政治势力，却不给予那些持有民主观点、不同现存制度妥协的人以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从 1842 年 4 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这家报纸是同黑格尔左派分子有联系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创办的，在大工业中心科隆出版。同年 10 月，马克思迁居科隆，担任《莱茵报》编辑。

《莱茵报》是全德第一家激进派报纸，马克思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表明他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提出了德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最尖锐的问题：关于报刊的地位和任务的问题，农民受压迫的问题，统一德国道路的问题，同普鲁士官僚制度、同守旧的反动思想体系、同统治着德国一切的反动制度作斗争的问题。

马克思体会到劳动群众的迫切需要，这就促使他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在论述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和关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情况的论文中，大胆地挺身而出

保护备受压迫而毫无权利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普鲁士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严格的检查。1842年11月底，马克思写道：“……现在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要遇到检查官的挑剔，大臣的信件，省长的埋怨，议会的指责，股东的号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①。《莱茵报》采取了越来越革命、越来越民主的方针。1843年1月19日，政府决定从4月份起封闭《莱茵报》。因为股东们决定要把报纸办得温和一些，马克思于3月17日声明退出编辑部。1843年秋天，马克思迁居巴黎，当时，巴黎是欧洲的革命流亡者一个聚居的中心。

马克思在巴黎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彻底地转到共产主义的立场。促成这种转变的，是马克思同巴黎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同他们的革命组织有了密切的接触，以及他研究了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傅立叶、圣西门、德萨米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的转向共产主义，和他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深刻变革，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马克思在他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初期，倾向于黑格尔左派分子，即倾向于那些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得出革命结论的黑格尔学说的拥护者。马克思竭力想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为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找到哲学上的论据。后来，他逐渐懂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和保守的哲学体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个阶段对马克思发生很大影响的是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费尔巴哈在德国第一个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他采取的是唯物主义立场，但是同时又完全抛弃了辩证方法。

马克思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弱点。他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

^① 《马克思给阿·卢格的信。1842年11月30日》，载《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253页。

的辩证法,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的内核,奠定了崭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

马克思在 1843 年夏天写成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的世界观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他在后来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①。1844 年 2 月,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的创刊号(双刊号,也是唯一的一期)上发表了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独立成篇的导言。马克思在这一著作里提出了关于国家的产生和作用的问题,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工业,即一般财富界与政治界”的关系的问题,诚然他所用的还是最一般的方式。

马克思提出了把人类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任务,论证了实现这一任务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他在《导言》中用新的方式提出了哲学的任务问题;强调指出哲学应该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首先应该为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马克思写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已表明他是一个革命家,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主张进行‘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③。

从《德法年鉴》杂志的出版工作一开始,马克思和编辑部成员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8 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0、467 页。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9 页。

阿·卢格之间就发生了原则性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很快就造成他们的决裂。在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评价方面，他们的见解相左尤为突出。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上著文，认为这次织工起义是无关紧要的地方性事件。马克思批判了卢格的文章，强调指出了西里西亚的1844年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诸问题，对于他的转向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到巴黎后仍旧继续系统地从事这种研究工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的开始 在同一时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转向科学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城的一个思想非常反动的大工厂主家庭。他父亲想把他造就成为一个企业家，迫使他从中学里退了学，把他送进一家商业事务所习商。但是这位天赋很高的少年，所渴望的是研究哲学、文学和历史，不愿意当商人。在他的内心中，很早就产生了爱自由的愿望。恩格斯在1839—1841年写的文章和通信中（《乌培河谷来信》等），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封建君主制的压迫，对教会黑暗势力，对反动的普鲁士主义的深恶痛绝，和对那些为贫困所迫而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恩格斯在给他朋友的书信中表示向往革命，希望推翻普鲁士的君主制度。

1841年恩格斯用笔名奥斯渥特出版了三本反对反动哲学家谢林的小册子，谢林在黑格尔死后担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在这几本小册子中，就已经可以看到青年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

1842年11月，恩格斯到了英国，住在大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他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恩格斯访问了曼彻斯特的工人区，细心观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他仔细地

研究了记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各种文件和材料。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正埋首于英国报纸和书籍中，在根据这些报纸和书籍编写自己的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著作。……我要在一切世人之前，控告英国资产阶级犯了大批杀害、抢劫和其他一切罪行……”^①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同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开始为宪章派报刊撰稿。他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宪章运动者。”恩格斯着重指出宪章运动的群众性和革命性，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首先是宪章运动者缺乏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

恩格斯用了很大的注意力批判地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他在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特别揭露了违反科学、仇视人类、为战争和贫困现象作辩护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大约到这个时候，恩格斯就已经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原理了。他后来写道：“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我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至今在历史著作中毫无地位或只占极可怜的一点地位的经济因素至少对于现代世界是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因素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②。但是，恩格斯彻底转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后来的事情。这个新世界观是由两位伟大的理论家共同制定的。可是，恩格斯本人却始终强调说，对于这个新世界观的制定起主要作用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会见。他们共同活动的开始 1842年1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了。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8页。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1页。

来,他们于1844年8月底在巴黎会面时,发觉彼此对最重要问题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次会见给他们的亲密友谊和共同为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进行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列宁写道:“古老的传说中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兼战士创造的,这两个人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老的传说中最动人的友谊的故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共同工作以前,都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他们的这种转变过程是彼此不同的。马克思的转变主要是根据在哲学和法学方面的批判性的研究,以及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德两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深刻了解;恩格斯的转变主要是根据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的研究,以及对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的观察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科学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当时正处在革命动荡的前夜。在经济落后(同英法比较)、政治分裂的德国,人民群众遭受双重压迫——半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当时德国正在酝酿的革命局势,向德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任务,而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比十七世纪革命时代的英国工人或者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工人要成熟得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世界历史事件的批判性的分析,根据对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英、法、德三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的深刻研究和理论上的总结,制定了新的革命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批判性地研究和创造性地改造一切先进科学思想成就的结果。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

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来源时指出，这种学说是作为“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② 而出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的革命世界观时，是以许多世纪来发展起来的先进哲学思想的成就，特别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为依据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前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学说和体系的单纯的继续和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科学上的真正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和创造性地改造了过去存在的先进哲学思想中的一切合理的、真正科学的、正确的东西，从而创造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新的，即高级的形式——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来研究人类社会，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思想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地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发展中的变化，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①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3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在指出这个科学发现的意义时写道：“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①。

除了德国的哲学外，英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他们论证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都带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烙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永久不变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革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剩余价值学说（工人用无报酬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当时就已经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溃疮和灾祸——无产阶级的贫穷化，生产过剩的危机，日益加剧的城乡对立现象；他们并且制定了建立新的、美好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各种方案。可是，无论是伟大的空想家罗伯特·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或者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都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负有世界历史性的使命。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伟大发现，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是能够进行革命推翻资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

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力量。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革命的 无产阶级政党而奋斗

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新的革命学说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第一部著作,是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驳斥了黑格尔左派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及其伙伴,指出那些通过“批判的静观”周围世界的方法来医治社会弊端的计划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而尖锐地揭露了黑格尔左派分子主观主义概念的反科学本质,以及他们鼓吹杰出人物在历史中起着特殊作用的宣传。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令人信服地证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英雄”,不是“批评的批评家们”,而是人民群众。用列宁的话来说,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①。

当马克思把《神圣家族》准备付印的时候,恩格斯已经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恩格斯在这部著作(1845年出版)中描述了英国工人的难以忍受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真实情景。恩格斯根据大量材料和亲身观察写成的这部书,是一部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书。但是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一点,因为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还发现了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指出了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地位。恩格斯指出必须使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于革

① 列宁:《哲学笔记》,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页。

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原则的形成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强调指出革命的实践活动不仅对于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而且对于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1845年2月，根据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迁到布鲁塞尔，同年春天，恩格斯也到了那里。恩格斯后来写道：“**当我们在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大致完成了发挥其历史唯物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来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确定这些新见解了。**”^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次合作的成果就是他们在1845—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当时没有出版。马克思后来指出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一些基本问题——作者已经达到了^③。

在这部卓越的著作中，对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且对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进行了批判。书中第一次广泛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初步提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存在于该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还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同于过去的一切革命。过去的一切革命是把统治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1页。

③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权从一个剥削阶级的手里交给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手里，无产阶级革命与这种革命相反，它的目的是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

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原则的同时，在工人中间宣传自己的革命学说。恩格斯写道：“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专只通报给‘学术’界。……我们负有义务要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见解，但同时我们必须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确信我们见解的正确。”^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时期，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的空想流派仍然继续占有优势。魏特林的空想体系在当时非常流行。侨居在巴黎和伦敦的许多德籍工人和手工业者都参加了秘密进行活动的正义者同盟所属的组织。同盟在德国和瑞士的某些城市也建立有许多支部。正义者同盟日益具有国际性质：各个支部的成员中有德国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瑞士人、荷兰人和某些其他民族的人物^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正义者同盟，因为他们不同意同盟活动的宗旨，特别是不同意同盟各个组织的狭隘的密谋策略；可是他们对同盟成员的理论观点却不断给予影响，并且跟同盟的领导人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们通过恩格斯同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建立了联系。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各地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2页。

② 参阅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9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起着很大的作用，成立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使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德国社会主义者威廉·沃尔弗，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日果以及其他一些人。委员会同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德国工人建立了联系，无论是居住在德国国内的，或者是侨居英国、法国和瑞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哈尼等人），同其他国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保持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要想把先进的工人争取到科学共产主义方面来，就必须系统地向他们说明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和空想主义的学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1846年3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魏特林和他的学说。不久，马克思终于和魏特林决裂。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跟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了斗争，这帮人用“博爱”和“阶级团结”的口号阻碍工人阶级提高觉悟。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放松地揭露这一小资产阶级流派的反动本质。1846年5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严词斥责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反对并仇视工人阶级的观点。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克利盖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跟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克利盖鼓吹的荒诞的梦呓只能损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决议和说明作为通告分发给各个共产主义小组。

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当时，卡尔·格律恩正向加入正义者同盟的德国工人大事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许多次公开演讲会上揭露

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本质。参加这些集会的工人,大多数都表示反对格律恩和他的跟班的观点。

1847年夏天,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出版,这部著作是对1846年出版的蒲鲁东所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回答。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驳斥了蒲鲁东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点。不错,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剩余价值、地租论还没有得到详尽的发挥(后来在50年代,马克思完成这一工作),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已经作了阐述。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了蒲鲁东对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采取否定态度所带来的重大的危害。马克思强调指出了建立战斗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工会组织在领导罢工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使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他写道:“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①

4.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流派所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以及新的革命世界观的广泛宣传,不久就开花结果了。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的许多活动家都开始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原理。

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约瑟夫·莫尔受同盟的委托请马克思,后来又请当时在巴黎的恩格斯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6页。

并为同盟草拟新的纲领。莫尔声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都已经了解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正确的，并决心抛弃从前的密谋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了同盟领导人观点上的深刻变化，以及他们改组同盟的决心，因而在这一次就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同盟。后来马克思写道：“恩格斯和我第一次参加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团体的条件是把一切会助长对权威迷信崇拜的东西都要从章程中删去”^①。

1847年6月初，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进行了同盟改组工作，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之一威廉·沃尔弗(1809—1864年)代表布鲁塞尔支部来参加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能够亲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过去不明确
的空想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新的、有鲜明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如下：同盟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几个支部组成区部，某一地区有几个区部应将其中一个称为总区部。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代表大会，在前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中央委员会。恩格斯在说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时，着重指出它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级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可以随时撤换。

章程宣布了同盟的基本原则。章程第一条规定的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

^① 马克思：《给威廉·勃洛斯的信，1877年11月10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俄文第1版，第487—488页。

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

代表大会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新组织的纲领，谴责了魏特林的观点，并通过决议把他的拥护者开除出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表明：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它的领导者面临着一项迫切的任务，那就是创办中央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暂时起了不小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开始为这家报纸撰稿。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从1847年11月29日到12月8日在伦敦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波兰、瑞士等许多国家的支部的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下进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经过同盟的各个支部讨论后，在代表大会上最后予以批准。在代表大会上展开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问题的讨论，具有巨大的原则性的意义。经过讨论结果，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一致赞成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宣言形式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这一工作是在以后几个星期时间内完成的，科学共产主义两位创始人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1月底寄到伦敦，并于2月出版。

《共产党宣言》——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的纲领性文献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个纲领。在《宣言》中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伟大学说的所有组成部分。列宁写道：“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2页。

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①

《宣言》扼要地表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规律性。《宣言》说明了至今所有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②

《宣言》对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和大机器生产的产生作了卓绝的分析。《宣言》以非凡的力量和深度分析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所固有的各种对抗性的矛盾，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从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③。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震撼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用毁灭大量物质财富的方法，用残酷的竞争夺取新的销售市场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结果必然会造成更加厉害的、破坏性更大的危机。

《宣言》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弊端，尖锐地批判了资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6页。

③ 同上。

产阶级制度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资产阶级的家庭,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国家政权越来越变成管理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宣言》谴责了资产阶级的掠夺政策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侵略战争,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一旦推翻必将引起国际关系的根本改变。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就会随之消失。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各种导火线也必将消失。

《宣言》指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状况,揭示了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所负的世界历史性的使命。

《宣言》的作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筑在雇佣奴役制、残酷地剥削工人和对工人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奴役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同时也使工人集中到工厂里来,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所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其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阶级,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同时也为解放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而斗争。

《宣言》中提出的使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虽然在《宣言》中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具有重大的原则性意义。《宣言》这样规定了工人阶级争得政权后将面临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因此列宁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9页。

阶级专政’……的思想”^①。“‘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关于共产党的学说的要点。在这里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③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唯一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政党，是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政党。

《宣言》对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活动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流派作出了阶级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科学共产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一切体系之间的根本区别，尽管他们对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中给予资本主义的尖锐抨击作了肯定的评价。

在《宣言》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中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一切旨在反对剥削者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对派运动和革命运动，必须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力量的团结。但是这种支持不应当使共产党人的独立性以及他们批判同盟者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的权利受到限制。

当资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共产党人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制度、封建贵族和反动市侩。但是，共产党人应该教育工人尽可能更明确地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性，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9页。

② 《列宁文集》，第14册，俄文版，第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9页。

使工人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造成的条件，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宣言》最后用豪壮的语言热烈号召人们去参加世界各国工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严整的世界观出现了，《宣言》的出版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一著作作为十九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总结。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世界观的产生意味着科学发展和社会思想史中的真正的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创作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宣言》把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的、战斗性的思想武器，把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的战斗纲领交给了国际工人阶级。

第四章

1848—1849 年欧洲的革命 和革命运动

1848 年初，欧洲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和革命运动时期；从巴黎到布达佩斯、从柏林到巴勒摩的广大地区都卷入了革命运动。这些革命事件虽然目的和任务是不同的，但是却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人民群众是这些运动的主要动力，并且肩负着斗争的主要重担。

1. 革命形势的产生

1848 年革命运动的主要前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急剧恶化，人民生活之所以急剧恶化特别是由于 1845—1846 年遍及法国、爱尔兰、德意志的许多邦、奥地利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农业歉收。1847 年，除歉收外，还加上使整个欧洲经济发生大动荡的工商业和财政危机所造成的后果。1847 年末，英国差不多有一半熔铁炉灭了火。兰开夏的棉织工业在 1847 年 11 月，920 家工厂中倒闭了 200 家，其余工厂每周也只开工三、四天。法国的生产也急剧萎缩了。只是 1847 年上半年，塞纳省破产的企业就在 635 家以上。遍地危机使劳动群众的处境急剧恶化。

人民骚动 在革命爆发前几年，差不多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人民骚动。在法国，1847 年是人民运动风起云涌的一年，运动

几乎遍布全国，主要是粮食风潮。城乡的贫民袭击官府粮食仓库和投机商人的店铺。罢工运动也广泛地展开了。政府残酷地惩治了这些运动的参加者。

在英国，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了，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在准备递交议会的新的请愿书中，尖锐地抨击了现存社会制度，并要求给予爱尔兰以民族自由。

在德国，1847年春初，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自发性的人民群众斗争。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的骚动。4月21日和22日，饥民上街抗议物价腾贵和官府对人民疾苦的漠不关心。有几家店铺被捣毁了，王储宫殿的玻璃窗被打碎了。

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高涨起来了。同时，在中小资产阶级中，在一些国家（例如法国）不满意金融贵族统治的大工业资产阶级中，反政府情绪增强了。

政治形势的尖锐化 1847年夏天，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在巴黎发起“聚餐会运动”。在聚餐会上发表演说，批评政府的政策。聚餐会运动的发起者，是称为“王朝反对派”的温和自由派。王朝反对派仅仅要求实行局部的选举改革，资产阶级自由派指望以这种改革来巩固在位王朝的摇摇欲坠的地位。王朝反对派的领导人律师奥迪隆·巴罗提出了温和自由派的典型口号：“实行改革，避免革命。”但是，与王朝反对派的愿望相反，主张实行选举改革的聚餐会逐渐具有更激进的性质。在第戎举行的一次聚餐会上，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著名活动家律师赖德律—洛兰举杯祝酒说：“为那拯救法国免受国王压迫的国民公会干杯！”

普鲁士也出现了“上层危机”。在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中，力图限制国王权力和扩大议会权力的要求日渐增强。普鲁士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不得不在1847年4月召开“联合省议会”——全国八省议会代表会议。但是，当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们要求把联合省议会

改组为代议制的立法机关的时候，国王就宣布永不同意实行立宪制度。在联合省议会拒绝批准政府举债以后，国王就把它解散了。

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政治局势也紧张异常。1847年9月，巴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在奥芬堡城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实行民主自由，召集全德议会，废除贵族特权，改组军队和改革税制。10月，资产阶级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在教平根城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召开全德议会以便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决议。巴伐利亚在1848年2月初，事情闹到了居民同军队公开冲突的地步。

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运动不仅在匈牙利和斯拉夫各族人民居住地区，而且在奥地利中部各地区都日益加强了。

在意大利，民族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运动提出的任务是要把意大利北部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整个意大利联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2. 法国的革命

巴黎二月事件 1848年初，法国爆发革命。议会改革的拥护者原定于2月22日在巴黎举行例行聚餐会，可是当局下令禁止举行。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莫大愤怒。从2月22日早晨起，巴黎街道上就呈现一片骚乱。一支主要由工人和大学生组成的示威队伍向着波旁宫进发，一路上唱着“马赛曲”，高喊“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示威游行未能冲到波旁宫，于是就分散到临近各条街道，开始拆毁马路，推倒公共马车，并动手构筑街垒。

政府派出军队，到晚间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控制住了局势。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巴黎又发生巷战。国王路易—菲力浦听到起义越发高涨和国民自卫军要求撤换内阁首脑的消息时，惊慌失

措，便把基佐免职，并任命一批被认为是主张改革的人担任大臣。

出乎统治集团意料，这些让步并没有使巴黎人民群众满意。起义人民同国王军队的冲突仍在继续。2月23日晚间，国王军队挑衅性地开炮射击手无武器的示威群众，在这之后，冲突就越发激烈了。街道上构筑了新的街垒，总数已达1,500个。这天夜里，起义具有了更好的组织。领导起义人民的是各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

2月24日早晨，首都所有的战略据点几乎全被起义者占领了。王宫中惊惶万状。国王路易—菲利浦根据近臣的建议，逊位给他的孙子巴黎伯爵后，就出走英国。基佐也逃往英国。

国王的逊位并没有阻止住革命的发展。巴黎的巷战仍在继续。革命队伍占据了杜伊勒里宫。起义者把国王的宝座搬到街上，放在巴士底狱广场，点起篝火，在千千万万群众的欢呼声中把它烧毁了。

成立临时政府 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继续维护君主制度。他们一听到“共和”这个词就害怕，就想起雅各宾专政和1793—1794年的革命恐怖时代。在众议院的会议上，资产阶级自由派竭力设法保全君主制度。这种企图被冲进会场里来的街垒战士粉碎了。武装工人和国民自卫军军人都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了。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七个聚集在有影响的反对派报纸《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两个左翼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两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政论家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参加过1830年革命的律师杜邦（厄尔省人）当选为临时政府主席。他已经年老力衰，并不起多大作用。政府的实际首脑是外交部长、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拉马丁。拉马丁是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很有演说天才，并高声叫喊反对七月王朝，因而出名。

用马克思的话说，临时政府“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

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它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但是，马克思着重指出，在临时政府中占优势、掌大权的是资产阶级的代表^①。

虽然人民提出要求，可是政府并不急于要成立共和国。2月25日，以老革命家、著名学者（化学家）和医师拉斯拜尔为首的工人代表团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宣布，如果这个要求在两小时内不实现，他就要带领20万人组成的示威游行队伍来质问。这个威胁生效了：指定的时限还没有满，政府就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了。

争取红旗和争取“劳动权”的斗争 同一天，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同巴黎革命工人之间就国旗颜色问题发生了争执。示威工人要求承认红旗——革命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旗帜为国旗。资产阶级集团反对这一要求，他们把三色旗看做是资产阶级制度统治的象征。临时政府决定保留三色旗，但同意在旗杆上系上红色旗绦（后来旗绦被取消了）。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反映出各个不同的阶级对二月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差不多同时还发生了另一场纷争。工人代表团要求立即颁布关于“劳动权”的法令。由于巴黎有大批的失业者，“劳动权”的口号在广大劳动人民中极得人心。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以后，政府根据路易·勃朗的建议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政府须“保障工人用劳动维持生活”和“保证所有公民都有工作”。但是，这一法令纯属一纸具文，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权”的口号是不能实现的。

2月28日，大批工人到临时政府大厦前面示威，他们举着的旗帜，上面写着“组织劳动”，“设立劳动和进步部”，“消灭人剥削人”的要求。“组织劳动”这个口号在前些年的社会主义者著作中

^① 参阅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就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在事实上意味着这样一种要求，即以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的另一种生产组织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以后，临时政府通过了一项在表面上看来具有妥协性的决议：设立以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首的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工人代表，企业主代表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政府把卢森堡宫拨给这个委员会作为会址。但是，卢森堡委员会并没有获得任何实权，也没有得到分文经费。资产阶级只是用这个委员会来向群众灌输幻想，麻痹他们的警惕性，以便赢得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路易·勃朗在这整个事件中扮演着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号召工人耐心地等待召开制宪会议，仿佛制宪会议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在工人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和会外宣扬自己的一套关于组织由国家拨款资助的工人生产协作社的计划。路易·勃朗的活动完全符合当时正在集聚力量准备消除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的心愿。列宁在评论路易·勃朗时写道：这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劳动民主派’或‘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领袖自居，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①列宁用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的名字把妥协政策和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策略叫做“路易勃朗式”策略。

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 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的有数的成果之一是缩短了工作日。在巴黎和外省当时的工作日都超过 11—12 小时之久。1848 年 3 月 2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巴黎的工作日为 10 小时，外省为 11 小时。但是，许多企业主没有服从这项法令，或者强迫工人做更长时间的工，或者关闭了企业。法令也没有满足工人提出的 9 小时工作制的要求。

①列宁：《大撤退》，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45页。

法国劳动者的另一个胜利成果，是实现了普选权（年满 21 岁的男子）。报刊交纳保证金制度被取消了，因此民主派有了大量出版报刊的机会。

二月革命保证了集会自由，结果在巴黎和外省，政治俱乐部如雨后天春笋般产生了。在 1848 年成立的革命俱乐部中，最有影响的是“人权社”，它有许多分社，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人物联合起来。著名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巴尔贝斯担任主席的“革命俱乐部”，同“人权社”有密切关系。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俱乐部中，就其作用来说，最突出的是“中央共和社”，它的创始人和主席是布朗基。布朗基揭穿了资产阶级的策略，号召人民不要相信临时政府。“中央共和社”在 3 月初要求废除所有反罢工的法律，要求让全体工人和失业者武装起来并立即把他们编入国民自卫军。

在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中，特别重要的是临时政府于 1848 年 4 月 27 日颁布了废除法属殖民地的黑奴制的法令。

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和居民中的其他民主阶层都竭力争取法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可是临时政府反对这样做。二月革命以前的警察和官僚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君主派将领仍然在执掌兵符。

临时政府的对内政策 临时政府为了消除会重新引起革命风潮的失业现象，3 月初在巴黎，后来在其他一些城市兴办了一些名叫“国家工厂”的公共工程。到 5 月 15 日，国家工厂已拥有工人 113,000 人。国家工厂的工人中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主要是在修筑道路、疏凿运河和栽植树木这些工作中挖掘土方。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之所以设立国家工厂，是指望使劳动者放弃参加革命斗争。

临时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作了一些局部性的让步，可是它从成立之后就暗中准备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坚决斗争。

在2月24日夜間，根据政府中的右派的提议，通过了编组别动队（grade mobile）若干营的法令，总人数为24,000多人；他们是招募来的，大部分都是沒有一定政治和道德观点的流氓无产阶级青年。别动队处于特权地位；他们身穿特别制服，领取高额薪饷。担任别动队指挥官的是反动军官。

临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完全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临时政府设法挽救因危机而濒于破产的法兰西银行：为这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牌价，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同时政府又把新的财政重担加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身上。政府限制向储蓄银行提取存款。政府保留了过去的几乎所有的捐税，此外还对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这四种直接税是向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即主要是向农民征课的。

劳动人民苦于贫困，因而更迫切地希望通过建立共和国来反对剥削者的压迫，争取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纷纷发生工人示威游行和罢工，袭击粮商的仓库和高利贷者的住宅，攻打征收粮食入城税的税务机关等等事件。

农民运动规模很大，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农民成群结队痛打并赶走林务官，砍伐国有森林，迫使大地主交还所侵占的村社土地，强令高利贷者交出债据。政府当局征收45生丁的田赋附加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这种附加税在农民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共和国的敌人把征收这种附加税的责任推到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身上，归咎于他们设立费用浩大的国家工厂。反革命分子竭力进行煽动来动摇农民对共和制度的信心，挑拨农民反对工人阶级。

国际上对法国革命的反应 二月革命得到了全欧进步人士的极大同情。马克思代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向法国人民致贺。波兰、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革命家表示希望法国新政府能够积极帮助欧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法国许多革命家也抱有这种愿望。但

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则忧心忡忡,害怕一旦同君主制国家联盟开仗,会激使法国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因此,临时政府总是想尽方法避免引起国际纠纷。

二月革命后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制度的主要敌人是沙皇俄国。尼古拉一世非常仇视法国革命。他决定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同奥地利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商量共同组织对法国的武装进攻,以恢复法国的君主制度。不过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不久,在奥地利、普鲁士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先后爆发革命,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尼古拉一世让自己的大使尼·德·基塞路夫留在巴黎,并同拉马丁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可是,又迟迟不肯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直到法国反动派得胜后才加以承认。

制宪会议的选举 制宪会议的选举定于4月9日举行。革命民主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主张延期选举,以便有更充分的准备,并在乡村展开解说工作,从而保证左翼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取得胜利。相反地,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和一切仇视民主制度的人都反对延期召集制宪会议,他们认为越早选举,反动势力取胜的希望就越大。

3月17日,巴黎的各个革命俱乐部组织了大规模的人民示威游行,要求把制宪会议选举推迟到5月31日举行。但是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4月23日,举行了选举。这次选举虽然名义上是在普选权(男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实际上远不是普选。许多人被粗暴地剥夺了投票权。当局对于怀有民主思想的选举人横加压制,驱散他们的集会,撕毁他们的竞选招贴。

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胜利,他们在880席中得到了500席。奥尔良派保皇党人(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和正统主义者(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共约有300个候选人当选。波拿巴主义派(波拿巴王朝的拥护者)仅仅获得微不足道的两席。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获得了 80 席。整个制宪会议中只有 18 个工人。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受了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欺骗，使选举的结果受到影响。

在许多工业城市中，选举时发生激烈的械斗。卢昂的冲突特别猛烈。4 月 27 日和 28 日两天，卢昂起义工人同政府军队进行了残酷的街垒战。

反动的加强。5 月 15 日的示威游行 5 月 4 日，制宪会议在十分紧张情势中开幕。1848 年法国革命史上新的时期开始了。反动势力既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就公开摧残劳动人民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成果。

临时政府宣告结束，执行委员会继之执政。在执行委员的成员中连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在执行委员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同大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右翼共和党人。

制宪会议一开始工作，就引起了巴黎民主阶层的反对，因为它否决了设立“劳动和进步部”的法案，通过了限制请愿权的法律，并且表示反对革命俱乐部。

为了给予制宪会议以影响，巴黎的各个革命俱乐部于 5 月 15 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人民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将近 15 万人，主要是工人。示威游行进入制宪会议所在地波旁宫。拉斯拜尔在那里宣读了革命俱乐部通过的请愿书，要求以武力援助波兹南的波兰革命者，并要求坚决设法消除法国的失业和贫穷现象。大多数议员离席而去，示威群众控制了会场。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一位示威游行的领导人宣布解散制宪会议。当场就宣布成立新政府，新政府由一批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组成。

解散制宪会议是一个为时过早和缺乏准备的错误行动。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赞成这样做。布朗基和拉斯拜尔对事态是有正确估计的，还在示威游行前夕，他们就警告大家不要采取那种给政府以

迫害革命者的借口的行动。这种担心不久就证实了：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果然驱散了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布朗基、拉斯拜尔、巴尔贝斯、阿尔伯及其他一些著名革命家被捕入狱。巴黎工人失去了优秀的领袖。

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5月15日以后，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日益猖狂。5月22日，封闭了布朗基领导的俱乐部和拉斯拜尔领导的俱乐部，6月7日颁布了严峻的法律禁止街头集会。军队云集巴黎。反革命报刊大肆攻击国家工厂，说国家工厂妨碍“实业生活”的复兴，威胁首都的“安宁”。

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取消国家工厂的命令，规定国家工厂就业的工人凡年在25岁以上者一律送往外省去做土方工程，18岁至25岁的单身工人均编入军队。工人多次提出抗议都被当局拒绝了。政府的这种挑衅性政策迫使巴黎工人举行起义，6月23日，他们进入街垒。

六月起义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街垒上红旗招展，上面写着“没有面包，就要战斗”，“劳动权”，“社会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起义工人发表宣言要求解散制宪会议，把议员交付法庭审判，逮捕执行委员会委员，军队撤出巴黎，给予人民以自己起草宪法的权力，保留国家工厂，保证劳动权。有一个宣言强调指出起义的国际意义说：“如果巴黎带上枷锁，那么全欧洲都要受奴役。”

激烈的巷战从6月23日到26日进行了四天。工人方面参加作战的有4万至45,000人；政府军、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方面参加作战的共有25万人。指挥政府军作战的是原先在阿尔及利亚打仗的将军们。这时，他们把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运动的经验用到法国来了。政府军队的总指挥是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将军，后来他取得了独裁权力。起义的主要根据地是圣安东郊区。在这个地区构筑的街垒高达四层楼房，周围环有深壕。指挥街垒战的大

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如共产主义者工人拉卡里和巴特米，社会主义者普若尔和德拉科朗日等等。

著名革命活动家、“人权社行动委员会”主席、当过军官的盖尔索济制定了一个攻势作战计划，起义工人就是根据这个计划作战的。热烈的革命家盖尔索济是拉斯拜尔的朋友，曾经多次受到法庭的迫害，他在巴黎的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盖尔索济考虑了过去起义的经验，预定出动四个纵队，集中力量进攻市政厅、波旁宫和杜伊勒里宫；这四个纵队应以工人郊区为根据地。可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因为起义者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领导中心。各支队伍之间的联系很差。

尽管工人英勇非凡，可是巴黎无产者的起义仍被镇压下去了。残酷的白色恐怖开始了。胜利者杀戮受伤的起义战士。有近25,000人被捕。最积极的起义者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有3,500人未经审判就被流放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巴黎、里昂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区都被解除武装。

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它的历史意义 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巴黎工人同法国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互相隔绝。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和受了反革命宣传欺骗的农民的消极情绪，也起了巨大作用。某些外省城市中的先进工人对六月起义表示同情。在卢维叶和第戎，工人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支持巴黎革命无产阶级。在波尔多，一群工人曾试图占领省政府大厦。工人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队伍，准备进军巴黎，援助起义。工人们还曾试图阻挡从巴黎附近地区调往首都的军队。但是，对巴黎起义表示同情的力量过于微弱，因而也就不能改变事态的进程。

国际反革命势力对法国当局用血腥手段镇压六月起义表示赞成。尼古拉一世曾为此而向卡芬雅克道贺。

欧洲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表示支持巴黎的革命工人。赫尔岑

和俄国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六月起义者遭受残酷迫害深感痛心。

1848年六月巴黎起义的历史意义是非常伟大的。马克思称它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列宁认为六月起义的一个最重要教训就是这次起义揭露了路易·勃朗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错误和危害性，并且使无产阶级抛弃了许多有害的幻想。列宁指出：“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②

反动势力的嚣张。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 法国六月起义的失败和巴黎工人的被解除武装意味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6月28日，确定卡芬雅克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权首脑”。解散所有的国家工厂（不论巴黎的和外省的），封闭革命俱乐部，恢复定期出版物交纳保证金制度，废止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这些就是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政府紧跟着实行的反革命措施。

11月12日颁布了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这部宪法根本不顾劳动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并禁止工人举行罢工。新宪法规定以普选产生的总统为共和国元首，任期四年，而把立法权交给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任期三年。选举权不适用于许多类工人。总统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力：任命所有的官吏和法官、统率军队、领导外交。资产阶级共和派指望用这种办法建立一个能够迅速镇压革命运动

① 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页。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2页。

的强有力的政权。可是同时，既然赋予总统这样大的权力，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同立法会议发生冲突。

1848年12月10日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当时提出6个候选人。先进工人提名当时还在狱中的拉斯拜尔为候选人。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候选人是前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资产阶级共和派支持现任政府首脑卡芬雅克为候选人。但是当选的却是波拿巴派候选人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亲王。他在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

路易·波拿巴(1808—1873年)才能平庸，可是野心很大。他曾经两度试图夺取法国政权(1836年和1840年)，不过先后失败了。1844年他在狱中写了小册子《论消灭贫穷》，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别有用心地假装是劳动人民的“朋友”。其实，他同大银行家有密切的勾结，大银行家们慷慨地资助他的党羽。

在七月王朝时代，波拿巴派只是一小撮冒险分子，在法国没有任何势力。现在，即六月起义失败后，情势变了。民主力量削弱了。波拿巴派大力展开了拥护路易·波拿巴的鼓动工作。这种鼓动工作对于农民影响很大，因为农民希望他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特别是能够废除引起怨声载道的45生丁附加税。波拿巴派的成功也得力于拿破仑一世的威望，因为人们对他的战功还念念不忘。

12月20日，路易·波拿巴就任总统，并宣誓忠诚执行共和国宪法。第二天，组成了新政府，政府首脑是君主主义者奥迪隆·巴罗。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把共和派驱逐出国家机关。

1849年春天民主运动的高涨 1848年冬天，法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工业和农业仍旧陷在危机之中。劳动人民的处境依然困苦不堪。大资本家加紧剥削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1849年4月初，正是将要举行立法会议选举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盟发表了竞选纲领。联盟的拥护者

认为自己是 1793—1794 年雅各宾派，即“山岳派”的继承者，因而自称“新山岳派”。他们的竞选纲领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纲领中提出了民主改革计划，要求减低捐税、解放被压迫人民，但是避而不谈关于工作日长短、工资水平、罢工和组织工会自由这样一些问题。

1849 年 5 月 13 日举行了立法会议的选举。由于反革命分子肆无忌惮的宣传和行政机关的粗暴的压力，立法会议的大多数席位(约 500 席)落到奥尔良派、正统主义派和波拿巴派这三个保皇派联盟手中，这个联盟当时叫做“秩序党”。资产阶级右翼共和党人有 70 个候选人当选，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盟获得了 180 席。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的示威游行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 5 月 28 日，立法会议开始工作。立法会议内部从一开始就在外交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这是和在內政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有密切联系的。

中心问题是所谓罗马问题。1849 年 4 月法国政府就开始军事远征，进兵成立不久的罗马共和国的国境。左翼共和党人反对这种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在 6 月 11 日立法会议开会时，赖德律—洛兰指控总统和各部长严重违反宪法，提议将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因为宪法规定禁止利用法兰西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去压制他国自由。立法会议否决了赖德律—洛兰的提案。于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决定组织和平示威游行，表示抗议。

示威游行在 6 月 13 日举行。由数千名手无寸铁的人组成的行列，向立法会议所在地波旁宫进发。但是军队竟动用武器，阻止游行，并且驱散了游行群众。赖德律—洛兰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其他活动家表现出完全没有革命斗争的能力。直到最后时刻，他们才发出号召书，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宪法。少数坚强

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和大学生)对军队进行了武装抵抗,可是游行的领导人却躲起来了。到傍晚,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1849年6月13日事件也得到外省的响应,不过大多数场合下也只限于示威游行而已,而且这些示威游行很快便被军队驱散了。变化较大的是里昂的事件。里昂在6月15日爆发了秘密会社领导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工人居住的克鲁亚—鲁斯郊区(1834年里昂起义的主要根据地)开始建造街垒。大批政府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出动攻击起义者。战斗从上午11点钟持续到傍晚5点钟。起义者英勇奋战,坚守每一栋房屋。起义者有150人伤亡,700人被俘,约有2,000人被逮捕送交法庭审判。里弗—德—日埃矿工曾出动支援里昂工人,但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就回去了。

在阿利埃省蒙特鲁桑城郊区,有七八百个农民拿着火枪、铁叉和铁锹在6月14日夜间集合起来。农民们得到巴黎示威游行失败的消息后,便各自回家了。

资产阶级反革命在1849年6月取得了对民主力量的胜利,与此同时法国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工业危机也有所减轻。

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第二帝国的建立 1850年3月,巴黎举行立法会议员补缺选举。在当选议员中有六月起义参加者德弗洛特、前卢森堡委员会秘书维达尔,在二月革命后担任过国民部部长的左翼共和党人卡诺。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左派的力量增强了。反革命阵营大起恐慌。1850年5月31日,立法会议通过了新选举法,其中规定了选民须有三年居住的资格以及其他旨在反对工人的种种限制。约有300万人因此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大资产阶级集团中,对于代议制度失望的情绪增长了,他们益发希望建立一个“强力政权”,认为只有这种政权才能保卫有产阶级,避免新的革命动荡。波拿巴派在他们的报纸和小册子上鼓动这种情绪,并以六月起义将再重演来恫吓有产阶级。各个保皇

派集团之间争吵不休，这就削弱了立法会议。

1851年12月1日夜間，以总统为首的波拿巴派阴谋分子举行政变。军队占领了巴黎所有的重要战略据点。立法会议被解散了，仇视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活动家被逮捕。为了掩饰政变的反革命实质和欺骗居民中的民主阶层，路易·波拿巴宣布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限制选举权的法律。

立法会议的大多数议员仅只对这种专制暴力畏畏缩缩地提出抗议，并且束手就逮。左翼共和党人组织了“抵抗委员会”，委员中有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12月3日和4日，巴黎的平民街区构筑了许多街垒，街垒的守卫者对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街垒战士不过1,200人，其中大半是工人。巴黎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没有积极参加反政变的斗争，这首先是因为立法会议的所作所为引起工人的反感、它把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成果（选举权、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权等等）剥夺殆尽。此外，还因为巴黎工人阶级在1848年六月起义遭到镇压时被解除了武装，并且由于大批逮捕和流放而力量削弱了。

波拿巴派很快地把共和派在巴黎的抵抗镇压了下去。为了迅速收场并使居民慑服，政变军队竟开炮轰击，和平居民因而伤亡者近2,000人。

波拿巴派的政变在某些外省城市和乡村中，特别在法国南部，遇到了强烈的抵抗。有些地方组成了游击队，同政府军队作战。这些游击队主要是由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民主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组成的。但是，各地的起义是零散的，没有总的领导，因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富裕的上层农民则积极支持波拿巴派的统治。

政变之后，建立了残酷的警察恐怖制度。政府宣布32个省处于戒严状态。有21,000个共和党人（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有

的被流放到殖民地，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驱逐出法国。这时还残存的独立的工人组织都被解散了，进步报刊也遭到查封。

过了一年，即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称帝，号拿破仑三世（波拿巴派认为拿破仑一世的儿子、从未掌握过政权的、在青年时代就死去的莱赫斯达特公爵为拿破仑二世）。

法国建立了波拿巴主义独裁制度，这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阶层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有产阶级害怕工人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表现得那样明显的革命积极性，因而把国家统治权交给了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冒险家，这批冒险家所依靠的是反动军阀和庞大的警察官僚机构。

3. 德意志的革命

1848年三月革命 法兰西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推动了德意志的革命运动。2月27日，同法国接壤的巴登大公国的许多城市都举行人民群众大会。人民向政府当局请愿，提出要求：废除封建义务，取消一切出版限制，实行陪审制度，平均分摊捐税，任命责任内阁，召开全德议会，编组国民自卫军，其军官由选举产生等等。在人民示威游行的压力下，政府答应了一部分要求，允许颁布大赦令和制定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法律。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也发生了大致相似的事件。

在萨克森、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人民的压力迫使这些邦的执政者不得不对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要求作了局部的让步。

巴伐利亚发生激烈的骚动。3月3日向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提出请愿书，要求政治自由。3月4日，慕尼黑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占领了军械库，并从那里取得武器，武装自己。在3月20日夜间，路德维希一世逊位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自己就逃出

领地。

革命运动也扩及普鲁士。普鲁士的革命运动是从莱茵地区开始的。3月3日，科隆工人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向市参议会递送了请愿书，要求实行普选权，取消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保护劳动和满足全体人民的人类生活需要”，实行公费教育儿童的制度。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曾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后来，示威群众被军队驱散了。

3月6日，柏林开始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到3月13日，发展成为人民同军队的街头交锋。3月18日，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包围了王宫，竟遭到军队的攻击，群众愤怒万分。柏林的街道上布满了街垒，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后来军队已经无力弹压人民运动，这时政府才不得不把军队调出柏林，并作了一些让步：宣布大赦、准许组织国民自卫军。3月29日成立了自由派政府，在普鲁士历史上第一次由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地主贵族的代表担任政府首脑。在新政府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工厂主康普豪森和银行家汉泽曼。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掌握了政权，就设法阻止革命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保存君主制度，阻挠德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资产阶级自由派同王室和贵族阶级勾结起来。为了便于狼狈为奸地对付人民运动，自由派的大臣们未作稍大的变更就把旧政权机关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

农民运动 农民革命运动与城市中的革命事件几乎同时开始了。德意志南部和西南部的农民革命运动规模最大。后来，运动也蔓延到普鲁士。农民们拿起镰刀、铁叉和斧头，赶走了林务官和村长，砍伐掉业主的森林，攻打贵族的城堡，强令他们交出封建文契，当场烧毁。农民迫使地主或他们的管家签立字据放弃一切封建权利。在一些地方，农民还烧毁了地主的城堡和事务所。大高

利贷者和投机商人的住宅也受到攻击。

在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农民的反封建起义,曾经得到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可是在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却与法国的不同,他们力求同贵族妥协,共同对付人民运动。德国资产阶级所以胆小怕事和犹豫动摇,固然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无力,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他们同封建主阶级保有联系和他们对于当局处于完全依附地位。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德国农民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农民也已经不同了。德国农村到十九世纪中叶,阶级分化已经十分激烈,富裕农民阶层已经分化出来,许多农民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解除了封建义务。此外,地主和亲近他们的人在农民中间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也发生了影响。这一切使得1848年德国的农民运动没有发展到像1789—1794年的法国那样的巨大规模。

普鲁士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巴登起义 普鲁士在革命后形成的新的政治形势,有利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涨。民主派在柏林开始出版许多报纸和散发了大量传单。发行最广的是《火车头报》和《人民之友报》。《人民之友报》的编辑是大学生施略费尔;他的战斗的革命热情和对劳动人民利益的高度忠诚,使他在民主集团中赢得声望。

在柏林和其他很多城市产生了许多民主俱乐部,成立了一批工人组织。3月30日组成了“人民同盟”,它的章程规定,同盟联合“社会的各个阶级,特别是无产的工人”。人民同盟出版的报纸提出下列任务:实行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武装人民、实行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当时还成立了“中央工人俱乐部”,它的发起人中有两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鞋匠赫茨尔和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4月间,“人民同盟”和“中央工人俱乐部”合并为一个组织——“工人兄弟会”。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在哥特沙克博士领

导下，4月13日在科隆成立了“工人联合会”，它拥有自己的出版机关。在工人联合会起重要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等人。哥尼斯堡也成立了“工人联合会”，它是从当地的“民主俱乐部”分出来的。

4月中旬，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黑克尔和司徒卢威领导的巴登的共和派集团举行武装起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巴登大公，进而推翻德意志的其他各邦君主。但是，几天以后，起义队伍就被政府军队击溃了。起义的失败是由于共和派集团的软弱和起义军在战略上的错误：他们分散了自己的力量，也没有获得农民的支援。

波兹南的波兰人起义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推动了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波兹南是归属普鲁士王国版图的一个波兰地区。波兹南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大地主。派到柏林去的代表团要求组织波兰军团，任命波兰人担任波兹南的行政及其他职务。普鲁士政府接受了这些要求。后来，又提出了承认波兰语为波兹南的正式语言的要求。

波兹南的人民群众挺身而出，为脱离普鲁士的统治，争取独立而斗争。到4月初，波兰人的起义队伍已增至15,000—20,000人。起义队伍主要是农民组成的，但指挥官大多数是波兰小贵族。起义的总领导人是著名的波兰革命家梅洛斯拉夫斯基。

普鲁士政府坚决拒绝了波兹南独立的要求。政府军队布满了波兹南地区。在最初几次军事行动中，波兰农民英勇奋战。他们虽然缺乏武器（许多部队只有镰刀），仍然打了好几次胜仗。但是力量悬殊，普鲁士军队终于占了上风：起义军被击败，到5月9日武装斗争就停止了。普鲁士当局残酷地迫害起义者。某些波兰军官采取投降主义立场，主张同普鲁士当局妥协，这对于起义的失败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思想反映出波兰地主的恐惧心情，他们所害怕的是农民不仅要求推翻普鲁士的压迫，而且还要求废除波兰小贵族

的封建特权。

普鲁士反动派转入进攻 1848年5月初，普鲁士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由于采用两级选举制，反动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有很大一部分议员是极端保皇党人，但是在议会中仍以资产阶级温和和自由派占多数。

国民议会于5月22日开幕。这时，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因为在议会开幕的前夕公布了普鲁士宪法草案，规定只有大私有者才有选举权。柏林民主集团对此非常不满。一群公民怒不可遏，把一本宪法印本烧毁了，以表示抗议。

广大群众要求改善他们的地位。5月30日，柏林发生自发性的示威游行，有几千工人参加。工人们听到了关于正在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就要求取得武器。6月14日，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为一方，警察队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为另一方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大批工人占领了军械库，取出了库藏的武器。但是，劳动人民的行动是自发性的，无组织性的，因而没有发展成为革命。

国王和他的左右人物利用了大资产阶级对这些事件而产生的恐惧心情，一面增加柏林卫戍部队的人数，一面改组政府。现在，革命的敌人已在到处准备对民主力量发动公开进攻的时候，反革命集团已不再需要自由主义作掩护了。康普豪森起到了他自命为“王朝的盾牌”的作用。6月22日，他被迫而请求辞职。新政府的首脑是国王的近臣冯·奥尔斯瓦特。汉泽曼仍然留任财政大臣，同时又有几名公开的反动分子参加了新内阁。

从康普豪森内阁转到奥尔斯瓦特内阁，意味着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向右转，意味着反动派转入进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 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布鲁塞尔。那时，当地的共和派集团正着手准备武装起义，打算推翻比利时的君主制度。共产主义者

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积极参加这一准备工作。3月3日夜間，警察逮捕了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第二天就把他们逐出比利时。在马克思被捕前数小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委员会曾由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授权决定：鉴于比利时警察迫害过于猖獗，必须把中央委员会会址迁到巴黎。

3月5日，马克思到了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担任主席，沙佩尔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恩格斯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他不久来到巴黎。3月末，中央委员会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的传单《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纲领的要点是：把德国变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实行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取消旧式军队，武装全体人民，实行诉讼免费，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各邦君主的领地和一切地主的地产、一切矿山、矿井、铁路和运河全归国家所有，在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建立大规模农场，成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为失业者建立国家工厂，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政教分离，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①。如果这个纲领得到实现，将使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得到彻底民主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到，如果这些要求能够实现，就能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为将来争取无产阶级的完全胜利斗争奠定有利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策略路线，是力争团结德国的一切民主力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加入了科隆民主协会，共产党人那里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代表人物共同工作。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来到科隆（4月11日）后，也迁到了科隆——工业发达的莱茵省的首府。在1848年4月和5月期间，中央委员会在同各个地方支部建立联系方面和建立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新支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遣了代表到德国各个城市去。据这些代表报告，同盟的各个支部中的盟员人数是非常少的。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得出结论：在目前条件下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出决定：今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发布同盟的指示主要通过报刊进行，同盟盟员除了参加工人团体外，还必须参加一般民主运动，构成民主运动中的左翼。

马克思坚决谴责了以诗人海尔维格为首的一群德国侨民想从法国组织军事远征打回德国，以便在德国发动革命的冒险计划。马克思反对这种举动时指出，这样做只能损害德国侨民的声誉而已。因此马克思劝他们个别地返回祖国，参加德国的革命斗争。可是海尔维格仍没有放弃自己的冒险举动。他的队伍在4月24日渡过了莱茵河，27日就在同官军作战中被击败而溃散了。

1848年6月1日，一种大型的政治性日报在科隆创刊了，它名叫《新莱茵报》。它的总编辑是马克思。报名下加有副题《民主派机关报》。实际上，这个报纸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论坛。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文章，特别是捍卫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充满战斗热情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文章发表后，许多起初被招来参加报纸出版工作的资产阶级股东纷纷退出。

《新莱茵报》抨击公开的反革命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行为，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捍卫德意志人民的切身利益。报纸一方面广泛报导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进展情况，同时十分注意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以及波兰、意大利、匈牙利、捷克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运动。

在对外政策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进行革命战争反对沙皇俄国的口号，因为当时俄国是欧洲反革命势力的主要堡垒。他

们指出,如果沙俄在这一革命战争中失败了,就会导致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高涨,就会导致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倾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展开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波尔恩,另一方面又反对哥特沙克,因为波尔恩一心指望革命的和平发展,而哥特沙克则认为德国可能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中间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共和国,并且号召工人不要参加全德议会选举。通过反对哥特沙克的半无政府主义策略的斗争,哥特沙克失去了他原先在科隆工人中拥有的威信。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在“科隆民主协会”和1848年6月底成立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中也起着领导作用。

争取统一德国的斗争。法兰克福议会 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任务,是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德国资产阶级大多数都力求实现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的统一。这种办法预定要把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排除出德意志,所以拥护这种办法的人被称为“小德意志派”。统一德国的另一种办法是把德意志邦联的全部领土统一成为一个以奥地利为首的德国。某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农民,特别是在南部,希望把德意志变成像瑞士那样的联邦共和国,中央权力微弱,各个小邦则保有很大的独立性。

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急进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士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展开了斗争。解决统一德国的途径的问题,取决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进程。

1848年5月18日,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选出的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法兰克福开幕。这是第一个全德性的议会,它的议员大多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议会中完全没有工人和手工业者的代表。议员中只有一个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威廉·

沃尔弗。沃尔弗是由西里西亚选出的，他在那里有很高的声望。

奥地利大公约翰被选为德国的临时统治者。这个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享有自由主义者的声名，实际上是言过其实的。这位帝国的统治者任命了德国中央政府的各部大臣，并向外国首都派出使节。但是，法兰克福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并没有实权，在德国国内外也没有甚么威信。议会拒不解决关于取消封建义务问题。在民族问题上，法兰克福议会公开采取沙文主义的立场：主张强制同化斯拉夫各民族，并反对意大利人民的解放运动。

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多数派——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进行着无尽无休而又毫无结果的辩论，并且作出反人民的、沙文主义的决议，丧失了民主集团对他们的信任那是必然的。

1848 年秋德国的革命战斗 1848 年秋天，德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展开了决战。这时期的一桩最重大的事件是美因河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起义是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施坦因问题激起的。在三月革命后，石勒苏益格南部（居民大部分是德意志人）和霍尔施坦因居民中的民主阶层起来反对丹麦的统治，组成了临时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使这两个公国加入统一的德意志。前来支援起义者的部队既有德意志的志愿军部队，也有德意志邦联的军队。丹麦人被击败了，德军进入日德兰半岛。但是不久以后，由于英国、俄国和瑞典的要求，德军被召回国。8 月 26 日，普鲁士同丹麦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的条件对于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施坦因来说是很苛刻的。两个地区的临时政府被解散了，两个公国交给一个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五个委员有四个是由普鲁士国王和丹麦国王任命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施坦因的国民议会声明反对停战协定，可是法兰克福议会却予以批准。

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在德意志引起公愤。9 月 18 日，美因河法兰克福爆发了人民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工人、帮工、小手

工业者、商人以及附近乡村的农民。领导构筑和保卫街垒的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经过激战以后，军队把起义镇压下去了。

德国许多城市和乡村都同情法兰克福起义，纷纷起来响应。9月22日，巴登民主派领袖司徒卢威依靠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在勒腊赫城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并选出了临时政府，其成员有司徒卢威、布林德和巴登的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临时政府通过决议：取消封建义务和赎金，停止缴纳赋税，开征累进所得税，把反革命地主、僧侣阶级和国家的地产交给农民村社。政府调动军队进攻巴登的共和派，把起义镇压下去了。

对丹麦的停战协定在德国其他地区也引起了抗议。例如，9月17日在科隆附近召开的人数众多的人民集会就曾向法兰克福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坚决的抗议，反对马尔摩停战协定，这次集会是《新莱茵报》和科隆“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机关发起的，莱茵省的许多城市都派有代表参加。

反革命在普鲁士的胜利 尽管普鲁士国民议会在政治上是温和的，可是在农民多次请愿的压力之下，议会的自由资产阶级多数派不得不通过一些关于土地问题的法律，其中包括废除地主在农民土地上有狩猎权的法律。这些法律以及关于彻底取消农村中的封建制度问题的讨论，引起了贵族的不满。要想防止反革命的进攻，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可是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议员却不能采取这种措施。

1848年10月13日，在柏林公共工程中做工的工人，因为受到解雇的威胁，而开始骚动。10月16日，警察和市民自卫团向游行示威工人开枪射击。为了回击这种暴行，市内开始构筑街垒。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都武装起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伙同政府军队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了。

法国和奥地利反革命的胜利使得普鲁士的反动分子振作起来。11月2日新内阁成立了，其成员是以凶恶的反动将领勃兰登堡伯爵(国王的叔父)和凶恶的反动分子曼托伊费尔男爵为首的一伙封建贵族和高级官僚的代表。11月9—10日，军队占领了柏林。国民自卫军没有作任何抵抗就缴了械。聚集在国民议会会场附近的一群工人准备同军队作战，可是自由派的议员们却不愿利用劳动人民的这种战斗情绪。

左派报纸全被查封了，民主组织都被禁止活动。11月9日，政府宣布把国民议会从柏林迁到它的郊区勃兰登堡。这一措施等于实际上取消了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在11月5日，即解散的前夕，通过了告德意志人民书，号召人民停止纳税，可是仍不呼吁他们起来作武装斗争。

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人士挺身反对柏林的反革命政变。“萨克森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西里西亚农民总联盟”及以其他许多民主组织都激烈反对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的行动。

莱茵省的民主组织对于国家政变进行了特别顽强的抵抗。11月18日，“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呼吁书，号召不要只作消极的抵抗，并指出国民议会作出的拒绝纳税的决定，只有在人民用武装来抗击政府的时候才能实现。《新莱茵报》开始登载着“不可再征任何捐税”的口号。“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号召各个民主团体举行人民群众大会，组织民团和成立安全委员会，反抗当局强行征税的试图。

大资产阶级同地主集团一起大力支持政府，他们的背叛行为使得政府很容易地把起来同反革命政变作斗争的民主派镇压下去。

民主阵营划分界限 1849年初，德国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民

主阵营中温和派和革命派之间日益明显地在划分界限。

《新莱茵报》的彻底革命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反动派的坚决斗争，——这一切都引起反动派报刊和温和自由派报刊的对它的猛烈攻击，并且受到政府当局的威胁和迫害。9月26日，《新莱茵报》暂被停刊（10月12日复刊）。1849年2月，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发行人科尔夫，对“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提出两件诉讼案，结果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

1849年4月，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日益仇视工人运动，就同他们断绝了组织关系，并退出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依靠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着手准备召开全德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以便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1849年的帝国宪法 法兰克福议会在经过长时期的辩论以后，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统一的德国宪法。宪法规定成立德意志帝国，它的境域包括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腾堡、巴登和其他德意志邦以及奥地利，这些国家都保持自己在内政上的独立，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具有全帝国性的最重要的职权（决定对外政策、统率武装力量、确定关税政策等等）都交给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立法权授与两院制的议会。

宪法宣布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人身不可侵犯和实行免费的世俗初等教育等等。同时，宪法宣布了教会财产不可侵犯，并宣布凡有关最重要的封建义务问题应采取由地主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帝国宪法虽然是温和性的，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因为这部宪法提出了消除德国政治上分裂的任务，使德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国方向发展迈出了一步。正因为这样，贵族和官僚反动集团执政的

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大邦的统治集团，拒绝承认这个宪法。法兰克福宪法成了死产的婴儿，纵然得到德意志的 29 个中小邦的承认，仍不起多大作用。

1849 年 4 月，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团来到柏林，建议普鲁士国王就任德意志帝国皇帝。可是，腓特烈·威廉四世坚决拒绝接受皇冠。

1849 年五月起义 1849 年 5 月，人民群众起来维护帝国宪法，不过这些运动跟 1848 年三月起义不同，带有地方局限性。运动只是扩及德国部分地区，即工业发达的萨克森和莱茵地区，以及反普鲁士情绪特别强烈的巴登和普法尔兹（在巴伐利亚）。

5 月 3 日，德累斯顿人民群众响应民主俱乐部的号召开始构筑街垒。5 月 4 日，萨克森国王逃离首都。政权转归临时政府，参加临时政府的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领袖、律师契尔奈尔，温和自由主义者海布涅尔和托德。临时政府的行动是不够坚决的。革命的敌人利用这种情况把大批军队调集到德累斯顿，从而取得对起义者的优势。资产阶级的自卫军背叛了人民运动。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队伍曾经在 4 天内顽强地击退了萨克森和普鲁士军队的进攻。起义者的军事领导人是柏林“工人兄弟会”领袖斯蒂凡·波尔恩。俄国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曾经积极参加这次战斗。到 5 月 9 日，萨克森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5 月 9 日，莱茵省的爱北斐特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击退了派来镇压起义的军队。这一天傍晚，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也拿起武器。他们构筑了街垒，坚持战斗到第二天早晨。在索林根，起义工人占领了军械库。在伊瑟朗，工人组成了近 3,000 人的武装队伍，全城街垒密布。

但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十分胆怯，他们害怕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更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的到来，不久，就把莱茵地区的革命运动所

获得的初步成果全给断送了。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胆小怕事，在爱北斐特起事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5月11日，恩格斯率领一支由500个索林根工人组成的队伍来到爱北斐特，准备参加武装斗争。恩格斯要求解除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武装，把夺来的武器分发给工人，并强向大资本家借款。可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温和分子组成的安全委员会却拒绝实现这些要求，虽然他们能够有效地巩固这个起义城市的局势。过了几天，他们借口恩格斯留在爱北斐特会引起资产阶级集团的不安，要他离开。恩格斯只好出走。

莱茵民主派的起义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他们没有设法使各个城市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因此加速了起义的失败。大多数农民对革命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普法尔兹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是在5月初爆发的。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也加入了运动。5月17日在凯撒斯劳滕逃出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宣布普法尔兹脱离巴伐利亚，但是，它的行动很不坚决，而且没有认真地采取措施来同反革命作斗争。

在这些日子里，革命运动也扩展到巴登。5月12日，拉什塔特要塞士兵举行起义。其他城市也纷纷发生士兵起义。5月13日，卡尔斯鲁厄爆发了起义。大公利奥波尔奔城出走。巴登的政权落到反对派政治活动家手中，他们组成了以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分子布伦坦诺为首的临时政府。所有的旧官僚机关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民主派提出的废除残留的封建义务的要求，也没有付诸实行。并且没有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却没有受到制裁。恩格斯在后来写道：“布伦坦诺先生最初一开始就出卖了巴登的起义……”^①

^①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

不久，普鲁士军队渡过莱茵河，向巴登腹地挺进。6月29—30日在拉什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战，在这次战役中，13,000名巴登起义者顽强地抵抗着普鲁士6万大军。7月11—12日，被击败的巴登—普法尔茨军队的残部越界进入瑞士。最后撤离的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志愿军部队，这个部队的指挥官是退伍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恩格斯就在这支队伍中担任维利希的参谋。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侦察和战斗，据目击者谈，他本人表现得非常英勇。恩格斯在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总名为《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详细地记述了这几个星期的事件，谴责了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行动，因为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拉什塔特要塞是巴登革命者最后一个抵抗据点，守军被普鲁士军队包围了，仍然英勇地战斗到7月23日。普鲁士军阀对拉什塔特的保卫者加以残酷的迫害。

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武装起义，是1849年德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最后一场决战。

科隆政府当局借镇压莱茵地区起义的机会封闭了《新莱茵报》。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即301号。马克思代表报纸同人在向科隆工人告别时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①

1849年6月16日，不久前迁到斯图加特的法兰克福议会被军队驱散了。这就是说德意志的反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4. 1848—1849年的英国

宪章运动的新高涨 宪章运动经过一度消沉之后于1847年

^① 马克思：《致科伦工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页。

又活跃起来。在宪章运动者的集会上，争取《人民宪章》的宣传活
动重新恢复了，工人的积极性增长了。从 1848 年起，在日益深刻
的经济危机和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宪章运动取得了新的
规模。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了在国内各地举行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
行。在格拉斯哥，失业者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没有面包，就要革
命”的口号。在曼彻斯特，警察试图驱散工人，结果引起了流血冲
突。军队被调来帮助警察。在伦敦和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工人
同警察的搏斗。

1848 年 4 月 4 日，宪章运动全国代表大会在伦敦开会。在递
交议会的新的请愿书，即第三次请愿书中，仍旧提出了人民宪章的
要求。以宪章纲领为依据的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
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应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
一本源。代表大会决定 4 月 10 日在伦敦举行群众示威游行，以便
护送宪章运动者代表团到议会大厦去递送请愿书。

政府对于宪章运动者积极性的重新高涨大感恐慌，于是下令
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并宣布宪章运动代表大会为非法。大批军队
被调到伦敦来。号召有产阶级公民报名参加志愿军。政府预料
将会发生人民起义，因而任命英国名将威灵顿公爵统率武装力
量。

1848 年 4 月 10 日的示威游行 4 月 10 日是星期日，伦敦数
万工人响应代表大会的号召走上街头。当局虽然下令禁止，可是，
在肯宁顿广场仍然聚集了大批的人民群众。政府当局深知要阻止
举行群众大会已经不可能，便向宪章运动领导人宣布同意举行群
众大会，但不准列队到议会大厦去。那时在群众中还享有威望的
奥康瑙尔就劝导聚集的群众各自回家，把一切事情交给他办。他
便把那份有数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装上一辆出租马车运往议会。
议会先是把请愿书束之高阁不予审议，继则借口请愿书的签名人

数比宪章运动者所肯定的人数少得多，干脆拒绝审议。

4月10日运动的失败发生了严重的后果。宪章运动日趋衰落。同时，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运动。宪章派召开国民会议，以代替宪章运动代表大会；国民会议于1848年5月1日举行会议，讨论了准备呈递给女王的关于工人困苦状况的报告书，为此费了很长时间，可是没有结果。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处在无人领导的状况中。政府用严厉手段把1848—1849年在英国一些城市里发生的分散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大逮捕和司法迫害开始了。从1848年春天起，英国的经济情况好转，这是促使群众运动退潮的最重要因素。

在以后几年，宪章运动失去了先前的群众性，尽管它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继续对英国的政治生活发生很大的影响。

宪章运动的历史意义 宪章运动者没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还没有作好这种准备，而英国的资本主义还处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把自己所有的潜力发挥净尽。宪章运动的衰落也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促成的。欧洲大陆各国1848—49年革命的失败以及这些年来宪章运动的遭受挫折，都暂时地削弱了英国工人对革命斗争方法的信心。此外，宪章派团体的许多战士亡命到美国去了，一些留在英国的也脱离了宪章运动。

尽管如此，宪章运动不仅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毕竟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重视宪章运动，他写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群众在这次斗争中提出的斗争方式和方法是对国际工人运动有价值的贡献。

^①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载《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6页。

宪章运动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慑于宪章运动的威力,不得不对劳动人民的要求让步,并实行一些改革。以后数十年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改革活动,在颇大程度上是出于害怕宪章运动东山再起。

宪章运动对英国的文化生活,对英国的文学和诗歌都发生巨大的影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宪章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写成了许多作品。著名宪章运动者厄内斯特·琼斯的诗是对英国和世界民主诗坛的巨大贡献,他的诗篇洋溢着革命斗争的热情。

1848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30年代,特别是40年代,是爱尔兰农民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时代。爱尔兰的农业在这20年间正处于改造阶段。由于在英国市场上形成了销售畜产品较之销售粮食更为有利的条件,爱尔兰便开始大力发展畜牧业,这样一来,地主就着手大规模地驱逐小农,建立大牧场。大量农民处在无地的境况中。1845—1846年连续歉收,因为种植的马铃薯——爱尔兰普通人民的主要食物——都死了。从1846年到1851年的六年中,爱尔兰饿死了100多万人。

所有这一切都增强了爱尔兰农民的革命情绪。同时,工人阶级的人数也略有增长,他们主要是从事原料加工和在运输业中工作。爱尔兰的工人运动发轫了。

由于人民群众的影响,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各种力量发生了新的部署。主张废除1801年合并而于1840年成立的“取消合并协会”,仍然只限于进行关于在保存英王权力的条件下取得爱尔兰的自治的宣传活动。但是1847年初成立的“爱尔兰同盟”,就主张抛弃合法斗争的旧策略了。爱尔兰同盟中形成了由有才能的新闻记者约翰·密契尔领导的左翼,密契尔提出了武装起来,为争取爱尔兰脱离英国,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密

契尔表达了爱尔兰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工人阶级的意志，他号召居民不要向英国政府交纳捐税，不要向英国大地主缴纳地租。爱尔兰同盟的另一位活动家、工人詹姆斯·拉洛尔是农民的利益的表达者。他是农民的儿子，提出了爱尔兰土地国有化的口号。

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各国的革命促使爱尔兰的解放运动日益活跃。爱尔兰同盟的左翼开始准备起义。

1848年5月，英国当局逮捕并放逐了密契尔，使运动失去了领导人。爱尔兰同盟的领导机关经过长时间的动摇，最后才在7月间宣布起义，但是由于领导方面下达的命令既不果决而又自相矛盾，因而使得起义陷于混乱状态。这场起义只是同军警发生几起彼此没有联系的小冲突而已。英国政府用严厉的镇压手段维护住了它对爱尔兰的统治。

5. 1848—1849年革命的总结和意义

1848—1849年革命事件是十九世纪欧洲阶级斗争发展的一个最重要阶段。

1848—1849年革命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有着共同的任务：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除此以外，在某些国家里还有它的特殊目的。由于各国的情势特点、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不同，它们的革命过程也各不相同。在法国，封建主义和专制政体早在1789—1794年革命时就被消灭了，1848—1849年革命的客观任务是推翻金融贵族的专权和确立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意志，1848—1849年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政治上的分裂和建立统一的国家。在意大利，除了有和德意志同样的任务外，还要把意大利北部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奥地利，1848—1849年革命的使命是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动统治，并把各个被压迫民族从民族奴役下解放出来。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在 1848—1849 年革命斗争中占重要地位。

人民群众在革命事件中处处起着决定性作用。就客观任务来说，各国的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革命，使 1848—1849 年革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1848—1849 年事件的主要特点，是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革命，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在 1848 年，工人阶级在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and 经济要求，第一次在那么广阔的领域里表明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仅极端仇恨封建制度，而且，也深恶痛绝资产阶级制度。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清楚。

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的各种原因中，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他们参加革命只是为了利用人民运动来达到自己狭隘的阶级目的。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吓得心惊胆寒，就同君主政权、反动军阀、旧制度的各种势力妥协，背叛人民。

法国就是这样。法国的大资产阶级为了保全自己的阶级统治，而支持波拿巴主义冒险家集团。在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驯顺地听命于军阀和贵族。在德意志其他国家中，情况也是这样。在意大利，温和自由派背叛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放弃了用革命方法使国家摆脱奥地利压迫的斗争。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叛变性的本质必须加以揭穿，这是 1848—1849 年革命的最重要的教训。

另一方面，在 1848—1849 年革命和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遭到了破产，他们的局限性和无能已经暴露无遗，他们不能在稍许长一点的时期里把被剥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

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特别表现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也促使革命运动走向失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表明了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随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破产而破产了。路易·勃朗和其他社会改良主义者宣传敌对阶级彼此和解,采取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妥协的策略,都是为反动派效劳。他们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漂亮辞藻来掩盖阶级矛盾,只有利于劳动者的敌人欺骗人民群众。1848—1849年革命事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写道:“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①

唯一能够光荣地经得住1848—1849年暴风雨事件历史考验的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他们的战友,始终如一地为争取以真正民主方式解决革命的客观任务而进行革命斗争。

1848—1849年的革命和革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反动派大力支持了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曾经加速革命爆发的1847—1848年经济危机后来逐渐减轻,而且到50年代初期为经济高涨所取代,这一情况对革命的失败也起了重大作用。

1848—1849年革命运动,在西欧各国都没有取得最后胜利,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些国家当时所面临的客观任务。尽管如此,可是1848年的革命战斗并不是白费的。革命削弱了许多国家的封建关系和封建残余,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并且把许多早已成熟了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和德意志的民族统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1—582页。

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在产业革命没有完成的条件下，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还带有半手工业的成分，这就使领导权在当时难以转到工人阶级手中，难以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建立“社会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这个斗争在法国曾经形成像巴黎工人六月起义那样的当代最重大事件。

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丰富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宝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于研究这次革命经验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原则和策略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关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的学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天才的结论。列宁强调指出 1848—1849 年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1848—1849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他们常常从这一点出发来判断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的命运。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确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和它们的倾向，也常常回过头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常常根据当时的革命时期来评价以后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①

列宁在 1905—1907 年和 1917 年 2 月这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制定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策略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借重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

① 列宁：《反对抵制》，载《列宁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0 页。

第 五 章

十九世纪 50—60 年代 英国的工业霸权

十九世纪 50—60 年代,英国执世界经济的牛耳。英国的霸权首先是依靠它在工业上对其他国家居于优势地位。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和完成都比其他国家早,这就为它的工业以快速度地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

英国在工业上的优势 从 1845 年到 1870 年这个时期内,英国的棉花用量差不多增长了 1 倍。煤产量也增长了 1 倍。冶金业发展了:生铁产量 1848 年才稍稍超过 200 万吨,1870 年就接近 600 万吨了。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始终一马当先。1850 年世界生产中,英国出产了一半的生铁,采掘了一半以上的煤炭,加工了将近一半的棉花。

英国的输出构成逐渐发生变化:除轻工业产品外,重工业产品,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产品越来越占显要地位。自从 1842 年政府取消了机器出口的一切限制以后,英国的机床、机器和机车在许多国家中越来越畅销了。从 1845 年到 1870 年的 25 年中,英国的机器输出量增加了 9 倍。英国为世界各国造船;在造船业方面,英国第一个由用木材造船改用金属造船,轮船制造业得到了广泛发展。

当时到过英国的人都对它的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规模宏伟感到惊讶。拥有数千工人的工厂,在 50 年代已经绝不是

罕有的事情了，某些工厂甚至有1万或者1万以上工人。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反映了资本的不断积聚和不断集中的过程。1862年颁布法律准许设立股份公司，即所谓“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种公司中，每个股东对公司业务所负的责任仅限于他所持有股票票面金额（在此以前，股东对公司的所有业务和契约要负完全责任，并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作担保）。通过这种股份公司吸收居民资金，对于资本的不断积聚和集中过程起了促进作用。股份有限公司为吸收中小资产阶级的资金和存款开辟了途径。在1863—1867年的4年中，英国开设了3,400多家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约为6亿英镑。其他国家也仿效英国，开设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能够大规模地扩大自己的对外贸易。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的输入额和输出额都增长了两倍。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居首位。英国工业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保证了它的商品在世界各地市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英国向其他国家供应轻工业产品和重工业产品。

英国对外贸易的特点是：英国的出口货基本上是英国本国生产的工业品，英国的进口货除了数量日增的外来工业原料外，粮食的比重也在急剧上升。这就是说英国变成了从世界各地取得原料和粮食、输出制成品的“世界工厂”。英国的农业不能保证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要，英国的人口在50年代和60年代由2,100万人增加到2,630万人（不包括爱尔兰）。从1851年到1870年英国消费的小麦，35%是从他国输入的。

英国在工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剥削许许多多的国家。从各个殖民地涌入英国的巨额财宝，使英国有产阶级越来越富有了。由于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和拥有巨量殖民地领土，英国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中叶就具有显著的特点了。列宁写道：“……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占

有巨量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①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就引起了国内阶级力量的深刻分野。生产一切物质财富的工人阶级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同他们对立的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同地主贵族一起在国家经济生活或者政治生活中都占统治地位。

贫富悬殊的加剧。劳动大众的状况 资本主义胜利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贫富悬殊的进一步加剧。有产阶级手中集中着巨量财产。大公司和大银行做着资本以百万计的大买卖。同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土地贵族也由于国内工商业的繁荣而得到直接的利益。英国贵族经济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巨量的地产。例如，波克留公爵占有 50 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圣德林公爵在苏格兰占有 100 多万英亩的土地。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地主贵族广泛参加工商业企业活动。下述材料尤其可以证明英国有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情况：在 1850—1870 年的 20 年间收入最多的一类人的数目增加了 60%，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 60 年代末为 36.5%；同一时期占人口 80% 的劳动人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 40%。无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在英国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日益缩减。在社会上层人物日益富有和日益奢侈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一天比一天严重。

在英国这个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官方统计，贫民的人数在不断增加：1855 年，在英国，贫民（快要饿死的穷人）人数为 851,369 人，而 1865 年则为 971,433 人。马克思在评论这个问题时写道：“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76 页。

腐朽的东西。”^①

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遇到危机时期尤其如此。

在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的同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日益加强。例如在棉纺织工业中，从1850年到1865年按每一千纱锭计算的工人人数(在大企业中)，就减少了一半多。

劳动强度的日益增加，使生产中的不幸事件越来越多。从1851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内，仅仅在英国煤井中就发生了1,437次爆炸事件，有将近5,000工人罹难。

农业无产阶级特别困苦，他们最没有组织，受的剥削也最重。1863年的官方调查证明，农业工人的饭食比狱中的囚犯还要坏得多。

资本家遵循着竭力扩大利润的方针，广泛利用工资低廉的女工和童工。例如，在英国纺织工业中的童工，1875年几乎比1847年多了两倍。

“工联主义”。工人贵族的产生 在十九世纪50年代，英国的工会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原有的工联会发展了，在许多劳动部门中成立了新的工联会，工联会的组织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也增长了。工联会在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了工联会，工人就可以起来抵抗企业主的压迫，工联会并且经常领导罢工运动，培养工人的阶级团结的思想。资本家多次试图取消这种工人组织。政府支持企业主，不承认工人有结社权。当局虽然考虑到工人阶级意志坚决，不敢恢复禁止组织工会的政策，可是仍旧利用种种借口来压迫工联会。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工联会的政策起了变化：反对企业

^① 马克思：《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51页。

主、爭取工人利益的斗争日渐退居次要地位。工联会开始由阶级斗争的机关变成了互助储金会。

英国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和广大的殖民地领土，从全世界各地取得巨额利润，因此，他们就可以让工人阶级中的某一个阶层处于特权地位。所以英国，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工人贵族”。工人贵族是由领取高工资的熟练工人阶层组成的。这些工人上层分子享有特权的经济地位，他们的利益就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相一致了。工人运动的团结因而遭到破坏，造成工人运动的削弱和分裂。工人贵族的人数总是不多的，可是资产阶级却可以通过他们来影响广大工人阶层，散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用革命也可能改善生活状况的思想。因此，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战斗的精神减弱了，同资本主义现实妥协的倾向抬头了。

有了这种倾向，在工联会中对于工人阶级的任务问题便产生这样一种观点：否定以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的政治斗争，只让工人在有限的范围内，采取狭隘的经济罢工方式，来同企业主作斗争，其目的只是稍许改善某些类工人的状况。

工联会的这种新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最先组成为工联会的、收入较丰的熟练工人之中。在他们中间开始滋长了帮会式的关门主义风气和力求同其他工人群众分开、保存并巩固自己特权地位的趋向。这种工联会的典型例子就是1851年成立的“机器工人联合会”。高额的会费，限制了广大工人群众加入这个工会，它的会员不超过11,000人。推举出来领导这个工会的人都领取高薪。木工、铸工和其他一些类工人也都效法机器工人联合会建立了工会。

工联会日益具有纯粹行会的性质，把一种专业的工人们联合成为一个狭小的圈子。这些工联的首领都反对把工联会联合起

来，融成一体，因为他们并不把工联会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首领从资产阶级和工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种错误思想出发，认为与其罢工，不如同企业主“和睦地”商量。因此在他们看来组织强大而统一的工人联合会是毫无必要的。工联会在当时只联合了为数不多的英国工人。英国的职工会，在十九世纪 60 年代所吸收的会员不多于英国全部产业工人的 10%。不过在这个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都还没有英国那么多。

合作社 这个时期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英国工人只注意经济问题的表现。办合作社的主张，由于欧文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宣传的影响，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就大受英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欢迎。欧文他们推重生产合作社，认为这种合作社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手段。1844 年在兰开夏郡的工业城市罗契台尔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用集股方法组成的，它的任务只是排除零售贸易中靠工人的贫穷而发财的居间资本家。罗契台尔的合作社非常顺利地发展起来：它的资本由 1844 年的 28 英镑增长到 1870 年的 5,500 英镑，1870 年这一年的贸易额达到 223,000 英镑。工人，即合作社社员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劳动者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价格也便宜。后来，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罗契台尔的先例”设立合作商店。这些合作社的贸易额在 60 年代达到数百万英镑。

1863 年，成立了“批购合作社”，其任务是向合作商店供应商品。这个合作社自备轮船仓库，自设企业。工人合作社虽然取得某些成就，但是毕竟未能使工人阶级的状况得到重大的改善，只是稍微减轻了居间商人对工人的剥削而已。

英国的政治生活 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处于与其他国家略为不同的特殊地位。英国地处海岛，同欧洲大陆之间隔着很深的海峡，又拥有海上的优势，在当时的作战技术条件下，可以不必担

心受到攻击；因此，它有可能派出很大一部分兵力去征服和夺取殖民地，只把一部分军队留在本国。当时英国军队是用志愿兵来补充的，并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度。英国统治阶级当时用不着开支浩大的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大批警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英国的军事官僚机器比欧洲其他国家弱得多。

在十九世纪，英国是一个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是人民在同反动势力进行长期斗争中争得的成果。当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举行公开集会和群众大会的自由。诚然，英国的警察有时也驱散集会，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定期出版的报刊拥有很大的影响，可以相当自由地批评政府的行动。工人团体和民主团体争得了合法存在的可能。在整个十九世纪，英国始终其他国家政治流亡者的避难之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居住和工作，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设在这里。英国资产阶级所以容许有民主自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强盛有坚强的信心。但是，英国本土居民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却没有扩大到爱尔兰的广大居民阶层和英国其他殖民地的人民群众中去。在殖民地，粗暴的警察官僚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统治着一切，依靠这种统治来维护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地位。

在英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有几个政党。托利党在十九世纪中叶改称为保守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也部分地代表大船主和殖民地大商人的利益。保守党的支柱是对地主处于依附地位的农场主。

另一个有势力的政党是辉格党，后来改名为自由党。自由党的上层分子是同资产阶级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大贵族代表。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国势力很大。在十九世纪50—60年代期间，自由党在英国起着领导作用。在这20年间，自由党单独执政或者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达15年之久，而

保守党只执政5年。

除了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个轮流执政的有产阶级主要政党以外,还有几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们有时也起着显著作用。例如,自由贸易派是代表不满意自由党贵族领袖的政策而希望上台执政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以自由贸易派为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主张成立“节约政府”,因为政府机关的开支一减少,势必使捐税减轻,使英国商品的生产费用降低,从而有助于英国商品的外销。基于同样的目的,自由贸易派也力争降低关税。

除了资产阶级政党外,在50年代上半期宪章派也在活动。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工人几乎完全无法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因此,他们在预备选举中,即提出议员候选人阶段(这时是由全体出席者用简单投票法表决的)支持宪章派。宪章派候选人赤裸裸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政策,所以在预备选举中总是取得压倒的多数票。

1854年3月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全国宪章运动组织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取名“工人议会”。工人议会的主席是著名的宪章运动者厄内斯特·琼斯。马克思曾接到邀请,但是未能出席。他曾写信给工人议会表示祝贺,并指出宪章运动者的任务是要把英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马克思写道:“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①

1854年的代表大会,事实上成了宪章派活动的回光返照。到50年代末,宪章运动就完全停息了。甚至像厄内斯特·琼斯那样

^①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4页。

的宪章运动革命派的著名活动家，在 50 年代末也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了，放弃了宪章运动纲领。

对外政策和殖民政策 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一样，同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国内工业力量的增长就激使资产阶级竭力去扩大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消除一切阻碍英国贸易的障壁，征服弱小国家。

英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帕麦斯顿勋爵，他曾多次担任外交大臣，并在 1855—1858 年和 1859—1865 年担任首相。帕麦斯顿大事玩弄自由主义的辞藻，把自己打扮成为保护他国自由的人物，实际上却在支持压迫各族人民，帮助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他挑唆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力求使英国成为他们的仲裁人。马克思曾经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那唯利是图的自私政策。

同英国政治活动家们所玩弄的自由主义辞藻完全相反，英国政府实行的是压制各族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政策。

英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赤裸裸地暴露在无数次的殖民战争上。

1856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在 1858 年签订了使中国人民进一步受奴役的条约。1856 年，英国对伊朗发动战争。不久，由于印度爆发了人民起义，英国政府才不得不暂时放弃彻底奴役伊朗的计划。在南非，英国对捍卫自己乡土的克索萨人诸部落发动了毁灭性的战争，并把他们赶走。1859 年，英国人残酷地镇压了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

在 50 和 60 年代期间，英国人在新西兰对爱好自由的毛利人作战，结果屠杀了很大一部分毛利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属于他们的土地。1860 年，英国军队伙同法国军队又对中国发动强盗式的进攻。

1863年,英国强迫日本对它“开放”贸易。1865年,英国当局用野蛮手段镇压了牙买加岛上起来反对种植场主的奴隶起义,450名起义者未经审讯就被处死。埃塞俄比亚政府试图向英国商人征收货物进口税,英国为了报复,便于1868年派兵侵入埃塞俄比亚。

论殖民地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英国在列强中占第一位。追求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是这种扩张的主要动机。追求海洋航运基地和海军基地,也激使英国政府去进行领土掠夺。

1852年,英国把缅甸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入自己的印度领地,1854年,英国吞并了印度以西的一大片土地——俾路支,从而使阿富汗失去了出海口。1860年,英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九龙,其位置在早些时候从中国手中夺来的香港对岸的大陆上。英国在马六甲半岛上的领地也在继续扩大。

英国在非洲侵占的领地较小。英国的非洲领地也和其他欧洲列强的领地一样,主要是在非洲大陆的沿海地区。这些领地成了进一步侵入非洲和完全瓜分这块“黑大陆”的战略基地。

在1850—1870年这个时期内,英国殖民地的人口从13,000万人增长到2亿人左右(不计印度各土邦)。

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1867年起义 爱尔兰在1848年以后,把小佃农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出去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日益穷困的农民纷纷移居大洋彼岸,移民的速度非常迅速。

在1841—1871年这个时期内,爱尔兰的人口由于移民出国和饥饿死亡,从820万人减少到540万人,回到1801年的人口水平。爱尔兰成了欧洲唯一的人口减少的国家。

在50年代末,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成立。它的会员自称为“芬尼党人”,这是根据英国人征服爱尔兰时期爱尔兰解放运动中一位传说中的英雄芬尼·马库尔的队伍命名的。这个活动极端秘密的军事化的芬尼党人组织所提出的任务是:准备和实行

武装起义，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芬尼党人的队伍主要是从工人和雇农中吸收来的，但是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人采取狭隘的密谋策略，而没有依靠广大群众。这是1867年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当局事先得到叛徒的告密采取了预防措施。起义由于许多人被逮捕失去了总的领导，结果只是同军队发生个别的冲突。起义被英国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英国工人阶级非常同情爱尔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爱尔兰实行的残酷政策表示愤怒的抗议。

马克思在许多作品中揭穿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压迫，并对英国工人说明，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爱尔兰人民的命运同英国人民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马克思指出，英国反动派在英国人民和爱尔兰人民之间挑拨离间，为的是要巩固自己对两者的统治。

50—60年代的工人运动 1857年，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受到剧烈的经济危机的打击，经济危机对工人的状况发生恶劣的影响。工联会会员有12%没有工做；无组织的工人失业的就更多了。在曼彻斯特，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失了业。企业主利用失业者增多的机会来降低工资并使劳动条件更加恶化。工联会支持工人进行斗争。

1858年，伦敦建筑工人发动罢工。他们要求把每天工作时间缩短到9小时。企业主立刻宣布同盟歇业，并声称工人如要恢复工作必须具结表示不加入工联会。罢工和同盟歇业延续了两月之久，结果是工人失败了。这次斗争证明：工人之所以在老板面前表现软弱无力，是因为他们分散在各个小工会之中。这次罢工的一个成果是伦敦各个工会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工会理事会，为其他城市的工人作出榜样。伦敦工会理事会的领导人是一批有才能的组织者，即几个大工会的领袖乔治·奥哲尔（鞋匠工会）、威廉·阿兰（机器工会）、罗伯特·埃普哈特（木工工会）等人。

这些年来事件告诉英国工人阶级，必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态度。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1—1865年)，英国工人热烈支持进步的林肯政府同叛乱的奴隶主作斗争。由于这次战争和对美国南方各州的封锁，对英国的棉花供应大大减少。由于“棉花饥荒”，英国许多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了。美国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希望英国政府因棉花不足而更快地站到他们方面来干涉战争。但是英国工人反对武装干涉的计划。各个工业区纷纷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林肯，支持美国人民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了站在南方人方面的行动计划。

英国工人阶级也积极地响应国际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英国工人热烈支持波兰的1863年起义和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政治统一的斗争。英国工人阶级的踊跃参加政治生活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增强了他们中的先进阶层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愿望。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对于培养英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起了重大的作用，英国许多工联会都以集体会员的资格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 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重大成就，英国资本主义在海外的统治范围和势力范围日益扩展，结果就大大增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轮流执政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奉行完全以大资产阶级利益为依归的政策。无论自由党或者保守党都反对扩大选举权。统治阶级的有势力集团都害怕新的选举改革所产生的后果。

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希望增强自己在议会中的地位的一些工业资产阶级都赞成选举改革。不过，争取选举改革斗争的主力却是无产阶级。

实际经验告诉工人阶级：要是没有选举权，争取改善自己经济

是困难的。议会的议员差不多全是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议会曾经多次表明它是和工人相敌对的。议会维护某些限制工会活动和确认工人对雇主处于无权地位的法律的效力。例如,按照当时施行的法律,工人在法庭上的供词如果同雇主的供词有出入,便认为无效。只有通过议会,才能废除这种法律,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议会的成分,争取议会的民主化。

马克思耐心而又反复地向英国工人说明:他们不应该仅仅进行经济斗争。他非常重视英国工人争取选举议员的权利的斗争。他支持英国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并且指出,这种斗争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手段。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特殊情况下,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的情况下,在官僚制度也就是主要的暴力手段还不很发展的条件下,并不排除不经过暴力革命使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可能性。

马克思表示赞成工人阶级也正在争取议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联盟,同时强调指出联盟的条件必须是激进派接受普选口号。采取这一步骤可以起试金石的作用,用来检验工人阶级的那些同盟者在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中有没有诚意和是不是彻底。

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立的“改革同盟”对于动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起了巨大的作用,加入改革同盟的,除工人外,还有赞成普选权(全体年满21岁的男子)要求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改革同盟”的支部在全国各地为选举改革运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鼓动工作。工联会也积极参加这个运动。

1866年的经济危机震撼了英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危机给棉纺织工业工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在1863—1864年“棉花饥荒”后元气尚未恢复。失业笼罩着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企业主利用这种情势大大降低工资。官方统计指出贫民人

数激烈增加。

1866年7月22日是星期日，这一天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拥护选举改革。从秋天起，改革运动在外地也具有群众性的规模：在曼彻斯特，有30万人参加群众大会，在伯明翰有25万人参加群众大会，在格拉斯哥有20万人参加群众大会。严冬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新的困难，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了。统治阶级越来越难于反对改革要求了。

1866年在得比内阁中任财政大臣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1804—1881年)得出结论说，改革反正是不可避免了，拖延下来就有使政治局势进一步尖锐化的危险。迪斯累利从这一结论出发，决定实行改革，借以抬高保守党的威信，同时也抬高自己的声望。议会在1867年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新选举法略微降低财产资格，从而扩大了选民人数(从100万人增加到250万人)，新选民来自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阶层。尽管选举法还保留了许多有关劳动人民参加选举的限制，但是新选举法的通过究竟是民主运动的重大胜利。英国无产阶级在1865—1867年积极争取普选权，这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争取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斗争中的巨大力量。

第六章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

1859—1861 年的革命形势和

农奴制的崩溃

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的失败，沙皇俄国的国际威望暂时地提高了，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都把沙俄看作是自己利益的可靠的保护者——国际宪兵，在它的周围联合起来。沙皇政府看得很清楚，即使在俄国本土，革命运动也远没有结束。因此它打算加强自己的威力来对付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恩格斯写道：“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俄国在对外关系上不仅必须成为不可战胜的，而且还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必须以沙文主义的胜利狂态和日新月异的辉煌战果来激使本国臣民无条件地俯首听命。”^①沙皇俄国封建农奴制经济危机越严重，沙皇当局的对外活动就越加积极。

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强国在近东地区扩张势力的斗争是异常尖锐的。这时，英国和法国差不多把经济上落后的俄国完全撵出近东市场。沙皇政府为了保全俄国在近东市场的地位（那怕是一部分也好），多次提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可是每一次都遭到其他强国的反对。列强的角逐使得俄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日益紧张，因而引起了俄土战争，这次战争后来演成以俄国为一方，

^① 恩格斯：《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下册，俄文第 1 版，第 29 页。

以英、法、土和撒丁组成的同盟为一方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在历史上叫作东方战争，或者依其主要战场所在地叫作克里米亚战争。

1. 俄国革命形势的成熟

在俄国，废除农奴制成为必然趋势，到十九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在当权的贵族地主看来，也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封建制度早从十九世纪 30 年代起就进入危机日益增长的阶段，俄国经济势不可挡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过程，不断地破坏着这种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的农民运动，40 年代比 30 年代猛烈，而 50 年代比 40 年代更加猛烈，大有演成用革命方法推翻农奴制度之势。沙皇俄国在 1853—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集团通过了准备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决议。

十九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是决定俄国以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紧要的过渡阶段。在那个时候要解决怎样废除农奴制的问题：用革命的方法呢，还是用改良的方法？农民群众为争取用革命方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进行斗争，而代表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则力图防止革命，想逐步地，即用改革的方法解放农奴，不仅要让贵族继续掌握政权，而且要让贵族继续占有土地。

俄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这两条可能的途径，反映了当时根本性的阶级矛盾。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在国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环境中进行的。俄国如火如荼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迫使沙皇政府甚至不顾农奴主贵族的反对，实行改革。

政府的初步改革方案 沙皇政府在宣布缔结巴黎和约的 1856 年 3 月 31 日宣言中，宣布了进行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可是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安慰农奴制地主，在 1856 年 4 月 11 日召见莫斯科贵族代表时却说：谕传政府要解放地主的农民纯属虚。但他随后又肯定农奴制“或早或晚”是要废除的，并且补充说：“这件事由上

而下进行比由下而上进行要好得多。”

在 1857 年初,设立了由高级官吏组成的“秘密委员会”,讨论了有关废除农奴制的准备措施。委员会的委员们把时间荒废在漫无止境地讨论为数极多的条陈和方案上面,把业已成熟的改革拖得遥遥无期。

沙皇在 1857 年 12 月 2 日(旧历 11 月 20 日)颁给西部三省总督弗·伊·纳齐莫夫的敕令中准许维帖布斯克省、格罗德诺省和科文省地主分别成立省贵族委员会来草拟解放农奴方案。敕令提示了下述三原则作为方案的基础:第一,贵族庄园的全部土地应认为是地主的土地,仅准农民赎买宅旁园地归自己所有,而份地只许在履行法定义务的条件下享有使用权;第二,保留地主对农民的警察权;第三,保证征自农民的赋税及其他货币税完全交给国库,不得短少。由此可见,政府已把关于废除农奴制法律的草拟工作交给了地主。同时,它不仅打算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还要在颇大程度上保留贵族对仅仅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的统治权。官方在对敕令的解释中指出,农奴的解放应该逐步进行,大约要 12 年时间。

这项敕令刊登在报纸上,并发给所有各省。各省地主都得到批准依据上述条件成立省贵族委员会。“秘密委员会”成了筹备改革的正式机关,并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从 1858 年春天起,报章杂志都得到准许论述将到来的改革问题。

1858—1860 年农民运动的高涨 政府完全不让农民参加关于农民解放的立法工作,它打算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做这桩事。但是,农民却对改革的筹备工作经常施加压力。1858 年,俄国欧洲部分就有 25 个省发生农民骚动。除了地主的农奴以外,国家农民、皇庄农民以及从农民中来的修筑铁路的季节工人也参加了骚动。在这一年,第三厅在“关于地主的农民在改变生活时的混乱状态”

专题报告书中,叙述了许多骚动事件。

1859年的农民骚动表现为波澜壮阔的反对酒税承包人敲诈勒索的运动。先是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后来是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和中部各省,农民决定忌酒。他们常常捣毁酒店,殴打酒商和地方官。在12个省里只几个星期功夫就砸了200多家“酒馆”。

在反对包税制的同时,农奴还顽强地反对强制迁徙,而且越来越经常地出现拒服劳役事件。此外,殴打和杀死地主和领地管理人的事情也频频发生。群众性的农民运动也在1860年展开了。

只在1858年到1860年,俄国就发生近300次的领地农民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事件。

由于国内情况的极度紧张,俄国的革命形势在1859—1861年出现了。列宁在列举这年头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鲜明征象时,特别着重指出农民群众的非常忿激的情绪和积极性,并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细心而冷静的政治家是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完全可能,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①。

被压迫人民“异乎寻常的”苦难的日益加重是克里米亚战争年代农奴制经济危机尖锐化的结果。这个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接连不断地进行反农奴制斗争,因而引起了政府人物的严重恐慌。

到十九世纪50年代末,俄国发生了“上层危机”,那时当权的贵族地主阶级已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代表他们利益的专制政权不得不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贵族废除农奴制的方案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后来说自由派贵族是争取废除农奴制的唯一力量。他们故意夸大自由派同农奴主在解放农奴的期限和条件问题上争执的重要性。实际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列宁写道:“我们的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

^① 列宁:《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载《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史学家们百般吹嘘和粉饰过的臭名昭彰的农奴主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由于对让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斗争。”^①

地主阵营内部关于对农民让步程度的争论，早在各省贵族委员会中就开始了。大多数地主都主张只给农民人身自由，不给他们土地所有权，提议减少份地，并坚决主张使用份地要负担繁重的义务。只有非黑土省份贵族委员会中的一小部分地主主张立即解放农奴，并给予他们小块份地，归其所有，但须支付高额货币赎金。这些地主目的是想把自己的庄园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希望从农民那里取得大量赎金作为资本，利用少地雇农的廉价劳动。自由派耽心如果农奴完全没有土地势必在国内引起强大的革命风暴，而革命将会使地主阶级的各种特权化为乌有，因此，他们准备对农民作稍多的让步。

在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于1858年底通过了关于以支付赎金为条件解放农奴给予土地的决议。农民用顽强的斗争迫使政府放弃了改革计划中的主要条款——不给农民土地。

赫尔岑在十九世纪50年代的革命宣传 当时真正代表农民群众利益的只有革命民主主义者。侨居国外的亚·伊·赫尔岑热烈主张解放农民。1853年，他在伦敦创设了第一个“自由俄国印刷所”，给不受检查的俄国民主出版业奠定了基础。赫尔岑在早期印发的传单中满腔热情地号召废除俄国的农奴制。他在从1855年到1862年每年出版的《北极星》文集中刊载了在沙皇俄国禁止发表的革命著作。从1856年到1860年，他出版《俄罗斯之声》丛书（每年两册），其中刊登了有关行将到来的农民解放问题的文章和

^①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载《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

资料。从1857年夏天，赫尔岑创刊《钟声报》，通常每月出版两期，继续出版了10年。用列宁的话说，“《钟声》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①由于热烈地反映俄国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钟声报》在俄国极受欢迎。它是秘密越境运到俄国散发给广大读者手中的。

但是，赫尔岑在50年代并不是始终一贯地主张用革命方法废除农奴制的。他从40年代末就侨居国外，没有看到俄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因而对群众性的农民解放运动估计不足。所以有时也就夸大了农奴主同自由派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不能彻底了解贵族自由派的阶级实质。他有时甚至还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专制政府真正能够解放农奴。

尽管如此，赫尔岑毫无疑问，仍然是赤胆忠心地为农奴的自由而斗争的坚定不移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争取农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他们的同志们是争取彻底解放农民的坚决斗士。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教士家庭。他从小就看到农奴的毫无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了别林斯基的革命传统，在大学读书时代就决定一生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渊博的知识献给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

在十九世纪50年代后五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当时最先进的杂志《同时代人》编辑部的主干。他同自己的朋友、天才文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年）在沙皇政府极其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条件下巧妙地用自己的作品教育了真正的革命家。在草拟废除农奴制法律时期，《同时代人》杂志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车尔尼雪夫斯基及

^① 列宁：《纪念赫尔岑》，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

其同志写了大量论文、书评和小品文，为彻底解放农奴而斗争。他们向读者介绍了废除农奴制工作的准备过程，叙述了农奴的困苦状况，不断地揭穿农奴主的贪得无厌和自由派的伪善欺骗。

车尔尼雪夫斯基密切地注视着废除农奴制的立法工作，揭发了贵族地主力图侵害农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的阴谋诡计。他指出，最低限度必须把农奴所使用的份地给他们，使他们享有完全的所有权，他坚决抗议对农民的份地估定过高的价格和强要农民赎买这种份地。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与其用花言巧语来掩饰过于沉重的或者不堪负担的数目字”，不如承认赎买是不可能实现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受检查的出版物上发表的言论使读者得出结论：农奴是不能从沙皇政府和贵族地主那里取得真正自由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坚信，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农奴制度，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他们希望群众性的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因此在刊物上迅速地反映了农民反对酒类包税制的斗争。杜勃罗留波夫在论述这一事件的论文中把它称作“人民的事业”，并强调指出农民骚动的组织性和力量。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群众性的农民运动能够给予专制农奴制度以致命打击。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号召俄罗斯拿起斧头”和建立革命组织的时代已经到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革命传单《向领地农民致敬书》，指出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的条件对于农民是极端苛刻的。在传单中说明了沙皇与地主狼狈为奸，并通俗地阐述了由民选的“人民公务员”治理的立宪国家的民主制度。

在革命传单的结尾部分，车尔尼雪夫斯基具体指出“我们俄国人该怎样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他写道：主要的任务是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全体农民都同心协力为自由而斗争。他号召地主的农奴要同国家农民和皇庄农民靠在一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着重

指出广大士兵的无权地位，建议农民也要吸引士兵参加争取自由的共同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重视准备全面的革命起义，警告防止过早的分散的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传单的手稿被沙皇警探截获，因而没有发到农民手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有才华、有影响的政论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是确信世界的统一性和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在研究自然界方面，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理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未能彻底克服唯心主义观念，不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是朝着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发展的，例如：他在著作中指出存在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强调指出在社会关系中的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并且始终不渝地捍卫劳动大众的利益。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农民革命正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能使俄国避开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阶段。这种乌托邦的幻想当时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体现形式，并表达了劳动群众要求自由的愿望。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当时俄国其他思想家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他的学说鼓舞了成百上千的人奋起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英勇的斗争。

俄国革命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开端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主张用革命方法争取农民解放的斗争，得到当时的先进人士，特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塔拉斯·格里哥里也维奇·舍夫琴科流放十年归来以后，就坚决主张彻底解放农民。他和《同时代人》编辑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同志。他在50年代末写了许多作品，号召人们同沙皇制度作革命斗争。舍夫琴科因

在乌克兰农民中宣传革命，于1859年被逮捕。1861年3月10日死于彼得堡。

从十九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产生了许多小组和团体，在这些组织中讨论用革命方法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参加这些组织的一般是青年大学生中的代表人物，而在他们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平民知识分子。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秘密出版手抄报纸，并在大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大学生小组，如莫斯科的瓦·伊·波克罗夫斯基小组。这些小组的参加者都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他们阅读和研讨禁售的社会政治书籍和赫尔岑的出版物。

1856年，哈尔科夫成立了一个学生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建立了联系，传播赫尔岑的出版物。喀山的大学生创办了一种报纸名叫《大学生图书馆》。1857年以这家报纸为中心组成的小组，经常传布秘密书刊。

十九世纪50年代末是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第二时期（即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开端。这时投入俄国革命运动的是一支新的力量，即摆脱了贵族革命家阶级局限性并使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个运动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用一个当代人的话说，“平民知识分子是人民中涌现出来并在人民中扎下根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

由于害怕人民骚动，亚历山大二世要求加速制定废除农奴制的法律。他在1861年1月的国务会议上说：“今后任何拖延都会有害于国家。”

废除农奴制法令定稿，于1861年3月3日（旧历2月19日）由沙皇批准。同时沙皇还签署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特别诏书。

2. 废除农奴制的法令

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阶段 关于准许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1861年2月19日法令”，只适用于大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各省的地主的农民，法令规定分期即在相当长的时限内解放农奴。

法令宣布农奴立即取得人身自由，不受地主支配。宣布农民在家庭生活方面享有自由，承认他们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以及同他人或机关订立契约等等。

实际上，这些权利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因为农民对地主在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是无限期保持着的，直到他们得到赎免为止。农民选择某种经济活动的自由也是徒有其名，这首先是由于农民使用份地必须履行义务，非经地主许可不得离开庄园。

尽管有这些限制，可是农奴取得人身自由仍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它给更加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途径。

农民与地主关系的调整工作被交给了特设的中介调停人（*мировой посредник*），这种中介调停人是指派当地贵族地主担任的。他们的工作由这些中介调停人和省级官员组成的专门机关节制。

地主对农民的行政和司法权于1861年年底取消。那时候成立了乡，乡包括若干个毗连的拥有男性居民300—2,000人的村庄。实行了由农民选举村行政和司法机关——在独立村为村长，在乡为乡长以及其他公职人员和法官——的制度。

有关农民与地主间经济关系的规定，预定在两年内实现。地主应在这个期限内草拟好专门的法定文书（*уставная грамота*），其中载明每个庄园中的农民所使用土地的实际数量，并依据1861年2月19日法令规定的标准算出农民的份地数额和义务。法定文

书由中介调停人审查其内容,审查后即向农民代表宣布,农民代表如未提出“正当异议”,便认为成立。

法定文书一成立,农民便无限期地成为临时义务农民 (*временнообязанный*),因为他们必须对地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等到地主同意签订赎买份地的专门契约以后,他们才能免除这种义务,成为农民-私有者。

由此可见,农民根据 1861 年 2 月 19 日法令摆脱农奴依附关系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许多地主都不着忙放弃老一套的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方式。甚至在宣布废止农奴制 10 年之后,俄国还有 30% 以上的农户处于临时义务农民的地位。

临时义务农民的份地和义务 按照 1861 年 2 月 19 日法令,农民可以取得带有菜园的农舍和份地而享有“使用权”;如果在第 10 次(1858 年)户口调查清册中载明他有这些东西的话。克里米亚南岸有许多皇族成员和有爵位贵族的庄园,那里的农奴完全没有份地。原先地主的家仆根本就得不到获得土地的保证。

法令规定的农民份地数额是被故意压低了,黑土地带尤其如此。这就使地主有可能在草拟法定文书时就大大压缩农民使用的土地,从而扩大地主的耕地。此外,地主依据法令还有权用其他手段使农民丧失土地,如让农民不付赎金而只拿 1/4 的份地;夺取特好的农业用地等等。整个说来,地主所得的“割地”在俄国各地达到改革前地主的农民所掌握的份地总面积 18%。在俄国中部、南部和伏尔加河下游许多黑土省份,这种“割地”为全部份地的 20% 至 40%。

在实行代役租制庄园中的临时义务农民,为了取得拨给他们的宅旁园地和份地,必须付给地主的缴纳,等于该地区在废除农奴制以前所交代役租的平均额。实际上是农民被迫为缩小了的份地而支付原来数额的代役租。况且这种代役租是由农民从非农业中

取得的收入来补偿地主的，所以代役租数额无论如何是不会同份地的价值相适应的。在劳役制的庄园中农民为了取得每一口人的份地，每年要做工 70 天。但是，农民必须在短促的农忙季节内服完劳役日数的五分之三，这样一来就大约等于从前的三日劳役制。

为了使农民不短欠租赋和使他们确实履行义务，因而保存了村社土地使用制，并实行了连环保制度，即整个村社必须对每个社员负有物质上的责任。这种村社制度，在大俄罗斯的绝大多数省份，在“新俄罗斯”的三个省（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利省和赫尔松省），在哈尔科夫省的一部分地区，在莫吉略夫省，在维帖布斯克省的许多县中都用法律规定下来。政府还认为保存土地村社可以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赎买宅旁园地和赎买份地的条件 赎买宅旁园地的期限由农民自行确定。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向国库缴纳法令规定的赎金（60 卢布），6 个月后即取得农舍和宅旁地段的完全所有权状。赎买份地则要预先取得地主的同意。

份地的赎金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其数额是按照临时义务农民每年缴纳的代役租的多寡人为地确定下来的。每年缴纳的代役租等于每年的地租，赎金的数额是根据地租额计算出来的。地主只要拿到赎金的 60%，就可以保证他得到原先的收入。因此代役租为 12 卢布时，就规定赎金总额为 200 卢布，如果代役租为 9 卢布，就规定赎金总额为 150 卢布，依此类推。份地赎金通常总是大大超过土地的市场价格，特别是在非黑土省份，因为那里的地价向来很贱，而代役租却特别高。

农民要赎买份地，必须一次缴纳赎金总额 20%—25% 的现金。其余 75%—80% 则由国家立即付给地主，国家就把这笔钱算作农民的负债。农民必须每年缴付赎地费（выкупной платёж），分 49 年陆续清偿这笔借款的本利。

这种赎买办法不仅对地主有利，而且对政府有利。地主可以立刻得到一大笔供自己支配的资金，而政府则可以借此机会从地主那里扣回来他们过去以庄园抵押于国库所欠的巨额债款。

3. 60年代革命运动的发展。1863—

1874年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改革

1861年的农民运动 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苛刻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强烈的抗议。1861年2月19日法令公布后，地方官员立刻就纷纷报警：农民骚动遍地蜂起。仅在1861年的10个月内，第三厅登记有案的就有1,176个庄园的农民发生骚动。

1861年的农民运动特别顽强。沙皇官员承认，在某些省份（格罗德诺省、科文省、斯摩棱斯克省、普斯科夫省、下哥罗德省、梁赞省等），整县整县的农民全部卷入运动。沙皇政府为了镇压这些骚动，曾经出动军队499次。讨伐军同起义农民频频发生武装冲突，伤亡众多。

农民要求立即摆脱地主的统治，他们拒服劳役，拒纳代役租。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份地、强制迁移、剥夺他们的森林及其他农业用地。在丈量和划分土地时，他们同地主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法令中所提到的草拟法定文书的两年期限，农民把它解释作为是政府答应过了两年给予农奴真正的自由，并把从前的份地归他们所有。几乎全国各地的农民都在盼望着到1863年春天获得完全解放。

喀山省斯帕斯克县别兹德纳村成了三个相邻县份有数万农奴参加的农民运动的中心。农民运动领导人安东·彼得罗夫是这样解释1861年2月19日法令的，他说农民应该获得地主所有的一切宜于耕种的土地。彼得罗夫号召农民不要服从地主和官吏，不要服劳役，不要纳代役租。有数百希望知道“真正自由”的农奴，从各地到他这里来。1861年4月24日，军队开到别兹德纳村来镇

压农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安东·彼得罗夫被捕,由战地法庭判处枪决。

1861年奔萨省的农民运动展开了紧张而激烈的斗争,运动的主要根据地是康德也夫加村和契尔诺盖伊村,数千农奴从附近乡村聚集到这里来。农民成群结队,拿着红旗,高呼“自由”,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在契尔诺盖伊村,以梭镖为武器的农民攻击开来的一连兵,迫使他们退回去。后来开来一营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康德也夫加村的农民也以令人惊异的顽强精神坚持抵抗。起义农民受到多次扫射,几十个农民被逮捕了,在这之后,他们的抵抗才被击破。被捕的农民遭到了残酷的鞭答。可是,就在严刑拷打之下还有几个农民仍旧高喊:“就是杀了我们,我们也不干活,也不纳租。”

革命民主主义者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 革命民主主义者代表农民的利益,对1861年改革提出了坚决的抗议。他们清楚地看出这次改革范围狭隘和内容贫乏,并利用一切机会来揭穿这次改革的农奴制性质。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信,农民从沙皇政府那里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的。他读了1861年2月19日诏书后说:“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他在《同时代人》上对2月19日诏书并没有加以评论,只是把官方材料作为当期杂志的特别附录予以披露而已。为了揭穿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写了五篇论文,这些论文采取致亚历山大二世书信的形式,并且讽刺地标上“没有收信人的信”这个标题。在这个虚拟的同沙皇的谈话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指出贵族地主与农奴在废除农奴制的任务问题上看法的对立性。他认为农民的不信任农奴主所实行的改革是合理的,并指出改革的准备工作是采取纯粹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的,这次改革简单些说,只不过让农民为削减了的份地而支付更多的

代役租而已。这一组论文给读者指出了专制政权的农奴制本质，并使农民考虑到必须同专制政权作革命斗争。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发表这些论文。

《钟声报》激烈反对解放农奴的奴役性条件。奥加辽夫详细剖析了1861年2月19日法令的内容，他在《钟声报》上写道：“代替旧农奴制的是新农奴制。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骗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向该报读者报导了1861年俄国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他们说：“巨人睡醒了”，并且毅然声明：“我们同俄国老百姓在一起，同庄稼人在一起，而不同枢密官在一起。”《钟声报》上曾发表了奥加辽夫的论文《人民需要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回答道：“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俄国革命运动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在这个口号下展开的。

白俄罗斯革命家康士坦丁（卡斯图西）·卡林诺夫斯基（1838—1864年）为农民的自由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徒，在彼得堡念完大学后就于1861年回到故乡，献身于革命事业。卡林诺夫斯基同瓦·弗鲁布勒夫斯基合办了白俄罗斯第一种秘密报纸《农夫真理》，他在报纸上坚决主张用革命手段解放农民。1862年，卡林诺夫斯基在维尔诺城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领导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起义准备工作。卡林诺夫斯基懂得，白俄罗斯人民只有同俄罗斯人民和波兰人民共同行动，才能争得社会自由和民族自由。他在一篇传单中写道：“莫斯科人民是我们的自由兄弟，并不想成为压迫者。他们坚决地把造成我们奴隶地位的责任归之于沙皇制度，使沙皇制度注定遭到灭亡。”卡林诺夫斯基强调指出1861年改革的掠夺性质时说，人民要求摆脱农奴制的奴隶地位，沙皇感到害怕，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

阿尔明尼亚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米凯耳·纳尔拜疆（1829—1866年）始终不渝地揭露1861年改革的农奴制性质。纳尔拜疆从

1853年起旅居莫斯科。他在拉扎列夫东方语学院教书并为在莫斯科出版的阿尔明尼亚进步杂志《北极星》撰稿。纳尔拜疆做了许多革命教育工作。他两次(1859年和1860—1862年)出国,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取得联系。纳尔拜疆完全赞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同农奴主和自由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在1862年在巴黎出版的著作《农业是正确的道路》中,严词抨击俄国农民改革的局限性,主张用革命精神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纳尔拜疆承认俄国革命运动的巨大意义。他写道:“俄国的解放对于全人类都有重大意义。”他把阿尔明尼亚人民和沙皇俄国其他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俄罗斯人民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60年代初革命运动的高涨 1861—1863年群众性的农民反农奴制的斗争,引起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涨。青年学生热烈响应蓬蓬勃勃的农民斗争。1861年春天,国内就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喀山的大学生在官军屠杀别兹德纳村农民事件后不久,就给安东·彼得罗夫和他的死难同志举行追悼会表示抗议,民主派历史学家阿·普·沙波夫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他表示坚信别兹德纳村的流血牺牲“一定会唤醒人民起来举行起义和争取自由”,他并且要求在俄国实行立宪制度。同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还发生了最早的大学生街头示威游行。

这时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先进人士加强了革命活动。他们打算秘密印发给各阶层居民的一系列的革命传单。从1861年下半年起,一群革命家印发了三期名叫《大俄罗斯人》的小报。在这些小报中要求彻底解放农民,给他们土地,使各被压迫民族享有自由,在俄国实行民主制度。同年9月,俄国出现了赫尔岑的伦敦印刷所印行的舍尔古诺夫和米哈伊洛夫所写的传单:《告青年一代书》。传单号召青年组织革命小组,并提出了为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广泛的纲领。在1862年上半年,莫斯科革命

学生会的组织者柴契涅夫斯基写了《青年俄罗斯》宣言，提出了建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他主张进行坚决的革命行动，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和在俄国建立革命专政。

1861 年底，俄国产生了革命组织的领导中心——秘密的“土地和自由社”，它的思想领导人是公认的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土地和自由社”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保持联系；它的领导核心包括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近同志：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和亚历山大·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兄弟、尼·奥勃鲁切夫、亚·斯列普卓夫等人。“土地和自由社”在莫斯科、喀山、萨拉托夫及其他城市设有分社。

1862 年夏天，政府对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力量加以打击。7 月 7 日沙皇当局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把他监禁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不久，又以串通“伦敦的鼓动者”的罪名逮捕了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纳尔拜疆和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同时代人》杂志被禁止出版。

宪兵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关押在要塞里达一年半之久，以便寻找对他提出起诉的正式口实。后来根据伪证和伪造文书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苦役刑 14 年，刑满后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迫使这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领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和在遥远的维吕斯克牢狱渡过了将近 20 年时间。到 1883 年才准他返回欧俄，居住在阿斯特拉罕。到 1889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请准迁居萨拉托夫，不久就在那里逝世。车尔尼雪夫斯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家。

1863 年春天的农民运动高潮，以及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的起义，促使俄国的革命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印发传单，号召支持波兰起义。赫尔岑在《钟声报》上发表文章，捍卫波兰的独立。喀山大学生小组打算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动

起义，以便牵制沙皇的军队阻止它去镇压波兰起义，但是，革命者的谋划被发觉了，“喀山密谋”的参加者遭到枪杀。

规模巨大的农民骚动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大惊失色，他们同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分了手，死心塌地地去支持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正是这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大肆攻击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即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曾呼吁政府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施加无情的镇压。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革命年代里，自由派和农奴主勾结起来，共同反对日益壮大的革命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公开宣称，代议政体对俄国来说是“无意义的幻想”，俄国人民仿佛还“没有进步到”实行立宪的程度。后来列宁在痛斥自由派在“农民改革”时期的背叛行为时写道：“我们看到过自由主义者们对待 60 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愚蠢……他们不是奋起捍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袖手旁观并替政府辩护。”^①

俄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 群众性的反农奴制运动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着手在俄国其他民族中废除农奴制度。

由于 1863 年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的农民起义政府进行了俄国西部边区和西南边区的农奴解放法令的修订工作。政府为了削弱这些地区爆发的农民运动，解放农奴的条件稍稍放宽一些。白俄罗斯农民、立陶宛农民和德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农民从 1864 年初起必须实行赎免，赎金数额平均减少 20%。此外，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对法定文书也作了修改：被特别削减了的农民份地显著地增加了，而义务则略予减轻。

在比萨拉比亚，由于农民骚动的影响，摩尔达维亚族的地主的农民的地位有了改变，凡依照 1861 年法令取得解放而没有获得土

^① 列宁：《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载《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 页。

地的，得到了与佃种地主和寺院土地的当地自由农人(царане)平等的地位。根据 1868 年的特别决定，佃农以履行一定义务为条件取得份地的永远使用权，并有权赎免这种义务。

沙皇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德意志贵族同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失去土地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之间的尖锐关系。依据 1863—1868 年敕令，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可以把盘剥性的工役地租折成货币地租，并且取得了脱离贵族庄园的权利。根据 1861 年 2 月 19 日法令，1866 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为农民建立了行政管理机关。

伏尔加河中游和乌拉尔一带民族地区的国家农民和皇庄农民，很大一部分在 1863—1866 年得到了解放。废除皇室庄园农奴制的条例是 1863 年颁布的。皇庄农民取得的土地，其面积等于 1861 年法令为该地区规定的全部数额的份地，并立即实行赎买。内地各省的国家农民根据 1866 年敕令实行赎买，这个敕令规定国家农民保有从前的份地，赎买期限由他们自己确定。第二年，这项法令推广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德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国家农民，并且必须使他们得到赎买。

在高加索，废除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在十九世纪 60 年代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开始的。那时，农奴起义在格鲁吉亚某些地区特别频繁(最大的起义是 1857 年的麦格列里亚起义，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民达 15,000 人)。1864—1866 年，政府按照对地主特别有利的条件解放格鲁吉亚农民。为使每个农奴获得人身解放，由国库一次发给地主赎金，最多达到 50 卢布，并且为地主保留了大部分地产。格鲁吉亚农民的份地平均减少了 30%，而从前被地主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希赞[хизаны])根本得不到土地。农民为了使用份地，仍旧和从前一样必须把一部分收获物缴给地主，所缴的收获物，耕地和葡萄园高达 1/4，刈草场高达 1/3，等等。格鲁吉

亚的实行赎买，也须取得地主同意，赎买条件特别苛刻，赎买果园和葡萄园的全部赎金，农民必须缴付现款。

1870年，阿布哈兹、阿尔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实行了“农民改革”。在这三个地区，赎买份地概由农民自己出钱，国库不给予帮助。农民没有赎买的钱，就继续对地主处于依附地位，使用土地还要履行各种义务（在南高加索，直到1912年他们仍然是“临时义务农民”）。

由此可见，俄国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常常迫使沙皇政府在解放农奴时作某些让步。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60年代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改革首先是从保证地主的利益出发的。

60年代下半期的革命运动 从60年代下半期起，农民运动转向衰落。根据第三厅历年年度报告书中的官方材料，1864—1866年发生农民骚动240起，而1867—1869年只有150起。在这个时期，一些革命组织和小组，大多是青年学生团体，仍旧继续在活动。在群众性革命运动衰落和政府反动势力猖獗的情势下，这些革命组织的成员都在探求同沙皇制度作积极斗争的新方式。

在这个时候，大学旁听生尼·安·伊舒钦所组织的革命小组在莫斯科十分活跃。“伊舒钦派”拥护空想的公社和合作社组合“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对这种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混乱而模糊的。他们希望革命斗争重新高涨起来以便推翻沙皇制度，但却错误地认为用谋刺沙皇的手段可以推进群众性农民运动，从而加速俄国的革命改造。

这个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莫斯科的大学生德·弗·卡拉科佐夫甘冒风险，急于采取这种个人恐怖行动。他为此而到了彼得堡，于1866年4月4日在河岸街夏季花园附近开枪射击亚历山大二世，可是没有命中。他便被捕并处绞刑。卡拉科佐夫的暗杀行

动,结果使得伊舒钦的小组遭到镇压,沙皇政府便用此为借口,对进步报刊和先进的大学生施加新的迫害。

但是,政府的镇压并不能阻止俄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反动年代里,农村的日益破产引起了农民的骚动。到60年代末,公开的学生运动重新开始了。最激烈的学潮是在彼得堡大学、理工学院、外科医学学院这几所彼得堡最大的学校里发生的。

1868年,在大学旁听的教师谢·根·涅恰耶夫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大学生小组。这个小组制定的《革命行动纲领》拟定了1870年春天在俄国举行总起义的冒险计划。涅恰耶夫和他的同志们否认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让人民群众自觉地参加解放斗争,以及对革命起义进行周密准备的必要。他们认为只消玩弄权术机巧,进行讹诈恫吓和采取恐怖行动就可以达到谋反的目的。

涅恰耶夫小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支部于1869年被当局破坏了。涅恰耶夫在此以前就逃往国外,同米·亚·巴枯宁非常接近。“涅恰耶夫策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谴责,他们认为“涅恰耶夫策略”反映出对革命斗争是危险而有害的思想,巴枯宁试图在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中散布的就是这种思想。

涅恰耶夫也没有获得俄国流亡革命家的支持。侨居国外的“六十年代派”革命家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在1870年初就同产生不久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第一国际建立了联系。

地方自治改革、市政改革、司法改革及其他改革 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使沙皇俄国政治制度适应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就成为当务之急。贵族地主为了保住政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在1864—1874年时期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总而言之就是要解决这种任务。

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就是把关于地方经济、初等教育、医疗工作和兽医服务等等事务交给选举产生的新机关——县地方自

治局和省地方自治局去处理。地方自治局中的居民代表(即地方自治局议员)的选举是两级制的。这就保证了统治阶级、首先是贵族地主在地方自治局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在偶然召开的地方自治局会议中,农民议员总是只占少数,而在经常工作的地方自治局成员中,农民代表更是寥寥无几。

地方自治局中的一切事务,首先是涉及农民的切身利害的,都由地主裁夺。他们限制有民主思想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如教师、医师、统计学家的主动精神和往往是忘我的活动。此外,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还要受沙皇的行政机关,首先是省长的支配。

1870年的市政改革取消了过去等级制市政管理局,设立了在财产资格基础上选举产生的市杜马。这种取法普鲁士的选举制度保证了大房产主、大商人和工厂主在市议员中拥有优势。

大资本家的代表们总是从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来管理城市公用事业,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城市中心资产阶级居住区的公用事业,对于工厂区和郊区几乎置诸脑后。

依照1870年法律规定,市政管理机关也受政府当局的监督。市杜马通过的决议须经沙皇行政机关批准才能生效。

1864年新的司法条例根据各个社会集团的居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形式上平等的原则确立了统一的司法机关体系。

法院开庭必须公开进行,由有利害关系方面当事人参加,开庭的结果须在报端公布。诉讼当事人双方为了在法庭上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聘请律师,而律师必须由受过法律教育并且不担任公职的人充任。

新的司法制度是符合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不过它还受到农奴制残余势力的影响。政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对资产阶级改革的一般原则作出了许多严重的背弃行为。例如:给农民设立了特别的乡法庭,在乡法庭里保留体罚制度;对于政治案件,即使

是宣告无罪的，也施加行政迫害；审理政治案件时不准陪审员参加；诸如此类。并且，官吏的渎职罪是不受各级普通法院管辖的。沙皇俄国的司法对专制政权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的改革也触及教育。建立了初等国民学校网。除了古典中学以外，还开办了实科中学（实科学校），实科中学主要着重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1863年的高等院校章程规定了大学的局部自治权，即实行大学校长和系主任的选举制度，扩大了教授会的权限。1869年在莫斯科创办了俄国最早的一所女子高等学校，这个学校采取普通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

出版界的状况略有好转。按照1865年章程规定，10个著作页以上的书籍，以及经过专案申请的首都的某些定期出版物均免于预先审查。报刊第一次违反书报检查规章时，其发行人应受“警告处分”，第二次违反时，出版物应停刊6个月，第三次违反时则禁止出版。

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带着极大的局限性。无论学校或者出版界都仍旧经常受沙皇当局和教会的监视。

在60年代，兵役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缩短了服役期限，废除了体罚，修订了军人条令等等。不过军事改革是直到1874年施行普遍兵役制的时候才实现的。按照新法令，取消了从前由地主用强制方法送农奴去当兵（从1861年起改为根据村会的决议送农民去当兵）的制度，实行征召一切年满20岁的男丁入伍的制度。兵役期限缩短到6至7年，服役期满后退为预备役。

新的建军制度取法于普鲁士和其他国家。这种新制度直到70年代中期修成了铁路网以后才有可能实行，有了铁路网就可以相当迅速地把处于预备役的有兵役义务的人动员起来。

但是，政府在宣布新的兵员补充原则时，却用法律把统治阶级享有的特惠和特权肯定下来了。特别是沙皇军队中的指挥人员像

过去一样基本上由贵族青年来补充，这就造成了军官成分的等级限制和普通士兵的居于屈辱地位。

俄国 60 年代资产阶级改革的总结 沙皇政府为了能在俄国革命高涨时期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使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有优势，而在十九世纪 60 年代走上了改革的道路。沙皇制度对国内新兴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小让步，其目的在于分散那种要求进行根本政治改革的力量。但是不管当权的贵族地主的意愿如何，就是实行那样有限的改革，也是沙皇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国方向迈出了一步。

1861 年的废除农奴制和接着在地方行政、司法、教育、出版等方面实行的改革，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尽管这些措施是不彻底的，不完备的，可是 60 年代改革在俄国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仍具有进步意义。

同时，60 年代改革也具有旧封建制度的许多特点。改革后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农奴制的残余。专制政权仍旧在维护着贵族地主的利益。地方自治机关、市杜马、学校、出版物、司法机关仍旧直接从属于胡作非为的沙皇行政机关。肥沃的土地大部分仍操在贵族手中，农民使用的土地大大减少了，因而使得被迫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民益发陷入奴役性的依附地位。临时义务农民的沉重义务，农民村社的合法化，赎金的支付——这一切不仅使中介调停人，而且也部分地使地主本人对农村社会握有极大的权力。千百万“被解放了”的农民群众在沙皇俄国仍然是受屈辱的，没有完全权利的。

60 年代改革的局限性的原因何在？那就是俄国的革命形势没有演变成为革命，而这一点又归结于迫切希望实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社会成员是涣散的、无组织的。许多世纪以来备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在当时还只能举行分散的自发性的起义。

沙皇政府一面镇压了农民起义，摧毁了力量还很弱小的革命运动，同时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实行了不彻底的改革纲领。结果使俄国资本主义沿着“普鲁士式的道路”进一步发展起来，这条道路为“被解放了”的农民确定了无限痛苦的未来命运。

4. 1864—1873 年中亚细亚的征服

中亚细亚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俄国主要经济区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阻滞着工厂工业需要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妨碍着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采取征服方法夺取新的销售市场，保证了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当时对这种做法感到兴趣不仅是工厂主，而且还有内地各省的贵族地主，因为把经济落后的新地区并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能够和缓俄国中部地区改革后农村中的尖锐矛盾。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向人烟稀少的边陲地区迁移，而工厂主也有可能取得新的市场。

中亚细亚的领土对于十九世纪 60 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那时，由于中国市场出现了大量英国货，俄国对华的陆上贸易衰落了，因而中亚细亚市场对于销售俄国工业品的意义便大大增长起来。中亚细亚诸汗国同伊朗一样，成了俄国中部地区各工业省份出产布匹的重要销售市场。

作为俄国纺织工业原料基地来说，中亚细亚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时期也完全确定下来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对欧洲的棉花输出几乎完全停止，因而造成了 1862—1865 年的棉花大恐慌。俄国纺织工业用的棉花，90% 以上依靠美国，生产因而遇到严重困难。中亚细亚商人便扩大向俄国输送当地出产的棉花，同时抬高棉花的价格。从前从中亚细亚输往俄国的棉花每年为 12—15 万普特，现在增加到 50—70 万普特，差不多达到当时俄国进口原棉总量 50%。

俄国报章杂志对于中亚细亚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862年有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宣称：“俄国同中亚细亚往来能够取得的利益是那样明显，凡是为这件事而付出的代价不久就可以捞回来。”沙皇俄国内阁，开始研究以武力占领中亚细亚诸汗国的计划。

19世纪中叶中亚细亚诸民族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亚细亚有三个封建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几个半独立的白克领地和许多独立的部落。基本居民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卡拉卡尔巴克人，他们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十九世纪中叶中亚细亚诸民族的状况首先是由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落后性决定的。许多土库曼部落和吉尔吉斯部落过着游牧和半游牧式的生活。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经营的同灌溉农业有关的农村经济都控制在封建主的手里，因为封建主占有灌溉系统的水源地段。按照当时在中亚细亚盛行的伊斯兰教法，全部土地分为三类：汗的宫室领地（амляковое владение），伊斯兰教僧侣的寺院土地（вакфная земля），世俗封建主的庄园土地（мульковая земля）。农民按照奴役性的分成制条件耕种封建主的土地，要缴纳收获物的20—50%。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技术几乎毫无进步。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亚细亚的工业仅仅只有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刚刚发端。矿石的开采和金属的冶炼都显著地萎缩了。中亚细亚所需的五金仰赖俄国的输入。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很慢，国库向人民征收的捐税有80%是实物，通常是粮食和牲畜。每个封建汗国都有地方性的商业手工业中心城市，如：塔什干、布哈拉、撒马尔罕、希瓦、浩罕等。在十九世纪，这些城市中最繁盛的是塔什干，它是中亚细亚几条商队大

道的中心，是对俄国过境贸易的枢纽。

连绵不绝的内战摧残了中亚细亚诸汗国的生产力，往往使这些汗国遭到彻底的破坏。封建混战常常使得广阔而富庶的地区变成废墟，农民和手工业者惨遭杀戮，灌溉系统破坏殆尽，田园寥落，城市破产。例如，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浩罕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穆尔伽布绿洲疮痍满目，霍占特、乌拉一秋别及其他商业手工业中心被破坏一空。

中亚细亚各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处于政治衰落时期，它们成了英俄两国在东方角逐的目标之一。

俄国和英国在十九世纪30年代头几次以武力侵入中亚细亚的试图都没有得逞。后来，这两个强国由于在近东矛盾尖锐化，就无暇顾及中亚细亚了。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情势就发生重大变化。

1864—1873 年的军事行动 1864 年，沙皇军队开始出征。部队从佛尔尼城(阿拉木图)和奥伦堡两路出动进攻中亚细亚腹地。1865 年占领了塔什干。塔什干诸酋长以及早就同俄国商业上利害关系的有势力的商人请求接受他们为俄国臣民。1867 年在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的领土上成立了土尔克斯坦总督领，以塔什干为首府。布哈拉汗国艾米尔在同俄军作战失利后，不得不放弃被俄军占领的撒马尔罕和其他领地，并保证俄国商品以优惠条件自由输入布哈拉。

同时，英俄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沙皇政府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优势地位，英国政府则承认俄国在希瓦的“特殊权益”。

1873 年，沙皇政府大举进攻希瓦。希瓦汗国军队未加抵抗就投降了。当年签订了希瓦成为俄国藩属的条约。希瓦汗放弃了独立外交权，承认把阿姆河以东的全部领土并入土尔克斯坦总督领，并同意俄国船只在阿姆河自由航行，俄国商品在希瓦境内销售，不

征关税。

中亚细亚并入俄国的后果 俄国中亚细亚诸领地的军政大权完全操在总督手中。被任命为总督的考夫曼将军在 1867 年至 1881 年期间是沙皇政府的全权代表。他所建立的殖民行政制度完全控制住了土著居民的生活,使他们如同在汗政权之下一样,仍旧处于屈辱的地位。

中亚细亚为俄国资本家的活动创造了特别有利的环境。俄国商品在中亚细亚市场的销售额急剧上升,从俄国内地各个工业省份运来的工厂产品数量迅速增加。当地手工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因为无力同俄国货竞争,而日益衰落。由于扩大种植改良品种的草棉,中亚细亚的棉花很快就在颇大程度上保证了俄国棉纺织工业的需要。同时,中亚细亚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显著地缩小了,不久就开始需要粮食进口。

尽管沙皇政府采取殖民政策,可是中亚细亚的归入俄国版图,却对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卡拉卡尔巴克人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积极的影响,在客观上产生了进步的结果。这些民族从此免除了连续不断的封建混战;并为社会经济的较迅速的发展,为新生产力的发展,为封建制度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创造了条件。

但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中亚细亚诸民族同俄罗斯民族以及同俄国其他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为共同进行反对沙皇制度、汗、白克以及俄罗斯族的和“本族”的地主和资本家,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准备工作,并使这一斗争在后来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当地居民从迁移来的俄罗斯手工业者和农民那里学会了较完善的劳动方法和技能,学得了工农业生产的新技术。中亚细亚诸民族的接近俄罗斯先进文化也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第七章

德国的统一

1848—1849年革命失败遗留下来未获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两个大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分裂局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能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种封建制度的严重遗害。意大利北部还在外国人统治之下，扫除异族统治，是意大利另一个未解决的任务。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虽然希望国家统一，但是由于害怕革命，而在1848年背叛了战斗的人民群众，同反动势力妥协了。

工业的高涨 恩格斯在评述德国50—60年代的经济发展时写道：“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和1849年因为怯懦而在政治舞台上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便以热烈投身于大工业作为寄托”^①。

德国在50—60年代，发生了规模广大的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不断地发展着。这20年间，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已经在德国各个工业部门中夺得阵地。虽然还没有把旧式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完全排挤掉，但是大工厂生产的作用已经一年大似一年。在普鲁士，蒸汽机的功率从1846年到1858年增加了4倍多。在同一时期，全德意志机器织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多。煤炭产量迅速上升，生铁和钢的产量都不断增长。铁路建设具有很

^① 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俄文第1版，第484页。

大规模，铁路长度到 1867 年已经达到 15,000 公里（1847 年为 4,300 公里）。银行和股份公司也增多了。巴伐利亚从 1849 年到 1858 年开设了 44 家股份公司，共拥有资本 14,500 万马克。普鲁士只是 1853—1857 年的 4 年功夫，新开银行的股本总额就达 6 亿马克。

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普鲁士式的道路” 1848—1849 年革命并没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德国土地问题。因此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德国农业中取得的胜利，不是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成果，而是由“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①。这种缓慢的、对农民非常痛苦的演进结果，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这种道路，列宁称之为“普鲁士式的道路。”

1850 年 3 月 2 日，普鲁士通过了一项关于赎免和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新法律。新法律无偿取消了少数封建小义务，同时规定由农民按很高代价赎免主要的封建缴纳和义务。恩格斯写道：在普鲁士“农民为求免除非法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而付给贵族和国库的款项至少有 3 亿塔勒尔，也许有 10 亿马克呢”^②。

地主从农民手里得到大量货币资金使得地主的庄园很快地变成资本主义农场。促成这种转变的也由于 50 年代世界市场上谷物价格昂贵以及种植马铃薯取得丰厚的收入，因为容克（东普鲁士的大地主）用马铃薯酿造的白酒非常畅销。容克农场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机器技术。

绝大多数农民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并且日益无产阶级化。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载《列宁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19 页。

② 恩格斯：《论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上册，俄文第 1 版，第 249 页。1 塔勒尔等于 3 马克。

列宁描述了处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沿着“普鲁士式的道路”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基本群众的贫困状况，他写道：“……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的经济，同时分化出少数‘大农’，使农民在几十年内受着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①。

德国统一的道路 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国民族统一问题更加迫切了。德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

在当时情况下，客观上存在着两条统一国家的可能道路。一条道路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坚持为之奋斗的道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示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来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建立统一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这条道路要求消灭普鲁士容克地主和普鲁士军阀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消除德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在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范围内，使全国团结一致，这是完全符合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上而下革命”的道路，即王朝战争的道路，是要把德意志诸邦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君主制度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德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必然会加强反动势力的统治。普鲁士和奥地利围绕着由谁来领导统一德国的问题展开了斗争。

政治生活的活跃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反动时期。反动首先表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德意志邦都废除了革命年代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

普鲁士的1850年宪法显然是一部反民主的宪法。普鲁士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主要是大地主贵族、高级官吏和将军；众议院议员是根据容克地主和大资本家享有各种特权的反动选举制度选出的。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9页。

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52年，根据警察的伪证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进行审讯，大多数被告都被判了罪。

在这些年头，德国的反动另一种表现就是颁布了一系列增强地主权力的命令。例如，1854年的《违反雇佣条件法》就限制了农业工人迁移和另谋工作的权利。

在50年代末，德国的政治生活显然重新活跃起来，1859年，德意志各邦的自由派人物，在美因河法兰克福组成了民族联盟，它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1861年，一批普鲁士自由派人物建立了进步党，它提出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实现普选制，建立责任政府，实行出版自由，等等）。

德国民族联盟和进步党中的自由主义者，都自命为反动势力、容克地主和军阀的反对者。但是他们害怕1848年革命事件再起，因而不敢采取积极的斗争方式，只限于发表演说和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其中包括纪念席勒诞生百周年的示威游行）。自由派试图诱惑工人放弃独立的斗争。民族联盟的著名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他自由派人物，为使工人阶级接受自己的政治影响，大力宣传消费合作社、储金会、互助会，认为这些东西是改善工人状况的方法。

普鲁士的“宪法冲突” 普鲁士早就开始同奥地利角逐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霸权地位，力争压倒奥地利，因此便想方设法设计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1861年登位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他周围的容克，打算把军队扩充到40万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和改善军队的装备，需要大量金钱。

普鲁士资产阶级当时正暂时处在“左倾”时期。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议员，要求政府作政治上的让步，他们运用1850年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拨款。政府为回击这一

行动而解散了议会，但是在新的选举中，反对派议员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使得宫廷和当政人物忧心忡忡。他们害怕反对派会向人民求援，担心斗争转趋激烈。

1862年9月，国王任命波美拉尼亚大地主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为宰相。对这位狂热的反动容克地主，时人有过这样的评语：“如果天使不带普鲁士徽章，他也不会接待。”早在1848年，俾斯麦就崭露头角，那时他曾建议国王说，要镇压革命，就必须坚决使用武力。从50年代初期起，他担任普鲁士出席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代表，后来担任驻彼得堡大使和驻巴黎大使。他所抱的政治目的是由普鲁士来统一德国，决心既定，就不择手段地要达到这个目的。俾斯麦摸清了自由派议员的底细，丝毫不理睬他们的激烈反对，仍然不经批准实行军事改革。同时，他也制定了自己的统一德国的计划，他说：“德国所瞩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威力……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说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就在于此——，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俾斯麦开始用不顾一切的坚决手段实行他的“铁血政策”，即侵略战争政策。事态很快就表明，俾斯麦对普鲁士自由派资产阶级估计没有差错：他们和先前一样，仍然是一群胆小鬼。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宪法冲突”，以自由派的投降和1867年成立民族自由党而告终。民族自由党采取无条件支持俾斯麦的立场。

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的宣传活动 敢于最坚决地反对俾斯麦政府反动政策的力量是工人阶级。

德国无产阶级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是德国人民中的先进队伍。他们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主张用民主方法解决德国统一问题。

从1861年开始，在德国各个工人教育团体里，主张必须建立

不听命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各种工人教育团体讨论了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问题。负责召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来比锡工人委员会，要求当时有名的政治活动家斐迪南·拉萨尔就工人运动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途径发表意见。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是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和政论家，在1848年革命时期就开始政治活动。那时他接近马克思，给《新莱茵报》写稿，号召同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因此被判处徒刑。拉萨尔因为积极活动和关心无产阶级而受到工人的拥戴。他把无产阶级看做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唯一实际力量。

拉萨尔在对来比锡工人委员会来信的《公开答复书》中，揭发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他们打算控制工人运动的企图，号召工人建立独立的政党。拉萨尔的答复书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起了积极的作用。1863年5月在来比锡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德国十个最大的工业中心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代表会议上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

拉萨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在理论问题上还是在实践活动上，他都采取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相异的立场，对待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则抱着在政治上有害的不正确观点。根据他的意见，工人阶级（他把工人阶级叫做“工人等级”）只能用合法的方式，只能用议会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不加批判地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错误的“铁的工资规律”理论，认为长期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从而否定了工人争取改善经济状况的斗争。拉萨尔把农民（以及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一切阶级）看做是“完全反动的群众”，摒弃工农联盟的思想。拉萨尔在他那部刻划十六世纪农民起义事件的历史剧《法国贵族季金根》中，不是把农民，而是把过了时的、实质上是反动的社会集团——骑士描写成为最进步的力量。

对于当时主要问题——统一德国的道路问题，拉萨尔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从虚构的“铁的工资规律”出发，进而否认无产阶级举行罢工、组织工会和进行群众性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工人用和平方式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从而取得政权。根据拉萨尔的想法，工人阶级可以利用夺得的政权来建立工人生产协作社。拉萨尔要求俾斯麦实行普选制，为此而同俾斯麦进行秘密谈判，答应支持他的由普鲁士王国领导统一德国的计划。拉萨尔的这种为社会主义者所不齿的行为，证明他是不择手段的。最后，拉萨尔成了俾斯麦玩弄政治权术的工具，俾斯麦打算利用拉萨尔在工人中的声望，进而借助工人来击破自由派的反抗。

拉萨尔当上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以后，取得了几乎是独裁者的权力（有权指派联合会地方分会的主席和联合会主席的继承人）。1864年，拉萨尔在决斗中殒命。他死后，继承他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施韦泽基本上是遵循拉萨尔的旧规。如后来发现，施韦泽向政府领取过秘密经费。

拉萨尔的活动促使德国的工人运动从自由资产阶级运动中分离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拉萨尔这一功绩，同时又严词谴责了他那错误的、有害于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观点和行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 萨克森和德国其他一些地区产业无产阶级中的进步阶层都起来反对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以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为首的萨克森工人团体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策略特别积极。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天才的政论家。他参加过1848年巴登起义，起义遭到镇压以后亡命国外，在伦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亲近。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当时是一位青年旋工,他在儿童时代就经历着艰辛的劳动、贫穷和困苦。20岁那年参加了职工运动和政治斗争,读了许多书,懂得不少东西,不久就显露才华,成为德国工人最有威信的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器重这两位德国工人运动领袖,经常给他们帮助和支持,虽然也批评他们的错误。

1868年,在萨克森工人团体联合会纽伦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接近第一国际基本思想的纲领。在这件事情上,倍倍尔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终于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还有下述错误:党纲在论及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不提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的问题,并且迁就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有这些反映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弱点,但是在德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乃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进步工人,反对在普鲁士王国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但是德国工人阶级当时的组织程度还没有达到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并阻止俾斯麦实行“铁血政策”那样的水平。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两个工人组织人数不多,它们的影响还不能扩及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

普鲁士的对外政策。普鲁士—丹麦战争。普鲁士—奥地利战争 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单薄,拉萨尔派的有害影响,自由资产阶级的胆小怕事,在在都使俾斯麦得以实现他那旨在保证普鲁士称霸德意志的政策。

俾斯麦的对外政策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俾斯麦考虑到俄国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打算改善普俄关系。1863年波兰起义时期,他向亚历山大二世提出了俄普共同镇压波兰起义者的协定草

案。这个协定于 1863 年 2 月签字(叫做阿尔文斯列本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没有批准,实际上也没有实行,但是签订协定这件事却促进了普俄关系的改善。

60 年代初,法俄关系开始疏远,因为法国政府背弃自己承担的义务,没有提出修改 1856 年巴黎条约中对俄国不利、使俄国受辱的条款的问题。同时,英法两国由于争夺殖民地,彼此关系也转趋恶化。欧洲几个大强国由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而无暇顾及普鲁士,为普鲁士容克地主实现自己的政策造成有利环境。

俾斯麦利用这个机会第一步是下手夺取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施坦因。这两个地区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它们的有利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早就使得德国军阀和德国资产阶级垂涎三尺。那里很大一部分居民是德意志人,眷怀德意志,俾斯麦也利用这种情况。1864 年,普鲁士同奥地利结成联盟进攻丹麦。战争为时不长,因为象丹麦这样弱小国家是无力抵挡两个强敌的。根据和约,丹麦被迫割让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施坦因。石勒苏益格和海港基尔归属普鲁士,霍尔施坦因归属奥地利。

普鲁士在这场战争取胜以后,马上就开始准备掉转枪口攻击不久以前的盟友奥地利,其目的是削弱奥地利,从而肃清它在德意志的势力。普鲁士的以毛奇将军为首的参谋本部和冯·罗恩将军为首的军事部积极地制定决战计划。

普鲁士的外交活动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一方面要向奥地利挑衅,同时又要使俄、法、英三大强国保持中立。普鲁士的这些外交活动都取得了成功。奥地利在 1853—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政策是沙皇所不能谅解的,因而奥俄关系很坏,这样,沙俄在普奥战争中就有了保持中立的可能。俾斯麦含糊其辞地保证在欧洲给予法国以“补偿”,换得了拿破仑三世的中立。当时英国正在倾其全力同法国进行外交斗争。俾斯麦又和意大利缔结了同盟,

因为意大利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拿回威尼斯。

俾斯麦选中了霍尔施坦因公国的局势问题作为向奥地利开战的口实。他故意挑剔奥地利总督的行为，把普鲁士军队开进霍尔施坦因公国。于是奥地利向正在法兰克福开会的全德议会提议谴责普鲁士的侵略行为。奥地利的提议得到其他许多德意志邦（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汉诺威、巴登）的支持。俾斯麦的粗暴的挑衅政策激使这些国家起来反对普鲁士，而普鲁士军阀的大国主义计划也使他们非常害怕。

1866年6月17日，普奥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奥地利的捷克地区。奥地利统帅部决定分兵作战：以75,000名军队开去对付意大利军，以283,000名军队去对付普鲁士军。普军人数为254,000人，但是装备比奥军好得多，尤其是普军拥有当时最好的从后膛装弹的撞针击发枪。

7月3日在萨多瓦（在克尼格雷茨附近）决战中，奥军遭到惨重的失败，而被迫后退。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集团陶醉于既得的胜利，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把战争进行到彻底打垮奥地利时为止。他们要让普军高唱凯歌进入维也纳，在那里迫使战败的奥地利接受割让许多土地的媾和条件。俾斯麦坚决反对这样做。对于这一点，他是有充分根据的：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为普军在萨多瓦会战中取得的意外胜利而大为震惊，在会战过后两天就提议愿意出面作和平调停人。俾斯麦估计到法国可能立刻站在奥地利方面进行武装干涉，这样势必根本改变现有的力量对比。此外，俾斯麦也不打算过分削弱奥地利；因为他还想在将来同奥地利拉手。基于这些理由，俾斯麦主张尽速媾和。1866年8月2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

北德意志邦联 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普鲁士取得胜利而告终，这就预决了今后德国统一事业的进程。奥地利被迫放弃自己

在德意志事务中独占鳌头的要求，并退出德意志邦联。站在奥方作战的4个德意志邦——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领、拿骚公国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市，被并入普鲁士版图，原先普鲁士王国分成东西两部分，中间错杂着其他邦的领土，这样一来，便连成一片了。普鲁士夺得这些领土后，就成了拥有2,400万人口的一个德意志邦。

经过俾斯麦政府的竭力设法，终于建立了北德意志邦联，邦联是由美因河以北22个德意志邦组成的。1867年4月通过的北德意志邦联宪法，在法律上肯定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普鲁士国王成了北德意志邦联的元首。他是邦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邦联委员会是由邦联所有参加国政府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在其中也居于领导地位。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担任邦联首相，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实际上已经变成整个北德意志邦联的最高军事机关。全邦联议会必须用普遍的(年满21岁的男子)和直接的(但不是秘密的)投票法选举产生，其中多数议员席位属于普鲁士。实际上，北德意志邦联议会只有很小的政治权力，因为它的决议非经邦联委员会批准不发生效力；政府不对议会负责。

同时，普鲁士还强制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同它缔结了关于南德这四个邦武装力量由普鲁士参谋本部监督的协定。

普鲁士在北德意志邦联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这个邦联的成立预先决定了德国的统一势必要以普鲁士为盟主。过了几年，即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德国统一大业终于彻底完成。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普鲁士军队占领下的凡尔赛戴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冠冕。

第八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

经过 1851 年 12 月的国家政变，路易·波拿巴攫取了政权，后来在 1852 年，他又自封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法国历史开始了“第二帝国时期”。第二帝国这个名称是以拿破仑一世的帝国作为第一帝国推算下来的。

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 拿破仑主义制度几乎毁灭了 1848 年革命的所有民主成果。政府借口取消秘密结社，摧毁了一切民主组织。政治俱乐部被禁止了，出版自由被扼杀了，反对派报刊大部被查封了，剩下的也受到警察机关的严密控制。报刊编辑人选须经内政大臣批准。中小学、大专学校、剧院也处在警察机关的监视之下。当局经常压制有共和思想的教师。

庞大的警察机构控制着一切生活领域。“他们扼杀了权利，禁止了言论自由，侮辱了旗帜，践踏了人民，而感到兴高采烈！”——维克多·雨果在当时这样愤怒地描写了拿破仑主义的统治者。

国家管理体系旨在提高握有实权的皇帝的地位，而把代议机关的作用化为乌有。代议机关由立法团、参议院、国务院三院组成：立法团由居民选举产生，没有立法动议权；参议院由皇帝任命大臣和僧侣组成；国务院也由皇帝任命组成，它根据皇帝提出的方案制订法律。

路易一拿破仑的政策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上半期,拿破仑主义制度也得到有钱的和很大一部分小私有农民的支持。马克思写道:“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马克思又补充说,“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①。

第二帝国政府无情地镇压国内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实现反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主要要求。拿破仑主义的特点是把全部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并力图使政权具有超党派,超阶级的外观。造成政权具有“超阶级性”和“全民性”外貌的一种做法是全民投票,拿破仑三世政府曾多次使用这种手段。这种全民投票是在粗暴的警察恐怖、贿赂舞弊、统计票数时的弄虚作假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政府却因此有了借口,说是得到人民的赞同。

为了达到见风使舵和欺骗人民群众的目的,拿破仑三世在立法团选举时恢复了普选权(年满 21 岁的男子)。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制度,警察对选民的压迫,牢牢地保证了为政府捧场的人在立法团中取得多数席位。

列宁在论证拿破仑主义这种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实质时写道,“……拿破仑主义的基本历史特征:依靠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的国家政权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和敌对力量之间看风使舵”^②。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这两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拿破仑三世政府使用“皮鞭和蜜糖”的方法,一面迫害独立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组织,同时鼓励政府所“批准”的工人团体,后一类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18 页。

② 列宁:《拿破仑主义的开始》,载《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12 页。

团体避免举行罢工，并接纳企业主和教士为“名誉会员”。这种团体受到当局的庇护，并得到不花钱的房屋。

拿破仑三世建造了豪华的宫苑。在他的宫廷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批冒险家，或者历史肮脏的坏蛋，前者如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刽子手圣阿尔诺元帅，他在 50 年代初担任陆军大臣，后者如同路易—拿破仑一起干冒险勾当的老搭档波西尼，他由皇帝册封为公爵，并当上了内政大臣。波西尼解释拿破仑主义政府的既营私舞弊又实行恐怖的政策时，曾经厚颜无耻地说：“一手拿钱，一手拿剑，我们就能把国家引导向前。”

产业革命的完成 50—60 年代，法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使用机器生产的以前只有个别工业部门，到这时已经遍及所有主要工业部门了。机器开始进入农业部门。法国经济中所使用的蒸汽机的总台数及其马力，在第二帝国时期大约增加 3 倍。

在广泛使用机器技术的基础上，工业生产在这 20 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个别部门增长得更快，虽然工业产量仍旧比英国落后得很多。由于急剧建设铁路而造成对金属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冶金业的发展，铁和钢的产量从 1852 年的 320,000 吨上升到 1869 年的 904,000 吨，几乎增长了两倍。棉织、毛织、丝织工业的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增加。

生产积聚过程在工业中进行着。克勒佐城的施奈德尔冶金企业，到 60 年代末已拥有近万工人。在阿尔萨斯，以及在卢昂、里尔和其他许多工业城市里，大企业占居统治地位。资本集中过程的速度很快，到 60 年代末，许许多多的铁路公司合并成为 6 家联合公司。但是除了装备有机器的工业以外，中小工业继续起着很大作用。轻工业在拥有工人人数和产品数量方面，都大大超过重工业。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激增,1871年巴黎已有180多万人,里昂已有32万人等等。

金融投机的猖獗,货币资本权力的加强,交易所的无边势力,这就是第二帝国经济的特征。许多大银行正是在这个时期开设的。例如,1863年创立了“里昂信贷银行”,1864年创立了储蓄银行——“法国工商业发展总公司”,1865年创立了“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由许多银行合并而成)。货币资本的积聚和巨量财富向一小撮大金融家手中集中的过程,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巴黎交易所变成了欧洲和其他各洲许多国家资本家和政府的一个举债的中心。

农业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经济作物的收获量增加了,播种面积略有扩大,牲畜品种获得改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土地所有权是十分分散的:1851年有土地所有主将近800万人;其中有60万人几乎陷于赤贫的境地。随着地权的分散,贫农益发依赖于农村富户和高利贷者,缺少土地的小农民进一步破产和贫困了。他们负债累累,不能改进耕作,无力置办机器,继续用落后的方法经营农业。

1857年,法国和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个主要工业部门生产锐减。到1859—1860年,危机过去了,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到了1866—1867年,周期性的危机又降临了,这次危机比上一次为轻,但在信贷领域内情况要比在生产领域内为严重。

在50—60年代,产业工人人数剧增,巴黎一地,在60年代就增加了10万人。工人阶级已经有1848—1849年革命的战斗经验,并在罢工斗争中和同当局的经常冲突中受到了锻炼。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变本加厉。例如,煤矿工人每人的日产量1851年是643公斤,而1869年已达777公斤。其他生

产部门情况相似。由于有政府的支持，企业主延长了每天的工作时间。许多生产部门中已经毫无限制。名义工资稍有增加，但是，食品价格和房租涨得更快，结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依然如故，而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业部门甚至下降了。

童工和女工受到残酷的剥削。在加来海峡省在很深的地下矿井里，有 10 岁的儿童在做工。目击者认为，他们的状况比奴隶还坏。调查童工劳动条件的检查委员会委员们在报告中写道：“他们一天劳动 15—16 小时，只能勉强糊口。”许多儿童和少年不能上学。

在阿拉斯区的作坊里，花边女工（其中有 7 岁的女孩）在狭小而闷气的房子里每天劳动 13 小时，甚至更多。从事花边生产的男女童工中间，流行着大量疾病（其中有脊柱弯曲、肺结核等病大大流行）就是这种致人于死命的劳动条件造成的后果。

铁路公司残酷地剥削工人，强迫工人一班劳动 16—17 小时，因此民主派政论家罗舍把铁路公司叫做“杀人凶手”。在这些年代里，任意罚款制度十分盛行，稍微违反工厂规章，就要挨罚，这也大大削减了工人的工资。

大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手工业者、小店主、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破产。由于工业企业和新开大百货公司的竞争，“中产阶级”——法国居民中一个颇大的阶层——的状况恶化了。

贫富悬殊现象越来越严重了。由于巴黎的改建，拆除了许多狭窄的街道，修筑了环形林荫大道，建造了许多新的车站、宫殿、教堂。巴黎改建的目的之一是拓宽街道和广场，以便于军队在镇压起义时作战。林荫大道两侧盖起了豪华的富人住宅。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仍旧栖居在破烂不堪的小屋里。其他许多城市也进行了改建。一小撮资本家，特别是建筑材料供应商人，在城市改建过程中发了大财。同时，房租更贵了。

50年代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 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一次演说中宣布：“帝国就是和平。”可是实际上第二帝国抛弃了这个装点门面的和平口号，几乎没有间断地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要满足那些财迷心窍、贪求新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金融巨头、企业主和交易所投机者的利益。战争也符合拿破仑三世王朝的利益。由于第二帝国内部动荡不安，胜利的战争也渐渐成了帝国生存的必要条件。

拿破仑三世首先使法国卷入对俄战争——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使法国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没有给法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这场战争对法国毫无必要，只是巩固了拿破仑三世的皇位。在1856年巴黎和会上，法国是以欧洲最大强国的姿态出现的。

1856—1857年，法俄两国开始亲近。法国的企图是极力促使俄国反英，因为当时英法两国在欧洲和在殖民地的竞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1858年初，意大利革命家奥尔辛尼谋杀拿破仑三世的事件，成了英法关系益趋紧张的原因，因为奥尔辛尼是从伦敦带了英制炸弹来到巴黎的。法国官方报纸谴责英国的纵容放任，要求对英国采取“坚决行动”。由这次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久就平静了下来。但是英法关系的恶化促使俄法两国在1859年3月3日签订密约，其中规定拿破仑三世保证支持俄国政府要求取消巴黎条约中关于禁止俄国在黑海保存舰队的条款，而俄国则保证在外交上支持法国反对奥地利。

法国与撒丁王国结成同盟于1859年4月发动了对奥战争。拿破仑三世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追求的是侵略的目的。在索尔菲利诺和马詹塔两次会战中，法军两次击败奥地利。然而拿破仑三世欺骗并出卖了自己的盟友意大利。拿破仑三世政府单独同奥地利签订协定（其中规定威尼斯地区继续归属奥地利），法国的合并

原属于撒丁王国的萨伏依和尼斯，以及法国军队的占领罗马，这一切大大加剧了意大利爱国人士对法国政策的不满。

法国的殖民地扩张 第二帝国一方面在欧洲进行战争，同时加紧进行殖民地扩张。在非洲，法国殖民者于 50 年代大事扩展以前夺自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把撒哈拉大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并入法国领地，并完全征服了山地各区。殖民者从欧洲向阿尔及利亚移民的政策，以及为这种目的强占当地居民土地的行为，又激起阿尔及利亚多次举行起义。法国当局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把这些起义镇压下去。

法国殖民当局在多年期间内利用个别部落之间的内讧并收买部落上层分子，不断地把法国领地的边界线向非洲腹地推进。

第二帝国在远东也拚命推行殖民政策。法国通过 1857—1858 年和 1860 年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两度强迫中国接受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这两次签订的条约使中国人民进一步受到西欧资本的奴役。

1858 年，法军借口保护天主教传教士而侵入中国的藩属越南。当时越南国内正遇到严重的困难。封建贵族原来已经把全国很大一部分土地集中到手里，现在又在夺取村社的土地。阮氏朝廷力图限制封建主并加强中央政权。为了这种目的，政府于 1840 年颁布专门命令，规定将夺自村社的土地均须归还村社。深受地方封建主和中央政权双重压迫的农民，展开了争取土地和反对使人破产的捐税和徭役的斗争。在 30—40 年代整个时间内，越南发生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些起义镇压下去。国内的封建落后，统治集团间的内讧和混战，加上对外关系方面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同暹罗的斗争），这一切都便利了法国殖民者推行侵略政策。

然而征服越南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法国军队于 1858 年 9 月在上伦港登陆后便陷入困境。越南人民起来抵抗，阻止住侵略

军向越南首都顺化推进。热带的酷热和疾病流行使法军大批死亡。越南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烈火，农民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当权的封建主集团竟公然出卖本国人民：越南政府于1862年6月签署了把南部三个省连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的条约。法国的商船和军舰取得了在湄公河自由航行的权利；并开放了三个同法国通商港口。此外，越南必须付给法国400万银元的巨额赔款。1863年，法国建立了对越南邻国柬埔寨的保护。1867年，整个越南南部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经过这些侵略活动，法国到1870年已占有殖民地90万平方公里，在这些殖民地上居住的人口为600多万。

向“自由帝国”过渡 当法国经济还处于高涨时期，战争还能给第二帝国政府带来胜利，给交易所投机商人、大工厂主和商业资本家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仿佛已被打垮，一切反对派仿佛已被掐死的时候，当代许多人满以为拿破仑主义的统治是铁打的江山。但是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有力地打击了法国，并使许多企业破产，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中产阶级”陷于贫困和破产的境地，这就引起了国内的普遍不满的情绪。

政府当局在1858年审讯奥尔辛尼的时候，在工人中间听到对拿破仑三世这样的议论：“太遗憾了，这条狗命竟留了下来！”因而非常不安。在这一谋杀案件发生后，就进行一阵大规模的警察迫害。当局借口维护“社会安宁”，逮捕了许多有反政府情绪的人，虽然他们同谋杀案毫无瓜葛。猖狂的警察恐怖引起怨声载道，促使共和派的宣传活动重新活跃起来。

1860年，法国同英国签订了新的商约，规定两国大大降低进口税率。新商约对于法国许多工业部门是不利的，这些工业部门将会由于英国货的竞争而受到损失。因此，这一条约引起法国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用关税保护工业。

拿破仑主义制度在国内的阵地已经呈现出严重削弱的迹象，因此，当局在内政上就越来越多地采取见风使舵的政策。1860年以后，在法国历史上叫做“自由帝国”时期。“自由帝国”的第一招就是稍稍扩大立法团的权力。

政府试图拉拢工人阶级，也向他们大送秋波。拿破仑的娄罗和官方报纸用骗人的手法把拿破仑三世说成是工人利益的“保护者”。统治集团常常表示接受工人某些要求。例如在1862年，巴黎印刷工人因为私营印刷厂降低工资而举行罢工时，国家印刷厂便故意提高工人的工资。1864年政府废除了为工人所痛恨的禁止罢工和结社的勒·沙白里哀法。但是，这个法律废止后，罢工者仍然受到迫害。

工人运动 法国无产阶级没有接受波拿巴当局别有用心地诱惑。从60年代初期开始，工人运动进入高涨阶段。一系列新的工会组织产生了。1864年立法团选举时，巴黎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工人候选人”名单，用以明确表示他们既反对帝国制度，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

这个时期法国工人运动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派别是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蒲鲁东主义者不断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他们否定工人参加政治生活，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工人互助会上面。归根到底，蒲鲁东主义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莫大的损害。

60年代的法国工人运动由于积累了阶级斗争经验而获得许多进展，使得先进的工人摆脱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队伍里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左派（通称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主张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集体所有制，认为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一派的领袖是装订工人欧仁·瓦尔兰，他是一位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英勇战士。

布朗基派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派别，其中大半是知识分子。布朗

基主义者在反对第二帝国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绩的，但是他们仅仅重视政治斗争，认为群众性工人运动、成立工会、举行罢工等等没有意义。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这两个渗透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派别，都不能保证正确地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法国的先进工人同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工人一起积极地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 and 活动。从 1865 年起，巴黎和法国其他许多城市先后成立了“国际”的支部。

60 年代外交上的失利 60 年代后半期，第二帝国在外交方面连连严重失策。拿破仑三世在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的政策留下了特别严重的后果。法国的中立使普鲁士轻而易举地战胜奥地利，而在 1867 年北德意志邦联成立以后，俾斯麦就断然拒绝履行早先对拿破仑三世许下给予法国以“补偿”的诺言。

墨西哥冒险的破产使第二帝国威信扫地。法国的金融巨头和权臣显宦对墨西哥垂涎三尺，由于他们的坚持，法国于 1862 年开始远征墨西哥（主张进行这次冒险最力的是皇帝的异母兄弟莫尔尼公爵）。拿破仑三世政府的目的是要把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种植场、银矿、锡矿的墨西哥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按照这桩冒险事业的发动者的谋划，夺取墨西哥乃是建立一个从属于法国的幅员辽阔帝国的一个步骤。

实现这一冒险计划的企图，引起了英美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使法国消耗了大量的物力，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当地的反动集团，即大地主和高级僧侣在法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附庸的墨西哥帝国，是一个极不牢靠的国家。被武装干涉者捧上皇位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完全靠法军的刺刀支持。1867 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坚决要求，法国军队撤出了墨西哥。那位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就被墨西哥共和派推翻了，并被枪决。

到 60 年代末,法国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关系显著地陷于恶化。拿破仑三世拒绝履行 1859 年法俄条约规定的义务,并且在 1863 年企图从外交上支持波兰起义,这就激使沙皇俄国起来反对法国政府。1867 年以后,法国同普鲁士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了,因为德国的统一事业即将告成,使得法国统治集团梦寐不安。拿破仑三世的殖民冒险政策,造成对英国关系非常紧张;英法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不顾英国的反对而开凿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于 1869 年通航,它由法国资本家控制着。

法国在意大利实行的阻挠意大利统一的政策也产生了对法国不利的后果。这种政策使意大利的爱国人士同法国疏远了,使意大利的广大人民起来反对法国。

可见,到 60 年代末,法国实际上已陷入孤立的地位。

帝国内部危机的加剧 1866 年,法国发生了新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内政局进一步紧张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加强了。大生产的竞争,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日益加重的租税使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痛苦不堪,他们抑制不住自己对拿破仑主义制度及其反动的对内政策和冒险的对外政策的愤懑情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阶层积极地起来反对政府。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了宗奉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传统的“新雅各宾派”。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原因不满拿破仑三世的政策,也不再支持政府。1869 年,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在立法团选举中获得大胜。共和派议员席位增加了。当然其中多半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拿破仑主义政府试图进一步在各个阶级之间实行见风使舵政策来克服日益增长的政治危机。从 1868 年起开始实行一些温和自由主义的改革。立法团得到了选举自己主席团的权力;对出版和集会的警察监督放宽了一些。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达到政府的

期望。政府只要稍稍打开一点缺口，就足以使压抑着的公众不满暗潮立即奔泻而出。

维克多·雨果的作品给予当代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同拿破仑主义制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雨果在侨居国外期间，在1852年就发表了战斗性的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1853年又出版了诗集《惩罚集》，严厉抨击篡夺法国政权的拿破仑冒险分子集团。雨果的火热的诗篇秘密地运入法国，有共和思想的青年，都争相传诵。

在60年代，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活跃起来，并起着显著的政治影响。有才能的政论家昂利·罗希福主办的《路灯》杂志，起初在法国出版，被查封后转到比利时出版，秘密运到法国发行，辛辣地嘲笑和揭露了波拿巴政府和宫廷。罗希福的杂志很受欢迎。1869年罗希福当选立法团议员，在法国创刊《马赛曲报》，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给报纸撰稿。

公众不满情绪的增长鲜明地表现在“博丹案件”上，所谓“博丹案件”就是1866年有一批左派共和党人为1851年十二月政变中被害的议员博丹募捐建造纪念像而受到法庭审讯的案件。出庭的青年律师甘必大发表了指控拿破仑主义制度的热烈的起诉词，并宣布法国永不与之妥协。

在这些年里，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是非常惊人的。1869年的矿工大罢工几乎席卷了整个罗亚尔矿区。矿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政府派出军队，开枪射击罢工工人。1870年初，在克勒佐各工厂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罢工，军队又参加了镇压。拿破仑三世政府一直戴着的“保护工人”的面具已经撕得粉碎。克勒佐罢工之后，其他工业中心城市也纷纷罢工。3月间克勒佐再度爆发罢工，4月间巴黎爆发铸工罢工。巴黎的铸工罢工持续了将近四个月，不仅得到法国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得到外国工人的支持。

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全国民主共和运动加强了，工

人也在这个运动中起着决定作用。1870年1月,巴黎举行20万人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几乎演成起义。这次示威游行起因于拿破仑三世的皇族皮埃尔·波拿巴亲王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共和派记者维克多·努亚尔。

拿破仑主义制度试图用第二帝国政府曾经多次使用的老手段,即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来平息日益增长的革命危机的浪潮。法国统治集团指望打一场胜仗来维系摇摇欲坠的拿破仑主义制度,使拿破仑的统治能够击溃自由主义反对派和粉碎工人运动。

第九章

十九世纪60年代的工人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进入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仍然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劳动群众的革命新高潮必然会到来。这是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而得出的结论。

1.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年代的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便着手积聚由于失败和迫害而削弱了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总结不久以前的革命经验。1849年秋天,法国和德国的反革命得逞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先后流亡伦敦,在那里他们又重新开始共同的革命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始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同盟盟员星散各地,彼此都失去联系。1849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重新成立,恩格斯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从1850年3月起,马克思主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理论机关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月刊在汉堡出版,它是《新莱茵报》的后身。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新杂志的任务是“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

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①。

1850年3月末，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由派去负责改组同盟地方组织的特派代表亨利希·鲍威尔带到了德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尽全力使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力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团结起来。在德国的许多大城市和瑞士的一些居民点都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支部。同盟跟设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跟法国革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英国宪章运动者左派、匈牙利侨民中的进步人士、比利时的革命工人重新恢复了联系。1850年4月中旬，同布朗基主义者、宪章主义者达成了一项关于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这项协议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奥·维利希、宪章主义者乔·哈尼、布朗基主义者亚丹和维迪尔签署的。协议第一条规定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②。

1850年6月发表的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指出了同盟在和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的工人阶级先进队伍建立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总结不久以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经验，同时又发展了他们学说的基本原理。在3月发出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就对德国的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主要结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5页。附录（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命中应当遵循的策略作出了具体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革命进程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暂时取得优势,并掌握政权。他们在《告同盟书》中阐明了工人政党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来反对反动势力,但是,它不能忘记民主派小资产者不愿意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不能忘记他们要保存资本主义及其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可是工人阶级的任务就不是这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对工人阶级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愿意“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

为了保证能够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对付得胜之后正开始反对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必须把工人组织成为社团会议、俱乐部或者委员会,归站在运动中心地位的机关来领导。同时工人必须武装起来,组成由选举产生的指挥官领导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工人在农民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对于工人取得最后胜利十分重要。资产阶级民主派力图在保存农村无产阶级的条件下,给农民群众一小块土地,用以拉拢农民。同他们相反,工人则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耘”^②。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这里就已经强调指出把劳动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重要性,和集体农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2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7页。

业生产对个体农业生产的优越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指出，工人必须力争把德国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企图，在国民议会选举时，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同年，即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组关于法国1848年革命的论文，后来（1895年）恩格斯把这些文章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书名重新出版。在这部杰出著作中，马克思发展了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的原理：只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消灭建立在人剥削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时候，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必经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作出的另一个结论说：“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①这个结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义。马克思进一步还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这是顺利进行推翻资本主义斗争所必需的条件。

1848—1849年革命事件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国家学说。同时，这次革命事件不但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发展他们过去提出的思想，并且用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具有迫切意义的新原理丰富自己的学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阐明了这些原理，这部著作是他在1851年12月—1852年3月写成的，1852年在纽约出版。马克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4、98页。

思在这部名著中第一次提出了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作为未来人民革命的基本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写道,“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①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分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农民小私有制的历史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农民阶层日益贫困的过程,证明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马克思写道,“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写了几部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分析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认为农民在未来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虽然谈的是德国人民遥远的过去,是十六世纪初德国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然而和1848—1849年革命战斗所提出的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问题却有着直接的关连。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1525年德国市民阶级的叛变和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的叛变,如同人民群众分散起义一样,是十六世纪初叶和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民革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恩格斯在关于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著作(包括《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中,以革命事件的目击者和积极参加者的身份,论述了这次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各阶级、各政党在革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6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665页(注释)。

命各个阶段中的态度，并作出了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有关的深刻的理论总结。1851年10月25日至1852年10月13日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总题目叫《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其中包含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恩格斯强调说：起义“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①他进而具体指出，决定起义取得胜利所必须遵守的规则：选择恰当的时机，采取攻势的战术，要有斗争到底的决心，要有革命组织的领导。

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同盟的解散 从1850年7月底起，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对于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维利希和他的拥护者，再三主张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联合在一起；而为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所支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采取这种步骤。这种分歧后来发展成为剧烈的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维利希和沙佩尔为另一方之间，在估计政治局势上意见严重相左，使冲突益形尖锐。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经济情况，在1850年7月得出一个结论：在最近期间不会有新的革命发生，因为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接着是工商业的高涨。新情势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根本上改变策略。

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对政治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并且不顾现实的力量对比，提出要在德国立刻准备革命起义的冒险策略。在1850年9月15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分裂发生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决定，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往科隆（科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2页。

隆的共产主义者曾严词斥责维利希和他的信徒)。科隆区部受命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并草拟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章程以代替旧章程。

维利希—沙佩尔派别集团在伦敦单独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因为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大多抱有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不久，它的地方组织大多也就解体。德国政府对共产主义者的加紧迫害，维利希—沙佩尔派别集团的破坏活动，给同盟带来极坏的后果。1852年10月—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批领导人在科隆受到审讯。同盟的7位著名活动家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3年至6年）。正如马克思在他出色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中指出，这个案件的根据乃是普鲁士司法机关的凭空捏造和警察专横。

于1852年11月17日，即科隆案件宣判以后五天，按照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

从1851年8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多年，他们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英国内外政策，有关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问题的文章。马克思在1853年—1854年还给宪章派的《人民报》撰稿。他在1855年为布勒斯劳的《新奥得报》，1856—1857年为伦敦的《自由新闻》写了许多通讯，主要是关于英国和克里米亚战争的。

1856年末，即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不久，马克思恢复了在1853年中断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50年代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给马克思提供了用以进一步探讨他的经济学说原理的丰富的材料。1859年1月，他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篇，这部著作包含有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总结。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下了经典性的定义。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使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状况急剧地恶化了，这次危机成了国际工人运动新高涨的开端。在一些国家里，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加强，农民骚动也发展起来。

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活跃起来。德国和意大利争取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1863 年的波兰起义，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些事件都激励了工人阶级的先进人士。

由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复兴和新高潮，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开展当前的革命斗争，就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解散后，就不再存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了。50 年代初期有过多次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试图，从这里反映出欧洲和美国先进工人日益迫切地要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愿望。各国工人表示支持波兰起义，英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支持美国人民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诸如此类的事件，尤其是这种愿望极其明显的证明。

1863 年 11 月 10 日英国工人致书法国工人呼吁国际团结。呼吁书中说：“为了工人的事业，非常需要各国人民的亲如兄弟的团结……因此，我们的口号是兄弟般的团结。我们要和全世界所有需要和平与自由、希望发展工业和人类幸福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法国工人在答复书中表示有充分的团结决心。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的圣马丁堂召开了国际性的大会，会上宣读了法国工人的答复书。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的无产阶级代表。马克思以德国工人代表的身份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的使命是实现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力量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协会还面临另一个任务，马克思后来在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波尔特的信中对此作了说明，马克思写道，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①

这些任务确定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的内容。1864年11月1日，马克思执笔的这两个文件由圣马丁堂大会产生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纲领起草委员会一致通过。

《成立宣言》明确地说明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状况，论证了随着有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长，无产阶级日趋贫困。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强调指出“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成立宣言》指出了工人运动成功的经验，即英国工人阶级争得了十小时工作制法律，工人合作制运动和工人生产联合会的发展。《成立宣言》中写道，“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上是能够进行的……”。

同时《成立宣言》根据以往多年的经验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合作制本身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社会解放，“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负担”，因为，“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成立宣言》宣称：“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地实现

① 马克思：《致弗·彼尔特。1871年11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5页。

它的伟大解放使命。他说：“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①因此，马克思把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提出作为无产阶级实现社会解放的必要条件。

《成立宣言》载有关于工人阶级必须注意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必须积极反对侵略性活动和掠夺性的战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说，这种斗争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国际”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以《共产党宣言》中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束语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进行。

国际工人协会临时规章中也包含有很多极重要的纲领性原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每个国家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的团结一致以及各国无产阶级彼此间的兄弟联盟对工人阶级斗争取得胜利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临时规章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为了求得社会解放，应该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必须把政治斗争看做是实现最终目的——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手段。

国际工人协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最高机关是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举中央委员会（后来改称总委员会），任期一年，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国际”的最高机关。总委员会应从其委员中选出通讯书记来同某一国家的“国际”组织联系。总委员会驻在地选定为伦敦。“国际”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前已经存在的工人联合会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0、12—13页。

加入国际,享有支部的权利,而且可以保留原来的名称(工联会、互助会、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教育小组和俱乐部等等)。若干支部联合成为区域的或全国的总支部,总支部由总支部委员会或全国委员会领导。

1864年9月28日选出的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波兰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到1865年秋天,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2. 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870年以前)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名义上只是“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德国和荷兰的通讯书记(后来又担任俄国的通讯书记),而实际上则是整个“国际”组织的灵魂和公认的领袖。“国际”有马克思这样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和天才的理论家。列宁写道:“马克思竭力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形态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主义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派的右倾等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反对所有这些宗派和学派的理论,为各国工人阶级制定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根据各国的情况和发展特点采取各种不同方式同过时的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宗派进行紧张的斗争。在德国,他们反对拉萨尔派,在英国,他们反对引诱工人脱离政治斗争的自由主义工联主义。

在1865—1868年,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当时蒲鲁东主义对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人有很大影响,是这些国家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国际工人协会于1865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年9月25—29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和以后在日内瓦、洛桑、布鲁塞尔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为克服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有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波兰的代表。会议听取了各地支部的报告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寄来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书面工作报告。代表会议在制订预定在1866年召开的“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时发生了分歧。一些有蒲鲁东主义思想的法国和比利时代表顽固地反对把工人阶级对波兰人民解放斗争的态度问题列入议程。然而，马克思和聚集在他周围的各国先进工人的代表经过力争，终于使这个问题列入1866年代表大会的议程。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60位代表。

尽管代表大会代表中有很多蒲鲁东主义者，但在大会讨论各个主要问题时，总委员会的路线仍然获得胜利。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然而他起草的《指示》作为英国代表和总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提交给大会。

《指示》十分重视用立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缩短童工的每天工作时间和保护女工的问题。《指示》指出，代表大会应作出决议，使这些要求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至于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合作制问题，马克思重新强调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劳动者的状况，只有在“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①以后，劳动者的状况

^①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6、219页。

才能改变。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的决议，同马克思在《指示》中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起草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在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把工会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列宁后来指出这个决议“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①

代表大会还谴责了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妇女参加生产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反动观点。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各个支部的发展。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斗争 1866—1867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激起了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罢工浪潮。由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国际”的各地方的努力，罢工者得到了很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国际”在无产群众中的威望因而大大提高，并使许多国家的“国际”支部得到很大发展。

由于普法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国际”总委员会便展开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宣传，以反对法德两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宣传。同时，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竭力维护国际工人运动，使它免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影响。1867 年春天成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与自由同盟”的首领们企图使工人运动接受他们的影响，因而邀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国际”的一些有声望的会员参加同盟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预定在“国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载《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际”将于 1867 年 9 月初在洛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举行。

在总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邀请的时候，马克思对“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和平主义宣传，以及这个同盟领导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建立欧洲联邦来防止战争的幻想给予致命的批判。马克思的结论是：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总委员会拒绝了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只是派了总委员会委员欧仁·杜邦以个人身份到日内瓦，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说明国际工人协会关于防止战争方法问题的观点。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年 9 月 2—8 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标志是蒲鲁东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攻击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者企图在洛桑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为此而提议改选总委员会并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英国迁到瑞士。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些提案。然而在蒲鲁东主义者力争之下，又重新讨论了日内瓦代表大会已作出决议的合作制问题，并作出了一项决议，把生产合作社推荐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手段。蒲鲁东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下述原因促成的，即来自法国和瑞士的蒲鲁东主义者代表占居多数，英国工联主义领导人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以及总委员会代表团中间存在着意见分歧。马克思的拥护者——杜邦、埃卡留斯、列斯纳，处于少数派的地位（马克思没有参加代表大会）。

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都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决定保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原有成员。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会员有向“国际”组织缴纳会费义务的决议（每人每年 10 生丁），这样的会员才有当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蒲鲁东主义者自国际创立以来从未交过会费）。

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无产阶级政治自由和政治斗争的决议着重指出，“确立政治自由是首要而绝对必须的措施”。决议同时还指出，政治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无产阶级社会解放必要的条件”。

在代表大会上还提出了关于必须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把交通工具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尽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而把它们留给下一次代表大会审议，可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其本身就具有极其巨大意义。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通过了答“和平与自由同盟”日内瓦代表大会书。这个文件指出，只有在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使社会不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制度”之后，才有可能制止战争和取消常备军。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 1867年9月，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用了20多年时间写成的这部天才著作，对生产和资本流通过程作出了深刻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研究了价值的本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的过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工人阶级的基础，从而指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占有工人无偿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大量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周密完备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论证了它在历史上的过渡性，以及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死亡的规律。《资本论》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科学的论证。列宁说“《资本论》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①。

1867—1869年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国际”的巩固 国际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总委员会在马克思起草的向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确认 1867 年和 1868 年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两年。这两年，国际工人协会“在经过了一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后……壮大起来了，并且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而引起统治阶级的猛烈攻击和各国政府的敌对行动。协会进入了战斗阶段。”^①

法国工人蓬勃展开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罢工斗争，是法国工人阶级开始摆脱蒲鲁东主义影响的一个标志。在 1867—1868 年，巴黎的青铜工人和成衣工人，鲁贝和维也内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费沃的煤矿工人，亚眠的纺织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国际”的法国各支部日益壮大，日益巩固了。

拿破仑三世政府加紧镇压“国际”的拥护者。1867 年 12 月至 1868 年 3 月在巴黎进行了对“国际”的审判，结果，“国际”的巴黎组织被查封了，它的领导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又在 1868 年 5 月 22 日到 6 月 19 日对“国际”的巴黎组织进行了第二次审判。但是这种一再迫害并没有达到第二帝国政府和法国大资产阶级所期望的结果。正如总委员会指出的，迫害“不但没有消灭国际工人协会，相反地却给了它以发展的新动力……”^②。

1867—1868 年，比利时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在沙勒尔瓦区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比利时政府为镇压这次罢工使用了武力，进行了司法迫害。主要由于保卫工人的“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积极活动，终于使沙勒尔瓦煤矿工人被宣判无罪。在这一事件之后，“国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上册，俄文第 1 版，第 274 页。

② 同上书，第 275 页。

际”支部在比利时得到很大发展。

德国先进工人日益明确地表示支持“国际”的原则。拉萨尔派的领袖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1868年8月底在汉堡举行的拉萨尔派代表大会，通过了准备同“‘国际’一致行动”的决议。1868年9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工人联合会纽伦堡代表大会表示无条件赞同“国际”的纲领。

在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中，关于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各民族劳动者阶级团结的思想，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

1868年日内瓦建筑工人举行罢工，由于通过总委员会得到各国工人的援助，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罢工的胜利促使“国际”瑞士各支部进一步壮大起来。

在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提出了普选权的纲领，这对于英国无产阶级争取议会改革的群众运动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工联主义首领们的机会主义策略却妨碍了这一纲领的实现。在人民压力下进行的1867年的议会改革是不彻底的改革。

爱尔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日趋加强，“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倡议下于1867年提出了英国工人支持这一运动的纲领，总委员会认为爱尔兰的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争取自身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然而，工联会的领导人，包括那些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的工联会领导人在内，在这一问题上却采取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立场。

到1867—1868年，“国际”总委员会同英国许多工联会建立了联系。很大一部分工联会正式加入“国际”。

这两年，美国的罢工运动也加强了。美国全国劳工协会同“国际”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 1868年9月6—1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内容

和决议反映了 1867—1868 年国际工人运动发生的变化。

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的 100 多个代表。代表大会非常明确地主张工人阶级必须进行罢工斗争，同时也指出“罢工不是工人取得彻底解放的手段”。代表大会就这样正确地确定了罢工运动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意义和地位。代表大会一方面打击了否定罢工的蒲鲁东主义者，同时又警告社会主义者不要过高估计罢工运动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斗争中的意义。

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实行土地、矿山、矿井、铁路集体所有制的决议。这一决议旨在反对蒲鲁东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手工业者和农民得到贷款和土地，并能互相直接交换劳动产品，城乡小生产者的状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可以得到根本改善的。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代表大会无条件地赞同由马克思参加起草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凯撒·德·巴普所作的报告中的论点。

在巴普的报告中以及在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导致大生产的胜利；在保持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仅仅对资本家有利。

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中说：“生产条件和采用农艺科学成就，提出了向大农经济过渡的要求，同时使农业中采用机器和集体劳动组织成为必要，整个现代经济正向大农业生产发展。”

代表大会指出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对工人阶级的卓越意义，建议工人学习《资本论》以利于他们的解放斗争。

代表大会表明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各国工人无产阶级团结思想的胜利。大会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这一决议正确地指出了战争的起因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联系。不过决议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把罢工看做唯一的反战手段，决议号召工人说：如果在他们

国家里爆发战争就立刻停止工作。这种夸大罢工作用的错误，受到了马克思的指责。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严重地打击了蒲鲁东主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领导权转到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即所谓集体主义者手中，他们主张实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集体主义者承认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且谴责了蒲鲁东主义者对待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和教育的任务问题）上的错误思想。但是集体主义者也没有彻底摆脱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特别在关于国家作用的问题上。

1868—1869年国际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和法国、比利时、英国、瑞士新的大罢工浪潮，进一步提高了“国际”的威望及其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影响。

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中的破坏活动 蒲鲁东主义者在思想上被粉碎后，无政府主义者便代之而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欧美各国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团结工人阶级的任务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和破坏活动而复杂化了。这一反对无产阶级的流派的首领是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亚·巴枯宁(1814—1876年)。

巴枯宁否定一切国家政权，认为它是强加之于个性的暴力。他硬说国家是资本的创造者，因此，只要消灭了国家，那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会自行消灭。巴枯宁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唯心主义观念，就认为无产阶级无须有阶级组织，无须参加政治斗争，他否认无产阶级有能力领导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所要求的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各个阶级的财产“平等”。

巴枯宁在理论问题上是个折衷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①。恩格斯写道：“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而他的蒲鲁东主义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是国家，而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②

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一样，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流派，由于它的伪装革命的言词，密谋和自发暴动的策略，所以特别危险。巴枯宁主义的社会支柱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追随巴枯宁主义者的还有无产阶级中的落后阶层，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西班牙、南意大利、瑞士拉丁语系地区、法国南部一些地区。

巴枯宁主义者打着“个性自由”的旗号，激烈攻击国际工人协会的基础——民主集中制原则。巴枯宁主义者力求从组织上削弱“国际”，取消“国际”的一切纪律。他们别有用心地反对所谓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专制”，而要求每一支部有自治权，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有自治权。实际上是巴枯宁企图把“国际”抓到自己手里。

巴枯宁想把国际工人协会并入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同盟”（他担任这个同盟领导委员会委员）的试图失败后，于1868年底加入“国际”。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了关于同“和平与自由同盟”建立联盟的建议后，巴枯宁便改变策略，退出“和平与自由同盟”，在日内瓦另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8年12月和1869年初，巴枯宁执意强求总委员会接受他的同盟作为独立的组织加入“国际”。总委员会要求解散同盟，因为在“国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6页。

②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3页。

际”内部如果存在另一个组织只会使“国际”的组织遭到破坏。巴枯宁同意解散同盟，于是同盟各支部的成员便被接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然而，巴枯宁却暗地里保存了自己的组织，并把它作为进一步阴谋反对总委员会、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中那些不听从巴枯宁主义破坏性宣传的支部的工具。

当时巴枯宁及其跟班的目的是尽可能取得更多的即将在1869年9月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席位，巴枯宁指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然后把总委员会搬到巴枯宁主义者拥有坚固阵地的瑞士。巴枯宁主义者把这一举措看做是篡夺国际工人协会全部领导权的第一着。巴枯宁施展了各种鬼蜮伎俩，终于使得他的大批喽罗参加了代表大会。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反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 “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在巴塞尔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英国、法国、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部的代表78人。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彻底从思想上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代表大会重新讨论了土地所有制问题，重申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此外，代表大会不顾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通过了在各地建立工会的决议。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主要敌人是巴枯宁主义者。在讨论废除继承权问题时同他们的冲突最为尖锐。总委员会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报告（马克思执笔的），驳斥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论调，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立法手段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总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

争。”报告进而指出，“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①

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因为代表们莫衷一是。

关于组织问题，由于巴枯宁主义者企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而显得特别重要，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十分明确的决议。巴塞尔代表大会无条件赞同扩大总委员会的权限，授以接受个别支部参加“国际”和开除个别支部出“国际”的权力，并且享有排解支部之间纷争的权力。巴枯宁主义者支持这些决议，因为他们指望利用总委员会的这些广泛权限。然而他们的指望落空了。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成员没有更动。总委员会的驻地仍确定在伦敦。

“国际”俄国支部的成立 1870年初，“国际”俄国支部在日内瓦成立，它把一些流亡在瑞士的俄国革命家联合起来。俄国支部的创始人一面把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呈报总委员会批准，并且在1870年3月12日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俄国支部驻总委员会的代表，在这封信上署名的是尼·吴亭、安·特鲁索夫、B.涅托夫（巴尔捷涅夫）。他们在信中说：“我们受过我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因为自己的著作而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思想的熏陶，我们满怀喜悦拥护您所阐明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您对工业封建制度的批评。——这些原则和这种批评，一经为人们所接受，就会摧毁资本主义的桎梏……”。吴亭他们接着写道：“同时，您在创建‘国际’中起着决定作用……”。他们确定俄国支部的目的是竭尽全力协助在俄国工人中积极宣传“国际”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把他们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4、415页。

团结起来。吴亭等人在谈到巴枯宁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活动时,以坚决的态度表示:“……我们并且认为有责任预先告诉您,我们和巴枯宁先生以及他的一小撮追随者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我们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发表对他的公开评论……。”马克思很关心俄国、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俄国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而从60年代末叶开始,这种关心尤为殷切,他在1870年3月24日复信中写道:“我高兴地接受你们交给我的光荣职责,担任你们驻总委员会的代表。”^①

在这以前,即1868年9月,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尼·弗·丹尼尔逊(笔名尼古拉-昂)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已在彼得堡着手把《资本论》译成俄文。丹尼尔逊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俄国革命家格·亚·洛泊廷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于1872年在俄国出版。这是马克思这一不朽著作第一次译成外文出版。

“国际”俄国支部对于巴枯宁主义者篡夺支部领导和支部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企图给予坚决的反击,并且积极协助总委员会同巴枯宁主义者作斗争。俄国支部领导人在1870年7月就这一问题写信给马克思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俄国支部,击破这帮坏蛋的干预,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深信,国际工人协会在最近几年内一定能在俄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协会落到这些无知的野蛮人或者招搖撞騙的学者的脏手里,那么我们的伟大事业必将遭到不幸。这帮家伙会使协会在俄国的一切发展年复一年地停顿下来!”^②

俄国支部的成员都是忠忱的革命者,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讯集》,莫斯科1951年俄文版,第36、37、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讯集》,莫斯科1951年俄文版,第42—43页。

从《人民事业报》可以看出，他们还没有彻底摆脱民粹派观点。

1870年上半年的“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闭幕后，巴枯宁主义者继续反对总委员会的路线，特别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利用了暂时为他们所窃据的“国际”日内瓦支部机关报《平等报》。总委员会针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在1870年3月底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机密通报》中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活动。这份通报分发给“国际”的所有组织。1870年春天，巴枯宁主义者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该报重新成为总委员会的机关报。

1870年4月，“国际”瑞士拉丁语系地区总支部在肖德丰(瑞士)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拥有形式上的多数，他们通过了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加入瑞士拉丁语系地区总支部的决议，从而使总支部发生分裂。从此，在瑞士除了执行总委员会指示的日内瓦总支部委员会以外，又出现了一个自称为瑞士拉丁语系地区总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的面目出现的。它的正式机关报是《团结报》，在纽沙德尔出版，由巴枯宁主义者古约姆主编。

到1870年，“国际”在组织方面和思想方面都已取得重大的成就。国际工人协会在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威信的提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及其他小资产阶级集团在工人运动中的阵地逐渐丧失。但是彻底清除这些集团对工人阶级的有害影响还需要一些时间。在一些工人阶层中，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政府主义的暴动思想和口号仍在传播，这些东西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反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已成为国际舞台上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顺利解决将关系到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基础上的思想上的进一步团结。

第十章

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倾覆

普鲁士和法兰西两国统治阶级为普法战争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法国当权集团指望通过对普鲁士的战争来阻止德国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德国一旦统一将直接威胁着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此外，他们还指望夺取那法国资产阶级垂涎已久的莱茵河左岸地区。执政的波拿巴集团还想打一场胜仗来摆脱在60年代末威胁着帝国的深刻的内政危机。第二帝国的国际地位在60年代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波拿巴政府盘算，只要仗打胜了，帝国的国际地位就会增强。

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也是求战心切。他们希望打败法国，削弱法国，尤其是要夺取法国蕴藏着丰富铁矿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俾斯麦从1866年起就认为对法战争非打不可，并竭力寻求有利的交战借口：他要使法国（而不是普鲁士）成为先宣战的侵略一方。这样，俾斯麦就可以在德意志诸邦中掀起加速德国全国统一的全民运动，从而有助于建立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德意志帝国。

宣战 在西班牙虚悬王位的继承问题上，俾斯麦得到了正合心意的口实。由于俾斯麦的干预，西班牙政府提议由普鲁士霍亨索伦族的利奥波尔亲王登位。法国政府因此深表不满。在法国的

压力下，亲王的父亲被迫于1870年7月声明放弃由他的儿子继任西班牙王位。可是法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普鲁士国王以霍亨索伦王朝首脑身份对这一放弃行为正式表示赞同，此外，还要他保证利奥波尔亲王今后不再有类似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在7月13日从埃姆斯发往柏林转知普鲁士驻国外的外交代表和新闻界的急电中同意了第一个要求而拒绝了第二个要求。在急电未公布之前，俾斯麦故意改动电文，使之具有侮辱法国政府的语调和意思。

俾斯麦以篡改这个所谓埃姆斯急电达到了他的目的。拿破仑三世于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来满足有黷武思想的波拿巴集团。这样，法国就成了攻击的一方，而且当时法国没有同盟者。

“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 在宣战前夜，法普两国的统治阶级都在本国大肆鼓吹沙文主义。与他们相反，两国先进工人对于行将爆发的战争则表示愤怒的抗议。

“国际”巴黎支部在7月12日发表的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中宣布战争是“丧失理智的罪恶行为”。宣言说：“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豁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黷武号召！”巴黎工人向德国工人发出呼吁，并树立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榜样。巴黎工人说：“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他们号召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工人：“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继巴黎支部宣言之后，“国际”的法国其他支部也相继发表宣言。这些宣言表达了法国广大人民群众：工人、手工业者、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热望和平的心情。1870年7月在法国举行的几次反战示威游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德国先进工人赞成“国际”法国会员们的反战主张。7月16

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工人大会的抗议书中宣称：“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在开姆尼斯召开的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宣称：“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柏林、不来梅、慕尼黑和德国其他城市许许多多工人组织都表示了这种态度。

7月21日，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表决政府军事拨款案时弃权。

“国际”总委员会于1870年7月23日发表了告各国工人宣言。在马克思起草的这篇宣言中有充分根据地宣称：“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宣言深刻地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性质。马克思预言：第二帝国的很快崩溃并不以战争的结局为转移。总委员会宣言说：“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在这一宣言中，马克思说明了这次战争对德意志各邦来说是防御性质的，同时他也揭露了普鲁士的挑畔作用，使路易·波拿巴对德国开战。他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德国工人阶级不要容许使这场战争失去它的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宣言强调指出，如果那样，“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①

法国初战的失利 第二帝国政府一开战就打算让法军在普鲁士没有作好动员以前以快速进军侵入德境，使北德意志邦联跟南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5、6页。

德意志诸邦隔离开来，这样至少能使怀有强烈反普鲁士情绪的南德诸邦保持中立。法国政府以为自己在战争之初拥有军事优势，如果对普鲁士取得初战的胜利，就能使奥地利（可能还有意大利）成为自己的同盟者，进而就能使敌人遭到致命的失败。

作战双方还未交锋，法国统帅部的作战计划就破了产。7月28日，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拿破仑三世到达麦茨（洛林）。按作战计划法军在第二天就应当越过国境。拿破仑三世在麦茨的时候，那里只有10万军队，另外还有近4万军队部署在斯特拉斯堡一带。法军的装备、弹药和粮秣均无保证。军队动员工作秩序很糟。应征入伍的士兵为了取得必要的装备，不得不长途跋涉，有时要走几百公里。铁路线上的混乱现象使局势弄得极端复杂。有利的进攻时机就这样错过了。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军队停留在国境线上毫无作为。

法国统帅部展开作战行动迟缓，使普鲁士可以顺顺当地地完成北德意志军队和南德意志军队的动员工作，并把军队集中到莱茵河左岸地区。8月4日，普军转入进攻，迫使法军一开始作战就陷于挨打的位置。

这种情况使法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按数量说，法军比普军少得很多。法军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和军事知识，参谋本部的组织机构，士兵的战斗训练和战术教育也都远不如普军。普鲁士统帅部有毛奇元帅起草的精密的作战计划。德国炮兵配备有从后膛装弹的大炮；这种武器的射程和射速都远远超过法国的火炮。法军在其他各种武器方面，特别是在轻武器方面（拥有沙斯波式枪）占有优势，但是因为士兵不善于使用新武器，这种优势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法国对战争没有充分的准备，在头几场猛烈的会战中就暴露无遗。法军在1870年8月4日的维散堡（阿尔萨斯）会战中，在8

月6日的韦尔特和福尔巴克(洛林)的会战中,遭到了惨败。

宣战以后,由于狂热的军国主义宣传(拉萨尔派在其中起很大作用)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德国工人群众也和其他阶层居民一样,一肚子沙文主义情绪。只有拥护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先进工人仍然忠于“国际”的原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揭露了“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扮演的仆从角色,并且向工人说明:战争只对统治阶级有利。

法国吃了头几次败仗后,德军就占领了阿尔萨斯全境和洛林的一部分,巴黎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这时法国很大一部分工人也被沙文主义宣传所迷惑。德国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革命领袖,他们竭尽全力向无产阶级进行宣传工作,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可是法国无产阶级就不同了,他们在当时失去了革命的领导。马克思在1870年8月2日,给德国革命家、第一国际会员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法国支部遭到了破坏,久经考验的人有的逃走了,有的被关进监狱。”^①

奥古斯特·布朗基正亡命在比利时。当时在那里过流亡生活的还有巴黎工人的天才组织者欧仁·瓦兰,他是巴黎工会联合会和“国际”总支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法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欧仁·杜邦正在英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特别是波拿巴政府在1870年6—7月对“国际”进行第三次审判之后,法国工人阶级还失去了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社会主义者的队伍,还由于政府的征兵,人数减少了。

1870年8月7—9日和14日的巴黎事变 1870年8月7—9日,即法军吃了头几次败仗以后,巴黎连续发生了自发性的群众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工人,他们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国,

^① 马克思:《给约翰·菲里浦·贝克尔的信。1870年8月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俄文第1版,第65页。

并把所有能拿枪作战的公民都武装起来。他们认为只有建立共和制度才能克敌致胜。工人们准备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共和派，即立法团中的左派议员，因为工人们还天真地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有决心而且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推翻帝国的斗争并且会胜利地保卫住法国。

然而，资产阶级共和派却同主张君主立宪的奥尔良派狼狈为奸，他们宁愿牺牲法国的民族利益，也不让人民革命力量在法国建立共和制度。在八月示威的日子里和以后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对于推翻那个使法国经济破产和民族受辱的拿破仑主义制度的行动，总是百般阻挠。1870年8月7—9日的巴黎事变，以及随着在各大工业城市（里昂、马赛、土鲁斯等）发生的共和派起义，都没有能够促成共和国的建立，只是把艾米尔·奥利维耶自由派内阁换成了以帕里考伯爵为首、由狂热的波拿巴分子组成的政府。新政府用残酷的恐怖手段摧毁一切推翻帝国的革命起义试图。1870年8月14日，布朗基主义者在巴黎发动起义，准备促成建立共和国，结果也遭到惨重的失败。布朗基曾于8月11日夜間，从布鲁塞尔赶来参加起义。起义的失败表明布朗基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很差，他们在当时还远不能正确理解革命的任务，也不懂得如何领导革命。

此外，由于左派议员的帮助，帕里考政府还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一种虚幻的印象，以为政府的军事措施是会奏效的，同时政府还一贯对人民群众隐瞒法国在军事上的真实情况。

法军在色当的溃败 法军莱茵军团的部队在8月6日战败后向着凡尔登和马恩河沙龙撤退，因为在沙龙，有一个新的法国军团正在编组之中。8月14日，普鲁士军在博尔尼镇附近迫使莱茵军团作战。这场战斗双方未分胜负，但却使法军渡摩塞尔河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昼夜，这给法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样，普鲁士

统帅部便有可能把法军拖入了两场新的大血战，那就是8月16日的马尔斯—拉—图尔——勒桑维尔的战役和8月18日的格腊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在这两个战役中，尽管法国士兵骁勇异常，但是莱茵军团仍遭败北。失败的罪魁是几天前（8月12日）继拿破仑三世担任法军总司令的巴曾元帅。巴曾使军队处在既失去必要的指挥又无援兵的境地。因为他的严重失职，使他统率的军团同巴黎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并在麦茨被德方第一和第二军团的7个军、一个后备师和三个骑兵师总共15万人包围起来。

在沙龙编成的法国军团，共12万人，在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下，于8月23日开往麦茨去救援巴曾军团。然而，麦克马洪军团对完成这一复杂的任务并无准备；加之麦克马洪本人又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为了取得粮秣，被迫绕道而行，因之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普军便得到进攻其右侧的机会。8月27日夜，麦克马洪担心被困于默兹河（麦士河）和比利时国境之间的狭窄走廊地带，开始西撤，即向梅济埃尔退却。8月28日，抵达梅济埃尔，但当天又重新回师东进，即向麦茨进发。麦克马洪之所以欲退又进，是因为帕里考下令要他同巴曾会合，防止巴黎发生革命。

普军的大部分部队以比麦克马洪快得多的速度向东北挺进，占领了默兹河渡口。8月30日，他们在博莽附近向麦克马洪军团发起攻击。法军被击败，退到色当郊外。

9月1日拂晓，色当会战开始了。尽管法军顽强抵抗，但是德军拥有最优良的大炮，又占有非常有利的阵地，使法军遭到致命的失败。被包围而陷于混乱的法军集中到要塞中。

当天下午三时许，法军还没有耗尽一切抵抗能力，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就下令投降，色当要塞中央碉楼上竖起白旗。法皇给普鲁士国王写了一封极可耻的信，内容如下：“我亲爱的兄弟，因为我未能死在我的军中，所以我只得把自己的佩剑献给陛下。我继续

做陛下的好兄弟。拿破仑。”

9月2日法军签署了投降书。拿破仑三世以下法军将帅以至士兵10万多名被俘，死伤17,000人，在比利时境内被解除武装的3,000人，缴枪投降的500多人，这就是第二帝国在色当一役溃败的结局。马克思评论色当溃败时写道：“1870年法国的灾祸在近代世界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①

第二帝国的倾覆。共和国的成立 9月2日，德国第三和第四军团由色当向巴黎推进。第二帝国政府企图把法军投降事件隐瞒起来，不让全国人民知道。包括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内的反对派议员们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大帮其忙。左派议员害怕革命，竭力用欺骗人民大众的方法以赢得时间，准备由立法团议员来组织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

然而，巴黎的工人比资产阶级政客先走了一步。9月4日，他们从一清早就离开工场，冲往立法团。正当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为临时联合政府人选问题讨价还价的时候，工人们涌进波旁宫，要求立刻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他们的行动是没有领导的。布朗基主义者积极参加这一天的革命事件，但因为人数很少，同工人群众联系不够，又不善于组织和带领群众，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工人们要建立共和国并争取由革命者组成新的共和国政府的尝试没有成功。

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共和派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把挤满波旁宫的群众带到市政厅。但是在市政厅，他们就强迫工人接受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大部分是右翼）和奥尔良分子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自称“国防政府”。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0页。

奥尔良分子在共和国政府中占据了最有权势的位置。特罗修将军任新政府首脑，保持有巴黎军事总督的职权。奥尔良分子担任了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巴黎警察厅长。奥尔良分子梯也尔尽管表面上不参加政府，不是政府的成员，可是实际上他却在政府中起很大作用。

资产阶级共和派担任了外交部长（法夫尔）、内政部长（甘必大）、财政部长（皮卡尔）、教育部长（西蒙）、司法部长（克莱米约）。

由此可见，共和国是巴黎工人冲破资产阶级议员的阻挠争得的，可是在人民斗争取得胜利后，这些资产阶级议员就攫取了政权。在一些外省中心城市（里昂、马赛、土鲁斯等等），资产阶级的阻力较巴黎为弱，都建立了革命政权机关——公社。外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公社，在他们存在的短暂时期内，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它们改组了警察机关和官僚机构；撤消了对参加政治斗争、参加罢工、参加社团和参加集会的人的通缉；释放了政治犯；并且颁布了下述法令：削去市政预算中的宗教支出，把公社房产拨给世俗学校使用，价值在 20 法郎以下押给当铺的抵押品一概无偿发还原主，取消城市入境货物“进口税”（octroi），开征不动产税和 1,000 法郎以上的动产税，以及其他法令。

但是这些革命的公社不久就遭到共和国政府的残酷镇压。

“国际”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 9月4日革命后，战争对德国来说，已失去了防御性质。但是普鲁士政府拒绝同已成立了共和国的法国人民签订光荣的和约。

德国先进工人在 9 月 4 日以后加紧反对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侵略计划，要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同它签订不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和约。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不伦瑞克委员会）在 1870 年 9 月 5 日发表宣言，表达了德国无产阶级这种意愿。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因此被控以叛国罪受到法庭迫害。中央委员

会的委员们于9月9日被捕，带上镣铐解往要塞。

1870年9月9日，“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宣言揭露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侵略计划，并指出普鲁士的胜利对工人阶级事业、首先是对德国工人的危险性。总委员会号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侵占阿尔萨斯和洛林，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同时它提出警告说：要是德国走上了“强夺法国领土”的道路，势必导致全欧洲性的战争。

总委员会欢迎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也指出，从这个共和国执政者最初几个实际步骤就可以看出，他们要加速奥尔良王朝的复辟，这正是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们所求之不得的。

但是，总委员会也警告法国工人，不要急于反对刚刚执政的政府。宣言说道：“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的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总委员会也竭力设法使法国无产阶级不走另一极端，即不要幻想在新的历史情况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有可能重新发生类似1792年（当时工人还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划分开来，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全民性运动。总委员会号召法国工人，“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为此，它建议工人们，在执行自己保卫法国的公民职责的同时，要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①。

“国际”总委员会这些指导性的指示对法国工人阶级进一步取得斗争胜利有着重大意义，可是当时法国广大人民群众并不知道这些指示。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拒绝发表总委员会的宣言，唯一刊登这个宣言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删去了宣言中所有讲到“国防政府”的词句。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2—293页。

九月共和国政府一开始执政，就对苛刻地要求法国割地赔款的普鲁士采取投降政策。政府所以采取这种投降政策是因为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保卫祖国。

1870年9月6日，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在给法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的通令中宣布：政府决心要“彻底履行自己的职责”，决不对侵略者“让出一寸领土，让出法国堡垒上的一块石头”。共和国政府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声明掩饰下，实际上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尽快地同普鲁士媾和。在先后由美国和英国驻巴黎大使出面调停的试图失败以后，政府便于9月12日派梯也尔去伦敦、彼得堡和维也纳，要他央求这几个欧洲国家政府促成媾和，并答应把法兰西共和国重新变为君主国。

在德军快要包围巴黎的日子里，法国政府只作了一些表面化的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而实际上它却阻挠武装劳动居民。1870年9月由各阶层居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并不是用来同普鲁士军队作战的。国民自卫军的训练也只是摆摆样子。波拿巴分子和奥尔良分子担任了国民自卫军的指挥职务。发给工人的是陈旧不堪的武器和不能使用的弹药。尽管秋天已经来到，工人队伍还没有穿上必需的军装，没有野营帐篷。在被包围之前，巴黎武器不足，也没有设法补充。

资产阶级政府让波拿巴派的警察和官吏(省长、市长、检察官、法官等)留在原来位置上。即使有所更动，多半也是以奥尔良分子来接替他们。在反动的警察和官僚机关的庇护下，奥尔良分子和波拿巴分子趁即将举行国民会议选举的机会，在巴黎和外省(特别是乡村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宣传，当时法国的新贵们力求尽快地把政权交给国民会议。普鲁士占领的局势，政府对保皇党人进行反共和宣传的纵容态度，以及故意仓卒地举办大选，都预决了即将产生的国民会议将是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议会。

政府原定在 10 月 16 日举行国民议会议员选举，但后来竟提前为 10 月 2 日。茹尔·法夫尔在 9 月 17 日发给法国驻外外交代表的通令中说提前大选的原因是普鲁士国王拒绝同“非法”的现存共和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法夫尔宣称：“我们承认提出这种异议是正当的。”

政府的政策同维护法国的对外安全和民主复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国防政府”从一开始就表明它实际上是一个“卖国政府”。

法国工人及其领导人囿于 1792—1794 年的传统，起初，他们还相信政府会从民族利益出发行事。他们没有利用共和国提供的自由来加强本阶级的组织，只进行抗敌御侮的斗争。他们严重的错误就在于此。法国无产阶级只是在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的过程中才渐渐摆脱这种错觉。

巴黎被围 1870 年 9 月 16 日，德军逼近巴黎。9 月 19 日，法军在沙提利昂附近战败后，德军就把巴黎包围起来。

巴黎的被围决不是无可挽救的局势。当时市内约有 10 万正规军和 20 万国民自卫军，后者只要发给武器并加以训练就能够成为抗敌劲旅。10 月 7 日，甘必大从被围的巴黎乘坐汽球飞到都尔，在他的领导下，外省也编成了新的军团。为了回击德国占领军的暴行，法国掀起了游击运动。敌人的大批兵力被拖住在麦茨，因此，围攻巴黎的普军在数量上少于法军了。

然而政府并不打算组织有效的军事抵抗。它宁愿扔掉巴黎，也不肯让工人居民武装起来。132 天的围攻清楚地告诉巴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维护其利益的政府满口高喊爱国，究竟值得几文钱。

政府军事策略的着眼点是：尽力挫折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强迫人民群众投降。政府首脑特罗修把保卫巴黎的企图叫做“纯粹的蠢举”——他在 9 月 4 日在政府第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说

的——，因而决定不时让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巴黎居民“流血”，以摧毁他们对胜利的希望。他那个竭力用以麻痹群众为目的的名叫“特罗修计划”的保卫巴黎计划，实际上内容只限于消极的抵抗，偶尔发动一下准备很精、徒劳无益、非败不可的出击。

普鲁士统帅部决定用饥饿迫使巴黎投降，法国政府的粮食政策正合普鲁士统帅部的心意。在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由巴黎20个区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各区警备委员会和布朗基主义者报刊曾经代表人民要求政府征发存粮和实行食品配给制，均遭拒绝。政府对于粮食和燃料的投机活动置若罔闻，以致这种投机活动日益猖狂。直到很晚很晚，政府才实行面包和肉类配给制度。可是工人居住区的供应要比资产阶级居住区差得很多。巴黎劳动人民为了能得到一点点面包代用品，要站队等待许多小时，他们饿着肚子，而还要忍受1870年隆冬严寒的煎熬，可是资产阶级尽管在围城之中，无论是粮食还是别的东西，样样不缺。

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渐渐明白“国防政府”政策的实质。政府的所作所为在人民的集会上和政治俱乐部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在共和国成立后头几个星期，人民曾多次派和平的代表团到市政厅去向政府陈诉自己的愿望、意见和要求，可是后来到1870年10月，人民就举行反政府斗争了。人民示威游行的战斗口号是建立巴黎公社。起初要建立的公社，还只是一个和现政府同时并存的人民政权机关，但从1870年10月末起，就打算成立起革命政府作用的公社，以取代资产阶级政权。

1870年10月31日的起义 1870年10月27日，巴曾元帅带领他的军团在麦茨要塞投敌，这样一来德军就能够把包围麦茨的军队调出来进攻巴黎。10月30日，巴黎国民自卫军被迫放弃了以前经过两天突击才从德军手中夺回来的布尔日村。布尔日村的失守，又是由于特罗修不及时派遣援兵，采取罪恶的袖手旁观态度

造成的。阵亡和被俘的法军达两千人。

正当九月共和国的将帅们在战场上叛国投敌的时候，梯也尔街政府之命，前往设在凡尔赛的普鲁士国王威廉的大本营同俾斯麦商谈停战条件。这是投降的“国防政府”第二次向普鲁士政府乞和。在此之前，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曾在9月19—20日呆在俾斯麦行营（在菲雷尔）两天，只是没有同这位普鲁士宰相达成协议。梯也尔的乞和谈判是10月28日开始的，进展比较顺利，10月30日，政府就向巴黎居民宣布谈判消息，政府把准备停战的消息叫做“福音”。

巴黎工人于1870年10月31日发动起义来反对麦茨的卖国投降、布尔日事变和停战谈判。他们夺下了市政厅，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建立了革命政权机关——民众救亡委员会。在这一事件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巴黎20个区的中央委员会。

但是，起义者未能巩固既得的胜利。积极参加起义的布朗基主义者同名叫新雅各宾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在理解起义的当前任务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参加民众救亡委员会的德勒克吕兹和皮亚两个新雅各宾主义者不赞成推翻政府，只要求选举和政府并存的公社，如同1792—1794年的巴黎公社那样。参加起义的布朗基和他的拥护者认为必须推翻政府并建立人民革命专政，但是，他们孤掌难鸣，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国际”巴黎总支部退出了起义，这一行动暴露了总支部很大一部分成员的蒲鲁东主义观点和他们对政治斗争的否定态度。“国际”的某些会员（瓦尔兰、勒弗朗赛等人）虽然参加起义，但表现得不够积极。

10月31日的起义遭到了失败。在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主义者争论不休之际，未被逮捕的政府委员在效忠政府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些营协助下，释放了被捕的部长。11月1日早晨4时

许，他们夺回了市政厅。

10月31日事件表明：巴黎工人的组织性还很差，他们还轻信资产阶级。

政府重握政权后，就拒不履行10月31日许下的宣布辞职和在11月1日举行公社选举的诺言，仅规定在11月6日选举市长，并且在11月3日就匆忙地举行对政府信任问题的全民投票。政府采用了各种欺骗手段获得了多数票，然后就大规模逮捕10月31日起义的参加者。为了免被监禁，布朗基和其他一些参加起义的人逃跑了。

1871年1月22日的起义 巴黎被围时间长达4个多月之久。10月31日起义以后的三个月是巴黎人灾难深重的日子。被围首都的劳动大众苦不堪言，他们忍饥受冻，还遇上瘟疫流行。死亡率急剧上升。由于许多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有增无已。国民自卫军的菲薄薪饷（每日30苏）成了许多人唯一的生活来源。

许多小商人因为市场需求一落千丈，加上告贷无门，因而倾家荡产。由于粮食状况越加恶化，面包配给量日益减少；1871年1月，每人每天只得300公分。食物昂贵到极点，马肉成了工人买不起的奢侈品；猫肉和狗肉也都以高价出售。除了上述种种灾难之外，还因为普军炮轰城市，许多居民流离失所。

但是，巴黎劳动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城市顽强地忍受着围城带来的灾难，他们坚持要继续为争得光荣的和平而斗争。他们对于祸国殃民的政府越来越加不满。这种情绪在布朗基派的报刊上，在人民集会和俱乐部的演说中都表露出来。推翻政府，选举拥有管理巴黎和保卫巴黎权力的公社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月5日，巴黎街头出现了一种被叫做《红色公告》的通告。署名的是1870年底设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通告写道：“政府没有征集全国民兵，它同波拿巴分子一样，把共和派关进监

狱。政府拖拉迟缓，优柔寡断，怠惰消极使我们濒于绝境。”法国的统治者“既不会管理国家，也不会抵御外侮，……老百姓冻死饿死；妇女在受磨难；儿童羸弱不堪，夭折而死。作战指挥越来越糟；徒劳无功的出击，一无所获的血战，接二连三的失败，使战士们，甚至是最无畏的战士们，也丧失了勇气。”通告接着要求建立公社，认为这是救亡图存唯一途径。

1月19日，政府伙同军事统帅部又作出一桩卖国行为。政府在布曾瓦尔（巴黎市郊）附近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击，这次出击持续到1月20日。这次准备不充分的战役只是使几千名人民战士在同装备优良的敌人英勇作战中白白牺牲。政府故意把国民自卫军配置在形势最险恶的地方，打算用这种手段使他们退出战斗行列，从而挫折巴黎人民的斗志，迫使他们放弃抵抗。

愤怒的巴黎工人在1871年1月22日再度发动起义。然而，发起并非常积极地参加这次起义的布朗基主义者，却无力为起义作好应有的准备工作，并保证起义的胜利。“国际”的巴黎组织的领导人仍然没有参加起义。因此，1871年1月22日的起义又失败了。

巴黎投降 1月22日人民起义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对革命者的大逮捕，俱乐部和民主报刊的被查封，人民集会的遭到禁止，这一切都使政府能够方便地实现它的卖国行动——把巴黎拱手让给敌人。1871年1月28日，巴黎投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的投降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而这些阴谋勾当则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①

特罗修—法夫尔政府全盘地接受了战胜者提出来的使法国丧权辱国的要求。巴黎投降的条件如下：限在两星期内支付赔款2

^① 参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3页。

亿法郎；交出巴黎大部分要塞，交出巴黎卫戍部队的野炮以及其他抵抗设备。法国还接受了普鲁士的提议，在十天内举行国民会议选举，从而促使保皇党人有获得政权的可能。

普鲁士侵略者和他们的法国同谋者，只是未能实现一件事：解除巴黎的保卫者——国民自卫军和国民自卫军各个工人营的武装。巴黎工人当时甚至拥有筹款自备的大炮。

按照巴黎投降条件而于1871年2月8日选出了国民会议，保皇党分子在其中占居多数席位。630名议员中奥尔良派约占200名，正统派约200名，波拿巴派30名，资产阶级共和派200名。“……那里麇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①这是马克思对这个资产阶级一地主议会的评价。

保皇党分子之所以能在国民会议中取得优势，是因为法国反革命势力——地主、大资产者和天主教僧侣狡猾地利用了农民渴望和平的情绪。他们一方面诬蔑歪曲城市无产阶级要求继续作战的动机，同时向农民保证：和平会使他们摆脱一切灾祸。

国民会议主张保留共和国，打算用共和国的名义同德国人签订辱国的和约，并且用共和国的名义把赔款的重担压在人民大众的肩上。国民会议认为共和国的存在是暂时的。

1871年2月17日，梯也尔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已开始的和谈很快就完成了，于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初步和约，并于3月1日由国民会议批准。（正式和约是5月10日在美国河法兰克福签字的。）根据这个俾斯麦强迫签订的苛刻的和约，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东洛林，并要支付50亿金法郎的巨额赔款。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9页。

军事的溃败和强加于法国人民的苛刻的和约是法国统治阶级破产和叛变的直接后果。巴黎无产阶级针对这种卖国行为号召拿起武器。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公社,开始了英勇的斗争。

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

1871年，世界史打开一个新时期。这一年发生许多重大的事件。这一年所以成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首先是因为当年的3月18日，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尽管时间很短，国家政权转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先进、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手中。1871年巴黎工人所建立的公社只存在了72天。可是，它对于工人阶级进一步的解放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帝国崩溃后法国的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大工业的增长，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法国工人阶级对政治的反动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远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巴黎的起义工人就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他们用“社会共和国”来同“资本和特权的共和国”相对抗。1865年初，法国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最初一些支部；这些支部以自己的活动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的提高，促进了无产阶级离开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各流派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摧毁了普鲁东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和其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分子们的阵地。“国际”的大会关于罢工、工会、政治斗争的决议，打击了那些企图引诱工人阶级抛开他们的迫切任务的人们。到60年代末，在最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有了重大发展。在法国，集体派社会主义者（socialistes-collectivistes）承认政治斗争对于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的必要性，他们代替右派普鲁东分子领导“国际”的支部。

工人阶级成了当时在全国展开的广阔的共和运动的主导力量。工人阶级也是 1870 年 9 月 4 日革命的主要动力，这次革命使法国恢复了共和政体。色当惨败（9 月 2 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暴露出法国完全没有军事准备，腐朽透顶的波拿巴制度的破产。

普法战争使法国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了。在一方面，战争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背叛民族的行为，他们暗中破坏被德国军队包围的巴黎的防守工作。在另一方面，它向首都的工人提供了武器，训练他们投入新的战斗，反对 1871 年 2 月 8 日所选出的国民议会建立的“卖国”政府。

法国统治集团表示同意的预备和约的苛刻条件，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不满。人们对共和制度的命运的担心增大了。国民议会的大部分代表是保皇派；军队、警察、国家机器仍然留在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最凶恶敌人的手里。疯狂的反动分子梯也尔担任政府首脑，他的全部政治历史都表明他极端仇恨人民群众和民主自由。

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了对抗聚集在梯也尔政府周围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在 1871 年 2—3 月间建立了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共和联盟，参加联盟的有在各工人区和其他民主区组成的 215 个大队。由一些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中也有第一国际成员）领导的这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变成了从下层产生的新的人民政权的萌芽。中央委员会竭力避免国内战争，坚持防卫策略，但是，事件的发展显然导致了武装冲突。

和约的苛刻条件和德军的占领巴黎（虽然时期很短——他们

在3月1日进入巴黎，停留了3天），深深地刺激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感情。关于废除缓期交纳围城时期所欠房租的法令和关于废除缓期支付同一时期所开期票的法令，严重地损害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切身物质利益。为了满足大银行家、企业主和房主的要求而通过的这两个法令引起了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很大不满，加强了他们对统治集团及其后台老板——金融资本家和“投降将军”的憎恨。

梯也尔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威信越来越降低了。同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影响更加增强了。在首都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中，革命的局势形成了。

统治集团见到政权有落入武装的无产阶级手中的危险，他们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就决定解除巴黎劳动人民的武装，破坏他们的革命组织。

3月18日起义。公社宣告成立 1871年3月17日夜里，政府派兵到蒙马特尔、别利维尔和巴黎其他的工人区去，准备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取由工人集资购买的大炮。依照统治集团的计划，解除巴黎无产阶级所住的郊区的武装一定要从夺炮开始，他们认为这些郊区是恢复君主制度和把战争费用放到人民群众肩上的主要障碍。军队在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和其他一些地区之后，夺取了大炮，并且已经开始把它们运往城市中心。受到政府军队突然袭击的国民自卫军拿起武器，在人民（其中也有妇女）的支持之下，回击了运走所夺取的大炮的企图。士兵们拒绝向人民开枪，并且逮捕了两名将军（勒贡特和托马），随后把他们枪毙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转守为攻，派工人住宅区的大队到城市中心去。这些大队占领了警察总署、许多个部、火车站、兵营和一些区公署的建筑物，入夜时分，又占领了市政厅，在市政厅上面升起了红旗。法国首都掌握在起义工人的手里了。

梯也尔政府逃往法国的旧王宫——凡尔赛(距巴黎 17—19 公里)。军队也撤退到那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变成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和靠拢他们的巴黎小资产阶级的激进部分的临时政府。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充满了天下太平的幻觉。委员会没有考虑到政府可能对革命的巴黎进行武装斗争，允许梯也尔从首都撤走了自己的军队。革命的巴黎的一部分领导者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但是，委员会没有这样做，没有在反革命武装力量极为软弱的时机（在这些日子里，梯也尔政府只拥有 27,000—30,000 名士兵，而且士气十分不振）歼灭他们。这个错误使梯也尔政府从惊慌中恢复过来，赶快加强军队。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还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它对于在巴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并同凡尔赛保持密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没有采取紧急措施。中央委员会一心一意地筹备巴黎公社的选举。它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是尽速把自己的权力交给由巴黎全体人民选出的机关，以免有人可能非难它非法篡夺政权。

3 月 26 日举行巴黎公社的选举。选举是在普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民的积极性很大。有 86 个人当选。3 月 28 日，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庄严地宣告公社成立，巴黎居民和 10 万名国民自卫军齐集在广场上，热烈祝贺自己所选出的人们。

在这时候，凡尔赛分子急忙使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战斗准备。梯也尔政府不惜向法国的敌人——德意志帝国政府求援。梯也尔的代表请求允许把凡尔赛军的人数增加到 8 万名，并且为了这个目的，释放被俘的法国士兵和军官。德国政府很高兴地实现了梯也尔的请求。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5 天之后，凡尔赛分子开始了军事行动，进攻公社社员们的前沿阵地。国内战争被强加到巴黎的无产阶级身上。从这时起，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合力量进行顽强的武装斗争。

革命的巴黎没有得到外省城市的重大援助，这也是对巴黎公社极为不利的一个情况。在3月19至27日的时期，马赛、里昂、土鲁斯、圣太田、那尔波、里摩日、勒克勒佐等一系列巨大的工业城市都发生了起义，宣告成立革命的公社。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拉法格在波尔多积极参加了领导革命运动的工作。4月30日，在里昂举行市政选举的时候，又爆发了起义。但是，外省公社的寿命都很短——分别存在3—4天。只有在马赛，公社存在了10天。由于外省的各个革命运动策源地之间缺乏巩固的联系，由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的严重错误，凡尔赛政府便易于击溃这些起义了。

阿尔及尔市的本地工人和民主主义者高举义旗，也企图宣告成立公社，但是失败了。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居民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的、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起义。直到1872年初，梯也尔政府才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

公社的组成。它的活动家 巴黎公社的组成体现了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进步部分的战斗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无产阶级的代表者起主导的作用。在公社中，小商人，手工业者，职员，科学、文学、艺术的先进活动家们，同工人们坐在一起开会。巴黎公社最著名的委员有工人，“国际”会员——瓦尔兰、弗兰克尔、赛拉叶、杜瓦尔、阿夫里阿尔、泰斯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有医师和工程师瓦扬、画家库尔贝、科学家弗路朗斯、教育家勒弗朗赛；有政论家维尔莫烈尔、德勒克吕兹、特里东和巴斯喀尔·格鲁赛；有作家茹尔·瓦莱斯、革命诗人让·巴·葛莱蒙和欧仁·鲍狄埃（后来，他写作了《国际歌》的歌词）；有大学生劳尔·里果，银行职员费烈和茹尔德。

路易·欧仁·瓦尔兰是“国际”法国支部的最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巴黎工人中间享有盛名，很受工人的爱戴。瓦尔

兰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加了3月18日的起义，在公社时期，任军事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匈牙利工人列奥·弗兰克尔（“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是匈牙利社会党的奠基人之一）领导劳动和交易委员会。弗兰克尔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专心致志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他积极参加实施公社的一系列保护工人和职员劳动的法令。他在公社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只接受了一个委托——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天才的科学家、热情的革命家、反对波拿巴制度的积极战士古斯塔夫·弗路朗斯，也是公社的杰出活动家。马克思认识弗路朗斯，给予他很高的评价。4月3日，弗路朗斯被凡尔赛分子俘去并凶恶地杀死。

铸工、“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委员艾米尔·杜瓦尔，在领导3月18日起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公社刚刚成立，他就死掉了。在最初战斗的日子里，他曾领导公社社员的一个中队，被凡尔赛分子俘去枪杀了。

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外，在公社的领导人中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在他们之中，62岁的沙尔·德勒克吕兹以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显得突出，他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曾经多次被捕和被流放。虽然身患重病，德勒克吕兹始终坚守公社委员的岗位，一度是公社的军事领导人。

巴黎公社的成员曾经不止一次地改换。公社的一些委员是由几个区同时选举的，还有一些委员是缺席选举的（如布朗基）。有许多代表根据政治的理由，拒绝参加公社。有些人在选举以后的最初的日子里就这样做，另外一些人在此后的日子这样做。在辞职的人们当中，不但有由富人住宅区居民选出的极端反动分子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有被新政权的革命—社会主义性质和工

人在新政权中的优越地位吓倒的资产阶级急进分子。结果，公社就出现了 31 个空缺。4 月 16 日，在同凡尔赛的武装斗争方酣的时候，公社举行了补选，结果，增添了 17 名新的委员，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列宁强调指出：“只有工人自始至终是忠于公社的。……只有法国无产者才无所畏惧地、不知疲倦地支持了自己的政府，只有他们才为了这个政府，也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美好未来而战斗、牺牲。”^①

波兰、俄国、意大利、匈牙利、比利时的革命家们，同巴黎的无产者一道，为了公社的不朽事业而英勇地奋战。伊丽莎白·德米特利叶娃（图曼诺夫斯卡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她亲身认识马克思，同“国际”总委员会保持联系。除了她而外，还有一位俄国女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公社社员的斗争，这就是“国际”俄国支部的会员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法国社会主义者、公社社员若克拉尔的妻子），她当选为巴黎第十七区警备委员会委员。当时旅居巴黎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彼得·拉甫罗夫也是公社的拥护者。

曾经参加过 1863 年起义的波兰革命家雅罗斯拉夫·顿布罗夫斯基和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表现出自己是公社的忠心耿耿的和富有天才的军事长官。顿布罗夫斯基指挥公社的三个军之一，他是对凡尔赛采取积极进攻行动的拥护者。指挥公社的另一个军的符卢勃列夫斯基，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同公社社员一起进行战斗的波兰人中，奥科洛维奇弟兄以及果敢的姑娘、在最后的巷战中牺牲的安娜·普斯托沃依托娃，都以自己的英勇显得突出。住在巴黎和参加公社的比利时革命家们，组成了志愿的

^① 列宁：《纪念公社》，载《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22 页。

“比利时军团”。

公社中政治派别的斗争 公社的活动是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中进行的。到4月末，在公社内部彻底地形成了两个大集团——“多数派”和“少数派”。所谓“新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和其他一些集团的代表人物形成“多数派”。“少数派”是由普鲁东主义者和接近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派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布朗基主义者特里东参加了“少数派”。公社中约有40名国际的会员；他们部分属于“多数派”，部分属于“少数派”。在两大集团之间，首先由于他们对1871年革命的任务和公社政府所应采取的策略有不同的理解而发生冲突。“多数派”没有看到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与1871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不同，错误地认为后者只是前者的继续。因此，“多数派”的许多成员对于社会改造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可是，这一派的拥护者更清楚地理解了建立集中的政权和坚决镇压革命的敌人的必要性。“少数派”对于社会—经济改造给予很大的注意，虽然在实现这些改造时，往往表现出决心不够。“少数派”的拥护者反对对与公社为敌的分子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谴责对资产阶级报纸的查封，等等。两派对于公社这一政权机关的性质各有不同的理解：“少数派”认为公社仅仅是巴黎一地的政权机关，“多数派”认为公社是全法国的政府。两派都犯了错误。当时，法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彻底革命的政党，这种情况对于1871年革命的发展和结局发生了有害的影响。

在公社的最初几次会议上，就暴露出了公社成员之间的原则上的和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后来，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在4月28日、30日和5月1日的会议上，在讨论关于成立赋与广泛权力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时候，斗争表现得特别激烈。坚决反对这一法令的“少数派”宣布说，这样政权机关的形成将是对3月18日革命的民主原则的破坏。5月16日，反对派的代表们发表宣言，在

宣言中，他们对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政策提出抗议，并且宣布说，他们不再参加公社的会议。作为回答，有些报纸开始要求逮捕“少数派”的成员和交由法院定罪，称他们为“叛徒”和“逃兵”。公社的检察长、布朗基主义者里果已经准备好逮捕反对派代表的拘票。但是，5月17日，“少数派”的许多成员出席了公社的例会，冲突缓和下来了。“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在防止公社的分裂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号召公社的成员们“竭尽一切力量维护对于战胜凡尔赛政府非常必要的公社的团结”。由于对侵入巴黎的凡尔赛反革命军队共同进行斗争，公社中的两个集团的代表们又接近起来了。

公社时期的群众性革命组织 公社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其中包括在学校、区公署、教堂的房舍中开会的政治俱乐部。第三区的“公社俱乐部”是1871年巴黎的最大的革命俱乐部，甚至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这个俱乐部开会时，有几千人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口号是：“胜利或者死亡！”各俱乐部讨论了公社的防御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批判了公社的个别缺点和错误，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

除了俱乐部而外，“国际”支部（它们的数目约有30个）起了积极的作用。公社在实行自己的许多法令和决议时，依靠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的工人组织。远在1870年9月就在巴黎20个区分别成立的警备委员会以及由国民自卫军各大队所选代表组成的军团委员会，大力地参加了社会—政治生活。

在公社时期存在的妇女社会组织中，最大的是“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这个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以女工—社会主义者娜塔利·雷美尔和另外一些工人运动积极女活动家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为核心。伊丽莎白·德米特利叶娃也是这个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公社——新型的国家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原封不动地

保存旧的警察—官僚国家机构。公社没有走那些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开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权组织来代替它。

公社的第一号法令（3月29日）取消了以招募新兵为基础的常备军。由武装工人和其他民主阶层的代表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它。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为压迫劳动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的警察，被国民自卫军的后备大队代替了。对于一切公务人员，包括公社的委员在内，都采取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和根据人民的要求加以撤换的原则（4月2日的法令）。公社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的规定，高级官吏薪俸的数额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4月2日的法令）。公社指望用这种方法达到消灭特权的官僚阶级。低酬职员的薪俸额被提高了。正如列宁所指出：“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①

公社在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官僚机构之后，又拒绝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公社同时是立法和行政机关。在公社会议上通过的法令，后来由公社建立的9个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内政和公安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劳动和交易委员会、公用事业（邮政、电报、交通道路等）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中的这个或那个委员会所领导的机关和机构去实现。由所有9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人（“代表”）组成的（从4月20日起）执行委员会是公社的最高机关。5月1日，由于前线情况的恶化，执行委员会被5名享有特别全权的公社委员组成的社会拯救委员会所代替。在巴黎的20个区中，每个区都设立市政委员会（又称区公署），在该区选出的公社委员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① 列宁：《公社的教训》，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4页。

巴黎的工人阶级从自己的人们当中提拔出许多天才的组织者和国务活动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在高级和中级官吏怠工的情况下组织了一系列政府机关和市政机关的工作，这些机关都是公社根据与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同的任务和目的改组的。公社委员、“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阿尔伯·泰斯在巴黎邮政局长的岗位上表现为卓越的组织家。印刷工人、社会主义者让·阿勒曼的行动非常果敢和具有主动性，在他的领导下，第五区对与公社为敌的分子，其中包括僧侣的代表，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公社派去掌管间接税的“国际”成员孔博和法伊埃，以及被任命为造币厂长的“国际”成员、青铜工人卡美利纳（他在1932年死去，死时为法国共产党党员），都是优秀的行政人员。

公社的社会—经济政策 公社的社会经济政策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改善广大居民阶层的状况，达到劳动者的经济解放。在公社的许多法令中，都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

公社决定（4月16日的法令）把3月18日起义后逃出巴黎的企业主们所遗留的工厂和作坊移交给工人生产协会。走向剥夺资本家的道路的这个第一步还是相当畏缩的，法令规定如果资本家返回巴黎，要给予他们补偿金。稍后（在5月4日的公社会议上），有人提议把法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大型企业上去，但是，这项提议并没有被通过。在某些大型企业中建立国家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例如罗浮宫兵工厂，在厂长下面设立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委员会，这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公社禁止征收非法的罚款和恣意扣除职工的工资（4月27日的法令），取缔面包房的夜间劳动（4月20日的法令），采取保障失业者的实际步骤，规定对于从事完成公社订货的男女工人必须支付的最低工资额（5月13日的法令）。

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公社发布了征用一切空闲住

宅并让遭受炮火的工人郊区的居民居住的法令（4月25日的法令）。按规定，当铺要将无产的居民阶层所典质的约80万件每件价值不到20法郎的物品无偿地归还原主（5月6日的法令）。从1870年10月起免除9个月的房租（3月29日的法令），这使劳动人民群众减轻了很大一笔负担。公社为了小企业主和小商人的利益，规定各种债务一律分3年偿还，不计利息，如不偿还这种债务，法院也暂不追究（4月16日的法令）。

公社在教育和文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公社发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的法令（4月3日的法令）以后，就对天主教僧侣在学校中的影响展开了斗争，开始用世俗的教师代替僧侣们。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小学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创办了法国第一所职业学校。公社提出了“全面教育”的原则，它的实质是把对科学基础的研究同学习技艺结合起来。博物馆和图书馆都进行了改组，又发布了关于将剧院从私人企业主手中移交给演员、剧院职工的集体的法令。

公社的英勇的女参加者路易丝·米歇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人们想要立即抓住一切：艺术、科学、文学、发明……生活沸腾起来。大家都急于从旧世界逃开”。

公社的改革方案大部分没有能够实行。但是，从公社所完成的事业中，很清楚地表现出，与很大一部分领导者的错误理论和迷惘思想相反，工人阶级具有革命的本能。

同时，公社也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加速了它的灭亡。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所存的现金和其他贵重物品（总值达30亿法郎）。公社所任命的驻银行代表（委员）、普鲁东主义者贝雷坚决反对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采取强制的行动。其他一些普鲁东主义者——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们，也都支持他。凡尔赛的反革命派通过法兰西银行外省各分行，广泛地利用了革命

所急需的这个银行的财富。

公社的活动家们过低估计对革命的敌人、对报刊上的反革命宣传、对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进行无情斗争的必要性，也是公社的重大错误。公社禁止出版的反动报纸约 30 种，但是没有查封它们的印刷所，有些被禁的报纸用另外的名称继续出版。为了制止凡尔赛分子大批枪杀俘虏，4 月 5 日公社发布了关于人质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逮捕了 200 多名反动分子。但是，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对于建立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公社只作了一些微弱的尝试。公社的多数领导者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不理解无产阶级不同农民结成联盟，就不可能保持住他们所获得的政权。

其实，对于革命的巴黎来说，同农民取得联系是极端困难的。凡尔赛分子为了遮断公社同外省的来往，封锁了巴黎的周围。梯也尔政府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用一切手段在农民面前给公社社员脸上抹黑。只有在少数农村地区中，农民们举着红旗进行示威，表示支持巴黎的公社社员们。印制 10 万份在农村地区散发的传单，是公社为了建立革命巴黎和农村劳动阶层之间的联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这份檄文是女作家，社会主义者安得列·利奥在 4 月初起草的，其中鲜明地描绘了劳动农民的困苦情况，阐述了公社所拟定的社会—经济改造的纲领（减少向小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免除贫农的税，农村行政机构由选举产生，等等）。檄文用下列的几行字结尾：“巴黎希望……土地归农民，劳动工具归工人，所有的人有工作……土地的果实归那些耕种的人”。

公社的国际地位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①。同时，公社也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66 页。

为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剥削下面解放出来而斗争是它的口号。

为了表示自己爱好和平、自己深深厌恶军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公社推倒了为纪念拿破仑一世的胜利而在旺多姆广场建造的圆柱，并把这个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

巴黎公社曾经力求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为了这个目的，公社的外交代表(委员)巴斯噶尔·格鲁赛于4月5日向外国强国的外交代表们分别送去关于巴黎公社成立和关于公社愿与一切国家保持善邻关系的正式通知。大多数外交官拒绝接受这个呼吁。他们几乎全都迁往凡尔赛，对公社采取极端敌对的立场。

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积极支持凡尔赛政府，对于完全毁灭巴黎公社起了巨大的作用。俾斯麦接到关于3月18日事件的消息以后，就向梯也尔政府建议由德国占领军直接协助镇压巴黎的革命。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害怕巴黎事件会对德国的工人运动发生革命化的影响。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集团还担心在巴黎成立的新政府不肯遵守1871年2月所缔结的预备和约的条件，并同德国重新开战。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就已经向驻屯巴黎近郊的德国第三军团司令部提出书面保证，说3月18日的革命“决不是以反对德国军队为目标”，公社社员不打算修订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和约的先决条件。为了防止革命的巴黎遭受可能发生的德国武装干涉，表示愿意付给德国5亿法郎，作为第一次缴纳赔款，但是要求在凡尔赛和巴黎的斗争中，德国政府保持中立。

4月26日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同德国外交官封·霍尔施坦就这一问题的谈判，没有得到成功的结果。俾斯麦主要是想要利用这些谈判对梯也尔施加压力，加速签订按照强迫法国接受的那些苛刻条件的正式和约。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法兰克福签

订了和约，从这时候起，德国占领军同凡尔赛反革命派以反对巴黎公社社员为目标的合作，就更加紧密起来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同德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反对自己的人民。

其他强国的统治集团也对巴黎公社采取了敌对的立场。沙俄政府对组织警察监视公社和“国际”的活动家予以协助。美国大使华施贝恩留在巴黎。他伪善地对公社的活动家说，他支持他们的政治纲领。而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华施贝恩没有隐瞒他对公社和公社的活动的坚决否定的态度。在公社存在的最危急的日子里，美国大使用保证性的表示欺骗公社社员说，仿佛由于他努力奔走的结果，德国占领当局同意让公社社员的队伍通过德军的防线。听信了这些虚伪的诺言，公社的几队战士向德军的前哨走去，但是在那里，大多数公社社员都被扣留，并引渡给凡尔赛分子。“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所起草的特别宣言中，揭露了美国大使的背信弃义行为。国际反动派建立的封锁圈紧紧地包在公社的周围。

国际无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支持 3月18日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成立，引起了劳动人民同巴黎的英勇的无产者的国际团结的广大浪潮。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支部，都表示支持巴黎公社，并且声明说，公社斗争的胜利结局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利害关系。在1870年9月（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中），马克思劝告法国工人和他们的领导者不要过早地发动，他指出，过早的发动将是“绝望的蠢举”。但是，在1871年3月，当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变成了事实的时候，马克思热烈地支持它。在4月12日致德国社会主义者库格曼的信中，他怀着钦佩的心情谈到公社社员，说他们是决心“冲天”的人们。马克思指出：“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① 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公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同时又强调了公社的极为巨大的历史意义：“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② 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从巴黎斗争起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③

在书信中和在通过可靠的人带给巴黎的口头通知中，马克思向公社的活动家们提出建议和指示，回答他们征询的问题，说明他们的错误，给与他们一系列的警告。在5月13日致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信中，他报告了关于俾斯麦同梯也尔和法夫尔相互勾结反对公社的重要细节，并且警告公社社员说，现在德国政府“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便利，以加速占领巴黎”。在这同一封信里，马克思指示说：“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们有时间来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④ 总委员会痛斥转到凡尔赛分子那一方面去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托伦的背叛行为，批准了巴黎支部联合会关于将他开除“国际”的决定。

根据马克思的倡议，总委员会通过自己的通信书记，向所有设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4月1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7页。

② 同上书，第288页。

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4月1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9页。

④ 同上书，第290页。

立“国际”支部的国家分别寄发了几百封信；在马克思执笔的这些信中，阐明了在巴黎所发生的革命的真实性质。总委员会在 1871 年 3 月、4 月和 5 月的自己的会议中，一再讨论了巴黎的情况，拟定了援助公社社员的办法。

依照列宁的形象化的说法，马克思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作为群众斗争的参加者，“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①体验了公社的各种事件。

在公社的日子里，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的行为是真正国际主义的行为。他们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从国会的讲坛上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Der Volksstaat)上，公开声明他们支持巴黎公社。他们强调指出公社的斗争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揭穿了德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和他们同凡尔赛反革命派的勾结。1871 年 3—5 月，在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开姆尼兹、汉诺威、慕尼黑和德国其他许多城市中，工人纷纷举行大会，声明他们支持巴黎公社的社员们。1871 年 5 月 25 日倍倍尔在国会中的英勇演说，不但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在这次演说中，他表示确信在不久的将来，巴黎公社社员的解放口号就会成为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号召。

“国际”俄国支部的成员们祝贺巴黎公社这个“无产者的共和国”。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赫利斯多·波特夫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塞尔维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为这一斗争写了一系列优美的文章。4 月 16 日伦敦海德公园的人民群众大会的参加者向公社发出了贺信。卓越的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支援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他

^①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载《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02 页。

缺席当选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著名的英国政论家和学者比斯利捍卫公社的事业，在《蜂房》报上写道：“全世界的工人都能够以他们的巴黎弟兄们所表现的高贵品质而自豪；巴黎弟兄们的英勇、坚忍、秩序、纪律、聪明、智慧——真正令人惊叹。”另一位英国进步政论家弗·哈里逊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公社的原则将会席卷整个欧洲，归根结底，将会改造社会的一切基础”。美国急进政论家林顿在驳斥反动报刊所制造的关于公社的无耻谰言时写道：“这是工人阶级为了反对长期被无耻地篡夺政权所举行的起义”。

在俄国，当时还没有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因此，对于公社的同情的反响，在俄国主要是来自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的代表者之一——大学生—革命家尼古拉·冈察洛夫编写了一些传单（标题为《绞刑架》），在传单中，他号召“一切正直的人们”支持公社的事业，并且论证了公社的世界意义。尼·阿·涅克拉索夫为公社的英雄们写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短诗（《长眠了，英勇牺牲的义士们》）。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在随笔《问心有愧》中，愤怒地斥责绞杀公社的刽子手。

公社社员和凡尔赛分子之间的武装斗争的进程 公社和平存在的时期没有继续很久。4月2日，凡尔赛军队就已经向设在通往巴黎各要冲的公社社员的前沿阵地进攻了。对于公社来说，这次进攻是一种意外情况，在公社的委员中间，可以避免国内战争的信心占有统治的地位。

凡尔赛分子的进攻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愤慨。4月3日，国民自卫军的部队分成三个纵队向凡尔赛挺进。但是，在进军前没有充分的准备。许多战士没有武器，大炮携带的很少——他们以为凡尔赛的士兵是不会严重抵抗的。这种计算落了空。一个纵队遭到蒙瓦列连炮台的致命射击，在3月18日以后，这个炮台仍然

留在政府军队的手里。另一个纵队虽然到达距离凡尔赛很近的地方，但是很快就带着巨大的损失撤退了。4月4日，公社社员的其他部队也停止前进了。在这次失败以后，克吕泽烈所领导的公社的军事总部便转入消极防御的策略了。

4月初，国民自卫军进行整编。开始成立了许多志愿部队，如“巴黎复仇军”、“弗路朗斯复仇军”、“革命义勇军”等等。但是，公社司令部所拥有的大量军事物资（特别是大炮）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军事机构太多了，它们往往相互掣肘。为了整饬纪律而成立的军事法庭，在行动时过于温和。军事专家的不足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只有少数基干军官转到公社方面来。在公社的军官中间，有凡尔赛的秘密帮凶，用自己的行动破坏公社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

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条件，盟士们(fédérés)——人们这样称呼公社的国民自卫军——还是以真正的革命英勇精神进行了战斗。马伊奥城关的炮手、特恩城关的战士、伊西炮台的守卫者们的英勇善战，特别驰名。巾帼不让须眉，少年不让成人。连公社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凡尔赛分子遇到了勇敢的对手。

4月6日，麦克马洪元帅被任命为凡尔赛军总司令，维努亚将军被任命为后备军团司令。4月9日，凡尔赛分子第一次向巴黎开炮，如果不算4月25日的一天停战，直到战斗结束为止，他们的炮轰没有停过。

4月的最后几天，胜利决定性地开始倾向凡尔赛军的一方，这时，他们已经有10万人以上；在公社的军队中，只有3万5千到4万人（根据另外的资料——约有6万名）。凡尔赛分子克服了“盟士们”的强烈抵抗，在所有地段向前推进。4月30日，伊西炮台（在南部战线）失守，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公社社员又占领了它。由于前线的情况普遍恶化，人们对于军事代表克吕泽烈的战术的不

满情绪增强了,他被革职,并被逮捕(后来公社审判他,但是宣告无罪)。他的职务由青年基干军官、工兵上校罗谢尔接替。

罗谢尔以整饬纪律为目标的最初行动,是非常坚决的。可是,他所提出的国民自卫军改组方案(把军团改为团,让各团住在营房里)遭到了中央委员会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怀疑罗谢尔企图实行个人独裁。这时,前线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了。5月9日,凡尔赛分子以数百门大炮轰击伊西炮台,占领了它。

公社社员的这一重要据点的陷落,在巴黎引起了极端紧张的状态。罗谢尔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揭露了公社的软弱方面,指责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破坏了加强巴黎防务力量的措施,并且请求解除他的军事代表职务。这封信的发表给公社造成不小的损失,因为它把公社军事机构的弱点暴露在敌人的眼前了。根据公社的命令,罗谢尔被逮捕,并且被押解到市政厅,不久以后,他从那里逃跑了。后来,罗谢尔被凡尔赛分子捉去,交付军法审判,被枪决了。

罗谢尔的职务由德勒克吕兹代替,他是公社的最忠诚的活动家之一,但是没有掌握军事知识。凡尔赛分子继续向前推进。5月13日,凡尔赛炮台被夺去。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巴黎城墙的很大一部分。5月20日,凡尔赛司令部下令向这个城市进行总攻击。

“五月流血周”。公社的覆亡 5月21日,凡尔赛军从半毁坏的圣克鲁门突入巴黎。5月21日夜,凡尔赛军的部队又突入了其他几个城门。不久,巴黎就已经有10万名左右凡尔赛分子了。虽然凡尔赛分子在人数和装备方面都有巨大的优越性,巴黎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首都的街头以急剧的速度建筑了5百多个街垒;在建筑街垒时,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

5月24日,公社不得不放弃市政厅,迁往第十一区公署。当天傍晚,“盟士们”被排挤出城市的所有资产阶级住区,斗争转移到

别利维尔、麦尼尔蒙坦和其他无产阶级住区去了。在这里，凡尔赛分子遇到了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们的激烈抵抗。在贞德广场上，有几千名公社社员在符卢勃列夫斯基的领导下，在36小时期间，成功地击退了凡尔赛军整个军团的进攻，甚至自己转入进攻了；但是，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压力下，符卢勃列夫斯基的队伍不得不退却。5月25日，塞纳河左岸全部转入凡尔赛分子的手中；这一天结束时，他们占领了巴黎的大部分。公社迁往第二十区的区公署。5月26日，凡尔赛分子击破了公社社员的抵抗，占领了圣安东郊区。27日，经过血战之后，别利维尔和沙蒙高地被占领了。同一天，在贝尔拉雪兹墓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墓碑、每一座坟墓旁边都进行了肉搏；被俘掳的公社社员都被拉到墙边，一个不剩地被枪毙了。5月28日，凡尔赛分子占领了拉姆庞诺街上的公社的最后街垒。

于是，在两个多月的震惊全世界的英勇斗争以后，巴黎公社复亡了。在5月的战斗里，同敌人英勇奋战，直到最后一分钟的公社的许多著名活动家都死亡了。在他们之中，有德勒克吕兹和顿布罗夫斯基。瓦尔兰于5月28日被逮捕，在受过残酷的侮辱以后，被枪杀了。维尔莫烈尔在一个街垒上受重伤，死在凡尔赛的监狱医院里。

1871年巴黎的7天巷战，以“五月流血周”的名称载入法国的史册。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凡尔赛的军阀们对于巴黎的劳动人民进行了前所未闻的残酷的镇压。他们在严刑拷打之后杀死的，不仅是公社的活动家，不仅是公社的战士，而且有被认为是公社的拥护者的和平居民。马克思写道：“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

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①

巴黎的街道、广场和街心花园堆满了被枪杀者的尸体。这些尸体被匆匆忙忙地埋到土坑里，连那些还有一点生命气息的人都在一起。

3万多名被枪杀和被折磨死的人——这便是1871年5月的日子里，凡尔赛军阀在巴黎所干的血腥罪行的总结。连同5万名被关入监狱的、被流放去服苦役的、被判处死刑的和几千名逃避警察追缉而流亡国外的人们，巴黎损失了约10万个自己的优秀儿女——主要是工人。军事法庭继续审判，一直到1875年。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历史意义 远在公社的斗争进程中，马克思就在他所起草的宣言中，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公社的历史意义。这篇宣言是在1871年5月30日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中一致通过的，后来以《法兰西内战》的标题发表，它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最卓越作品之一。马克思强调指出，公社是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经验。马克思考虑1871年革命的经验，认为恰恰是这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预言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②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7页。

② 同上书，第384页。

巴黎公社不仅对当时的、而且对以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公社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它促使他们对《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的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德文新版(1872年)的序言中写道：“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正如后来列宁着重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②

巴黎工人的英勇斗争没有得到成功的结局。法国工人阶级当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没有得到农民方面的支持，正如在1848年一样，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公社在军事问题上和社会—经济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和失算，加速了它的灭亡。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尽管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还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③

公社以后的第一国际 巴黎公社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发生了深刻的作用，它是加强革命—社会主义宣传的强大推动力。“国际”在各国工人群众中间的声誉显著增长了。

国际反动派为了对付“国际”的威望的增长，对它的斗争急剧尖锐化了。“国际”总委员会和各支部英勇保卫公社的事业，在马克思所起草的宣言中热烈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于公社的流亡者的关怀——所有这一切都引起反动派残酷地迫害社会主义者。警察和法院的追缉使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支部的合法活动困难起来，甚至不可能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402页。

③ 列宁：《公社的教训》，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4页。

政府的镇压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的唯一的危险。在公社失败后所形成的困难环境中,巴枯宁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策略,他们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1871年9月举行的伦敦“国际”代表会议,在反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路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积极参加它的工作的这次代表会议,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中,强调指出在各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

伦敦代表会议的一篇决议中说:“……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①

1872年9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追认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赋予它在必要时把个别支部和联合会开除出“国际”的权利。由于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的另外一个著名代表——詹姆斯·吉约姆进行破坏活动,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把他们开除出“国际”。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倡议,代表大会决定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纽约。这项决定是在许多情况的影响下采取的。在反动势力残酷迫害“国际”的条件下,总委员会在欧洲的进一步活动遇到了许多障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诡计,英国工联右翼领袖的妥协活动,也妨碍总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到了后来,设在美国的总委员会同欧洲的工人运动之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5页。——译者

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它的活动逐渐减弱了。1876年7月，“国际”在费城举行代表会议，通过了解散“国际”的决定。

第一“国际”光荣地完成了摆在它面前的历史任务。它以自己的争取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和反对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以自己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的决议，以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各民族间的和平、争取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的言论，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

第十二章

7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发展的基本特征

巴黎公社所展开的、大约包括 30 年的一段时期，在人类的历史命运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在这个时期内，在最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制度中和政治上层建筑中开始出现和开始形成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在二十世纪初彻底形成的。

技术的进步 在本章所讲述的时期中，对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前提。70—90 年代的特征是技术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在人类面前揭开了崭新的远景。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参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技术进步很快；在另一些国家里，例如在英国，特别是在法国，呈现出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停滞倾向。

从十九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钢的大批生产，开始成为工业力量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世界钢产量从 1870 年的 52 万吨增加到 1900 年的 2,830 万吨。钢产量增加最多的是“年青的”、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在那里，特别有效地利用了柏塞麦的发明，后来又利用了马丁的发明。1878 年托马斯发现脱磷的过程，是冶金工业中的技术革命，它为拥有磷铁矿的那些国家（例如德国）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机器、轨道和船舶

的生产中,钢越来越排挤掉其他的材料;它为机器的坚牢度、速度、功率的增加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对许多机器和工程建筑物的结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作用。

创造新的动力基地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用蒸汽机作为唯一的动力来源,已经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增长。在十九世纪最后 33 年间,发现了显著扩大工业动力基地的手段。

80 年代,瑞典工程师拉瓦尔和英国人巴松斯分别设计了汽轮机,不久,汽轮机就成了蒸汽机的严重竞争者,它的特点是:燃料的消耗比蒸汽机省得多,效率也比较高。只有当汽轮机同直流发电机(它的最初型式是在 70 年代出现的)联合为一个机组,制造出比以前的电力来源功率大得多而又节约得多的涡轮发电机的时候,这项发明的价值才完全确定了。

工业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加强了工厂、商店、办事处对人工照明的需要。但是,只有在拥有廉价燃料(或水力)的地方建造大型电站和发明把电流经过必要的距离传送到消费者那里的方法,才能够开始不仅把电普遍利用于照明,而且作为机械动力的来源。成功地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是在从前由于旧式发动机械——蒸汽机功率低和效力小而受到阻碍的生产集中的重要促进因素。

在 70—80 年代,进行了一定距离的输电的试验。在这方面,法国科学家马·德普勒进行了研究工作;同时,俄国科学家季·亚·拉奇诺夫成功地致力于输电的实现。恩格斯立即指出说,一定距离的电力输送“彻底地使工业几乎从地方条件所划定的一切界线解放出来,使利用最遥远的水力也有了可能……”^①。

但是,最初的电站所发的直流电不大适宜于远距离输送,因为在那种条件下获得必要的电压是很困难的。80 年代末俄国科学家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信(1883 年 3 月 1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第 289 页。

米·奥·多里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的实用三相发电机的创造，使容易变压的交流电有可能被利用于电力输送了。1891年，多里沃—多布罗沃尔斯基（在德国工作）又实现了世界第一次的长距离（175公里）交流电的输送。这些发明本身标志着电工技术的历史中的新时期的开始。电流的侵入最多种多样的生产部门，在很短的时期，就在个别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和世界经济中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对毫无例外地一切生产部门的技术发生了最强烈的影响。技术和工业的新部门——电化学、电冶金学产生了，第一批电车（80年代）出现了，电焊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应用，等等。

在同一时期，创造了另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内燃发动机，后来，它要在交通运输、军事技术、农业机械化以及其他部门中完成一次革命。在十九世纪70年代，第一批瓦斯发动机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只有过些时候，在制成它的使用液体燃料开动的结构以后，内燃发动机才得到大量的推广。

石油的经济意义骤然增大了，它的开采量迅速地开始增加了；1870年，全世界共开采石油80万吨，1900年，开采量几乎达到2,000万吨。从这时候起，资本主义强盗开始争夺石油的残酷斗争。

石油工业是比“旧”生产部门——采煤、造船、炼铁等等的发展迅速得多的那些年青的生产部门之一。顺便说一句，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强的因素之一。化学工业也属于新的部门，它的迅速发展是由在制造染料、人工肥料、爆炸物质方面重要发明来决定的。在这方面，德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按照化学工业发展的水平和一切生产部门采用化学的水平来说，它超过了自己的所有竞争对手。

随着工业生产的增长，同交通运输、首先是铁路运输的发展具有最密切的联系。在40年期间，世界的铁路网增加了将近3倍。

在美国以及俄国，铁路的建造特别紧张。恰恰是在本章所讲述的时期，铁路变成了欧亚美洲许多国家的主要交通道路，推翻了过去关于距离的观念，对生产力的分布、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产生了最严重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 25 年间，海上运输的革命也完成了，这种革命从汽船坚决排挤掉帆船表现出来。在 1871 年，帆船的排水量为 1,500 多万吨，而汽船的排水量约为 250 万吨。到 1900 年，对比关系根本改变了：820 万吨对 1,385 万吨。同时，由于利用钢造船舶，蒸汽机的改进，汽轮机的采用和开始采用内燃发动机作为船舶的机器，轮船的构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通信工具的技术进步具有最巨大的意义。在 80 年代，所有各国电报线长度约为 150 万公里，而到本世纪末——430 万公里。实行了在一条电线上同时传送许多电报。在 70—80 年代，创造和改进了电话的机构。在 1895 年，完成了在通信方面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发现——亚·斯·波波夫发明无线电；意大利人古·马可尼的工作对于无线电通信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各国资本家、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最残酷的竞争刺激了技术的进步。从此，为了爆破竞争者的阵地而顽强地寻求技术上的新发明——在经济危机时期求得特别强烈。在工业生产高涨的年代里，资本家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也拼命地扩大生产机构，常常建立以过时的技术为基础、但在投机的“旺季”完全有利可图的企业。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整个说来，在本章所讲述的时期，世界工业生产额增长了两倍多。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有了最深刻的进展；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比重改变了。这引起了抢夺市场的斗争的尖锐化，这是经济危机时间拖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次数比从前更频繁了。

在工业各部门的发展中,不平衡性加强了:重工业增长的速度比轻工业急剧加大了。农业的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工业。这种现象,正如列宁所指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①在70年代上半期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的特别持久的全欧洲的农业危机,加深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美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欧洲输出廉价粮食的急剧增加,是以谷物生产过剩和欧洲市场上谷价很高为特征的危机的推动力。在土地改革具有半途而废性质和许多封建残余没有消除的那些国家里,例如俄国、奥匈、日本,农业的状况特别严重。

地租降低的缓慢和不充分(在法国,这种情况特别显著)是农业危机特别拖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危机的消除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的结果,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产品,特别是畜产品的需求。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国家的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了:机器和人工肥料的利用加强了,从三圃制向多圃制和向更集约的经营农业方法的过渡加速了,畜牧业、经济作物的比重增长了,等等。

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俄国的某些地区),农业危机导致了半封建的经济形式的恢复。

十九世纪最后25年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还表现于工业最重要部门的增长速度的不同。例如,在1871—1900年的时期,英国生铁产量只增加1/3,而德国却增加将近4.5倍,美国增加7倍强。同时,在造船、棉布生产等方面,美国和德国仍然远远落在英国后面。

由于美国 and 德国压过“旧”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急剧改变了。1870年,英国在世界总产值中占

^① 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载《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4页。

32%，美国——23%，德国——13%，法国——10%。到1900年，对比关系就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31%，英国——18%，德国——16%，法国——7%。这不仅表明英国过去的工业垄断权已被消除，而且表明它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丧失了领先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德国也紧紧逼近英国的水平，后来又把英国从第二位排挤了出去。法国落后于其他大国的差距加大了。

在改革后的俄国，特别是在90年代，工业生产增长的特点是速度比较高，但是，俄国在十九世纪末所达到的绝对水平，同其他的大强国相比，仍然是十分低的。亚洲国家中第一个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也开始跻入工业国家之林。但是，这种发展具有极端的不平衡性：纺织生产的增长虽然很快，而工业威力的基础——冶金业在日本发展得却特别缓慢。在这几十年间，拥有天然富源、资本以及工业化所必要的其他各种条件的小国比利时，进入了高度工业强国的队伍。

到十九世纪末，在世界舞台上已经不是一个强国——过去独霸工业的英国，而是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工业强国。

十九世纪末，美国按工业国家的意义来说，已经牢固地占第一把交椅，但是按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12%）来说，却次于英国（19%）和德国（13%）。生产力发展日益落后的法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9%，比1870年仅降低1%。工业发展水平和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之间的这种不相适应，不能够不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照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经济威力，为瓜分市场和原料产地而进行激烈斗争的来源。

十九世纪末，殖民地的绝大部分集中在英国和法国——“旧”资本主义强国的手里；在瓜分开始时“迟到了的”德国、美国、日本，只能够夺取第二等的、按面积和人口来说要差许多倍的殖民地。列强的经济威力和它们的殖民地面积之间的不相适应，造成了最尖

锐的矛盾。

垄断组织的产生 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重工业中的生产过程的非常复杂化,和由此产生的极大量投资的必要性,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在十九世纪的最后 25 年间,比较少数的大型和最大型企业在不断发 展,而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则被吞并,或者开始起从属的作用。一系列部门的自由竞争逐渐由垄断制来代替。垄断联合组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卡特尔(为了瓜分销售市场,确定生产规模、价格水平等等的目的而建立的联合组织),辛迪加(为了共同出售商品的联合组织),托拉斯(为了共同生产和销售而完全合并对企业的所有权),康采恩(在财政方面共同依附于某一垄断集团的基础上,一系列托拉斯或企业的联合组织)。

不仅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而且在工业发展水平比较不高的许多国家里,都加强了生产的集中和出现了垄断组织。在西欧的大多数国家中,在美国,在日本,在俄国,都形成了垄断制。

在十九世纪 60 和 70 年代,最发达的国家里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达到最高的极限点。在这个时期,垄断组织只是刚刚产生,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大。在 80 年代,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数目增多了,它们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联合组织是极端不稳固的,常常分崩瓦解,用另一些来代替。在很大程度上,这还只是关涉到国际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例如国际钢轨卡特尔)。在 90 年代,垄断组织对经济发展的进程就已经发生更重大的影响了。

尽管生产力猛烈发展,它的增长却落后于科学和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因为资本主义在利用人类知识的发展所创造的远景方面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三相交流电的采用在 90 年代遇到了在前一时期建成的、在技术上已经陈旧的电站的所有者的抵抗;煤气公司阻碍了电气照明的使用。在一系列的经济部门中,只要对资本家来说比利用机器更有利可图,就广泛地采用落后的以手的劳动为

基础的生产形式。

英国和法国中的食利阶层的加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征候之一。使这两个国家变成食利者国家的倾向，是由于资本输出的大大加强和它超过商品输出的增长而产生的。在这些国家内部，对于投资、对于生产力的增长，有充分的可能性。但是，资本的输出可以获得无比多的利润，最老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而贪婪地向前急急奔去。

有些国家由于自己的落后性，本来是外国资本投入的对象，它们也参加了奴役其他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来源的大量资金投入了奥匈的经济，而奥匈向巴尔干各国输出资本，极力使它们从属于自己的势力。俄国和日本本来是一系列国家的债务者，而它们选定中国和朝鲜作为投资的范围。

十九世纪末，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出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相结合，亦即形成金融资本的倾向。资本的集中是同生产的集中平行地进行的，并且大大地加速了后者。银行的和工业企业的利益开始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基础上，银行垄断组织和工业垄断组织的领导者开始发生直接的联系，合并由一个人来领导。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工作上基本结束了。而殖民地的角逐、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却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尖锐化。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新的、最后的阶段所特有的个别特征的出现，是十九世纪最后 25 年的标志。正如列宁所指出，“如果还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是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的，那就太荒唐了”^①。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早于十九世纪末末——二十世纪初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59 页。

期显示出自己的形成状态。

十九世纪末的经济危机 十九世纪末所达到的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同造成地球绝大部分居民贫困的后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列宁写道：“资本主义的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超出那些必然使劳动者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社会条件。”^①

在十九世纪最后 25 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 4 次经济危机。1873 年开始的危机具有前所未见的力量和长期性（连同危机以后的萧条现象——约 6 年）。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高涨是极短的；在 1882—1886 年，危机又爆发了，它以特别的力量席卷了这时在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已经占第一位的美国。

再一次的经济高涨也是不长久的。1890 年，又出现了以欧洲为主要中心的新危机。后来，经济行情的好转是极不平衡的：在德国——从 1893 年起，在英国——从 1895 年起，在美国——到 1897 年才开始好转。但是，在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种高涨本身就是新的深刻危机的前提。1900 年，新的危机来临了。

经济危机特别加速了生产集中的过程。每一个危机都导致了大批小型企业的破产，从而严重地促进大公司势力的增强。在这种意义上，1900—1903 年的危机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由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垄断组织彻底确立了自己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的统治地位。

^① 列宁：《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载《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2 页。

第十三章

英国的工业垄断权的丧失

在十九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英国逐渐丧失世界工业垄断权的过程。英国虽然失掉世界制造厂的地位,但是,它保持了在仍然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利润的世界中介贸易、保险和银行事业中起绝大作用的殖民地的和海上的领导权。

在经济地位中的变化 在同时代人明显地看出它丧失工业领导权的很久以前,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开始改变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了下来;从 70 年代开始,英国资本在国内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本向宗主国以外的输出是对它的最有利的使用。

同时,在一系列的欧洲国家和在美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它们的产业革命比英国发生得晚,因而是在较高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为保护关税政策的新浪潮所代替了,结果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的增加,压缩了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外国企业主们常常利用英国的贷款,为了建立本国的工业而在英国购买机器设备。虽然在 70—80 年代英国在生产总额和产品的绝对增长方面仍然保持着优越地位,但是美国和德国在发展速度方面越来越超过了它。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对工厂机器设备的巨大资本是在很久以前投入的,而在其他各国,大工业是比较年轻的、新

的经济部门。远远不是所有的英国企业主甘愿牺牲旧的固定资本和采用价钱昂贵的新技术设施。英国的资本家们也不认为这是迫切的需要。只要英国保有自己的巨大殖民地以及它们的广大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廉价的劳动力，甚至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英国资本家也有获得巨大利润的可能性。但是，技术中的落后状态很快就在生产数量上反映出来。美国在炼钢方面，在冶铁方面，在采煤方面，都开始赶上英国。在贸易方面，德国相当快地变成了英国的严重的竞争者。在 90 年代，比较廉价的德国商品加强渗入英国本土的市场和它的殖民地的市场。英国报刊敲起了警钟。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威廉斯写道：“德国开始同英国进行蓄意的和殊死的竞争，并且竭尽一切力量为消灭不列颠的优越地位而进行斗争”。英国的纺织品虽然还在世界市场上占第一位，但是冶金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状况却受到德美两国的竞争的严重破坏。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中把资本投入重工业的那一部分，第一个开始充满了修正传统的自由贸易观念的思想，对卡特尔化、保护关税政策和采取不列颠帝国市场的方针，显示越来越大的愿望。

1878—1879 年的工业危机，按它的规模、长期性和猛烈性来说，是英国所经历的一切危机中最沉重的一个。在危机以后没有接着出现比较重要的高涨，而从 1882 年年终起，英国经济又开始陷入照例的危机，在 1883 年，它变成了总危机。1888 年和 1889 年是在经济活跃和高涨的标志下度过的，但是在 1890 年，接着发生了世界货币危机，此后，英国发生了在 1892—1893 年达到最尖锐程度的新的工业危机；1894 年，工业危机转入了萧条时期。根据官方统计，即使是在 1889 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仅伦敦一地就有贫民 130 万人。

在持续 20 年(1875—1895 年)的农业危机时期，英国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了约 50%。这导致了许多小农场主和中等农场主的破产

以及农民收入的急剧减少。新的农民群众涌入城市，住满城郊的贫民窟，对劳动市场增添了压力。直到 90 年代后半期，当大地主们不得不大大减少地租（将近 $\frac{1}{4}$ ），而谷物农场开始变成高度集约化的畜牧业和养禽业的饲料基地之后，危机才被克服。

英国在工业方面越落后，像资本输出一类的重要利润来源，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意义。在 70 年代末，英国在国外的年平均投资为 2,200 万英镑，但在 80 年代末，它们达到了 10,300 万英镑。到十九世纪末，资本输出变成了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收入项目之一。这是在英国的资本主义中较早出现高利贷倾向、亦即腐朽现象、寄生现象、在技术和生产组织中的进一步落后现象的主要原因。

英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输出资本：英国的企业主们在荷兰建设了毛织厂，在比利时、俄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一些国家建设了铸钢厂；英国的金融家们在欧洲的国家里，对铁路建设投入自己的资本；英国的公司对海上贸易交通线的发展给予补助金，以水运费和保险费的形式得到高额利润。但是，对殖民地以及对某些非欧洲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和南美洲的资本输出，具有最大的意义。同时，在英国本土，在股份公司的帮助之下，对资金的动员急剧加强了。不错，在过去英国的工业领导权以之为基础的各主要工业部门中，这种过程进行得很缓慢。但是，在 90 年代，个别的股份公司就往往跨过了卡特尔阶段，开始变成强大的托拉斯和康采恩。反过来，垄断化又推动了寻找新的市场，争夺新的剥削对象。

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生 帝国主义特征在经济中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体系也发生了影响。从 60 年代末，英国的资产阶级中就已经涌现出一系列的著名思想家，他们竭力为资产阶级的扩张野心和巩固殖民帝国的计划辩护。例如，查理·迪耳克在他所著的《大不列颠扩张论》（1868 年）一书中，主张扩大英国

各移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洲)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在实质上,也就是使那些资产阶级变成掠夺不列颠帝国各国基本居民的共同参加者。依照迪耳克的意见,这就会使英国在世界上保持住统治地位。迪耳克反对“自由贸易”,而主张实行“公平贸易”,他所谓的“公平贸易”意味着防止其他强国对英国和整个不列颠帝国的竞争。

1883年,约翰·西里所著《英国的扩张》一书出版了,它是成立以鼓吹殖民扩张思想为宗旨的宣传团体(例如“帝国联合会”)的推动力量。

在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中,其他一些动机也起了作用。英国资产阶级一时一刻都没有忘掉宪章运动的可怕力量,他们见到在受压迫的、贫困的工人阶级下层又在积蓄爆炸物质,就企图利用“在帝国中求生路”的口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在英国产生的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刚刚出现,就为了毒化工人的意识和用资产阶级精神培育他们的目的而利用了社会蛊惑的方法。迪耳克指明了殖民主义怎样能够同“社会政策”结合到一起。除了鼓吹“帝国”思想而外,他大嚷大叫地主张“工人立法”和承认工人的“政治权利”。后来,十九世纪末英国最走运的冒险家和殖民扩张活动家之一西塞尔·罗得斯极端厚颜无耻地表述了帝国主义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之间的联系,他说:“帝国就是饭碗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①

十九世纪末,英国展开了大力宣传,鼓吹种族主义和英国人的“独特性”,说他们有“担负”管理“有色”民族的“使命”。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在这时候主要是由英德竞争的尖锐化和不列

^①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转引,载《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页。

殖民扩张(特别是在南非洲)的积极化刺激起来的。

各政党的斗争。殖民帝国的发展 从1868到1874年,在英国是自由党当政。党魁威廉·格莱斯顿出身于利物浦的大批发商人家,在几十年间是英国自由主义的领袖和思想家,他善于使用伪善的辞句,来掩饰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自由党人从关于英国的经济领导权毫不动摇的假定出发,来制定自己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他们认为,就是在国际政治中,英国作为唯一的大工业强国,也将不变地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得出了结论:英国不应该同其他强国结成长期的同盟,或者参加任何的集团。后来,这种对外政策得到了“光荣孤立”政策的名称。

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格莱斯顿进行了一些社会和政治改革。例如,1871年的法律规定工会有法人的权利,但是,在同年所通过的禁止纠察的刑法典修正案使罢工斗争受到严重的困难。在1872年,实行下院选举的秘密投票法。

这些有限的改革没有给自由党人带来重大的成功。在1874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失败了,以本杰明·狄士累利为首的保守党人当政了。

狄士累利在30—40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和政治活动,宣传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希望用这种方法吸引工人对贵族有好感。后来,他积极参加改组保守党,从60年代末起,成为该党的领袖。在70年代以前,保守党首先是大地主、银行家和英国国教僧侣的政党。现在,大多数的大工业家参加了保守党,它开始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而出了名。保守党人在1874年选举中的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即:有很大一部分工人选民受蛊惑性的社会立法纲领的吸引,也把自己的票投给了狄士累利的政党。

保守党人的对内政策,是在反对自由党人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口号下实行的。狄士累利伪善地责难他们限制国家对“经

济生活”的干涉，因此，他们让工人受企业主的随意摆布。保守党人在上台时，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在社会立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1875年，用“企业主和工人法”代替了工人所痛恨的“主仆法”，根据新法，双方签定雇佣合同时，在法律方面基于平等的原则。关于对纠察的刑事责任的1871年修正案被允许和平纠察的“关于秘密集会和保护财产”的法律（1875年）代替了。当时，还实行了禁止雇佣10岁以下儿童作工的法律。狄士累利正如以前的格莱斯顿一样，拒绝满足工联的54小时工作周的要求，但是通过了关于限定每周的工作时间为57小时的法案。

同时，保守党人竭力加强国家机器。从70年代起所通过的法律（成立地方管理部及其他），在有损于过去享有很大自治权的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机关的情况下，很可观地扩大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同时，依靠降低议会的作用而显著增加了内阁的权力。对一切重要问题的立法创制权集中在政府的手里。扩大政府所属的行政机构（设立农业部、苏格兰事务部以及其他机关）是加强内阁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

保守党人的对外政策和殖民政策，不仅是由资产阶级的新的需要，而且是由从前为这个政党的基本支柱的大地主们的新的需要来决定的。农业危机使地主们的收入减少了，土地贵族竭力更广泛地参与殖民和对外贸易的事务。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最初的行动之一，使狄士累利变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宠儿。狄士累利在自己的代理人的协助下，使埃及的赫迪夫(Khedive)伊斯迈尔陷入财政破产的边缘，在1875年，伊斯迈尔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的45%股票非常便宜地卖给英国政府，再加上向小持有者收购，不久以后，英国就掌握了控制额。狄士累利向赫迪夫收购股票时，事先并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这是英国革命以来前所未闻的事实）。

第二年即 1876 年,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狄士累利竭力制造对维多利亚的崇拜,使它变成“托利民主政治”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因素之一,变成向英国人民灌输不列颠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的工具。狄士累利善于把自己政府的每一个外交行动说成是为保持英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威信而斗争的必要步骤。他解释说,在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中支持土耳其,在柏林会议上对俄国施加外交压力,以及英国竭力进行殖民扩张(从土耳其夺取塞浦路斯岛、占领布尔人的共和国德兰士瓦、对阿富汗的战争、屠杀祖鲁人运动,等等),都是为了上述的目的,这种对外政策需要大量的开支;预算出现很大的赤字,保守党人的政府甚至不得不提高所得税。这在不小程度上使狄士累利失去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 1879 年末—1880 年初的竞选时期,自由党人坚决反对狄士累利在对外政策中的“高价冒险主义”。格莱斯顿提出的诺言是:削去非常国家开支,扩大选举权,和最后一项,达到“绥靖”爱尔兰人。

自由党人在组织上巩固他们的政党,也从他们在 1880 年选举时期的阵势中反映出来。根据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伯明翰市自由党人的倡议,从前只在例行选举之前成立的竞选宣传机构被改组为常设的“全国自由联合会”(1877 年)。1880 年的选举给自由党人带来了胜利。格莱斯顿再度组阁。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心问题之一的爱尔兰问题。

爱尔兰问题 在 70 年代末,由于全欧农业危机,爱尔兰的情况严重尖锐化了。大地主又开始大批驱逐佃户。1879 年,在爱尔兰成立了由过去的芬尼社成员、英勇的工人米凯尔·戴维特领导的农民组织“土地同盟”。在一年期间,“土地同盟”把 25 万多人联合到自己的队伍里。它对地主驱逐佃户的回答是:焚烧地主的庄

园，消灭牲畜，有时也杀死罪大恶极的地主或者他们的管家。一种叫做“杯葛”的新的斗争方式普遍流行起来了，这个名称是从地主杯葛上尉的名字来的，他首先亲身体会了这种以反对那些胆敢夺取穷人土地的人们为目标的社会制裁方法。

在这些年间，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领导者巴涅尔变成了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公认的领袖。由于有力地反对英国政府，巴涅尔在爱尔兰的农民中间享有广大的声誉。这种声誉也使得他一跃而为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地方自治——即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容许爱尔兰自己管理，变成了巴涅尔的口号。

1880 年格莱斯顿当政时，不但毁弃了他以前所作的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诺言，而且提出一项主要有利于地主的土地法案。当时，“土地同盟”加强了杯葛运动和恫吓地主，而巴涅尔采取了在议会中阻挠讨论的策略。政府开始采取大批逮捕的方式。在被逮捕的爱尔兰人中，也有巴涅尔。但是，这只是向火中浇油；爱尔兰处在国内战争的边缘。英国政府不得不提议妥协：爱尔兰人重新缴纳地租和停止杯葛，交换条件为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取消特别戒严，而地主们“豁免”佃户的欠租。

巴涅尔害怕农民运动脱离他的影响，1881 年秋天接受了格莱斯顿所提出的妥协条件。

巴涅尔和格莱斯顿的协议引起了爱尔兰的小资产阶级恐怖集团的活跃。在 1882 年，英国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温狄士和助理大臣波尔克被杀。格莱斯顿利用这次恐怖行动，作为再度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借口。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在 3 年期间，以实行无情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的政策的非常刑事法庭代替了爱尔兰的普通陪审法庭。在处理“爱尔兰问题”时的显然无能，破坏了格莱斯顿政府的威信，同时也破坏了整个自由主义的威信。

自由党的分裂。保守党人的胜利 在 80—90 年代,英国的逐渐丧失工业领导权变成了明显的事实。失业现象增强了。1885 年初,在某些城市里,其中包括伦敦,失业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饥饿进军。

统治阶级加紧修订自己的政治概念。自由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约瑟夫·张伯伦公开主张“国家有组织地干预工人问题和贸易”。保守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倾向;兰多尔夫·丘吉尔建立了“公平贸易联盟”,它展开了有利于“帝国联合”和帝国保护关税政策的思想的鼓动;在另一方面,丘吉尔号召保守党人更加大力地参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自由党人竭力用小的让步,把劳动人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为了这个目的,格莱斯顿的政府在 1884 年实行了所谓第三次选举改革(第一次改革是在 1832 年,第二次改革是在 1867 年实行的)。1884 年的改革规定了乡村地区的工人—房客和小佃户的选举权。

在对外政策中,格莱斯顿的政府实际上继续了狄士累利的路线。布尔人在马朱巴山击溃英军(1881 年)以后,格莱斯顿不得不承认布尔人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共和国的独立,但是,英国保持对这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控制权(1884 年的协定)。1882 年,以保护英国在埃及的财产为借口,英国陆军镇压了埃及人民的民族解放起义,同时,英国的分队野蛮地炮击亚历山大里亚港。埃及被英国占领,实际上被归并于不列颠帝国。在中亚细亚,英国的扩张同俄国的扩张碰到一起,在 1885 年几乎引起一场武装冲突。

1885 年,英国在东苏丹遭到严重的失败,当时,东苏丹正展开马赫迪的民族解放运动。苏丹的主要城市——喀土穆被起义军夺取,而英埃联军被逐出国外。

1885年6月,由于保守党人和爱尔兰人的投票,格莱斯顿的政府被推翻了。但是,索尔斯柏里的保守党内阁只存在了半年。在1885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人在议会中得到稍微多一些席位,格莱斯顿再度组织政府。参加竞选的,除了全国自由联合会而外,1883年建立的保守党人的中央党组织——全国保守党人会联合会也参加了。

格莱斯顿的新政府在议会中又预先得到了爱尔兰议员的支持。许多人把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希望同格莱斯顿的名字联系了起来。但是,这个问题在议会中的讨论立即决定了格莱斯顿政府的命运,并使整个旧的自由党受到了打击。在自由党人中间发生了分裂:实际上以约·张伯伦为首的具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自由联合主义者”(即保持同爱尔兰的“联合”的拥护者)的一派,过了几年就正式地加入了保守党。

自由联合主义者转到保守党人的方面,大大加强了后者的势力。保守党组织新政府,此后20年间(1892—1895年中断3年),把政权握在自己的手中。

英国资产阶级的贪求无度的殖民扩张,展开了新的阶段。不列颠帝国的领土从1884至1900年扩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即30%。虽然在从1871年到1894年的时期,对欧洲各国输出的份额在英国的输出总额中由50%缩减到40%,仅仅在70年代的期间,对殖民地的输出就增长了40%。英国资本主义用扩大和加强剥削大片殖民地的方式,摆脱了由于丧失工业垄断权而造成的困难状态。在殖民地建立了拥有几万名工人的开采矿石和贵重金属的企业,棉花、咖啡、可可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园。

在这方面,西南非洲和赤道非洲的英国殖民地的种植园制度最有代表性,在那里,广泛采用许多部落的强制劳动。

工联主义和费边社员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60年代末至70

年代初的经济高涨,为工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会为缩短工作周和为自己活动的合法化而进行的积极斗争,导致了会员人数的显著增长。然而,在政治方面,英国工人阶级依然是“‘伟大的自由党’——工厂主们所领导的政党的尾巴”^①。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的分裂,从他们中间分化出相当大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垄断了当时工人组织的唯一形式——工联。无产阶级的下层群众受压制,没有组织起来。

由于1878—1879年危机而造成的工人生活条件的恶化,失业人数的增加,农村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加强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

美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亨利·乔治的学说的大受欢迎,是英国工人对社会问题感到浓厚兴趣的征候之一。亨利·乔治在他所著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用新的形式重复了旧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应当到土地所有者攫取地租中去寻求社会不幸的根源,拯救社会之道在于通过土地国有化的途径或者通过“统一税”(国家只收地租,以代替它所收的一切赋税)的办法,将地租交给国家。《进步与贫困》一书的思想变成了工人俱乐部和急进派俱乐部里经常讨论的主题。对亨利·乔治的糊涂理论的醉心并没有继续很久;到80年代末,它就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是,对于一部分工人来说,这部书是认真地思索自己阶级的命运的推动力。

另一个社会思想流派——“费边主义”比较稳固,它也是由于英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增长产生的。“费边社”是以著名的拖延战术家、罗马统帅费边(绰号“拖延者”)的名字命名的,成立于1884年初。费边社社员们并不隐蔽他们的目标是吸引英国工人脱离马克思主义。费边社社员活动的特点是对无产阶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级的革命行动具有强烈的敌意。

在费边社的成员中，也有像韦伯夫妇或著名作家肖伯纳那样真诚同情贫民和失业者的悲惨命运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完全谬误的途径上寻求了出路。

费边社社员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是从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环境中最流行的改良主义思想(其中也包括亨利·乔治的学说)出发的。费边派的历史哲学是以实证主义者斯宾塞的思想为依据的，斯宾塞把人类社会比作生物的机体，它的自然发展讨厌一切急剧的变化。向数目越来越多的公民提供选举权，扩大自治区的职权和把某些经济部门交给它们，推广各种公用设施，特别是由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措施——所有这一切，费边派认为，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了。他们宣传“小事”或“蜂螫”原则，也就是借助于旨在唤醒有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进一步改革的调查、抨击性文章和政论演说，来暴露现代社会的溃疡。这些“小事”被描绘为社会主义的措施，它们的使命是归根结底，用社会主义“浸透”英国的资本主义。同时，费边派又断言，他们所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对于英国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因为只有它仿佛适合于英国人民的性格、传统和历史。费边社起了资产阶级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主要传播者之一的作用，机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苗床的作用。列宁把“费边社”的观点和活动评定为“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①。恩格斯关于费边派写道：“害怕革命，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②。

社会民主联盟的成立。工人俱乐部 1881年在伦敦成立了

① 列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7页。

② 恩格斯：《致左尔格的信，1893年1月1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

“民主联盟”。它作为小的知识分子团体，存在了3年。它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海德门。海德门出版一个小册子——《大家的英国》，在小册子里，按照列宁的说法，他“转向社会主义，但依旧是个思想极其混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①。在1884年，这个组织采取了“社会民主联盟”的名称。

社会民主联盟并没有发展到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它教条地、当做药方和现成公式的汇集来领会马克思主义。其结果是在战略路线和战术上都有严重的缺点，妨碍联盟接近群众，特别是妨碍它对在80年代末展开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发生影响。1886年初，在经济危机又一次尖锐化的时候，联盟企图领导失业者的自发性出动没有成功。当1886—87年冬季临近，失业者又起来斗争的时候，社会民主联盟考虑到前一年的失败经验，展开了大规模的解释自己的纲领的运动。这个纲领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银行和铁路国有化、征收累进所得税、由国家保证失业者的生活，等等。联盟作了预先的准备之后，领导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示威，其组织性和群众性（参加者达10万人）给予资产阶级的舆论和工人很大的印象。

社会民主联盟重视罢工斗争，虽然一些领导者，在一个时期也包括海德门，认为罢工是有害的，因为它仿佛会分散“未来革命”的力量和削弱工人。远在自己活动的初期，在1884年，联盟就发表宣言，说工联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组织，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需要彻底改组。对工联作这样的评价，成为社会民主联盟分裂的原因：在1884年，从它里面分化出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同盟的首领是威廉·莫利斯——画家、诗人、实用美术的热心宣传家，他认为实用美术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用恩格斯

^① 列宁：《海德门谈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2页。

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感情的社会主义者”^①。威·莫里斯的政治观念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他认为工会是未来社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中间,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他们知道工联主义的弱点和缺点,同时也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真正发展道路,不应当是放弃工会,而应当是在前进中克服它们的缺点,吸引广大的无产者群众参加有组织的斗争。当无政府主义派在社会主义者同盟中占有优势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一派退出了同盟,回到社会民主联盟。

社会主义者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在80年代积极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到80年代末,仅在伦敦一地,工人俱乐部就达200个之多)。工人俱乐部积极起来保卫爱尔兰。示威和群众大会往往以同警察冲突而告终。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最大规模的示威(1887年11月13日)以后,工人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者同盟和费边社成立了“法律与自由同盟”,宣传建立不依靠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独立工人政党作为工人在议会中的代表。

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新工联主义 在80年代末,由于吸收非熟练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和组织他们加入工联,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转变的迹象。1888年,在东区(伦敦的无产阶级住区)的火柴厂中,女工举行罢工。由于女工参加了工联,罢工以胜利而告终。在1889年初,伦敦煤气公司工人的罢工也得到了成功。煤气工人工会立即博得了威信,开始迅速地增大,不久以后,它就同杂工工会合并了。几乎在同时,伦敦港的3万名码头工人开始总罢工,提出一系列的经济要求。他们对企业主的胜利,为新工联巩固了存在的权利。在1890年期间,有20多万非熟练工人组成了自己的工会。

新工联主义给英国工人运动注入了战斗精神。在1890—1891

^① 恩格斯:《致左尔格的信,1886年4月29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555页。

年，当企业主们由于周期性危机的来临而对工人的工资开始进攻的时候，工联就用罢工来作回答，按参加者的人数和他们的顽强性来说，这些罢工是宪章运动以来空前未有的。新工联是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拥护者。

独立工党的成立 在1893年1月成立了独立工党，矿工凯尔·哈第成为它的领导人。

新政党为了使人们不把它看作大陆欧洲的正式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民主党，宁愿不称作社会主义的党。哈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英国的条件。哈第的政治观念基本上是费边社的；费边派很快就在独立工党中稳固地扎了根，在那里占决定性的地位。但是，哈第与费边派不同，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由于改造资本家，而是通过逐步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方式，并依靠加入工联的工人本身分配劳动产品的结果而达到胜利。在实际上，是把一切全都归结于“工联主义政策”，即组织工联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中的政治代表，利用这些国家机关达到部分的改革。

独立工党的力量在于同工会的联系。工联代表大会在1893年通过关于捐助竞选资金的提案，是独立工党的巨大胜利。在这时期，独立工党参加了罢工运动的领导。它的鼓动员激烈地批判了工联的领袖和他们的“调和”劳动和资本的利益的路线。这个政党在存在的最初几年，就拥有将近两万名党员了。

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很深的。旧工联的领袖们继续保持自己的影响。在议会选举中，他们依旧支持自由党人，使独立工党的28名候选人在1895年全部落选。在1895年的工联加的夫代表大会上，决定今后只能选举直接在各该工会工作的人员作为代表大会的代表，“独立党人”因而受到第二次严重的打击。这项决定的目的，是使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的许多活动家离开工联的领导工作。当时还通

过一项决定：代表大会将要根据代表证书，即根据各代表所代表的工联的会员人数进行表决。在这种制度下，代表就有可能把他自己的意见冒充为各该工会的全体会员的意见了。

同时，新工联发生了一定的蜕化现象：在新工联中，抄袭旧工会的传统方法的机构扩大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官僚制度形成了。在 90 年代后半期，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由于粮食价格的降低（农业危机的结果）、工业萧条的克服和对殖民地剥削的加强而有若干增加，这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普遍低潮。

社会民主联盟还和从前一样，主要从事空谈主义的宣传，独立工党迅速地丧失了自己的战斗精神。它的领导权越来越转入了费边主义活动家的手里。

十九世纪 80—90 年代英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对工人贵族在工联组织中的垄断地位给予了第一次严重的打击。但是，这并没有导致英国工人运动的根本好转，也没有造成它同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

第十四章

德意志帝国的容克地主—资产 阶级反动势力。工人和 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

德意志的统一给予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以最强大的推动力。在 70 年代初，德国基本上是农业国家，它的大工业刚刚产生。到 90 年代，情况根本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完成了深刻的革命。

迅速的经济发展 德国产业革命开始得比较晚，但是，这种情况也包含着一系列的优越性。德国在实现自己的工业化时，广泛地借用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德国的工业是建立在最现代的技术的基础上的。

除了制铁和采煤而外，重工业的年青部门——电机工业和化学工业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在 30 年间，铁路线的长度增加了将近两倍。

不论在经济中，或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保存着极强烈的封建关系的残余。但是，甚至在这些条件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行政—法律制度的划一，都为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创造了前提。

从战败的法国取得 50 亿的赔款，引起空前未有的“开业狂”，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也促进了上述的一点。股份公司，主要是投机性质的，迅速和大量地产生了。夺取洛林及其最丰富的铁矿蕴藏，

在十九世纪末德国的经济高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地区的工业一年比一年增长。

与工业的发展同时,城市也增长了,全国的面貌改变了。工人阶级,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工业以及贸易和运输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895年,在国民经济的这些部门中从业的,已经超过人口的50%。

在这时期,除了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外,经济危机也席卷了德国,它阻碍了工业的发展。1873年的危机,按它的后果来说,是极为凶猛的,它的特别强烈,主要是在统一后不久就席卷德国的投机倒把的结果。在2—3年的期间,建立了大量的股份公司、银行、铁路公司、工厂、造船厂,正如恩格斯所写道,它们“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①。1873年的危机打断了“开业狂”。同时,这次危机,尤其是1882年和1890年的危机,有助于德国工业的迅速集中。

农业中的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是不同的,在那里,确立了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所谓“普鲁士道路”。在十九世纪末,全部农场的将近²/₃属于小农场(2公顷以下);他们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5.6%,而地主和富农农场(20公顷以上)的所有者把54.4%的土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容克地主的庄园在德国东部特别大。容克地主土地所有的保持,使无地和少地农民注定遭受苦痛的奴役。

德国工人的生活,比西欧的一系列其他国家和美国差。虽然有迅速的经济高涨和大量的移民,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失业后备军。工人的工资,把一切损失和扣款计算在内,往往少于最低的生活费。劳动群众的低的生活水平,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德国资本家们在国外市场中的利害关系增大了。

^① 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3页。

垄断组织的产生 从自己存在的最初起，德意志帝国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就遇到了非常的困难。德国资本在这次斗争中的工具，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费用（这是靠采用新技术、加强剥削工人阶级等等来达到的），另一方面是倾销（以抛售的价格在国外销售商品）。德国资本家竭力用提高同种商品在国内的价格的方法，来弥补自己在出口方面的损失。听从容克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德国政府，从 70 年代末开始实行高额保护关税税率。保护关税政策促进了由工业集中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来的垄断组织的生长。

垄断组织的建立在德国比在“老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开始得早一些，进行得快一些。例如，与英国不同，在德国的以生产集中的高度为特点的重工业部门中，垄断化进行得最为成功。例如，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地区采煤的集中导致了德国最大的垄断联合组织之一、在 90 年代初就已经把开采量的 87% 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的煤炭辛迪加的形成。在化学工业和电机工业这样的关键工业部门中，也强烈地进行了相同的过程。在德国，卡特尔是垄断组织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形式。在 1887 年有 70 个卡特尔，在 1896 年——250 个，在 1900 年——300 个。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和由于参加者相互斗争的结果，这些联合组织中有许多在当时很容易地土崩瓦解了。

在垄断组织的形成中，银行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因为工业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必要的积累和需要调动资金。因此，在德国，银行同工业很早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银行向工业企业提供长期贷款，竭力地控制它们，鼓励生产集中到同它们有关系的那些企业的手里。例如，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地区的重工业集中过程中，银行“贴现公司”是决定的力量。同时，银行本身进一步巩固起来。到十九世纪末，信贷业务的主要部分集中到同正在形成的工业垄

断组织具有密切联系的六大银行的手里。当时，资本向国外的输出也加强了。同 80 年代初比较，德国在本世纪末的国外投资约增加两倍，达 150 亿马克左右。

出现了控制一个甚至几个工业部门和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向国外输出资本的工业巨头和大银行家——施杜姆、基尔道尔夫、克虏伯、西门子、布累希烈德尔、汉泽曼等等。他们把主要经济命脉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开始对政府在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中所采取的方针发生重大的影响。

国家制度 德意志在普鲁士君主国和容克地主阶级的领导下的统一，给帝国的整个政治生活和国家制度盖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军阀支配了帝国的国家机器和军队以后，便竭力在全国推行在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反民主制度。第一任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他担任这个职务将近 20 年，直到 1890 年）是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的表达者。但是，考虑到在经济上已经巩固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俾斯麦竭力建立在容克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的两个阶级的联盟。资产阶级甘居次要的地位，因为害怕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产业革命的完成，导致了德国工人阶级在人数和成分方面的严重变化。产业工人的比重不断增长，在他们中间，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得到了最大的反响。加强了德国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同情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化的范例，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化有巨大意义。巴黎公社复亡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工人运动是在资本主义达到自己的发展的高度的时期展开的，这一事实是它的巨大优越性。

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依靠容克地主的国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他们不得不用对容克地主阶级的重要经济的和

政治的让步,去换取已经实行的对他们有利的措施。

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制度是由 1871 年 4 月通过的宪法决定的,这部宪法把普鲁士君主制的领导权固定了下来。普鲁士国王——而且只有他——可以根据宪法做德国的皇帝。他毫无限制地支配帝国的武装力量,有权批准或者否决一切法案、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普鲁士首相通常是帝国的宰相;宰相是唯一全德国的大臣(各部由只被认为是宰相的幕僚的国务相领导),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1871 年德意志的统一只是普鲁士专制的假面具。他写道:“……德国……要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①。

帝国宪法一方面保证最反动的阶级——容克地主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又有伪民主的外表。例如,它宣布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有普选权,但是,妇女、军人和 25 岁以下的青年完全不能够参加选举;况且,帝国议会的权限是大受限制的。

在占帝国领土将近 $\frac{2}{3}$ 的普鲁士,仍然保存着规定三级选举制的极端反动的 1850 年宪法。根据这种制度,容克地主阶级的代表的一张票在实际上等于劳动人民的几十张票。甚至俾斯麦有一回都说这种制度是“对常识的嘲笑”。但是,容克地主们却竭力反对修改普鲁士宪法的任何尝试。

然而,当政的容克地主阶级的代表者不能不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日益增长的和越来越明显的需要。在 1871—1873 年期间,发行了代替各王国和公国的多种通货的统一的金币,建立了统一的邮政制度,在 1875 年,建立了帝国银行,颁布了统一的刑事法典。进行编纂民事法典,但是,这个工作拖了 20 多年。在 1872—1875 年,实现了普鲁士各州的行政改革,它剥夺了容克地主由于旧

^① 马克思:《致不伦瑞克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870 年 9 月 1 日左右),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70 页。

的封建特权而属于他们的地方政权。

德意志军国主义 德意志在普鲁士基础上的统一导致了很久以前在普鲁士形成的军事制度、它的反动精神和侵略传统开始扩展到整个国家。不错,在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的个别国家(主要是南方的)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普鲁士军国主义影响的加强引起了不满情绪甚至分立主义的情绪,但是,整个来说,德国资产阶级积极支持了以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而居功自傲的普鲁士军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增长,给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力量。

容克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认为军队是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的最重要的工具。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巴黎公社;他们曾经帮助扼杀它,但是没有力量阻挡公社对德国和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的影响。公社覆亡以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停息,反而更加强了,这种情况在统治阶级的眼睛里只是提高了军队的作用,把军队当作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最可靠的武器。

从法国得到的 50 亿赔款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军人名额的扩大和军队的重新武装。在 1874 年,俾斯麦达到了由帝国议会通过将和平时期军队人数从 350,000 名增加到 402,000 名的法律的目的;同时,全国非常后备军的法案也被批准了。但是,关于七年间,即关于批准以后 7 年军费的法案,是当时军国主义集团所努力得到的主要新措施。这更加放松了军阀的手脚,使他们长期不受帝国议会方面的任何监督。在 1880 年,适应俾斯麦的需要的议会多数投票表决把七年法再延长 7 年。军队继续扩大,在 20 年间,它的成员增加了 50% 以上,而人口仅增加了 25%。

统一后的德意志的反动政治制度,使一些军国主义机构有可能把极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并对总的政治方针和具体政治问题的决定发生影响。宫廷军事委员会、德皇私人的军政室和

民政室，就属于这样的机构。成为反动派的棱堡和对外侵略的鼓动者之一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得到了巨大的意义。在这里，在毛奇、后来的瓦德西以及更后来的史里芬的领导下，制定了在两条战线上、对法国和俄国同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计划。以宣传军国主义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联合会，同总参谋部有密切的联系。支持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法国）的紧张关系对统治阶级是有利的——这可以为军备竞赛作辩护。

波兰西部地区的殖民化 准备指向东方的侵略，在普鲁士和德意志是和加强波兰地区的日耳曼化结合起来的。德国的合并主义者公开地以使波兹南、东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变为对俄作战的据点的“必要性”，来作为迫害波兰居民的理由。在 70 年代，对波兰人的迫害（这一时期，几乎完全禁止用波兰语文教学）主要是在向天主教会作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后来，这种迫害以日益增长的力量继续着，但是，已经没有任何的掩盖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们对波兰的劳动人民，实行社会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德国殖民者竭力要把波兰人赶出地方自治机关，在所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完全取消使用波兰语文。所谓“殖民协会”是在 1886 年建立的，把德国的富农农庄安置在波兰地区是它的目的。

所谓东部马尔克德国语文促进会对波兰文化进行了斗争。波兰的社会团体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在某些情况下，使波兰人从他们的土地迁到德意志的内地去。波兰西部地区在实质上是德国的欧洲殖民地。大叫大嚷地进行反对波兰居民的沙文主义运动的德国统治集团，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想在德国人民群众和波兰人民群众之间煽起仇恨，分裂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用民族主义的毒药来毒害他们。

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 参加保守党的容克地主们，在很长时期，连自己的一部分特权都不肯放弃。保守党人，

以自己的领袖埃伦堡伯爵和曼托伊费尔伯爵为首，在 70 年代期间反对俾斯麦所实行的政策，其中包括反对帝国政权的权限的扩大，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普鲁士的“轻视”。

早在 60 年代，就由一批从保守党中分化出来的政治活动家建立了“自由保守”党，又名帝国党（这个名称强调指出无条件地承认帝国）。那些认识到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的容克地主，和以克虏伯、施杜姆和卡尔道夫（后来领导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为首的一些最大工业家，都参加了帝国党。帝国党支持俾斯麦，俾斯麦从帝国党内选取了他的帝国政府的大部分内阁。

在 70 年代，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是俾斯麦的另一个主要支柱。这个党和它的个别活动家，例如米凯尔、卡尼格先，逐渐从自由主义发展到同反动容克地主阶级结成联盟了。最后，民族自由党人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纲领要求（包括：公民平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等等），而满足于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进步党还保持着一些反对党的性质；一部分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职员和工人支持它。例如，进步党人反对保护关税，反对扩充军队和增加军事预算。

在 70 年代，天主教中央党是独树一帜的，它聚集了极端多种多样的分子：西里西亚的地主—天主教徒，德国西部的资本家和被他们剥削的天主教徒—工人，巴伐利亚的农民。中央党由反动分子—教权主义者温德赫尔斯特、李伯尔等领导，他们的观点和要求最接近保守党的政治纲领。

“文化战斗”在 70 年代，中央党同大举迫害天主教会的帝国统治集团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措施得到了“文化战斗”的名称。在实际上，政府起来反对天主教僧侣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动机。

天主教会担心的是：随着国家政权的进一步集中，它的政治影

响就会下降，而新教的普鲁士的作用就会增长，因此，它支持反普鲁士的情绪。“文化战斗”的发动，是由于容克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企图打击在帝国的某些部分存在的反普鲁士的、分立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的波兰人、丹麦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居民中间存在，而且在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巴登人——在统一前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政令所达不到的各州居民中间存在。

“文化战斗”的目的之一，是引诱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迫切需要、放弃阶级斗争，使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宗教问题的方面去。

反天主教徒的第一个重要法案，是在 1872 年通过的。它规定废除天主教僧侣单独监督学校的特权。但是，帝国政权害怕同天主教会这个传统的反动势力的支柱完全决裂。因此，在整个“文化战斗”期间，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问题甚至都没有被提出来。

同年（1872 年），帝国议会批准了关于禁止耶稣会和其他修会活动的法案。1873—1875 年期间，又实行了一系列显著损害天主教会利益的措施。国家把训练神职人员的工作掌握到自己手里并由国家任命他们；限制了高级僧侣阶级对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权力，废除了宪法中规定教会自治的那些条款，颁布了关于结婚必须采用非宗教仪式的法律。

但是，俾斯麦并没有能够使天主教会服从政府。相反，对不驯服的天主教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政治压制和迫害，倒使拥护天主教会的人数增多了：中央党过去在帝国议会得 63 席，而在 1874 年得 91 席。“文化战斗”的另一个目的——引诱无产阶级放弃为本阶级利益的斗争，也没有达到。在 1874 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比 1871 年增加将近两倍。

社会主义宣传的加强、工人运动的积极化，促使反动力量团结

起来。中央党的活动家始终借口天主教会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铜墙铁壁”的角色,作为反对“文化战斗”的主要论据。该党的领袖之一在反对关于驱逐耶稣会士的法案时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因此,耶稣会士永远会成为‘国际’的最积极的反对者。”

从1876年起,停止颁布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帝国政府和教权主义者之间有了某些接近。后来,在“文化战斗”时期颁布的法律大部分都废除了。

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政党 在70年代上半期,爱森纳赫派——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展开了广泛的社会主义宣传,这种宣传促进了德国的无产者从拉萨尔思想的影响下面摆脱出来。消除分歧的可能性接近了,况且,过去使工人运动分成两派的主要问题——关于国家统一的道路问题,在1871年以后已经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在许多基层组织中都尽弃前嫌,两派的普通党员肩并肩地为反对共同敌人——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而斗争,在工会里一起工作。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统一是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实现的,在那里,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建立统一的政党符合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使工人运动上升到新的阶段。但是,基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犯了重大的错误,在统一的党的党纲中的一系列中心问题上,同拉萨尔派的领袖们谋取妥协。结果,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包含着大量错误的和有害的、早已被历史发展过程所推翻的拉萨尔的原理和教条。其中有这样一个论点,即宣布除了无产阶级而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①。如果工人阶级遵循这样的论点,这就会意味着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译者

他们使自己失去劳动农民这个同盟者。

哥达纲领还包括关于存在着“工资的铁的规律”的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工资永远是由工人维持生活所必要的最低生活资料来决定的。按逻辑说，这就意味着工人的经济斗争的徒劳无益和不需要了。在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用拉萨尔主义的精神来解释的；关于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是用建立“自由人民国家”和组织“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工人协作社”的空洞口号来代替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纲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马克思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它作了详尽的分析。

德国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形成，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新的高涨的起点。党在国家的所有工业地区的影响一直不断地增长。工人报刊加强了，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新工会、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机关产生了。

虽然加强了迫害，每一次的国会选举都不变地显露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增长。社会民主党在 1877 年约得 50 万票和 12 个议席，把进步党员和帝国党抛在后面，按得票数目成为国家的第四个政党。这种情况表明阶级力量的极化，社会主义者很成功地把从前受容克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民族主义蛊惑宣传欺骗的劳动人民的选票争取回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满意地指出社会主义思想的普遍传播，竭尽一切力量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消除党在统一时所犯的意识形态的错误。1877—1878 年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的、后来合成《反杜林论》一书的恩格斯的一系列反对杜林的论文具有巨大的意义；这部书的每一编讲述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杜林的糊涂观点是反动—空想的计划、庸俗唯物主义、黑格尔主义等等的混合物，它不仅流传在小

资产阶级中间,而且流传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因此,恩格斯的这部新的理论著作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

就整个来说,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健全的机体。它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经常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往来,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工人运动各种理论和策略问题的具体建议。

70年代末反动势力的加强。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 德国社会民主党很有把握地积蓄力量,这引起了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越来越大的惊慌。俾斯麦和他周围的人们决定急剧地加强镇压。为了这个目的,制定了旨在直接反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法案。它规定封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查禁工人的报刊,和其他一些同类的措施。在1878年春天,政府把法案提交给帝国议会。但是,它遭到很大多数的否决。进步党人,当时还是政府反对派的中派,甚至国家自由党人,全都投票反对这个法案,国家自由党人平常是支持俾斯麦的,但是在这一次,他们不愿意为必然引起整个无产阶级的愤怒的措施担负责任。

俾斯麦的政府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在1877年所选出的帝国议会方面的反对。在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垮台以前不久,帝国议会否决了政府关于对铁实行保护关税的提案。在不小的程度上,表决的结果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即:国家自由党议会党团的大部分人代表着海港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和那些不怕外国竞争并认为实行保护关税会恶化它们对外贸易扩张条件的工业部门(例如化学工业)资本家的利益。

可是,在与慢性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尖锐的经济危机年代里,从一方面,冶金工业的大资本家,从另一方面,急欲使因美、俄等国输入农产品急剧加强而引起农产品价格降低趋势停止下来的地主们,都越来越坚决地提出了关于规定高额进口税的要求。俾

斯麦政府表示愿意接受这些要求，它注意到了事情的政治方面和财政方面。俾斯麦考虑到：通过实行有利于容克地主阶级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保护关税政策的办法，可以巩固两个统治阶级的联盟。同时，保护关税（正如俾斯麦经常提高的间接税一样）应该是提供军事开支的新源泉。

日用品的显著昂贵是保护关税的必然后果，保护关税的一切重担都落到劳动人民身上，首先是工人阶级身上。统治集团的两个要求——关于提高进口税和关于制定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非常措施——意味着俾斯麦政府向更加反动的政治方针过渡。

俾斯麦毫无根据地把威廉一世被刺事件的责任转嫁到社会民主党身上，他利用这次事件，于1878年6月解散了帝国议会。在此后举行的选举中，国家自由党把自己的代表委托书失去了约 $\frac{1}{4}$ 。同时，大力支持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案和改行保护关税计划的保守党人和帝国党的代表权大大增加了。从这时候起，两个保守政党就成为俾斯麦的一切政治阴谋在帝国议会中的支柱，他有时也拉拢国家自由党人，有时又拉拢中央党参加那些阴谋。

在选举中的失败对国家自由党人发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他们再也不反对通过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了。1878年10月19日帝国议会批准这个法案，有效期间原定2年半；后来，议会几次把它延长。

新议会也向保护关税政策迈开了最初的步子。1879年，对铁、棉纱和粮食实行保护关税。国家的关税收入立即增加了1倍，而在1899年，它就已经比1879年的水平超过了4.6倍强。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加强军备。

采取对粮食的禁制关税使俾斯麦同保守派的政党更加接近起来。至于国家自由党人，保护税率的实行则引起了他们的内部分裂，这种分裂削弱了党，把它更紧地缚在政府的车轮上。有一批坚

持自由贸易的分子脱离了国家自由党。在 1884 年,这群人同进步党人和其他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共同组成了所谓自由思想者党。这个党的自由主义色彩往往帮助它把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是,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工人运动的加强,自由思想者党越来越不反对德国统治集团的反动政策,与国家自由党人同流合污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英雄时期” 在帝国议会通过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就把社会民主党原有的 47 种机关报刊查禁了 45 种,封闭了出版社会民主党文件的 16 个印刷所。警察在柏林实行所谓小戒严(后来,其他一些中心城市也实行了小戒严)之后,党的许多积极活动家被驱逐出首都。工会、工人的文教机关和合作社被解散了,警察没收了它们的财产。到处禁止工人集会。开始了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最残酷的迫害时期。

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在非常法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者进行的沉重打击,并未能阻挡住在德国开始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党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不仅能够坚持,而且大大增加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英雄时期”。

在最初茫然自失的党的领袖们,不久就放弃了被动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应当把合法机会——首先是选举权和帝国议会讲坛的广泛利用同对现存制度作斗争的非合法形式的运用结合起来。这些指示具有巨大的意义。必须建立适应地下环境的党组织体系,在德国境外出版能够向群众自由讲话和鼓舞他们参加斗争的党的机关报。但是,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国外机关报的发行会落到机会主义分子的手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领袖发出一封所谓通告信,坚决反对号召阶级和平和党停止地下活动的机会主义分子。通告信是对于重

新调整党的一切工作和党向积极策略过渡具有巨大意义的文件。

在 1879 年 9 月,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刊号出版了;它在苏黎世发行 9 年,后来在伦敦出版,直到 1890 年为止。最激烈的机会主义分子赫希柏格完全被取消了参加报社的资格,他那一派的人们在报社中失掉了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克服巨大的困难,不怕警察方面的迫害,在德国工人中间以及农民中间散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秘密文件。这个在非常法时期进行活动的所谓红色邮政——德国工人运动史中的光辉篇章之一,证明了许多万斗争的普通参加者的奋不顾身和英勇精神。当恩格斯说“……我绝对相信我们的群众,他们在同警察的这种游击战争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他们在革命经验方面不足的东西……”^①的时候,就是指的这种平凡英雄。

除了在国外出版机关报而外,1880 年在维登堡(瑞士境内)举行党代表大会,是党的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纲中所说的党只通过合法手段求得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原则,并依照倍倍尔的坚决主张,而把规定利用一切可行的斗争手段的一条加入了党纲。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自己不屈不挠地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团结而斗争,博得了德国工人巨大的爱戴。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时期,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特别有力地展开了组织的才能。从帝国议会的讲坛上,从党的报刊上,在工人的集会上,永远响彻他们向德国工人说明当前对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任务的声音。

自从党的工作改用革命方式以后,它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又开始不断地增长了。党在 1884 年的选举中达到巨大的成功,

^① 恩格斯:《致贝克尔(1884 年 2 月 4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第 355 页。

约得 55 万票。这次选举的结果十分确切地显示出：对工人运动作任何打击的反动政策都是要破产的。但是，统治集团仍然执迷不悟。工人罢工的起码权利常常遭到破坏；警察用反社会主义者法来限制罢工。在 1886 年，内政部长发布了旨在反对罢工的新命令。同时，俾斯麦采取“鞭子和糖果”策略，企图以所谓社会立法（对年满 70 的老人给予少得可怜的、由工人自己付出的养老金，等等）的小恩小惠阻止工人运动的增长。同时，政府在工厂立法和劳动保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沙文主义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盟”。俾斯麦的退职 在 1887 年，俾斯麦遇到了帝国议会对七年法的再度延长的反抗。反抗是胆怯和不坚决的：帝国议会同意增加几万名军队，但只批准了 3 年而不是 7 年的对这些军队的军事预算拨款。无论如何，这是政府威信严重下坠的象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首相很善于利用国际局势。当时，在法国，充满复仇思想的布朗热，展开了他在陆军部长职位上的活动。对于俾斯麦和他的周围的人们来说，这是促使德法关系尖锐化和在欧洲制造新的战争警报的最方便的口实。在 1887 年初解散议会以后，政府在沙文主义叫嚣的环境中进行了选举，迫害一切不赞成军国主义者的无理要求的人们。在“祖国在危急中”的虚伪口号下，俾斯麦把两个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结成了竞选集团——所谓政党联盟。它在一时之间，能够把中小资产阶级中很大一个阶层从自由党左派手中夺取过来。在新的帝国议会中，在“政党联盟”得到多数新组成的议会中，通过了政府的一切要求：批准了七年法，同意再度把粮食进口税大大提高（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议会的专门拨款以外，利用另外的资金扩充军备），延长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有效期限。

在这些事件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统治集团的反动的对内政策同他们所实行的外交政策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俾斯麦的手中，在国际局势尖锐化时期人为地煽动起来的沙文主义是对国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但是，俾斯麦在政治上得到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政党联盟”是利益在许多方面并不一致的力量的不牢固的联合。其中，关于关税问题的严重分歧已经不可避免，资产阶级对关税的进一步提高已经没有兴趣。由“政党联盟”议会的法律所引起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加强了工人本来就很大的不满情绪。1889年春天，在德国开始了罢工运动的猛烈高涨，——鲁尔、萨克森、西里西亚、萨尔各地矿工的罢工，随后，建筑工人、冶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罢工。在一年之间，发生罢工约一千起，参加者达30万人以上。这个在当时来说空前未有的罢工运动的规模，表现出以引诱工人脱离斗争为目标的“社会立法”以及镇压无产阶级的残酷措施的破产的整个深度。尽管多年的迫害，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巩固下来了。

俾斯麦拼命继续过去的严厉政策。但是，在1888年登极的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认为进一步执行这种政策是危险的。他主张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其中包括加强社会的蛊惑宣传。首相和威廉在对外政策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反映出统治阵营中的深刻分歧：是像俾斯麦所主张那样，今后仍然以欧洲为德国扩张的主要对象呢？还是像皇帝本人也随着重工业的大资本家表示同意那样，应该认为整个世界是德国扩张的范围呢？

在1890年，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又到了失效时期。因此，政府提出把这个法律改为经常生效的法律的计划，为了转移视线，给予法案以稍微缓和的形式。俾斯麦考虑到，即使在反动的“政党联盟”议会中，也有否决法案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准备实行政变：解散帝国议会，取消普选权，对工人运动的先锋队进行肉体的迫害。但是，这些计划没有遇到害怕迎头痛击政策的威廉二世方

面的支持。在 1890 年 1 月，帝国议会拒绝政府恢复非常法，这使俾斯麦的政策完全垮了台。1890 年 2 月举行的选举，给参加“政党联盟”的政党带来了毁灭性的失败。不久以后，俾斯麦就辞职了。

“新路线”和随后 90 年代反动势力的加强 接替俾斯麦的新帝国首相——卡普里维将军，在强烈打击德国出口的经济危机时期开始自己的活动。为了回答德国对农产品所规定的保护关税，俄国和一系列其他国家在德国工业品实行了禁制税率，这种情况是德国对外贸易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有势力集团的不满情绪，表现于他们要求同外国（包括俄国在内）缔结足以保证德国工业品拥有稳定销售市场的贸易条约。尽管大地主反对，卡普里维政府满足了这些要求。1891 年德国同奥匈、意大利、比利时、瑞士，1893 年同罗马尼亚、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缔结了贸易条约。条约规定相互降低关税（德国方面——降低农产品关税）。1894 年同俄国的贸易条约，是卡普里维任首相时期的这类条约中的最后一个，它引起害怕俄国粮食出口商竞争的容克地主的特别愤怒。

在对内政策方面，90 年代初是以政治统治短时期的某些“缓和”为标志的。“非常法”的破产，在 1890 年全年期间坚持罢工斗争的工人阶级的进攻热情，引起了“自由主义”。威廉二世为了收买人心，核准对无产阶级的某些让步；它们是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禁止 13 岁以下儿童劳动，妇女规定 11 小时工作日，等等）。但是，工人没有停止斗争。

统治阶级丢掉“新路线”，又开始草拟反工人法。在 1894 年，德皇周围的人们制定了“防止图谋推翻现行制度”法案，这是反社会主义者法的翻版。卡普里维深信用迫害的方式不能摧毁德国的无产阶级，他反对这个法案。

这彻底破坏了由于容克地主的阴谋在以前就已经动摇了的首相的阵地。在 1894 年，年老的公爵、过去任阿尔萨斯—洛林总督

的霍恩卢埃接替了卡普里维的职位。在霍恩卢埃任首相的时期，对工人运动的迫害大大加强了。在1897年，根据德皇的建议，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被称为“苦役”法的反工人法案；法案用惩罚作威胁：只是参加罢工，就判处3年以下徒刑；对“主谋者”——判处6年以下徒刑。法案被议会否决了，因为中央党和“自由思想者”害怕在他们具有影响的那些选民阶层的眼睛中完全揭穿自己。

9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改纲领的必要性成熟了。这个问题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认为拉萨尔主义的原则变成了党进一步发展为战斗的革命力量的严重阻碍，使党纲摆脱一切拉萨尔主义的原则是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新党纲是1891年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比哥达纲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拉萨尔精神根本被消除了，把关于夺取政权、关于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为党的最终目标的条文列入了党纲。但是，在爱尔福特纲领中，缺少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最重要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也缺少作为德国工人阶级当前斗争目标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和其他一些要求。这是对于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机会主义作出的最严重的让步。机会主义的代表者企图使党相信“现代社会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坚决批判了这种观点。可是，机会主义者以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的成功（1893年得1,786,000票，1898年得210多万票）为口实，继续自己的有害活动。他们反复说，只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谐”道路适合于德国。在90年代初期，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是这类观点的表达者；他要求放弃革命的策略，并竭力吹嘘反动政府同自由资产阶级合作实行改革的作用。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倍倍尔，驳斥了福尔马尔的妥协主义立场。但是，党的首脑作了机会主义的动摇，其中包括表现在关于五一罢工的问题

题上。在 1892 年,党的柏林代表大会就以经济危机的不利条件为借口,公开反对五一罢工。而在实际上,党的许多首领是害怕新的迫害,企图根本阻止积极的革命发动。所谓自由工会的领导也站在机会主义立场,自由工会在人数上增长得特别迅速(在 1891 年,入会者为 277,000 人,而到 1900 年,达 68 万人以上),但是,它变成了改良主义思想的集中点。

下层工人对自己的战胜反动势力怀着合理的自豪心情,他们充满战斗精神。在 1890—1893 年危机时期所展开的,以顽强和持久为特点的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表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倾向。虽然存在着机会主义分子,这种倾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占有优势。

资产阶级支持改良主义者,以为他们的加强可以改变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内容。在那时候,在自己存在的初期,垄断资本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超额利润分给无产阶级上层——熟练工人阶层。这为修正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 90 年代末,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表述了修正主义的基本原理。修正主义者所攻击的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局部的方面。他们攻击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攻击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主义者企图证明,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越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会改善,阶级矛盾就越会缓和,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仿佛就有可能“长入”社会主义社会。

虽然在党的队伍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得到正式的批驳,但是,没有一个人,包括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在内,提出关于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这些代理人绝裂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最积极地反对修正主义。

统治阶级“团结政策”的开端 在 90 年代,当明显地表现出德

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跃进性的时候，它的向外扩张具有特别积极的性质。十九世纪末德国对外贸易总额比70年代的水平超过1.5—2倍。在俄国、奥匈、丹麦、瑞士、瑞典、罗马尼亚的输入总额中，德国占第一位，它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中成功地挤掉了自己的竞争者。德国的工业公司又用自己的商品充斥了从前由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更遥远得多的市场——中美和南美、东方各国。

虽然按照国外投资总额来说，德国大大落伍于英法两国，但是，在一系列的地方，它已经令人感觉到排挤竞争者了。在欧洲，德国的投资额大大超过英国。由于德国缺乏富庶的殖民地，它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面向徒具独立之名的软弱国家，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它们成为经济上的附庸。因此近东（首先是土耳其）、远东（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成为英—德争夺投资范围的主要舞台。

德国资本和容克地主阶级的以军阀为靠山的领导集团，以在欧洲和其他大陆进行普遍扩张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寻求聚集自己的力量、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和对外实行侵略政策的途径。这种表明帝国主义特征不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方面都日益增长的反动方针得到“团结政策”的名称。重工业界的大资本家——克虏伯、施杜姆，德国最大银行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和容克地主阵营的一系列活动家，是这种政策的鼓舞者。“团结政策”的拥护者提出建立巨大的海上舰队、再度提高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和进一步进攻工人的生活水平与政治权利，作为首要的任务。统治阶级坚决地主张建立能够推行“团结政策”的政府。海军上将、海军建设计划的起草者梯尔皮茨，和外交大臣、以德国外交界领导人的资格宣布了关于给予德国“有阳光的地方”的要求的标洛，都被提到首要的地位。

政府认为得到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是自己的任务之一，没有

它,就不可能由议会通过海军建设的拨款。在1898年春天,“团结政策”在这方面得到了成功:中央党支持梯尔皮茨的方案,因而在议会中得到多数。政府方面也竭力讨好中央党,对教权主义作了一些新的让步。

1898年由议会通过的庞大的海军计划,规定在5年期间建造主力舰19艘,岸防装甲舰8艘,重巡洋舰12艘和轻巡洋舰30艘。但是,在1900年,梯尔皮茨的新计划就以军舰建造数目增加一倍为目标了。同时德国增加了自己的陆上武装。到90年代中期,和平时期的陆军人数超过了55万。服役期限由3年改为2年,这就大大扩充了后备军干部的名额。对陆海军的支出越来越占国家预算的大部分。1879年军事拨款为42,800万马克,而1899年达到了92,600万马克。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军国主义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巨大力量。

反动的思想体系也适应于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在十九世纪末,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仇视人类的学说在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他那充满对人民、对革命的憎恨的哲学,包括着公开宣传力量的崇拜和种族主义。在1860年就已经死去的阿瑟·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在这时候也有了巨大的影响。叔本华同尼采一样,否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任何规律性,否定在历史中的进步。

90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以在德国人民中间宣传侵略行为、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论证”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的侵略主义的要求,发扬披上几分现代化外壳的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传统为目标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最好战的是泛德意志协会,它简直成为宣传扩张主义、军国主义和武装侵略思想的司令部了。协会的首脑是克虏伯康采恩总经理胡根堡,以及大资本和容克地主—军国主义集团的其他代表者。泛德意志协会广泛利用

关于德国人比其他一切民族优越的种族主义“理论”，竭力在思想方面准备实现德国资本的吞并纲领。泛德意志协会的成员们还支持建立一个旨在以“联合”为口实而使一系列欧洲国家从属德国的所谓“中欧”的思想。

容克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都接受沙文主义思想体系，积极地支持军国主义。只有德国的工人阶级表现出是黷武主义、没有限度的军备竞赛、对劫掠和暴力的崇拜的始终不渝的反对者。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许多代表，从议会的讲坛上揭露了军国主义者的罪恶阴谋和活动。同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出现了机会主义的虫伤，这种虫伤的发展和加强对反动力量是有利的。

第十五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

法国虽然在 1870 年战争中失败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仍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它丧失了自己以前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意义。这与在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严重过程有关系。

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 在十九世纪最后 33 年间,法国工业品的产量大见增加。在法国北部各省,即法国的煤炭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心,经济的进步特别显著。生产集中的过程还不断地继续着。在工业中,蒸汽发动机的功率增加了 4 倍多;到十九世纪末,在里尔地区的纺织企业中,集中已经达到如此的程度,有一半生产设备被集中在 6 家最大的企业里。但是,同其他的大国相比,法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集中的速度慢得多。

在 70 年代初,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第 2 位,仅次于英国。到十九世纪末,它被挤到第 4 位。法国工业企业的多数还属于工人不足百名的小型 and 中型的一类。在巴黎,成为法国输出的最重要项目之一的奢侈品的生产依然广泛地发展着。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比较差,因而加强了机器的进口额(从 1890 年到 1900 年,它增加了将近 2 倍),是法国落后的指标之一。

在法国农业中,小农户和细小农户保持着很大的比重。1893 年,占地不足 5 公顷的 400 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71%)只拥有

650 万公顷土地，而 85 万富农户和大农户则拥有 3,680 万公顷。小农户担负抵押的债务，到十九世纪末增至 250 亿法郎。70—90 年代全欧洲的农业危机，在法国的农业发展中十分沉重地反映出来。另外还加上由霉蚜的传播所引起的葡萄栽培业的危机；1879 年采摘的葡萄还不到平常收获的一半。

在农业危机以后，开始改种收益更大的农作物，扩大了畜牧业、蔬菜栽培业、果树栽培业，也就是比较最适合集约经营的那些部门扩大了。农业机器的数目增加了。

但是，少地的法国农民的基本群众依然没有作技术和农艺改进的资金。按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来说，法国占欧洲最末的地位之一。同时，农业仍然是全国大部分人口的占优势的 职业，在 1896 年，从事农业的人口还占总人口的 60—61%。

在对普鲁士的战争中的失败，沉重的 50 亿赔款，失掉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及其巨大的矿藏，再加上国家在天然资源方面的相对贫乏，特别是缺乏炼焦用煤，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国的经济发展。土地所有的细小性质是法国落后的严重原因，它使农业的集约化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发生困难。同时，细小土地所有制推迟了小农“积累”的变成资本，限制了生产集中的可能性。

人口增殖率极低是法国近代史的突出特点之一。在 1870—1900 年间，它只增加了 200 万人，而在同期，德国的增殖为 1,500 万人以上。

银行的作用和资本输出 在法国，比较高度集中的工业部门，首先是冶金工业、采矿工业、以及在法国经济中最重要 的纺织工业。70 年代，在这些部门里也产生了股份公司——未来的垄断组织的萌芽。远在 1876 年，在朗威就建立了联合 13 个最大钢铁企业的冶金辛迪加。在法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银行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按银行事业的集中水平来说，法国走在其他

国家的前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 30 年间, 3 个最大的法国银行——“里昂信贷公司”、“全国贴现局”和“总公司”所吸收的资本数额从 42,700 万法郎增加到 23 亿法郎, 还不算它们在 1900 年拥有的 61,500 万的固定资本在内(在 1872 年为 2 亿)。银行资本越来越常常同工业资本交织在一起, 最大的银行家同时成为工业公司的大资本家。例如, 在 1899 年, “总公司”、“全国贴现局”和其他各大银行的经理参加了 60 个冶金、煤炭公司的董事会, 是巴黎—地中海铁路的经理, 等等。到十九世纪末, 几家最大的银行在法国的金融市场上占有统治地位, 掌握着全国国家的财政后备不下 $\frac{3}{4}$ 。“过剩”资本通过银行, 向国家公债和国外投资涌去, 这比直接对法国工业投资获得的利润要多得多。

正如列宁所指出, “**财政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而工业资本在衰退着)**”^① 是这一时期法国经济发展主要的特征。法国资本主义的高利贷性质是法国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最重要原因。

与分配外债的业务有关的大银行家是已经形成的金融寡头的基本核心。1892 年, 法国出售的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总额达到 770 亿法郎(而投入工商业的资本为 66 亿法郎), 其中外债占 210 亿。到十九世纪末, 法国的国外投资额增长到 270—280 亿。它们主要具有贷款的性质; 投入外国工业和法国本国工业的资本, 为数都不大。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在人口增加迟缓、工商业和海运等等停顿的情况下, ‘国家’却能靠借出高利贷来发财。”^② 已经形成的金融寡头发财最多。但是, 以取得股票和债券的利息(“剪息票”)为自己收入的主要项目的较小的有价证券持有人, 也分得国外投资利润的一部分。相当大的一个寄生阶层——由中等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载《列宁全集》, 第 22 卷,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261 页。

② 同上书, 第 225—226 页。

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食利者阶层形成了金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依靠他们。

法国变成了欧洲的高利贷者；法国的资本首先正是投入欧洲国家的。法国统治集团竭力鼓励资本的输出，利用它作为外交斗争的工具——拉拢同盟者的手段。这也就是法国资本加强投入俄国的目的之一，截至1900年，在俄国的投资达70亿法郎，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投资都要多。法国的银行为了追求利润，甚至不拒绝向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敌对国家贷款。它们甚至向德国的工业家们放债，用这种方式促进“世仇”的武装。法国在奥匈的投资额也极大，截至十九世纪末，约为25亿法郎。

在同一时期，大大加强了殖民扩张。在1860年，法国的海外领地为241,800平方公里，居民340万人。到十九世纪末，法国已经占有巨大的殖民领土——370万平方公里，居民5,640万人。按殖民地的面积来说，法国稳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它远远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保卫共和国的斗争 小生产在经济中的巨大比重，决定了法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间阶层人数众多，结果，就存在着许多的政党、集团和派别。

保卫共和国的斗争是70年代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在镇压巴黎公社以后，有势力的反动集团宣布君主制度的意图大大加强了。在1871年2月选出的国民大会中，保皇分子占绝大多数。他们分成三派：正统派（“正统的”、“合法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奥尔良派（恢复路易·菲力浦的继承人的拥护者）和波拿巴派。这几派的意见分歧给君主制度的复辟造成了困难。但是，法国人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广大群众的共和主义，是复辟阴谋破产的主要原因。给国家带来民族灾难的第二帝国的例子，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也反对君主制度，他们首先是由

于害怕法国无产阶级有再闹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忠心耿耿的奥尔良派分子梯也尔，也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复辟是不可能的。具有君主机构的共和国、“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从梯也尔和支持他的资产阶级集团的观点看来，这就是法国国家应有的形式。

在梯也尔任总统的整个期间，法国的 39 个省戒严。1872 年颁布一项法律，它威胁说，宣传社会主义要处以为期 2—5 年的监禁。反动派企图使社会主义运动完全陷于瘫痪。

1873 年，在法国提前向德国支付了 50 亿赔款以后，占领军便撤出了法国的领土。为了支付赔款，间接税大大提高了，国债增加了，它的偿还也落到人民的肩头上。

尽管梯也尔的政策具有一切反动性质，而君主军事独裁的拥护者对他并不满意。他们被给共和党人带来成功的补选的结果吓坏了，要求实行更“强硬的政策”。在 1873 年 5 月，麦克马洪元帅担任总统，他是保皇党人，是色当惨败的罪魁和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开始直接准备保皇党人的政变。甚至定造了迎接国王的轿式马车，制成了带有相应纹章的帽徽，作出了国王礼服的样品，等等。但是，资产阶级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害怕新的革命，不愿意去恢复君主制度。已经准备好的政变的策动者们又确认了军队对阴谋的否定态度，他们没敢起事。

在 1875 年期间，国民大会通过了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同 1789 年和 1848 年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相比，1875 年的宪法倒退了一步，这个事实鲜明地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意图的发展情况。1875 年的宪法没有包含直接指明国家制度的形式的条文。只在规定总统选举程序的一条中提到“共和国”一语，同时，这一条是以仅仅 1 票多数通过的。总统得到广泛的权力，直到解散众议院的权力。规定每隔 7 年，由两院议员联席大会选举总

统。反动分子赋予第二院——根据新宪法成立的参议院以特殊的意义，第二院不是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而是由自治市代表选出的。被赋予极广泛的权力的参议院，能够阻止众议院的一切活动。妇女和军人没有参加选举众议院议员的资格。

但是，在法国存在着保皇派政变的实际威胁的条件下，1875年的宪法具有若干进步的意义。在1876年的议会选举中，共和党人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占少数的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在议会选举以后，曾经企图建立麦克马洪的专政。总统迫使由温和派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茹·西蒙主持的政府辞职，恢复保皇党人德·布罗伊公爵的政权。所谓“五月十六日内阁”的新内阁从众议院中得到了不信任的表决。于是，经参议院批准，众议院被解散了。冲突具有极尖锐的形式。对内阁投反对票的363名议员，向全国发表一个宣言。广大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立场，决定了有利于共和国的斗争结局。1877年的选举给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带来了新的胜利。

恩格斯对于坚决反对保皇派阴谋的法国工人阶级的“本能的**政治觉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共和党人的胜利同时也是法国农民阶级在政治方面有了进步的证据，这种进步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1877年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农村居民变成共和主义派了^①。具有反君主制度情绪的军队的立场，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麦克马洪于1879年1月提前退职，就是保皇集团方面对于这一事实的承认。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代表茹尔·格列维接替他；这一派的其他领袖组成政府。

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激进派为反对派 于是，政权转入了这样一个政党的手中，它在为共和国而斗争的时期，由于提出撤消

^① 参看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2—153页。

参议院、教会同国家分离、征收累进所得税等等要求，而给自己博得了声望。但是在实际上，执行这样的纲领并不符合与大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意图。

温和派共和党人把他们所允诺的改革推迟到“适当的”时机，这使他们得到了“机会主义者”的绰号。在重新兴起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他们在 1880 年通过了关于大赦巴黎公社参加者的法律。1884 年通过关于工会合法化的法律，以及稍微限制对儿童和女工的剥削，也都具有这样的不得已的性质。他们允诺政治制度民主化，结果只不过实行了参议院全部议员由选举产生这一点（根据 1875 年法律，一部分参议员是被圈定的，终身连任）。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百分之百地实行从帝国时代继承来的最严格的集中管理，这种制度使政府所任命的省长变成省内完全的主人。

共和党人机会主义者的政府为了执行大资本的意旨，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公司发财的措施。在 80—90 年代，不断地提高了间接税。生活费的上涨是实行保护进口税的结果。

温和派共和党的影响开始低落。党的领袖甘必大的过去声名已经如此地暗淡无光，以至在 1881 年，在他的选区贝尔维尔的竞选大会上，工人们不准甘必大讲话。能够使机会主义者还保持着一些群众基础（包括在知识分子进步阶层中间的群众基础）的唯一的東西，是反对教会影响非宗教学校的斗争。在 1880 年，政府违反参议院的意志，实行了关于解散耶稣会以及其他修会的法律，这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有可能把自己描绘为“黑暗势力的反抗者”。过了不久的时间，各修会又复活了。

在 80 年代初，实现了旨在推行普遍、免费、非宗教教育的改革。这种改革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推行得很慢，没有足够的规模，并且不完备。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不再记得自己关于使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要求。肮脏的财政黑幕和诡计逐渐暴露出来，这些丑

事通常总是牵涉到在国家机构中占据最大职位的人们。

群众（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中间的日益尖锐化的意见分歧中得到了自己的反映。在 1876—1877 年的选举中，他们是团结的阵线，可是，在 80 年代初，急进派议会党团脱离了他们。急进派依靠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依靠农民的一些阶层和工人，作为政府的坚决反对派出来发言。

急进派的领袖若尔日·克雷孟梭在 1870—1871 年任巴黎无产阶级住区之一（蒙马尔特，3 月 18 日起义就是在这地区爆发的）的区长。虽然在公社时期，他也采取左摇右摆的“中立”立场，在 70—80 年代，他在工人中间还享有很大的威信。在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间，克雷孟梭是把一些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的最初的人物之一，这些要求是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如：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取消常备军以及缩短工作日、工会活动合法化，等等。

殖民扩张 在 1881 年的选举中，温和派共和党人又得到了胜利，但是，不能认为胜利是稳固的。急进派在众议院中获得 50 席，他们的影响继续增长。人民群众的不满促进了这一点。人民群众不仅对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对内政策不满，对他们依照大资本的殖民侵略野心所确定的外交方针也是不满的。

茹费理是这种政策最有力的传导者。在 1881 年，当他初次主持政府的时候，不经众议院表决，就占领了突尼斯。接近政府的金融家们对于有利于他们的侵略行动预先作了准备，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从前为突尼斯发行的债券，结果发了大财。法国殖民扩张的全部历史都贯穿着这种鬼域伎俩。在 80 年代，法国殖民者又侵入尼日尔河流域、刚果河流域和撒哈拉，对马达加斯加进行第一次远征。

法国在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特别广泛地展开了殖民扩张，远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殖民者就在那里落了户。从 80 年代初起，法国加强了自己的完全征服整个越南的企图。在这时候，它遇到了越南人民本身以及中国的有力抵抗。在 1884 年，法国向中国开战，企图迫使中国放弃它对越南的主权，不再帮助越南进行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但是，殖民者并不容易战胜越南的爱国者和中国的部队，法国的军阀再三遭到失败。

茹费理的殖民冒险行为十分不得人心。这种冒险使大银行的利润增加，带来了赋税的进一步增长和许多人命的牺牲。此外，这种政策导致了法国同英国和意大利的关系的尖锐化。

1885 年，当传来法军在谅山（印度支那）大败的消息的时候，在法国引起了不满的猛烈爆发。茹费理的政府垮台了。虽然如此，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仍然继续着。在残酷的和顽强的殖民战争以后，整个越南被征服了，已经正式地变为保护国。到 90 年代末，东部印度支那在实际上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这是“为了交易所投机生意”^①的殖民侵略，“最卑鄙的殖民主义和财政掠夺”^②政策。

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引诱法国脱离欧洲的事务，削弱了它在欧洲的力量。1875 年国际局势的尖锐化就已经表明了德国方面的先发制人战争的严重危险性，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有同盟者，不可避免地遭受新的失败。不愿意德意志帝国加强的俄国和英国的外交干涉，预先防止了这次战争。在 1877 年，德国再一次企图利用法国的内政困难对它进行打击。因此，在法国的统治阶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 年 9 月 18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第 331 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7 页。

级中间，加强了同另一个大的欧洲强国结成反德同盟的愿望。可是，走上殖民扩张道路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竭力同德国接近。

工人党的建立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成立没有导致法国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作日的时间为每天 10—12 小时，甚至更长些。到 90 年代初为止，法国在实质上没有社会立法，缺少对不幸事故、疾病、年老等等的保险。

在公社以后的最初几年，当反动派特别猖獗的时候，工人运动的可能性是极有限的。但是，在 7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小组在国内又已经活动起来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茹尔·盖德和保罗·拉法格广泛地展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在 1878 年由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于巴黎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者——生产资料公有化拥护者的一派积极地发了言。当时，这一派还是少数。可是，盖德及其追随者的坚持不懈的活动，不久以后就带来了自己的果实。在 1879 年末于马赛举行的下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集体主义者所提出的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化，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这证明，普鲁东主义的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急剧下落了。

马赛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党的决议，批准了它的党章。这次大会成为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转折点。下次大会的任务是通过党纲。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草案（草案的序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更彻底得多，也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它的讨论是在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残酷斗争中进行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竭力把自己的观点注入纲领，但是，他们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在 1880 年的加夫尔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中有一些如拉萨尔主义的工资的“铁的规律”之类的错误观点，但是就整个来说，

这个纲领对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政党的活动是必要的基础。

工人党面临着严重的思想斗争。在起草纲领的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流派的领导者贝努阿·马龙，特别是保尔·布鲁斯（在第一国际中，他们是巴枯宁主义的拥护者），就已经反对革命的策略，赞成以微小的改革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坚持所谓“可能”（possible）政策，这个政策给布鲁斯和他的拥护者带来了轻蔑性的“可能派”的绰号。

工人党中两派的斗争，在 1882 年定期代表大会的时期导致了分裂。由盖德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在很长期间被称为盖德派）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写道：“意见分歧完全是原则性的：斗争是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象机会主义者那样（翻译成社会主义的语言就是：象可能派那样），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呢？……团结一致——假如有可能，当然是好事情，可是还有比团结一致更宝贵的东西”^①。盖德派的组织保留了“工人党”的名称。

在工人阶级中间，还有第三个流派——布朗基主义。布朗基本人在出狱以后，没有活多久，在 1880 年就死去了。可是，当巴黎公社社员开始从流放中回来以后，布朗基主义者的政治势力又增强了。在巴黎公社社员中间有许多布朗基主义者，其中包括公社的著名活动家爱·瓦扬。

摆脱了可能派以后，工人党更加完整统一了。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区，它的影响特别增长了。这一时期，盖德派领导了几次大罢工。在 1886 年第加维尔的矿工罢工时期，他们起了巨大的作

^① 参见《恩格斯致 A·倍倍尔》〔1882 年 10 月 28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3 页。原文在“把运动的阶级性”前还有“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一段文字，引用时被砍掉了。

用,这次罢工持续了几个星期,使全国动荡起来。政府派兵镇压罢工工人。资产阶级急进派发表反对罢工者的言论。只有工人党的活动家为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其中包括保·拉法格,他以“乱管闲事”的罪名被投入狱中。第加维尔罢工的结果之一,是在众议院中成立了独立的工人党团,而且有几个在急进派候选人名单上当选的社会主义者参加。急进派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开始下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急进派、克雷孟梭等人丢了丑,结果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任何宣传家也办不到的事:法国工人们脱离了急进派。”^①

尽管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集团的抵抗,由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逐渐地产生了代表法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但是,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批判了工人党领导者的错误、他们的不灵活性、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立场、不理解局势的具体特点。在 80—90 年代的政治危机时期,这些缺点暴露得特别明显。

布朗热主义 不论是急进派或是社会主义者,都未能掌握在国内日益增长的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策的不满,更何况盖德派在巴黎的阵地是十分软弱的。在法国的这个情况中,与布朗热将军的名字有关的运动非常迅速地增长起来。

爱好虚荣和没有原则的升官主义者布朗热,在多种多样和阶级利益相互矛盾的集团的巨大不满的浪潮中,骤然飞黄腾达起来。最初,布朗热博得“左派”将军的声名,因而在 1886 年当上了陆军部长。后来,他企图利用法国的外交孤立达到蛊惑宣传的目的。布朗热和他的亲信——由沙文主义者戴路列德领导的“爱国者同盟”开始煽动沙文主义和军事复仇的情绪。这引起了温和派共和

^① 《恩格斯致左尔格信》(1886 年 4 月 29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3 页。

党人的不安。1887年夏天，布朗热被免去陆军部长的职务，改任驻在外省的军团司令。

布朗热利用“被迫害者”的光荣，使自己的声誉更加增大了。在当时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中，群众性的“布朗热主义者”运动开始增大了。这一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可是，工人阶级中被布朗热的“民主”声誉所吸引的某些阶层也开始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特别是在首都和北方的工业省份）。布朗热主义者提出了修改宪法和召开立宪会议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广泛利用了1887年末围绕着茹·格列维总统所展开的巨大的政界丑闻，总统的女婿几乎公开地出售荣誉军团的勋章。格列维不得不辞职，这导致了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威信更大地下降。

恩格斯称布朗热为“假英雄，假将军，浑身是假”，是“同极端共和主义者、教权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同一切人同时搞阴谋”的饶舌家，而整个运动的基础是“沙文主义的，决不是别的”^①。布朗热起初同急进派有联系，过了很短时期，他就同反动的教权—君主集团达成协议了。教权—君主集团企图利用居民的广大阶层的愤懑，以便消灭共和制度和恢复君主制度。

1889年1月27日巴黎补选时，布朗热得到约25万票，这一天他达到最大的成功。一部分部长惊慌失措，准备离开自己的部。但是，布朗热没有决定发动政变。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惊魂甫定，就决定消除来自布朗热方面的危险。他们揭露了这位将军同保皇集团的联系，那些集团为他的活动提供资金。这些揭露引起布朗热运动拥护者人数的急剧减少。政府用逮捕威胁布朗热，他逃往比利时，甚至在自己的拥护者眼中都威信扫地了。在1889年的选举中，布朗热主义者完全失败了。

^① 参看《恩格斯和拉法格的通信》，载《历史档案》（俄文），1956年，第2期，第6、27、8各页。

在布朗热运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者中间发生了极深刻的意见分歧。可能派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政策，参加全共和派的资产阶级联盟。一部分布朗基主义者参加布朗热派，但是，以瓦扬为首的多数起来反对布朗热主义者。盖德派提出“在鼠疫与霍乱之间不能挑选”的口号，采取中立的态度。

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法国外交政策 布朗热派危机成为法国改变外交政策方针的推动力。殖民扩张的巨大支出、赋税的增长导致了温和派共和党人阵地的削弱。这促使他们寻找新的、还没有被利用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方法。温和派共和党人考虑到复仇的口号促进了布朗热运动的成功，就决定由他们自己提出这样的口号。这时，他们以下列事实为借口，即：德国军国主义者没有放弃关于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思想。1887年的战争警报特别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从这时起，法国资产阶级开始坚决地努力同沙俄建立密切关系，同沙俄的同盟可以特别巩固法国在欧洲的外交阵地。在两国政治接近以前，随着俄德两国政治和财政联系的减弱，法国资本对俄国加紧了扩张。俄国工业和沙皇政府的主要债权者的角色从柏林移转到了巴黎。

法俄两国关于同盟问题的长期谈判，导致了在1891年协定的缔结，协定规定：一旦缔约国一方与某一第三国（指德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应予援助。在1892年，签订了军事专约，又过一年，正式批准了这个专约，于是，法俄同盟彻底形成了。

稍后，法英两国也接近起来：在1898年由法绍达引起的、几乎导致战争的尖锐冲突之后，法国政府把让步当作上策，于是，在1899年，法英两国缔结了关于划分在热带非洲的势力范围的协定。这一协定为五年以后建立旨在反对共同竞争者——德国的英法协约开辟了道路。

与法国的殖民冒险和它的对外政策积极化同时发生的，是军备的不断增长。远在 70 年代，就进行改组军队，实行义务征兵制，服役期 5 年。1889 年服役期减到 3 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拥有军队 60 多万人，即比 70 年代初期多 20 万名。军事开支大大增加了。

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 布朗热主义破产以后，资产阶级政党重新部署。在教权—君主集团中，承认现行的共和制度和为了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而与温和派共和党人合作的倾向加强了。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促进了这一点，他在 1892 年发布了一个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别通谕。

当政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和君主主义者集团善于利用无政府主义分子在 90 年代初期所搞的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恐怖事件引起的惊慌。在 1893—1894 年，以“反无政府主义者法”为借口，解散了巴黎的职业介绍所（首都工会联合会）和实行了其他一些反动措施。

还在这以前，在 1891 年，警察就袭击工人的五一示威。在法国北方的工业小城富尔米枪杀手无寸铁的示威工人，是当局的暴虐的特别令人愤慨的事件。但是，这种野蛮的镇压只是加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保罗·拉法格由于发表保卫富尔米工人的言论而被捕，但在最近的补选中，他以极多的票数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 1892 年，卡尔莫煤矿区开始了具有政治性质的罢工；这次罢工延续了 3 个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在这次罢工期间，让·饶勒斯出了名。在 80 年代，他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但是，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影响下，他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以所有热情支持卡尔莫的矿工们。

1893 年的议会选举给法国社会主义者带来了很大的胜利。这次选举是在揭发巴拿马运河公司事件之后不久举行的。1888 年，

这个拥有 80 多万小存户的储金的公司停止了支付。已经开始的审讯被故意拖延了几年,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公布公司给与巴黎资产阶级报纸津贴以及它向部长、众议员和参议员行贿的丑恶事实。从此以后,“巴拿马”一语就变成表示金融家的肮脏诡计的代名词了。

在新的众议院中,有 12 名工人党的代表,其中包括盖德。其他各社会主义组织——可能派、布朗基派等等,也有同样数目的代表当选,除此而外,还有 25 名所谓独立社会主义者,他们脱离了急进派,成立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党团(在 1889 年的选举中,各派社会主义者共得 10 席)。“独立社会主义者”党团的领袖是亚·米勒兰,后来是最反动的政治活动家之一。盖德派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同“独立派”联合成一个党团,这犯了重大的错误。由于如此,社会主义党团的领导权就落入与工人阶级的事业背道而驰、仇视马克思主义、把党团活动引进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轨道的人们的手里。恩格斯^①极端反对盖德派同“独立社会主义者”合流,因为这会使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从属米勒兰派。

当时,盖德派还犯了另外一些错误。为了增加选票的数目,他们宁愿在最重要的纲领原则(其中包括在法国具有特别意义的农民问题)上让步。例如,在 90 年代上半期,工人党通过了特殊的土地纲领;虽然制定这一纲领的事实本身表明盖德派意识到争取农民阶级的重要性,但是其中包含着一系列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偏差。纲领的基本原则归结于支持小的农民所有制。在自己的著作《法德农民问题》(1894 年)中,恩格斯揭露了盖德派纲领的错误,并且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保护劳动农民不受剥削,但是不能向他们隐瞒:摆脱奴役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把个体经济变成

^① 参看《恩格斯致左尔格信》(1893 年 12 月 30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第 275 页。

公有经济^①。

盖德派利用从政府取得的建立工会的权利，进行了组织工会的巨大工作。盖德派的影响扩大到了远在 80 年代建立的全国工团（工会）联合会。但是，盖德派没有能够巩固这种影响。反映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混入各工团以后，就开始宣传经济总罢工仿佛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的思想，号召完全放弃政治活动，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无政府主义者用他们所组织的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同盖德派所领导的各工团相对抗，这样分裂了工会。在 90 年代中期召开的、解决关于统一问题的工团和职业介绍所代表大会上，盖德派成为少数，他们并不继续斗争，而退出了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建立的法国总工会落到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手中，这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德雷福斯案件。十九世纪末的政治危机 在 90 年代末由于所谓德雷福斯案件产生的政治危机的时期，很鲜明地表现出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在 1894 年，总参谋部的犹太籍军官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以给德国当间谍的罪名，被判处终身流放鬼岛（在新喀利多尼亚岛附近）。德雷福斯的无辜虽然有一系列的证据，而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教权主义的力量，反对重新审查所作的判决。德雷福斯案件把国家分成两个阵营。法国的所有先进人士——艾·左拉，安·法朗士以及其他的人们，都在宣告德雷福斯无罪拥护者——打退反动派的进攻的德雷福斯派的人数中。左拉英勇地发表以“我控诉”三个字开始的致共和国总统福尔的公开信，对于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这个可耻案件的真实情况具有很大的意义。当时旅居法国的安·巴·契诃夫写道：“绝大

^① 参看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莫斯科 1955 年版，第 433—437 页。

多数知识分子都站在左拉一边，相信德雷福斯的无罪。左拉声名大振，他的抗议书好像一阵清风吹来，每个法国人都感觉到：人间毕竟还有正义；如果发生冤狱，总会有人出来说话的。”

反动派企图利用已经造成的情况来破坏共和制度，他们挑起许多次街头冲突。

德国反动集团也不愿意水落石出。在 1898 年，德国外交大臣标洛写道：“如果此案拖长，瓦解法军和使欧洲陷入窘境，那就太好了。”

因要求案件更审而展开的运动，开始发展为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发展为政治危机。后来，列宁写道：“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只要反动军阀千百次无耻行为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只要有一个‘意外的’、‘微小的’缘由，就能激起人民直接去进行国内战争！”^①

盖德派，正如在布朗热主义时期一样，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德雷福斯一案仿佛同工人阶级无关。饶勒斯采取相反的立场。他把自己的巨大热情的所有力量，他把自己所有的顽强性和坚决信念，都投入了争取宣告德雷福斯无罪的斗争中。但是，饶勒斯在这时候往往忘记了无产阶级在展开的斗争中的独立的阶级立场。

法国统治集团的最显著的代表意识到，政治危机的发展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极不希望的后果。他们认为最好是在关于德雷福斯个人命运的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便逐渐消灭民主运动。在 1899 年，成立了瓦尔德克—卢梭的内阁，瓦尔德克—卢梭是著名的律师，十分灵活和机警的政治家，同大资产阶级的有势力集团关系密切。参加这个内阁的，除了巴黎公社的剑子手加里非将军而外，还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79 页。

有社会主义者米勒兰——这是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中破天荒的事情。新政府通过了关于更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决议，希望以此“平息”民愤。同时，用加强反教权主义斗争的方式，作了吸引群众的注意力的尝试。

拉拢米勒兰入阁的目的是加深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欺骗工人阶级和巩固改良主义分子的阵地。这给工人阶级带来极大的损害。列宁写道：“客观上历史已经向工人阶级实际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而米勒兰主义者却用微小的社会改良的诺言来诱骗无产阶级离开社会主义变革。”^①

米勒兰的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所谓米勒兰的特殊机缘(casus)，在实际上是从修正主义者当时所宣布的完全修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中产生的。列宁写道：“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较发展的政治条件，所以他们能够立刻过渡到‘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以及由它产生的一切后果。”^② 法国资产阶级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耍手腕的艺术，利用米勒兰分子的合作来摆脱第三共和国所陷入的严重政治危机。

①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8页。

② 列宁：《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0页。